目次

第二篇　各論・各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第三節　南北戰爭後的經濟發展

第三篇　結論·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矛盾的嚴重化

第一篇 概論








第一章 導論

——經濟史的方法論——

第一節 歷史和歷史學

歷史是繼續不斷的社會發展過程。歷史的現實——現在，是從永刧的（一去卽不復返的）過去發展來的到達點，這是既存的東西；同時，其中還包含着進展到將來的萌芽，因而這又是漸次成長的東西。社會歷史的現實，決不是和實踐的意志相分離的。因爲社會歷史，決不像自然那樣，由於脫離了人類的意志，永久循環而成立的。它是由於人類的實踐，追求想實現的事物，而包含有發展到將來的現實。故歷史中不祇是「有，」而且還包含着「將有；」不祇是「存在，」而且還包含着「正在創造中的存在。」

歷史學就是研究這個繼續不斷的發展過程的學問。但是，要澈底認識這個發展過程，就必須了解推動歷史的主要因素是甚麼，就是說，必須先把握其內在的矛盾才行；這是對過去的回顧，同時也是向將來的展望；是觀念的，同時也是實踐的；是理論的，同是也是歷史的，換言之，只有在這兩者之辯證法的統一上才可能把握歷史。

歷史學的任務：第一是在研究過去藉以知道現在是怎樣發展來的，而破除一切事物固定不變的謬論；第二是在「溫故知新，」卽由於檢討過去的長期發展過程，發見其演變進化的法則，從而可能推測將來，預知將來，更進而支配將來

其次，歷史學是最具體的科學之一，它是說明人類行爲發展過程之現實的實證的科學。歷史學的任務，雖是在說明人類的實踐

活動，是最具體的科學，但在使歷史的材料構成爲一種體系的時候，決不祇是冗雜羅列一些史實就算了事，卻必須利用這些具體資料，作一種抽象化或普遍化的工作。經過這種抽象工作（依據實踐的）所達到的普遍豐富的結論，我們可能發現歷史發展的法則。這種法則，貫澈表現在具體的歷史活動中，構成爲研究歷史的出發點和基礎。而且這種法則決不能跟現實的歷史相分離，我們必須注意它的歷史性和社會性。

這樣，歷史學的基本任務是在發現和說明歷史發展的法則，在特殊的各種社會經濟機構上，採取着怎樣的特別的具體樣式而表現了出來。只有這樣歷史學才可能昇高到歷史科學的階段；同時，這也就是歷史學之所以成爲歷史科學的主要根據。

那麼，歷史的發展法則是什麼呢？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的動力是什麼呢？各種各派的歷史觀，就是替我們解答這個問題的歷史學說。

第二節　歷史觀

第一項　自然條件的歷史觀

人類社會建築在自然的基礎上，社會的歷史，決不能脫離自然的環境，沒有自然便不能想像社會與歷史，因爲沒有社會的自然雖能存在，但是沒有自然基礎的社會和歷史，是決不能存在的。

自然可分爲二大類：第一是內在的自然，卽人類本身；第二是圍繞人類的自然，卽外部的自然。外部的自然，從經濟上看來，又可分爲下列二大類：

（一）肥沃的土地，魚類豐富的河海湖沼等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

（二）急激的瀑布，能夠航行的江河，森林，炭坑，金屬礦山等勞動工具的自然富源。

在生產力微弱，文化發達的初期，因爲人類對付自然的能力非常薄弱，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曾具有極大的意義；但在生產力發達的階段，勞動工具的自然富源，却具有決定的意義。（註一）

注目於自然條件之重要的一些學者，認爲推動歷史的根本原因，是自然條件。這種自然條件的歷史觀，可分爲下列兩說：（A）人種說（Rassentheorie），（B）環境說（Milieutheorie）。

（A）人種說——人種說的代表學者是奧大利的Gumplowitz。此派學者，認爲人種的差異，在歷史的發展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的條件。其理論根據，大概是說：世界各處，都有種種不同的人類居住，然而有的國家，曾作了大的發展，而有的國家，不是被消滅，就是發展很慢，進步遲緩，其根本原因，完全在人類的特質如何，人種的優劣如何。

但是，人種學說，不能解答這兩個問題：第一，今日號稱文化最高的白種人，他們的古代文化，爲什麼決不及今日所謂「文化落後」的中國人的古代文化？其次，爲什麼今日稱爲文化低劣的黑種人，在印度和埃及等地，在古代曾創建了比較高級的文化？第二，如果認定人種的特質，是決定人類歷史的根本因素，那麼，具有這種特質的種族，應該在全部歷史過程中顯露其特質，但是爲什麼同一種族，有時很隆盛，而有時又很衰弱呢？例如，同樣的斯拉夫民族的勞動大衆，爲什麼在帝俄時代，那樣的愚昧無知，而在今日的蘇聯統治下變爲這樣進步的了呢？這個問題，都是人種學說不能解答的。如果要想貫澈人種學說的說法，必須把人種的特質也作爲在各個時代，因該種族的生活條件的不同而變化才對。但是，生活條件如何，是由當時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主要地是由在生產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生產關係來決定的。因此，所謂「人種是歷史之最後的決定要素」的人種說，是不能成立的。

（B）環境說——這種學說主張：圍繞人類的外部的自然條件，是決定歷史的根本原因。環境說中也有種種的不同，有拿地理條件來說明歷史的，有用氣候來說明的，更有把其他的自然條件，作爲歷史推化的基本要素的。在這裏，我們以 Bodin, Hippokra-

tes, Montesqieu, Buckle, Ratyel, Semple, Cunow, Plekhanov 等等，作爲環境說的代表者，略述其主張的大要。

最初闡明社會進化上的氣候原理者是 Bodin（1530—1596年）他認爲酷熱的氣候足以引起各種迷信的信念。寒冷的氣候，則產生粗暴的意志力，溫和的氣候，是構成理性發展的基礎，換言之，溫和的氣候，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條件。北方地帶，產生戰士和工人；南方地帶，產生詩人，僧侶和藝術家；溫和地帶產生立法家司法家和學者式的領袖。(註二)

其次，Hippokrates 也首先以氣候的寒暖，決定國民的性質；其次以土地的形狀及自然中所存在的糧食等，決定人類的體質及性情，從而制約人類的行爲，更定各種社會關係，以決定歷史的發展。據 Hippokrates 說，亞細亞人之所以沒有歐羅巴人好戰，就是完全因爲一年中的氣候，沒有大差異的緣故。(註三)

Montesquieu（1689—1755年）在其名著法律的精神（Spirit of Laws）一書中，曾闡述自然環境影響之重大，他說，「寒冷的氣候，會收縮身體外部纖維質的最外層，由此增加纖維質的彈性，並且有利於血液從身體表層流轉到心臟。反之，溫暖的空氣，會鬆弛和伸張纖維質的力量和彈性。結果，在寒冷氣候中的人們比較的更強有力。」當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北方人民移到南方去的時候，他們比南方人還要軟弱，據此可知氣候影響於人類及歷史的因果關係之大。Montesquieu 更舉一例，說明地理的條件，是影響於歷史進化的。他說，雅典的民主主義（Democracy）之所以發達，就是因爲土地的生產力較弱的緣故。斯巴達（Sparta）的貴族政治之所以盛行，就是因爲土地的豐饒。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土地豐饒的地方，人民都很溫順，不大愛惜自由，因此支配權容易落到少數人手中。然在土地貧瘠的地方，人民深恐土地更加荒廢，且怕外敵侵入，所以一般人民，常在緊張狀態中，因此不肯把支配權交與一人，於是全體人民，大家都得參加政治，民主主義卽易於成立。其次，Montesquieu 更從氣候的寒暖，來說明商業，宗教，婚姻等等問題。他認爲氣候是決定歷史進化上的基本因素。(註四)

其次，Henry Heomas Buckle（1821—1862年）的著作，很廣泛而詳細地解釋着地理的，自然的因素左右人類生活的情形。

他認為可能有力地影響人類的物質因素有四：氣候，食物，土壤和自然界的普通現象。Buckle 所陷的偏執，由 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年）加以充分的發展，他同樣地極力主張自然條件是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站在同一立場的 Miss Ellen Semple，在她所著的地理環境的影響（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一書中，曾提出自然界影響人類的各種方式的標準說明。其他如 Ellsworth Huntington 也認爲自然的地理環境，是強有力地影響社會進化的重要因素。（註五）不但這樣，就是德國卡爾學徒中有名的學者 H. Cunow，也偏於自然主義的立場。Cunow 是承認唯物史觀的，因此他認爲：社會的基礎是在生產關係；但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建築在生產力上面的。生產力的決定要素，是生產手段，換言之，便是技術，（照他看來）因此他認爲技術是很重要的。不過他以爲這種技術，是更由自然條件來決定的，所以他極力說：比如沒有岩石、木材、礦物的地方，技術便不能存在。他這種說法，假如貫徹下去，則各種自然條件便成了社會進化的根本原因。機械論者，Plekhanov, Bucharin 等的學說中，也顯示出同樣的地理的唯物論的傾向。Plekhanov 說：「地理環境的性質決定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則決定着經濟的，以及隨着經濟之後與夫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又說：「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着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則是由地理環境的性質來決定的。」（註六）這樣，照 Plekhanov 看來，地理環境，通過生產力而決定社會的發展。其次，布哈林一方面把社會解釋爲：「基於人們之間非常長期的相互作用上的廣汎的相互作用的體制，」而以均衡論爲唯一的社會的規律性同時，更站在生產力之自然的，技能的立場，認爲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的被動的反射作用，因而達到了自然條件，技術決定社會發展的結論。

在近年，許多學者根據自然條件的差異，強調各資本主義國的特殊性。其次，Madjar, K. Wittfogel 等等，則以黃土，灌溉，治水等自然條件爲主要的根據，想說明中國和東洋社會的特殊性，因而創倡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的學說（參看第六章）這些都是想以自然條件來說明歷史的一種企圖。（註七）

上面的各種環境說，在十八世紀的法國，許多啓蒙的機械論的唯物論者，大都採用。他們都以外部的各種自然條件，來說明當時

社會現象和歷史發展的原因。這是從封建的束縛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對於近世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立與發展曾有極大的貢獻。而且，環境說較之中世紀神學的歷史觀社會觀是一種極大的進步，它是想科學地研究社會發展的第一步。

環境說雖較中世紀的神學的歷史觀前進一步，但其根本錯誤，是把自然條件或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過於誇大，而誤認它是社會進化的根本因素。

不用說，社會的成立和發展，是以自然爲其基礎，人類社會決不能脫離自然的環境。衣食住等一切的生活資料，都是自然的產物。自然物也好，人類所生產的東西也好，總要由自然的環境而規定其性質。但人類社會和動植物的社會不同：後者只是被動地受自然環境的影響；而人類社會則以勞動工具積極地作用於自然界，由改變自然環境來適應自然。例如：開墾山林原野，治水灌漑，農耕牧畜等，Engels 在其名著自然辯證法上說：「人類把自己的印跡加在自然界上：他不但移植了動植物界，而且還改變了自己產生地域的形狀和氣候，並且在人類行動底結果只能隨着全地球的毀滅和消失以前，甚至也改變了動物和植物。」這樣，人類社會，由於生產力的發達，技術的進步，漸次不受自然環境的直接影響而獨立。故人類在自己與自然之間，創造出人爲的環境。自然環境雖是人類社會成立的前提條件，但不能夠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社會的生產方法，才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原因。例如：（一）非洲的北部，都知道有不毛的沙哈那沙漠。在游牧的阿拉伯人居住的時期，農業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偶然有點水的地方才有草原。但在法國侵佔北非洲後，他們用最新銳的掘井法，掘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取水，掘鑿水井，實施人工灌漑，栽種着繁茂的椰子，把不毛之地，變成了良園美土。（註八）（二）在美國大陸上，從很久很久以前就埋藏着豐富的資源，在西歐的技術未輸入之前，這不過是死的埋藏物。良質的煤炭也好，英國地理環境的特殊性也好，只有由資本主義的成立，才對於英國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所以自然力，若是聽其自然，決不能成爲推動歷史的基本原因，「對於自然力，必須加以社會的統制，節約；並藉人類的手的勞作，把它大規模地佔有，則致這種事實，才是在

產業上，負擔着最決定的任務。」（註九）因此我們知道自然條件的影響，決不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它是因社會發展的不同而變化的。所以卡爾說：「自然的制限，跟產業的進步成比例地退却。」（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四七九頁中譯四二一頁）

其次，歷史告訴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差不多相同的幾個國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水準却有極大的差別。

「假使拿埃及和塔吉克蘇維埃共和國底地理環境來作一比較，我們就發見很多類似之點。兩地都是溫熱的氣候，都出產棉花，葡萄和蜜柑，礦產也相當類似的。可是就生產力發展底水準而言，埃及跟塔吉克是完全比不上的……兩個地理條件類似的國家，其中一個是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發展着繁榮着，另一個則貧乏下去，崩潰下去，這當中的原因何在呢？從地理環境中去找原因是白費力氣的。這些原因存在於兩個國家底內部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組織中。塔吉克的經濟操在社會主義國家底掌握中，這一國家曾經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根絕了人對人的剝削。塔吉克在它的發展上是毫無束縛的，它爲着全體勞動人民底利益服務。塔吉克底全部自然財富都是爲着它們的自覺的、有計劃的利用而被開發出來的。惟其如此，所以從前的落後和被奴役的塔吉克，現在却不斷地發達和繁榮起來了。

相反的，現今埃及全部政治和經濟的結構都是用於剝削的；埃及人民的汗血和埃及土地的天然肥沃性，都被剝奪乾淨，以滿足英帝國主義者和埃及的地主和資本家底慾壑。惟其如此，所以埃及日益貧困了，每況愈下了。這就是說，社會的發展，依賴於地理環境的影響，遠不及它依賴於內部社會生活組織之大。這就是說，地理環境的影響，並不是一種不可改變的東西，它是隨着那支配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的組織而改變形態的。」（註十）

最後，自然條件，地理環境之多少重大的變化，需要幾千年幾萬年的悠久時期；而人類社會制度之極重大的變化，少則數年，數十年，多則有幾百年或千餘年已經足夠了。在三千年內，歐洲已經換去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而在蘇聯，打倒資本主義制後，已經換去了四種不同的社會制度。

這樣，相對地看來，不變的自然環境，決不能成爲常變的歷史發展過程的法則。（註十一）所以我們畢竟承認：自然條件會影響於人類社會歷史，但以自然條件來作爲推動歷史車輪的基本動力，却認爲是不正確的見解。

第二項　個人主義（英雄論）的歷史觀（註十二）

所謂個人主義的歷史觀，是以最出色的歷史人物，名君，英雄，將軍等等的行動，作爲決定歷史發展的基本力量的一種歷史學說，站在這個立場的學者，認爲只有「英雄，」只有傑出的人物（例如拿破崙，華盛頓等，）才是歷史上唯一的積極創造力量，成千成萬的羣衆，不過是消極的被人領導和統治的「羣盲」或「愚衆」。因此，他們的主張是：「英雄造時勢，」而個人的行動就能制御着歷史的車輪。這種歷史觀，是不是正確的呢？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

本來，個人在歷史中作用的問題，是和歷史的偶然性的意義問題相關聯着的。例如：法國在七年戰爭中的失敗，是因爲路易十五世時代法國軍隊的腐敗，而這個腐敗，是由於法國封建制度的腐爛，以及當時在軍隊和國家機關中佔領導地位的貴族的墮落。單是這些一般的原因，已經可以解釋法國在七年戰爭中的失敗了。但當時無才能的將軍能在軍隊中佔據高位，祇是因爲他們有宮庭的個人關係而決非有才能之故。這種事實，自然是和當時法國社會制度的性質有關係的。同樣，因爲這種社會條件，所以皇帝的寵幸者如保弄都爾一類人能够影響戰爭的進程，能够使法國和奧國聯合起來去反對普魯士。路易十五世的個性如對於寵愛者愛好等，這並不是法國社會發展的結果，這是一種偶然的事情。法國的皇帝，也可以沒有這種特性的。類似的事情，可以在我國清末的宮庭中看出。

其次，伊里奇在一九一八年說到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比較容易的原因時，會指出過這樣的事實：就是在當時俄國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之上，有那羅曼洛夫（沙皇）那樣的廢人，像 Kerensky（宰相）那樣誇口與說空話的人。一九一七年整個俄國的學

帝和統治者，是否是那樣一個廢人呢？從俄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看來，這不是必然的結果，這也是偶然的事情。

其次，一個有才幹的人或無能力的人，在社會上，可能發生的作用及其意義，是由社會條件來決定的。（如在資本主義國家，尤其在法西斯支配下的德國，許多優秀人材反被遺不用，無才幹的人反居高位統治大衆，）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的偶然機遇，特性和才能，可以影響歷史發展的進程，但這種影響的可能性和範圍，是由這個社會組織的形式來決定的，社會形式則決定於國內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而階級力量的關係，是依生產方法為基礎的。因此，歷史偶然性的存在，並不取消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反之，我們只有把這些偶然性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連繫起來看，才能對這些偶然性有正確的了解。

正是某個偉人在某個時候，出現在某個國家，這是純粹的偶然現象。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取消，那末，這個要求還是有的；而且還會有人來代替他，而代替者——無論好壞在相當時期內是可以找到的。拿破崙，正是他做了軍事獨裁者，被戰爭消耗以後的法蘭西共和國，需要這樣一個獨裁者，這是一種偶然。如果沒有拿破崙，那末，他的作用會被別人來完成的。這是無疑問的，因為無論什麼時候，如果需要這種人，這樣的人纔能找出來的：凱薩爾，奧夫古斯特，克侖威爾等。

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常常是在世界歷史或者個別歷史的轉變關頭出現的：如果沒有那些偉大的社會運動，被深刻的社會需要所引起的運動，那末那些歷史的人物，就不能顯露自己的聰明和才能。如果沒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那末世界就不會知道絲消奧匹爾管理國家的才幹，不會知道拿破崙的軍事天才，他也只好當一輩子的普通軍官，或竟至實現其跑到俄國當兵的企圖。

其次，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一定的尖銳程度，而無產階級在歐洲先進國家中，作為新的歷史力量，踏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才能出現科學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大名才會傳揚到後世。所以[illegible]說：「當我們談到關於研究歷史的人物們衝動——自覺的或不自覺的——的原因時，因此也就是歷史事件真正的最後原因時，就不需要注意個別份子的衝動（雖然他們極爲出色），而應當注意的，是推動廣大羣衆——整個民族和這民族的整個階級，參加運動的那些衝動。同時，帮

裏不應當重視短時期的爆發和很快就過去了的騷動，而要注意造成偉大歷史變革的持久運動。尋找那些原因，明顯的或不明顯的，在直接的或在思想上的，也許是幻想的方式，在羣衆的腦筋中在羣衆領袖所謂偉人們頭腦中所反映出來的意識的衝動——這就是研究一般的歷史法則和個別時期或個別國家的唯一道路，」（註十三）

這樣，我們認爲：過於強調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之個人主義的歷史觀，也是一種不正確的議論。

第三項 「政治史觀」

所謂「政治史觀，」是主張政治關係，政治權力，暴力，軍事征服等乃推動歷史車輪的基本動力的一種歷史觀。這種主張，又可稱爲暴力學說或權力學說（Gawaltitheorie）其內容紛繁，總不外主張：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因是在經濟外的政治關係上，在政治權力的支配上，因無既存的適切名稱，我們暫定名爲「政治史觀。」

Eugen Duhring 是站在「政治史觀」立場上的代表學者之一。他說：「政治關係的形態，是歷史的基礎。經濟的附帶關係，祇是它們的結果，或是特別的情形，所以總是次要的事實。」（註十四）故 E. Duhring 認爲：在歷史上，政治關係的形態，是最基礎的；經濟關係，不過是第二次的基礎。推動社會歷史的最原始的東西，應求之於直接的政治權力，不應該先求之於間接的經濟關係。經濟的理由，不能說明人與人的關係和歷史。

其次，Frang Oppenheimer，亦以政治的權力或暴力作爲歷史發展的根本基礎。他在其著書國家論（Der Staat）上，即以同樣的理論，說明國家之成立，是因爲强大民族，憑藉暴力，强制弱小民族隸屬於他們的結果。同樣，以征服的結果，來說明階級國家之成立的，還可舉出 Karl Krusky 的名字，Kautsky 在其著書唯物史觀第二卷第四章上說：「最初的階級和國家，是由相互的征服及課稅行爲結合起來的各種族而形成的。」因此，他否認 Engels 在原始共產體內部生產力的發展上發現了階級和國家的發生原

因，却說什麽：「從原始共產體內部發生的各種原因來說明階級和國家形成的企圖，不能得着滿足的結果。」所以他主張「把國家的發生和階級的出現，還元到征服。」顯然的 Kautsky 的見解，可說是和 Dühring 及 Oppenheimer 這類人的暴力說，征服說「不謀而合。」

不錯，「暴力是一切舊社會在懷孕新社會時的產婆。」（註十五）但是，暴力本身，只能幫助新生產關係的生產，却不能創造新的生產關係。例如：以戰爭與奴隸制出現的關係來說，在社會生產力非常低度，一人的生產物只能供給一人糊口之用的階段，根本沒有剝削他人勞動力的餘地，故戰場上獲得的俘虜，都一律弄死不要。Engels 說：「以前都不知道怎樣處置軍事的俘虜，或是把他們殺了，再以前簡單地把他們吃了。但是在已有的「經濟情形」的階段上，他們得到了某種價值；所以俘虜留得了性命，而由人來利用他們勞動。這樣，暴力非但沒有統治經濟情形，而且反被迫爲經濟的目的服務：奴隸制於是發明了。」（註十六）據此可知決不是戰爭創造了奴隸制，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才是使俘虜變爲奴隸，使奴隸制得以出現的主要原因。同樣的道理，「顯明的，在掠奪者佔有別人的財富時，這個私有財產，先應該存在；所以暴力雖然能夠變更所有者的面目，可是牠不能造成私有財產本身。」（註十七）這就是說，暴力不能產生新生產關係，從而不是推動歷史的根本動力。

第二，「暴力不是簡單的隨意的舉動，它的實現，需要非常眞實的先決條件，就是說需要某種工具。……完美的暴力工具（或簡稱武器）的生產者，戰勝不完美的武器的生產者；換句話說，勝利根據於武器的生產，而武器的生產又根據於一般的生產，所以也就是根據於「經濟的力量」「經濟的情形，」或暴力所有的物質資料。」（註十八）所以 Engels 又說「在事實上，在暴力的本身裏面，什麽是「首要」的呢？首要的，是經濟的力量，以及利用近代工業力量的可能性。」（註十九）

第三，至於以征服來說，「一切的征服，有三種形態的可能。征服民族使被征服者從屬於自身的生產方式（例如在今世紀——十九世紀——愛爾蘭和一部分在印度的英國人那樣）或者是征服民族，使舊日的生產樣式繼續下去，而以朝貢爲滿足（例如土

耳其人羅馬人那樣）或者在那裏起着一個交互作用，發生一個新的綜合（例如一部分像日耳曼人征服的那樣）在一切的場合生產方式，——是征服民族的也好，或是被征服民族的也好，或者是由此兩者融合而用生的也好，——對於從新實行的分配，是決定的。這個分配，雖表現為新生產期的前提，但其本身，仍是生產的所產；不只是歷史的一般生產的所產，而且還是一定的歷史的生產之所產。例如在俄國以荒廢為事的蒙古人，是和他們的生產——這只要以廣大而無人跡爲主要條件的放牧場就夠了的——相照應而行動的。……在某個時期，據說人們只由掠奪而生活的，這是一種傳統的觀念。但是，爲了要能夠掠奪，必須有掠奪物存在，即必須有生產存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上的這一段名文，雖是在說明征服在歷史發展上的一些作用，但決沒有說在社會更進一步的發展上，或在這種那種生產方式的形成上，征服會起着決定的作用。征服的結果，因勝利者與敗北者的生產條件不同而發生種種（三種）差異。故征服雖於歷史發展上有若干作用，但決非決定歷史的基本原素。

根據上述觀點，我們斷言以政治關係，權力暴力征服，等等政治的因素，來作爲推動歷史之根本動力的所謂「政治史觀」，也是一種極不正確的歷史觀。

第四項　「第三史觀」

所謂「第三史觀」，主張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有能動的作用，即認爲生產關係有自動的作用，更進而主張生產關係被人口的因素所決定；而且人口因素的本身，帶有自己運動的性質。故所謂「第三史觀」主張人口直接決定生產關係，它是社會的下層建築；至於經濟的動靜，不過是這個下層建築的運動之一種反映而已。因此，人口的因素，是決定社會發展，人類歷史的最主要原因。——這就是所謂「第三史觀」的主張的概略。據個人所知道的日本反馬克斯主義陣營的健將高田保馬（帝大教授）主張此說最力，他認爲這種「歷史觀」，既非唯心史觀，又非唯物史觀，故自稱爲「第三史觀」。

當然，人口的變動，要影響到社會的發展或阻滯。但是，人口變動的本身，主要地被社會經濟條件所規定。從長期看來，因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各時代有各時代特有的人口法則；（註二十）從短期看來，經濟繁榮時人口增加，經濟情形惡劣時人口便減少，——尤其勞動人口是這樣的。這樣，不是人口的因素決定經濟的動靜和生產關係，反而是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着人口的變動。

第二，人口的變動，「人口增加本身，不能解釋為什麼這種社會制度恰恰為這一種新的制度所代替而不是別的一種，不能解釋為什麼奴隸制度代替了原始的公社制，封建制代替了奴隸制，資產階級制度代替了封建制，而不是任何別的制度。

假如人口之增加是社會發展之決定力量，那麼人口密度更大就應該引起相當於他的更高形式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的。中國的人口密度四倍於美國，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觀點看來，美國高於中國，因為中國現在還統治着半封建制度，而美國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比利時的人口密度十九倍於美國，二十六倍於蘇聯，但是從社會發展的階段上看，美國高於比利時，而比利時較之蘇聯卻落後了整個歷史時代，因為比利時還統治着資本主義制度，而蘇聯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註廿一）

這樣看來，想以人口的因素，來作為社會發展的最主要力量的所謂「第三史觀」實在是不值一駁的謬論。

第五項　唯心史觀

只要稍稍學習過哲學的人，都知道近代哲學的根本問題，是在說明精神與物質，思惟與存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在解答我們的意識與周圍世界的關係的問題。凡以精神，意識，思惟為根本，而以物質，存在，客觀為次要事物的學說，統稱為唯心論或觀念論；反之，以物質為根本，以精神為次要的，則稱為唯物論。唯心論，是由於只是片面地誇張認識之一要素的思惟，并使之絕對化而成立的。至於宗教上所說的神和唯心論者所說的絕對精神，理念，純粹思惟等等，在本質上完全是同一的東西，因為這些都是精神的產

物，而唯心論不過是「僧侶主義的傀儡」是宗教的巧妙的辯護論。立脚在唯心論上的歷史觀，簡稱爲唯心史觀，這包含着神學的，和其他各種各様的唯心論的歷史觀，爲便於說明，我們暫分爲古代，中世，近世三期加以非常概略的介紹。

（A）古代（註廿二）

在古代，在希臘時代初期，所謂歷史，大概是把神話，傳記，戰爭一類的故事，毫不關聯地敍述一番而已。例如古代的著名歷史家，Herodotus（480—425 B. C.）雖主張歷史中有因果法則，但僅結合直觀所得的因果法則，不了解其根本關聯。

其次，Thucydides(465—396 B. C.)認爲造成歷史的，不是神意，更不是偶然的運命，是人類的行爲。人類的行爲，則決於人類的本質，即人類的性格，這種性格，是固定不變的，社會條件所不能規定的自然的天性。人類即據此本質，依照他們的所有欲，權勢欲，熱情來行動，因而造成歷史。

在古代歷史家中，Polybius（198—117 B. C.）的意見，也帶着濃厚的唯心論的色彩。他說歷史是由人類的行爲造成的，人類行爲，則由本能與熱情所規定，這更由土地氣候及國家組織所限定，尤其是國民中指導人物之個人的智能和思考，是造成歷史的原動力。

從上述 Herodotus, Thucydides, Polybius 的見解看來，可知古代歷史學家的歷史觀，大半帶有神學的唯心論的色彩。這樣的歷史觀，到中世紀時更爲發展。

（B）中世

至於所謂「中世紀是已經由野蠻狀態完全脫出來了的時代，一切舊的文明，舊的哲學，政治，法律，都一掃而空，無論甚麼，都是從

新開始建設的。中世從衰滅了的舊世界所繼承的唯一的東西，便是基督教。這種結果，和在一切原始的發展階段一樣，牧師便是智的教養之獨佔者，同時教育這種東西，在本質上，便帶着神學的性質，在牧師的手中，無論政治，哲學，都是和其他的學問一樣，不過是神學的一部門，所以對於政治，法學，也依神學上通行的原則來看待。教會的敎義，同時便是社會上的公理，聖經的詞句，在任何裁判所中，都有法律的效力。」（註廿三）在這樣的中世紀，只有教會中人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故中世的歷史家大牟屬於教會中人，而所謂歷史，也不過是一些基督教史和猶太史一類的東西。站在基督教的立場的歷史家，當然要把歷史的推動力歸之於神意，而認爲神意是創造歷史的，例如：（Augustin, Thomas D' Aquino 把歷史的原因與結果都歸之於神，歷史的原動力，不是人類本身的行爲，也不是人類內在的東西，却是人類及世界以外的，超感覺的先驗法則，像這樣的神學的唯心論的歷史觀，繼續支配了數世紀，Schlegel, Bunsen Krause, Rochholl 等都是這派的學者。

（C） 近世（註廿四）

唯心論的歷史觀發展到十八十九世紀時，最値得注目的是：Saint Simon, Ciambattsta, Vico, Kant, Hegel 等等的歷史觀。Saint Simon, 認爲推動歷史的動力，有第一次的與第二次的。第一次的東西，是人類精神流出來的一個崇高法則，這是一個時代精神的動向，我們不能變更這種力量。人類是這種精神的工具，此種精神纔是歷史的原動力。第二次的東西是人類能支配的，例如經濟方法。第一次的東西，支配第二次的，經濟方法，也是由精神造成，故經濟關係，決不是歷史的原動力。時代精神支配經濟關係，因而支配政治及其他一切。總之，Saint Simon 認爲精神是歷史的原動力，這是典型的唯心論的歷史觀。

其次，G. Vico 的歷史論中，也帶着濃厚的唯心論的色彩。他認爲造成歷史的，是人類本身的行動，這是神所賦與的性質。換言之，他說神雖不直接干涉歷史，但能由於人類的性質，把歷史引導到神所預定的地方去。他把原始時代至當時的時代分爲三個階段

——（一）神的時代，（二）英雄的時代，（三）人類的時代。人類歷史的進步，就是由於人類精神的進展。

Kant, Hegel, 是唯心論哲學陣營中最重要的人物，其歷史觀自然還是唯心論的。Kant 認爲時間空間內所發生的一切現象，不過是我們的意識內容，因而這些現象之間的秩序與法則，都是我們的悟性（理性）的創造物，所以根據 Kant 的見解，自然的意向（這是和神的預定相同的。）是支配歷史，把人類引導到一定目的去的。但自然之領導人類的歷史，要靠人類的素質，即須使人類的理性力，這種理性力，必須本能來作他的發展的刺戟。人類的本能，是藉對立（Antagonismus）而發達，所謂對立，大概是指利己的本能與社會的本能。換言之，社會化與孤立化；社會性與非社會性之間的對立，形成爲歷史發展的槓桿。※總之，Kant 認爲本能是由對立而發展的。因爲本能之刺戟，理性這東西，乃作出某種行爲，因而造成歷史。

其次，讓我們來看 Hegel 的歷史觀。Hegel 把歷史的發展，當作不斷的流轉，並且認爲這是藉不斷的變化，不斷的消滅與再現而進化的東西。所以據 Hegel 的見解，發展是由一個階段到他階段的不斷的轉變，故對於一切的事物，都不把牠們當作完全的完成物來看待，單把牠們當作發展的過程來觀察。但是歷史之辯證法的發展，是因爲甚麼原因呢？據唯心論者 Hegel 看來，促成歷史之發展的是精神，或 Hegel 所謂的理性。Hegel 說：「世界歷史，是建築在精神的基礎上面的。」那麼，精神或理性是什麼？Hegel 說，「理性就是神，神是支配者，他所支配的內容，他的計畫的實行，便是世界歷史。」歷史的發展是辯證法的，因爲構成歷史之根底的精神，是作辯證法的發展的緣故。

這樣，Hegel 雖已把握着「歷史的發展是辯證法的」這種眞理；但在別一方面，却陷於精神創造世界，精神推動歷史之唯心論的泥沼，不能構成正確的歷史觀。那末，唯心史觀爲什麼不正確呢？不用說，人類的一切社會行爲，都有自覺的企圖，包含着意識的機動，

※ Kant 所說的「人類行爲因本能之對立而發展」的思想，後來由 Hegel 更深化一步而成爲辯證法（Dialektik）這再由 Marx, Engels 而發展其爲唯物論的辯證法。

這當前追求着預定的目的。「這些按不同方向而活動的志向乃其種種對外界的影響所造成的結果，便成歷史。」（註廿五）但是人們的意志，有意識的動機，精神等決不是歷史的最後原因。人類的意志，行爲的動機，是受外界，社會環境之一定的刺戟而發生的，人類行爲的手段，決非自由選擇，而是由環境所決定的。因此，貫徹社會生活中的規律性或法則，自有其客觀的存在；人類的社會環境，社會存在，就是歷史的最後而基本的原因，它是有意識的動機的推動力，而這種動機，又是社會行爲之直接的推動力，所以它是「推動力的推動力」。社會歷史發展是人類行爲的結果，只要人類行爲是以意識爲媒介，那末人類的社會意識（Ideologie）就是人類的社會存在之自然必然的過程的一環。同時，社會意識，以這個過程爲前提，被社會的存在所決定。而社會意識，也只有被社會的存在所決定的這種被決定性下，才可能對社會的存在有所影響，發生反作用。這樣，各人在追求自己所預定的目的時，不單是這個目的的內容；同時，爲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也依靠客觀的前提，所與的條件。因此，行爲之客觀的結果，不一定和主觀的目的相吻合，這根本要靠客觀的條件如何。所以，Engels 說：「在歷史上活動的好多個單個志向，在大多數場合之下，並未引起那應有的結果。這些結果，往往是跟活動者的願望相反的。單就這一點說，推動活動者的動機，歸根結蒂，仍只有次要的意義。」（註廿六）所以，不管各人的動機如何他們的意識如何，精神如何總之，在各人行爲的社會總結果中，貫徹着和他們的意識獨立的客觀的規律性或法則。*所以，凡以精神，意識，志向，思惟，動機，理性等等抽象事物，來作爲歷史發展的最根本因素的唯心史觀，也是只看見事物的表面而未探究到本質的不正確的歷史觀。

第六項 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的創造者之一 Engels 說：「唯物史觀，是從下述的命題出發的。即生產，和繼生產之後的生產物的交換，是一切社會秩序的基礎，在歷史上所出現的一切社會，生產物的分配，及與此相聯伴的諸階級或諸身分之社會的分化，依存於如何生產，生產物

如何交換。因此，一切的社會變化及政治的變革之最後原因，決不能求之於人類的頭腦，或永久眞理，或他們對於正義的洞見的增進，却應當求之於生產及交換樣式的變化。這不應求之於哲學，却應當求之於該時代的經濟。』（註廿七）

Engels所提出的唯物史觀的根本命題，如果稍加解說，就是這樣的。——人類是『社會的動物，』他們不能從社會孤立而生活，在他們利用自然，作用於自然而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時，他們一定是在相互的一定的關係下從事生產。在物質生產上人們相互之間的這種關係，我們稱爲生產關係。這是生產之社會的形式，只有在這個裏面，人類纔能夠利用自然，作用於自然；纔能夠勞動，纔能夠實行物質生產。但是，生產物的交換或分配，一面是以生產爲出發點，爲基礎；同時，又構成爲生產的運動的契機，故交換上及分配上的關係，結局也包含在生產關係的範疇裏面。因此，生產關係，決不是單純的技術上的關係，生產關係的總體，形成爲『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這是法律的及政治的施設。意識形態（Ideologie）之『現實的基礎。』（經濟學批判序言）

* Engels 在其名著費爾巴哈論上說：『在社會史上，演員則爲賦有意識的人，他們不是深思而後行動的，便是隨着情慾行動的，各抱有一定的目的。在猶眞，倘無自覺的企圖，倘無預定的目的那一事無成了。然而不論這個差別，在歷史的研究上，尤其在各個時代和事件上，有多麼重要，但有一事實却不能絲毫加以改變，即歷史行程是由內在的一般法則所決定的。事實上，不論各人自覺的和期望的目的如何，但大體說來，在現象的表面和這一領域內，好像仍是偶然在支配着。期望的事，只有在稀少的場合下，才能作到，人們所設立的目的，大半不是相互衝突和矛盾，便是半因它自身的本質，半因手段不夠而不能達到。無數個人志向和無數個人行動的衝突，以致在歷史方面造成了一種狀態，正如在不自覺的自然中所統治的狀態一樣。行動雖有着某種預期的目的；但是事實上從這些行動中所產生的結果，却不是所期待的。即使這種結果，在外表上看來，似乎與預期的目的相符合，但歸根結蒂，他們距所期待的還相差很遠。這樣，大體上說來，似乎在歷史方面也同樣是偶然在支配着。不過凡在表面上看去是偶然的地方，其實這種偶然本身，總是受內部的隱密法則所支配的。所以問題就在發見這些法則。』（張仲實譯『生活』版，六二—六三頁）唯物史觀，就是告訴我們這個法則，這個支配歷史之客觀的規律性的。

但是，當作生產之社會的形式的生產關係，不能不有構成其基礎的內容。這種事實，是和沒有內容的形式決不能存在的事實一樣。生產關係的內容，便是生產力。內容較形式更為優越的命題，在社會發展的場合也是妥當的，因而生產關係的體系及其變化，結局被生產力所規定。但生產力是歷史的產物，是從前代繼承的既與的東西，這決不能任意選擇取捨。因此，在生產力的運動與發展中，包含有離人類的意志而獨立的法則。因而由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程度以規定的，必然地與生產力的大小相照應的生產關係，也是離人類意志而獨立的「自然必然的」關係。所以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說：「人類在他們的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踏入一定的，必然的，離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即踏入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相照應的生產關係。」

既成的所與的一定的生產關係，被在此生產關係中活動的生產力的水準所規定，前者如與後者相照應，相適合，則前者（生產關係）是發生產力發展的契機。但若生產力更加發展，現存生產關係早已不能適應那個生產力時，於是生產關係從生產力發展的契機，轉化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在這裏，生產力需要新型的生產關係，就是說必然地要打破現存的生產關係。發展大了的生產力和既存生產關係相衝突的結果，後者終被打破，便發生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組織。這樣，生產關係結局變來和生產力相對地照應，而克服了兩者間的不適應。因此，社會的發展，不單是量的增加，而且還包含有質的變化；包含有在性質上大不相同的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經濟組織的發生。唯物史觀的重要特徵，就是從某一個社會經濟組織變到別一個社會經濟組織的轉化中，發見了歷史的運轉點。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知道：唯物史觀，決不是在人類的意識，思想，精神等等抽象事物中，探求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探求從某一社會質變到別個社會的最後原因，卻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的展開中，探求社會進化，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并主張從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來說明社會的意識，思想，精神等等。至於想變革現存生產關係的革命思想的發生，是因為該生產關係已變為正在其中活動的生產力的桎梏：是不外乎在意識形態（Ideologie）上反映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與衝突的客觀事實。因此，這種革命

思想，表面上看來雖像社會改革的原動力，但其眞正的原動力，却內在於社會經濟構造的本身裏面。Ideologie 是以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爲基礎，它是依存於這種構造的上層建築。因此，上層建築的變化，決不能產生基礎的變化，反之，在根本上後者限定前者，故「隨經濟基礎的變化，巨大的上層建築的一切，緩慢地，或迅速地，也發生變化。」（經濟學批判序言）

同樣，1883 年，Engels 在送葬卡爾的弔辭上說：「卡爾發見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法則，這個法則指出了，在從來過度的唯心論圍蔽下的如次的簡單事實：即人們在過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生活以前，第一必須先吃飯，喝水，住房，穿衣服，因此、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更因此某民族或某時代的各時期的經濟發展階段，是使這些人的國家制度，法律思想，藝術以及宗教觀念發達的基礎，因而這些東西，不能不從這個基礎來說明。」在這裏，我們不要誤解唯物史觀主張經濟關係是唯一的決定的要素，而對於上層建築的各種要素，毫不注意。如果只說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把社會的發展過程，還元到經濟之自生的運動，因而抹殺了或輕視了階級及其活動與抗爭的意義，那末，這種見解，只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把握着經濟的意義，却不是唯物史觀的見解。所謂經濟的唯物論，或「經濟史觀，」就是主張「經濟的要素，是支配社會生活的唯一的東西」的學說，這和唯物史觀，大不相同。所以，Engels 說：「照唯物史觀說來，歷史上最後決定的要素，卽是實在上人生的生產與再生產。除此以外，無論卡爾或我，都決沒人主張過。假設現在有人誤解，說經濟的要素，是唯一的決定要素，那末，這個人，他正把那文章（唯物史觀所說的）變作任何人都沒有說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無意義的）文章了。經濟的狀態，是基礎。但是上層建築之各種要素——階級鬭爭之政治形式與其結果——戰敗後由戰勝者方面所定的諸制度——法律形態，和這些實際上的鬭爭，反映於當事者頭腦的反影，政治上，法律上，哲學上的理論，宗教的見解，以及此種見解更進一步發展而成的教義體系等，對於歷史的鬭爭行程上，也有種種影響，在多數地方，並且決定歷史的鬭爭的形式，這都是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中，一切經濟的運動，貫通偶然事件（這是因爲內在的關係，在相互之間，過爲隔離，且太難證明，所以我們以爲不存在而忽略了的事物與事件）之無限的多數，都是必然一貫的。」（註廿八）——這是唯物史觀的簡略的說明。

那末，唯物史觀和其他一切的歷史觀有何不同呢？伊里奇在其簡明扼要的名著 Karl Marx（卡爾傳）上說：「唯物史觀，……革除了從來歷史的理論上所有的主要缺點。第一，一直到現在的歷史，充其量，不過是考察人類歷史的活動之觀念的動機，既不曾研究這些動機的原因，又不曾發現在社會關係的組織之發展的背後所橫着的客觀法則，更不曾探求在物質的生產發展階段上的這些根本。第二，至今所適用過的理論，恰好忽略了人民大衆的活動。反之，歷史的唯物主義者，才使我們能以自然科學的正確性，研究影響大衆生活的社會條件，及在這些條件中漸次發生的變化。卡爾以前的「社會學」和成文的歷史，充其量不過是完成了赤裸裸的事實的聚積，對於我們，除表示歷史的過程之若干斷片的局面以外，沒有一點甚麽。卡爾教給了我們對於社會之經濟組織的起源與進化及滅亡之過程作包括的檢討的方法。在那中間，他認定了此等全體之中所含的一切矛盾的傾向；並且更進一步，達到了可以精確的規定社會諸階級的生活與生產的條件。這樣，他一方面排除了主觀主義，同時排除了某種「指導的思想」之選擇與說明上的遊戲。於是暴露了無例外的一切思想的萬端，在社會生產力的狀態中所表現的一切不同傾向的根本。……卡爾一方面追求歷史之無窮止的運行中，及此中所包含的一切矛盾中所存在之一貫的決定的法則；一方面指摘對於作始終一貫的過程的歷史之科學的研究方法。」據此可知唯物史觀和其他一切的歷史觀的不同，以及它的無比的正確性。我們只有依據唯物史觀的觀點，才可能在歷史的研究上達到正確的結論，發現支配歷史過程的客觀的歷史發展法則；因而才可能使歷史的研究，發展上昇到歷史科學的階段。

第三節　經濟史的意義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他們不但不能離羣而獨立，而且還要在一定的社會中纔能生活成長，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有種種不同的方面：有關於政治的，有關於法律的，有關於教育的，有關於經濟的……等等。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Wirtschaftsgeschichte），主要地是（在和其他各種要素的交互作用上）研究構成社會結構之基礎的經濟關係（經濟生活）的演變，從而發現其發展法

則的科學。因爲經濟關係，是人類歷史上最後的決定的要素，故研究經濟關係的歷史的經濟史，同時又可說是人類歷史的根本史。

經濟史，既以經濟關係的進化發展爲主要的研究對象，故與一般的歷史，及各種分科的歷史，例如和研究法律制度的沿革的法制史，研究社會團體的變遷或社會問題的歷史的社會史等等，大不相同，這些科學，雖和經濟史一樣，也是研究社會生活的一方面的歷史學，但其對象不同，故其意義有別。

顯明的，這些科學，不但有互相交錯地方，而且研究方法也是一樣，故彼此之間有密切的關聯。這樣，在研究經濟史的時候，我們決不能把經濟關係和其他各種社會關係切離，而單獨研究經濟關係的演變或經濟生活的歷史，我們必須考慮到社會進化的其他各種因素（例如：法律，政治，哲學，宗教，文藝等等）而且要在這些因素和經濟關係的變互作用上，研究經濟關係的歷史，就是說，要在經濟的因素和其他各種社會因素的全體性上，以經濟關係的發展演變爲主要的研究對象，探求經濟發展的客觀的內在的法則。這樣，社會經濟史，由於說明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發現了經濟發展的內在的客觀法則，致使勞動大衆了解其社會的地位和使命，獲得一強有力的理論的鬪爭武器，從而使他們易於完成其歷史的使命。這可說是經濟史的主要任務。

和經濟史極相似，而又不能不嚴格區別的，是經濟學史與歷史之經濟的說明。

經濟學史和經濟史一樣，都是屬於歷史的研究。但前者以經濟理論之發展爲主要對象；而經濟史則以經濟現象之事實或歷史爲研究對象。前者是理論和思想之史的研究，後者是在說明事實的沿革。兩者的研究方法雖同，但其對象不同。但經濟理論，經濟思想，是時代的産物，是被社會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反之，該時代的經濟關係，雖不能根本被經濟理論和思想所決定，但受其影響與左右的時候亦多，故經濟學史和經濟史的關係，非常密切。*

其次，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經濟史是研究經濟關係的發展的歷史科學。反之，從特殊方面，從經濟的觀點，來研究歷史的各方面

※例如：地租的演變（經濟史）和地租理論的歷史（經濟學史）之間的區別與關聯。

的東西，是歷史之經濟的說明。前者是關於特殊事項（即經濟關係）之歷史的研究，後者是從特殊的觀察點（即從經濟的觀點）解釋一般的歷史，兩者間有極顯著的差別。

第四節　經濟史上時代的劃分

第一項　劃分時代的意義

——一般歷史學上時代的劃分——

一般歷史學上的時代劃分，決不是單把悠久的歷史的年代，劃分爲適當的長短，眞正的意義，是在把所劃分的時代，使其具有當作一個時代的特徵，指出和其他時代的相互關聯，而且在研究的時候，也有該時代特有的問題和方法。

本來，歷史學上的時代劃分，是從歷史學的開頭就存在的。但此問題之科學的研究，是近世資本主義勃興，歷史學之科學的研究，盛行於世的結果。在從前，時代劃分中，大半根據該時代的世界觀的原理。例如中國古代歷史學家，以帝王的名字，或以朝代的名稱，來劃分歷史上的各個時代。這是因爲他們認爲帝王是「代天命而興」的，它是在「替天行道，」是社會進展的原動力的緣故。在外國也好，差不多也用同樣的觀念，把各時代劃分爲各朝代。本來，關於歷史之時代的劃分，及所劃分的各時期的名稱，歷史學家的意見不一，議論紛紜。許多的時代劃分，是因爲從來的歷史學家，單爲研究上的便利，或爲易於記憶，而假定的，並決沒有瞭解如何劃分的科學的根據。許多眩惑於事象的表面現象的歷史學家，不是以各時代表面上的特徵爲時代劃分的標準，就注目於轟動一世的大事件，而用作劃分時代的根據。然而，我們決不贊成這種辦法，却要求把握着歷史事象之本質的時代劃分。那末，像這樣的，把握着了社會歷史的本質的時代劃分的原理是甚麼呢？不用說，這是根據社會經濟組織的時代劃分，要把握着社會經濟組織的概念，才使我們可能認

識社會的最根本的特徵。人類在從事於社會的生產的時候，結成特定的，必然的，和他們的意志獨立的各種關係，卽結成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爲社會之經濟的構造或實在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聳立着法律及政治的上層建築，而且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和這個基礎相照應。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式，限制約束着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般生活過程。因此，我們決不能根據政體如何，是專制國家嗎，或共和政治；或根據文化的盛衰，宗教有無權威，或根據是自然經濟或貨幣經濟……等等第二次的特徵，來作爲把握社會的標準，卻必須以最根本的，第一義的特徵的生產方式爲其標準。生產方式，是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或方法。在古代，勞動力之所有者的奴隸，是主人的所有物，被認爲是生產手段的一部分。在中世，農奴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從事強制勞動。在近代，勞動者爲獲得工資而在資本家的工廠作工。社會的階級關係如何，是隨生產方式的如何而生產的，由社會經濟組織的概念而把握社會，也就是根據階級關係來把握認識社會。

這樣，根據社會經濟的組織及其各階段的特徵之時代劃分，纔是正確的辦法。故任何專門的歷史也好，例如宗教史也好，藝術史也好，都必須根據社會經濟組織的概念來區別各個時代。因宗教史也好藝術史也好，都只有當作以經濟關係爲基本的社會歷史的一部分，纔能夠存在。脫離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而獨自發展的宗教和藝術，是決不存在的。

第二項　經濟發展階段說

一般歷史學上正確的時代劃分的辦法，旣是以社會經濟組織爲主要根據，那末，以經濟關係的發展，經濟生活的演變的歷史爲對象的經濟史學，應該拿社會經濟組織上的什麼特徵來劃分經濟史上的各個時代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以前，讓我們先介紹一些代表的有力的見解。

研究經濟史的一些學者，根據一定的標準，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上，區劃出種種階段，這就是所謂「經濟發展階段說」…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sstufentheorie) 這是把經濟發展歷史上的全部過程，分爲主要的幾個階段，抽出並說明各階段的特徵及與前後階段的關聯。重要的見解：

第一，是以生產技術的發達來作爲區分經濟史上的各時代的標準的見解。代表的學者是 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 Morgan 氏在其名著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 1887）上，把人類的歷史，分爲未開（蒙昧）時代（Savagery），野蠻時代（Barbarism），文明時代三大時代。

未開時代又分爲三期：

1. 未開時代（蒙昧）：
   - 下期——樹上生活，以草木的實及根爲食料，言語漸次發生。
   - 中期——使用火以魚介類爲食料，製成打製石器。
   - 上期——發明弓矢，獵食鳥獸，村落的定住，用樹皮織物，磨製石器，製成獨木舟及其他器具。

其次，野蠻時代亦分三期：

2. 野蠻時代：
   - 下期——製作土器，馴養動物及栽培植物。
   - 中期——在東大陸，則馴養乳及肉的家畜；在西大陸，則爲繁樸的田園耕作，以煉瓦及石塊爲建築材料。
   - 上期——鎔解鐵鑛，因地耕作，發明文字等等。

3. 文明時代：（有史時代）

第二，以生產的形態作爲區分經濟史上的各時代的標準者，可以舉出 E. Grosse 及 Friedrich List 二人作爲代表。E. Grosse 的時代區分是這樣的：

1. 低級狩獵時代

2. 高級狩獵時代
3. 牧畜時代
4. 低級農業時代
5. 高級農業時代

其次，F. List的區分則如下：

1. 漁獵階段
2. 牧畜階段
3. 農業階段
4. 農業工業階段
5. 農業工業商業階段

第三種時代劃分，是以「財富從生產者到消費者手裏所通過的過程之長短」爲標準，或從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所觀察的階段學說。代表的學者是Karl Bucher，他把經濟發達史上的全部過程，分爲下列三個階段：

1. 自足的家內經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純粹自家生產，沒有交換經濟，故財富的生產和消費在同一的經濟內部。
2. 都市經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生產與消費者之間，不參加仲介者。從生產上看來，是定貨生產；從交換方面看來，是直接交換。
3. 國民經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有許多仲介者存在，爲商品的生產與流通的時代。

第四種時代劃分法，是以交換爲標準。代表的學者是 B. Hildebrand 他把經濟史上的全部過程，分爲下列三個時代：

1. 自然經濟時代——物物交換是交換的一般形態。
2. 貨幣經濟時代——貴金屬貨幣是交換的媒介。
3. 信用經濟時代——由信用(Credit)以交換財貨。

第五種階段說，是以地域範圍爲標準的。代表的學者是新歷史學派的 G.V.Schmoller。

1. 村落經濟時代
2. 都市經濟時代
3. 領域經濟時代
4. 國民經濟時代
5. 世界經濟時代

第六是柏林大學教授 W. Sombart，以社會的分化爲標準的階段說：

1. 個人經濟時代——沒有交換的自給自足的自己經濟時代。
2. 過渡的經濟時代——自己實行慾望滿足，但和別的經濟是在有規則的協同之下的時代。
3. 社會經濟時代——常與別人立於結合關係的經濟的時代。

第七，一九二四年，Breslau 大學教授 Mitscherlich 以結合關係爲標準在其著作"Eine Wirtschaftsstufen Theorie"上，創造新階段說：

1. 簡單的共同經濟階段

2. 基於共同經濟的基礎而協同地結合的經濟階段
3. 自由個人經濟的階段
4. 基於個人經濟的基礎而協同地結合的經濟階段

第八是A.Bogdanov 的階段說：

1. 零細自然經濟——可細分為原始氏族 Communism，權威制氏族，公社封建制。
2. 交換經濟——可細分為過渡形態制及農奴制，小布爾喬亞制，家內資本主義制，Manufacture 型的產業資本主義，機械制的資本主義。
3. 合（共）同經濟(Collectivism)

第九是Doprovsky 的階段說：

1. 原始社會的經濟
2. 家父（長）制的經濟
3. 奴隸制的經濟
4. 農奴制經濟
5. 小生產者的經濟
6. 資本主義經濟
7. 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經濟
8. 社會主義經濟

9. 世界共產主義時代的經濟

上面介紹的各種階段說，因爲對於社會進化的過程，沒有明確的認識，故其劃分階段的標準，不是交換，便是分配，消費等現象，這是非常膚淺的，不合理的辦法。我們在劃分歷史上的各個時代的時候，必須把握社會進化過程的重要因素，用它來作爲區劃經濟史上的各階段各時代的標準，而除去了最重要的生產關係，是上述各種階段說不合理的根本原因。

要提出合理的階段說，必先說明各個階段，各個時代演變的法則，即必須先說明社會進化的根本法則。

那末，社會爲什麼轉變呢？社會進化的根本法則是什麼呢？——這是因爲構成社會組織之基礎的經濟關係中的生產過程的變化，引起社會的轉變。即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充分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這種生產力，便和在其中發展的現存的生產關係相衝突的時候，換言之，生產力和人類對於生產手段的社會關係，（其法律的表現即爲所有關係）相衝突的時候，則此生產關係，早已不像從前能夠幫助生產力的發達；反之，却變爲束縛漸次發展來了的生產力的桎梏，這形成了社會變革的機運。變革的結果，建基於舊生產關係上的社會崩潰下去，繼起於新生產關係上的新社會發生了出來。因此，我們劃分各時代的階段的標準，不能夠是交換，分配，消費等等次要的經濟現象，却應該把重心放在生產上，故與生產過程內的生產力之發展同時並進的生產關係，不能不是區劃各階段的標準。根據這個標準而建立的階段說，把一直到現在爲止的歷史，劃分爲下列四個時代：

1. 原始共產社會 (Urwuchsige Kommunistische Gesellschaft, Ursprüngliche Gemein-Wesen.)
2. 古代社會 (Antike Gesellschaft.)
3. 中世封建社會 (Feudale Gesellschaft.)
4. 資本主義社會或有產者社會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

本書的第一篇，便按照上列的順序，說明各階級的經濟發展過程，探求其內在的客觀的法則。附論「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但因

限於篇幅，比較不大重要的原始社會和古代社會，只能加以概要的解說。

(註一)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四七六頁，中譯四一九頁。

(註二)Bogardus 著，徐卓英顏溯暉譯，社會思想史上冊二九六頁。

(註三)石濱知行著，經濟史概論二三頁。

(註四)同註三，二九七——二九八頁。

(註五)同註三，二九九——三〇五頁。

(註六)G. V.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 of Marxism，張仲實譯，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三九頁，四一頁。

(註七)Madjar: 中國農業經濟 K. Wttfogel: Gesellschaft and Wirtschaft Chinas.

(註八)Pokrovsky: Brief History of Russia. 日譯本，一五頁。

(註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四七八頁，中譯四二〇頁。

(註十)沈志遠譯：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理論與現實季刊第一期八〇——八一頁）

(註十一)聯共(布)黨史教程上冊，中譯二一五頁。

(註十二)Plekhanov: 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廣士譯；丁洛夫著：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讀書月報第一期）

(註十三)Engels 著，費爾巴哈論，張仲實譯六五頁。

(註十四) Engels 著，吳理屏譯，反杜林論一九五頁。

(註十五)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一六頁，中譯六四一頁。

(註十六)同註十四，二三〇頁，

(註十七)同註十四，三〇二頁，

(註十八)同註十四，二〇八頁。

(註十九)同註十四，二一九頁。

(註二十)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五九六頁，中譯五三〇——五三一頁。

(註廿一)同註十一，二一六頁。

(註廿二)H. E. Barnes: History of History，向達譯本一——一〇五頁。

(註廿三)Engels 著錢亦石譯德國農民戰爭二五——二六頁。

(註廿四)同註三，六——一五頁。

(註廿五)同註十三，六三頁。

(註廿六)同上。

(註廿七)同註十四，三六〇——三六一頁。

(註廿八)Engels 1870年給友人 Block 的書信的一節。1875 年選錄於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 轉引自前揭石濱知行著書，

本章主要參考書

卡爾：經濟學批判序言，哲學的貧困及其他。

Engels：費爾巴哈論。

Engels：反杜林論。

馬恩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

伊里奇著：卡爾馬克斯（Karl Marx），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哲學筆記及其他，

永田廣志著：唯物史觀講話，唯物辯證法講話。

石濱知行著：歐洲經濟史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冊，

第二章　原始共產社會

第一節　勞動創造了人類社會

「上帝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人類」——這千百年來宗教上的謬論，終於在近代科學的照射下，尤其在達爾文的名著進化論刊行後，曝露了它那誑語騙人的本質。近代科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胚胎學，人類學，民俗學，言語學等等，提供了許多關於原始社會的研究資料，我們從此知道了人類的祖先，也不過是在樹下跳來跳去的猿猴。那麼，人類是怎樣變來的呢？毫無疑問的在猿猴演變為人的過程上，勞動是推動的力量。人猿爲了獲取食物和防禦野獸，必須利用木棒和石頭，因而必須用兩條後腿直立起走，把前腿（兩手）解放出來才行。這樣，勞動使手「越來越巧，越來越妙，而兩隻手所獲得的巧妙，世世相傳的更其豐富。」（Engels）。手的發展，保障了人類的直立行動，因而才能發展喉嚨和聲帶，才能使頭腦豎在頸骨上，才能不阻礙腦的發達。因爲兩手靈活了起來的緣故，人類可能獲取的食品種類也增多了，除了素食以外，肉類也成爲人類常食的東西，蛋白質和脂肪質等營養料的激增，使人類的頭腦更加發達，越發聰明，人類的生活活動也因此提高了。這樣在推動人猿演進爲人的過程上，手是一個推動機，在這個推動機中，勞動又有一個推動的作用。（註一）所以Engels說：「動物只是利用外界的自然……但是人類卻支配自然。這使人類和其他各種動物發生最後的本質的區別，引起這種區別的又是勞動。」（註二）因此「勞動創造了人」（Engels）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就因爲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美國學者富蘭克林）卡爾也說：「勞動工具的使用和製造，……是人類特有的勞動過程的特徵。」（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一四三頁，中文本一二九頁。）從這點我們就可以了解德國布爾喬亞經濟學者Karl Bücher在其著書國民經濟

的成立(Entstehung der Volkswrtsckaft) 上所說的話是怎樣的不合邏理。他說：「只有人類，毫無疑意的，在長時期，曾是不勞動而生活的。」因而他稱原始時代的經濟爲「非經濟」(Nichtwirtsehaft) 同樣，原始人是懶惰放逸的說法，也是不合理的胡說。

其次，人類爲謀生存，不只是要勞動，而且還要在相互的一定的關聯下或社會裏從事勞動。在原始時代因爲自然和野獸的侵襲，根本不能生活下去；在近代，一切的生產都是社會的生產，個人更不能離羣獨居。*

所以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上說：「人類最像文字上所表示的是社會的動物，不只是社會的動物，而且只有在社會裏才可能個別化的動物。在社會外部的孤立的個人的生產——這是文明人偶然迷荒入野時可能有的，但此文明人已經自動地具有了各種社會力量——是一個不合理，這等於說沒有共同生活，共同說話的個人而有言語的發展的那種不合理。」故人類爲謀生存，必然地要組成一種社會。人類最初最早的社會，是原始共產社會，還佔了很長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估計不下數萬年乃至數十萬年。）

第二節　原始社會是共產主義的組織

原始社會是共產主義的組織。這個結論，是經過了許多學者經年累月的研究才達到的。1847—1852年 Haxthausen (1792—1866年) 旅行俄國，其結果發表了俄國農村共產體（農村公社）的研究；1851—53年 C. L. Maurer 發表關於古代日耳曼人的共產體組織的研究；H. Maind (1822—1888年)在1871年發表關於印度共產體的研究；186 年 J. J. Bachofen(1815—1887年)出版母權論；1864年 J. J. Mac-Lennan (1827—1881年)論證原始的婚姻形態，還對於氏族制度的研究，曾有大的貢獻；尤其是自從1877年 Lewis H. Morgan 發表其劃時代的名著古代社會 (Ancient Society) 1884 年 Engels 出版家族，私有財產及

* 魯濱遜漂流記，不過是十八世紀個人主義的空想的產物，何況魯濱遜早已有了各種社會力量（槍彈小刀獵犬聖經及各種智能）才可能在荒島上住一些時候。

國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以來，原始社會之共產制的組織，變爲絲毫不能動搖的眞理，加以各地的原始共產體的殘存，*更給與反對論者以無情的事實的反擊，證明了私有財產制度決不是和人類同出現同時發生；更不是人類社會所不可缺少的必然的制度。因此學說而引起了現存制度的辯護者的憤怒和攻擊，是想像得到的。但是，憤怒也好，攻擊也好，總不能一手遮盡世人的耳目，總不能歪曲事實來遷就他們的「理論」。這樣，否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存在的一切論調，和「上帝造人」的論調一樣，在歷史科學的突飛猛進中，漸次衰微無力，加速度的向着湮滅的路上走去了。

那麼原始共產社會是怎樣構成，怎樣發展的呢？

第三節 前氏族社會

原始共產社會的第一期，是氏族制度發生以前的前氏族社會。在這裏人們形成了一種「原始羣」（伊里奇），男子沒有經常和女性住在一起，小孩產後也歸全社會養育。在這裏，沒有婚姻，沒有家族，原始人羣的男女成員，實行無規律的性的雜交，因而從有生以來就是親屬。每個集團中，各個成員之間都是平等的。當然，這種平等，是意味着窮困交迫，飢寒無依以及爲生存而鬥爭的平等。因爲前氏族社會的生產力非常微弱，從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看來，還大半在採集自然物爲生的蒙昧時代。前氏族社會所存在的蒙昧時代，可分爲如下的三個發展階段：

「一、下期——人類的嬰孩期。人類生存在熱帶或亞熱帶的森林裏，食物是果實，堅果及根塊。明晰的言語的形成，是這一時

---

*現存的共產體：(一)非洲的 Buschmanner 族；(二)Ceylon 島現存的 Veddah 族；(三)澳洲黑人；(四)南美Gran Chaco 土人；(五)東非 Asa 族；(六)北美 Seri-Indianer 族；(七)南美巴西的 Barora 族；(八)南美 Feuerland 族；(九) Bengal 的 Mincopie 族；(十) Irokessen (Morgan的研究)；(十一)北極地帶的 Eskimo 族……等等。

期的主要結果。

二、中期——開始於魚類的食用與火之使用。因此，人類得以完全離氣候及地勢而獨立，沿着河流及海岸散佈在地球上的大部份，許多的石器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三、上期——以弓矢的發明開始，拿獸肉作爲日常食物，視狩獵爲一種正常的業務。」（註三）

促進前氏族社會生產力發達的是火的發明與使用。Engels 在其自然辯證法上說：「不管過去牧畜與工具的發明怎樣偉大，然而人們最初征服自然的權威，卻是在發明了火以後。」確實的，自從原始人一旦看見各種自然現象——燐火，雷電的火花，火山噴火——，領悟到火的功用，並且經過了許多年代學會了利用和保存自然的火光，再經過許多年代學會了自己取火以來，人們不只是克服了氣候上的各種障礙，而且還會用火來烹飪，驅逐野獸，燒煉棍棒等工具，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達。原始人經過了許多年代，漸次把木棒改良爲尖鎗；更因此產生了標鎗，加以弓箭和骨器（可以做針，鉤，矛尖，刀刃）的發明，他們才可能獵取較大較多的野獸，和發展漁業。生產力漸次發展，經過了若干年代以後，人類社會才有分工，起初這種分工，是按照性別和年齡而分工的。製造工具，弓箭，標鎗，狩獵，作戰，則由精強力壯的男子負担；採摘植物，看護小孩，烹飪，則爲婦女們的專業。這種分工，決不是階級分化，因爲私有財產在原始社會不但沒有存在過，而且也不可能，一切生活資料都是共同生產，共同消費。

隨着生產力的發達，住在一個區域的原始人羣，大大的擴張了。原始人羣分裂後變爲許多的原始部落。

自然淘汰的法則，含有優生學的意味的限制，首先禁止了近親（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結婚，產生了以兄弟姊妹的雜婚爲基礎的血緣家族，（The Consanguine Family）再進而禁止兄弟姊妹間的結婚，成立了普那路安家族（Punaluan Family 或譯爲集團婚，羣婚的家族，郭沫若氏譯爲「亞血族結婚，」（註四）再經過由於禁止血緣集團內部的結婚而發生的對偶家族（Pairing Family）——「某程度的對偶關係，時間雖有長短；但即在集團婚中間，間或在它以前是已存在了的。一個丈夫在他的許多妻中間，有一個正

妻，（還不能稱她爲愛妻，）而他對於她也是在許多丈夫中間的一個主夫。」（Engels）——才發展到文明時代的建立在男子支配權上的一夫一妻制家族（The Monogamous Family）（註五）氏族制度，就是從上述的 Punaluan Family 起源的。*

第四節 氏族社會

Engels說：「在蒙昧的中期發生，在其上期更加發展了的氏族制度，依據我們的資料所能判斷的範圍，在野蠻的下期即達到全盛時代。」（註六）所以在大體上看來，蒙昧時代是和前氏族社會及氏族的第一步發展相一致；反之，野蠻時代便是氏族發展，及因內在的矛盾而趨於崩潰的時代。

在氏族社會的第一個階段，因爲女性在原始人類的集體家族經濟中，起着決定的作用，所以他們在一個氏族共產體中佔有支配的領導的地位。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還是母系氏族制度的支配。以後生產事業日漸繁重艱巨，男性手工業者的出現，男人從事於牧畜和連年不斷的對外戰爭，抬高了男性的社會地位，確立了男性在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統治。這樣，在前階級社會的歷史上，母系時代後來被父系時代所代替，女性的統治地位也讓給父性的家長，而婦女也跟着隸屬於男子。由男系追溯血統及父方的財產繼承權的成立，氏族制度早已進展到最後的一夫一婦制，男子爲確保其遺產，便要求着妻女嚴守貞操。這時候，氏族制度已經走到崩潰的路上去了。

氏族部落，和原始人羣擴大而分裂出來的原始部落完全相同，它既不知道把生產手段作爲私有財產，也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

* 因爲原始社會的技術非常幼稚，故當作生產力看的人類本身就具有絕對重大的意義。這也決定了人類血緣關係和原始生產關係的一致。結婚，獲取生活資料和氏族成員在社會上的地位，都由氏族來決定，故氏族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限於篇幅，我們只能對此加以概略的說明。

削。在氏族社會，「不動產也好，動產也好，都是屬於氏族的財產。土地是部落的財產，而氏族只是附着於一定的土地。氏族成員所使用的工具，只是生前爲他享受，死後是要被氏族依據一定的法規轉讓給別一個成員的。而其氏族成員，在蒙昧社會當中，大家都是建設保衛，同仇敵愾。氏族的最高權力機關，是許多長老們所組織的會議。長老會議有權收編異族的人們爲氏族成員，同時也有權分配給他們以氏族成員所應享的權利。此外，氏族的領導者，同時也就是富有經驗而有權威的長老，因爲他們對於傳統遺俗，保守不易，是一個氏族傳統風俗文化的保存者。領袖和長官，都是由氏族推選出來的品行端正，英勇善戰的人們來担任。氏族各成員之間的爭議，由氏族來解決；而氏族與氏族之間的衝突，則由部落來解決。」（註七）所以 Engels 在名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上分析了氏族制度的組織後說：「這種氏族制度，在它的一切自然的簡單性上，是如何的可以驚奇的啊！沒有軍隊，沒有憲兵及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知事或審判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但是萬事依然順利地推行。一切的爭鬪與糾紛，皆由有關係者的全體，氏族或部落在各個氏族之間來解決。僅有在非常希罕的時候，才有當作極端手段的復仇行爲嚴嚇地存在，我們今日的死刑，只是這種復仇的文明形態，而帶有文明的一切利益與弊害的，雖然有比今日更多的共同事務有待解決——共產主義的家屬是爲許多家族所共同的，土地屬於部落，僅有園圃暫時劃歸家屬——但他們並不需要有如今日那種麻煩複雜的行政制度之形迹。有事件發生，對於這事件有關係的各方面把它解決，而且大部份，數百年的習慣早把萬事規定好了。可憐的貧人都不會有——因爲共產主義的家屬與氏族知道他們對於老人，病夫與殘廢者的義務，一切人都是自由，平等——女子也包括在內。容納奴隸的餘地已經沒有，壓迫別的部落的餘地也不存在。……這樣的社會產生出何等漂亮的男女，這從凡會接近過尚未墮落的印第安人的白人都要讚美這種野蠻人的莊嚴，公正，高尚及勇敢的事情上，可以爲證。」（註八）

但是，在別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忽略了 Engels 所指出的原始氏族的一些缺點：野獸般的殘忍；虐待異族的人們；不分好歹的服從長老們的遺敎與法規；頑固不堪的氏族習慣，致使原始社會的技術非常落後，陷於一般的貧窮，以及極度的分散和各部落與各氏

族的閉關自守的狀況。這些都是氏族社會的缺點；同時，這也就是爲什麼人類社會，此後還必需經過數千年的血腥的殘殺，慘酷的剝削，及其他種種壓榨，才可能發展到沒有階級支配，階級對立和國家的高級社會的原因。

第五節　農村公社

原始共產社會的最後一個階段，是農業共產體，或農村公社。這是原始社會崩潰過渡到古代奴隸社會的階段。所以卡爾說：「農村公社，雖說是社會之第一次的構造的最後階段，而同時又是到第二次的構造的過渡階段。」（註九）那麼，從氏族制度進展到農村公社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卡爾告訴我們說：（一）『由於他們（指農村公社的成員——彭）切斷自然聯繫起來的臍帶，而使「農村公社，」變爲未與血緣紐帶相聯結的自由人之最初的社會集團。（即氏族的血緣紐帶纍纍，變爲可能包含非本氏族的人員，即血緣結合。變爲地域的結合了——彭。）（二）在農村公社，家宅和它附屬的園圃，是農民的所有。……在這裏家宅早已不是集團居住的場所，但能看見定期變更其所有者的農村公社。這樣，個人的用益權和共有財產相結合（在氏族制度時代大家住在共同的家宅裏面——彭。）（三）不能讓渡的公有財產的耕地，定期分割給農村公社的各成員，他們按照自己的計算，耕作自己分得的土地，其收獲則歸己有。（在以前是共同生產，共同分配消費——彭。）』（註十）這樣，「由於從自然的血緣——這樣強固，但是狹隘的紐帶——解放了出來，農村公社，獲得了對土地公有制度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關系之堅固的基礎，同時各個家族之獨佔的所有物的家宅和園圃，分割耕作及其收獲的私人佔有，促進了和較古的共產體不相容洽的個性。」（註十一）——即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並存之「農村公社的二元性」（卡爾）及其矛盾。

第六節　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

「隨時間的經過，——卡爾說——這個同樣的二元性，可能變爲農村公社崩潰的根源。外來的有害的各種勢力縱然不算也好，公社的本身，也內在着崩潰的各種要素。不動產的私有，早就以附有庭園的家宅形態參加進來，這可能轉化爲從此準備攻擊公有地的保壘，而且也發生了。但重要的是：當作私人佔有之根源的分割勞動。它提供出蓄積動產——例如家畜，貨幣，甚至有時是奴隸或農奴——的地盤。公社不能統制的個人交換——在這裏，詭計和偶然起着大的作用——之目的物的這種動產，漸次會壓迫全部農業經濟。這正是引起原始的經濟和社會的平等崩潰的契機。這首先破壞耕地的公有，其次破壞森林，牧場和荒地——都是一度變爲私有財產之公有的附屬物，便漸次轉爲私有——的公有；導入利害與感情的爭鬥，和公社內部所產生的異分子。」(註十二)

這樣「分割勞動，」動產的私有，個人的交換；構成了原始共產社會崩潰的第一個要素。

其次生產力的發達，農業經營的漸次集約化，＊必須延長土地的分割使用年限把土地供個人長期使用。分割地的長期的世襲使用，漸使土地變爲私有，＊＊因而破壞了農村公社的土地公有的組織，而促成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

最後，私有財產，和後起的耕地世襲相隨伴，加強了家族的意義，致使以前構成社會單位的氏族的影子越加稀薄，而代以各個人的家族。加以公共職務的世襲化，奴隸的出現和漸增——最初只是俘虜，以後氏族中的貧窮人也賣身爲奴隸——更促進了基於財產公有，相互平等的原始共產社會的沒落。

＊「從經濟學上看來集約耕作無非是不把資本分配與併存的各種土地而集積在同一的土地部份上的。」（資本論第三卷下册，德文本二一四頁，中譯本五六九頁。）

＊＊「在共產主義組織的胎內，起了向高級農業——使用犂頭——的一個重大進步，Mark公會（德國的農村公社——彭）於此基礎上，並於維持農制的形態之後，生產技術的發展更加一層進步，於某時期後使之不得不要更加集約的耕作，所謂集約的耕作者，在當時農業技術的階段上，僅依更加集約的小經營，即以人身的勞動力與土地更加緊密更加徹底的結合，而可以達到的。以同一的分配地，供個個農

家，更加長期利用的運作事，還是成爲細心管理分配地的前提條件，尤其是土地的施肥，成了不常改分（卽在行分劃土地——彭）的原因，在德俄三國，都是如出一轍的。無論在何處，都是一樣可以看出 Mark 公社生活中改分的期間，漸漸變爲延長的特徵，這就是到處由分配地的分有，遲早變爲世襲所有的結果。由共分向私有的移動，與勞動的集約，同一步調，而同樣的我們可以研究以下的事實；卽森林與牧場經營，無論在什麼地方，是附帶最長期的共用地，反之集約的經營的農業，是最初開闢共有地分配的道路，然後就開闢排他所有的道路。」Rosa Luxemburg: 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 陳壽琹譯新經濟學二〇一頁。）

（註一）蒲韓之譯原始人的文化第五章。

（註二）Engels著勞動在猿猴演進爲人時的作用馬恩全集日文版第十四卷二九二頁。

（註三）Engels著胡華出版社版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二四——二五頁。

（註四）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三頁。

（註五）同註三，四四——一一〇頁。

（註六）同註三，三三二頁。

（註七）同註一，九四——九五頁。

（註八）同註三，一二九——一三〇頁。

（註九）1881年科爾給威那·札斯里奇的書簡的第三稿，日文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三九五頁。

（註十）同上。

（註十一）同上。

（註十二）同上，四二三頁。

本章主要參考書

Morgan: Ancient Society. (古代社會)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Rosa Luxemburg: 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 (陳壽僧譯新經濟學)

H. Cunow: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d. I. (吳覺先譯經濟通史卷一)。

焦敏之譯原始人的文化。

石濱知行著鄧伯粹臧經森合譯歐洲經濟史綱。

山川均等著服得山等譯唯物史觀經濟史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一分冊。(日譯本)

蒲哈特著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俄文有日譯本。)

布里古金著社會構成論(俄文有日譯本)

第三章　古代奴隸社會

第一節　古代社會奴隸制度的成立過程及其意義

所謂古代社會，是指二千年前存在的地中海岸的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奴隸制度社會。古代希臘決不是單一的國家，那是由多數散在於巴爾幹半島南部和愛琴海（今稱多島海）諸島及小亞細亞西海岸的獨立國而成的。羅馬本是意大利諦伯里司河畔的一個小鎮，強盛起來後始使近鄰隸屬於己，征服了全部意大利，最後竟佔領了把希臘也包含在內的地中海的全岸。西曆紀元初年，羅馬是併有當西部歐洲的大部分，北非全部及西南亞洲的強大國家。

在古代，奴隸制並不是僅存於希臘和羅馬的。伊理奇在其關於國家的講演中說：「開始我們是有過無階級的社會，即是太初的，家長制的，原始的社會，其次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所有者的社會。現代的文明化了的歐羅巴全部是經過了這個階級的。奴隸制在二千年前是全盛時代，世界上其他部分大多數民族也都曾經過。其在最未開化的諸民族中，奴隸制的痕跡，就在今日也還存在。」然而，奴隸制的典型的最高發展是在希臘和羅馬，故我們的說明，即以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奴隸制社會為主要對象。

那麼，奴隸制是怎樣發生起來的呢？奴隸制發生的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生產力的水準要發達到個人的生產，除了供自己糊口以外，還必須有剩餘供別人剝削的程度，也就是說，生產力要發達到奴隸的作用變為有利可圖的程度。

第二個條件是：農村公社內部，所存在的各家族的財產上的不平等。財產承繼權，更加強了貧富的懸殊，使富家損人利己，集中財富，而貧家小戶則構成了奴隸制的泉源。（債務奴隸，賣身為奴等等。）第三是戰爭時所獲得的俘虜轉化為奴隸。

在希臘，在其歷史之最古的時代，和一切的民族一樣，在過所謂「家長制（父）的奴隸制度，」這是奴隸制最初的形態。當時的奴隸較少，奴隸以服務家內經濟爲主。奴隸和家族的成員，沒有嚴密的分離，家長雖是奴隸的所有者，但是他本人也沒有從肉體的勞動解放出來，因此，對於奴隸的剝削，還比較緩和。氏族崩潰後，許多家父長的家族，利用奴隸之勞動力，增加了這些家族的生產能力，擴大了個人家族的生產範圍，而生產也跟着從自給自足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進展到以交換爲目的的商品生產。同時在最富裕的家族，奴隸從補助的生產力轉化爲主人製造剩餘生產物之基本生產力，因而對奴隸的剝削程度，比以前更加殘酷了。這樣，「在古代……過度的勞動，達到可怕的程度……在那裏強制工作者勞動至死的程度，是過度的勞動的公認的形態。」（註一）「因此，奴隸經濟的特質，……是從人類家畜，（Human Cattle）在可能範圍內的短期間中，儘量剝削多量的勞動，是最有效的經濟。」（註二）

奴隸制是最初的人對人的剝削制度；因而最初的階級分裂，是階級的生產關係之最初的形態。隨着階級的分裂和階級支配的發生，國家也發生了。國家是壓榨被剝削者大衆的階級支配的暴力機關。故古代國家不論它的形態何如，（共和制也好，君主制也好，）他總是奴主統治奴隸的機關。其次，奴隸制的出現，不僅使農工之間的分工變爲可能；同時也可能使一些人從肉體勞動中解放出來，專門去從事精神勞動，這造成了希臘羅馬的美術和科學的物質基礎。所以 Engels 說：「如果沒有奴隸制，那麼，或許就沒有希臘的國家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度，或許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的基礎，或許就沒有像現在一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全部我們的經濟政治及智慧等等的發展，有這樣的社會組織作爲基礎，這種社會中，奴隸制正是共同承認的成份，同樣的也是必需的成份。」（註三）那麼古代奴隸社會爲什麼會是社會歷史上「必需的，」必然的一個發展階段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原始共產社會崩潰階段上，技術非常幼稚，生產力也非常之低，因而奴隸勞動的使用，奴隸的單純的合作，（Cooperation）縱然不是剝削剩餘勞動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也好，無疑的這是最有利勞動的方式。

第二節 希臘羅馬的奴隸制

在希臘，早在荷馬時代（Homeric Period 約在紀元前九世紀）已有奴隸的存在。男性奴隸，從事耕作與牧畜，女性奴隸從事家內工作。到了有史時代，奴隸數目，無形增加。奴隸的來源，據 J. K. Ingram 在其著作奴隸制度史（History of Slavery）所指出的約有五種：（一）生來奴隸及世襲奴隸；（二）自由勞動者遺棄或變賣自己的子女而成的奴隸；（三）債務奴隸；（四）戰爭的俘虜；（五）買賣來的奴隸。當時主要之奴隸市場是：Cyberu, Samos, Chios, Ehlesus. 後來 Delos 島，成了奴隸交易的中心地，每日有一萬人的奴隸買賣。奴隸的數目非常之多，以雅典來說，「在全盛時代，全雅典的自由市民，連女子及兒童在內，總數為90,000人，男女奴隸為365,000 人，還有保護民 45000 人，故對一個成年男子市民，至少總有十八個奴隸，及二人以上的保護民。」（註四）其次，奴隸的人數，「在 Corinth ，當最盛時代為460,000 人，在 Aegina 為 470,000 人，在兩方面都十倍於自由市民的人數。」（註五）奴隸勞動使用在經濟活動的一切領域內，即在家內經濟，工藝，農業，礦業，運輸等等。其他店員，會計，營業監督，甚至在公共職務中也使用着奴隸。奴隸勞動的大量使用，一方面促進了財富集中在富豪與支配者階級手中，同時，又使小企業被使用着奴隸勞動的大企業所驅逐，致使從來的獨立的小生產者，自由勞動者也淪於奴隸的境遇。這樣，「完全的奴隸制度發展的結果，在自由人便把手工業，農業及一般的肉體的勞動，看作應當輕視的無價值的東西了。到了此時，自由人及支配者階級，對於勞動完全不發生關係，并且莫有那一個人，對於生產形式的改良，及文化發展之主要的要求，感覺興趣了。於是肉體的墮落，與社會道德之大腐敗，便隨了發生，在政治上便有野心和煽動出現，就國家說，便衰弱不堪了。這樣造成了高度文化的希臘社會，也就瓦解了。」（註六）

在羅馬，奴隸勞動比在希臘普及得更廣泛，而對奴隸的剝削也更加背酷。這是因為羅馬人征服四方所獲得的奴隸非常之多，而且廉價的原故。（每奴隸一人僅約值德幣三馬克，）在羅馬，奴隸勞動，不是主用於手藝的工業，而是主用於農業或礦業。因為羅馬是

農業國，手工業品的大部分是從希臘及東洋諸國輸入的。奴隸勞動在家內經濟上也用得很多，羅馬的富家中，常有數十數百的奴隸，當作僕婢使用。

羅馬和土地貧瘠因而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希臘不同，本是農業國家，最初在那裡是沒有大地主存在的。但自紀元前二世紀以來，即開始發生土地集中的現象。其原因（一）戰爭提供許多廉價的奴隸給農業者；（二）由征服而被集中在羅馬的資本的過剩；（三）農民的零落，其土地被廉價拍賣，而且都爲富者所購獲，這樣，在紀元前二世紀末羅馬有了大私有地（Latifundium）之形成。同樣的私有地，在羅馬諸州也發生了。大私有地主廣泛的使用着奴隸勞動，其數目超過數千，奴隸受着極苛酷的條件而勞動着，然以鑛山和石廠的奴隸剝削更爲殘酷，在這裏，奴隸們過着比畜性還不如的生活。和希臘同樣，奴隸可能在事務所或商店做職員，甚至下級官吏的職務也可能充任。不僅是肉體勞動，就是精神勞動，也大半靠奴隸來做。其他銀行業者，教師，學者，優伶，一切的勞動，都委之於外國來的奴隸，富豪貴族都在這些奴隸勞動上，追求着他們的安樂的好夢。總之，在羅馬，自由勞動，在量上或質上僅起着極小的作用，全部社會生活，幾乎完全靠奴隸勞動來維持，所以我們在此可能看出以奴隸制爲基礎的古代社會之最典型的形態。

第三節　農業和工業

在希臘的農業上，奴隸勞動的使用較少，且帶有一些和其他的經濟部門相異的形態。希臘的土地和氣候，不大適宜於栽種穀類，而葡萄和橄欖則頗爲發育。但栽培葡萄和橄欖必須綿密的工作，不利於使用奴隸勞動，在適於栽培穀類的希臘地方，便使用着奴隸。但是，是以特殊的形態，即將耕地給與奴隸，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奴隸經營着獨立的經濟，對於其主人獻納一定的貢稅，這提高了奴隸勞動的生產性。這種制度，例如在斯巴達是存在着的，在那裏奴隸稱爲 Helot 且被束縛於土地上，這和中世紀的農奴制度沒有多大的差異。

羅馬的土地比較肥沃，故本來就是農業國，在最初，獨立的小農民經營較多，但因種種原因，如戰爭，租稅，以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侵蝕，大都沒落下去，而漸次形成使用着許多奴隸勞動的大私有地（Latifundium）的農業經營。

其次，以土地所有關係來說，希臘也好，羅馬也好，在從前森林牧場國有地的使用，總是附隨於市民權的特權之一。但是這些土地，漸被富豪所侵蝕，終於大半淪爲私有。傭兵制，戰爭，租稅，以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侵蝕，更促進了小農民喪失土地的過程。Tiberius Gracchus代表着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紀元前 133 年擬實施限制土地所有到最高 500 ugera(1 ugera＝0.252 Hektar)的程度的法律，但因此遭忌被殺，而未見諸實行。擬繼承乃兄遺志的 Cajus Gracchus，亦因此遇害，此後的歷史是大私有地迅速發達，小農民急激零落到奴隸的境遇的過程。征服地廉價穀類的大量輸入，一方面固然促進了小生產者的沒落，同時又喚醒了大私有地的農業經濟中奴隸勞動的不利，漸次轉向到牧畜業，或將大私有地分割，租與奴隸而轉化爲中世農奴制的萌芽的生產方式。所以Engels說，「帝政時代，羅馬農業的發展，一方面引起了宏大面積的牧場經營的擴大和地方人口的減少；別方面又引起了把所有地細分爲 Colonus 所住的出租地的結果。這樣發展的結果，致使後世的農奴先驅者的隸農的過小經營，變爲絕對的多數，因而早已懷孕着在中世紀才變爲支配的那種生產方式，漸佔優勢了。」（註七）所以，在奴隸社會內部，發生了封建諸關係的萌芽。

其次，古代奴隸社會的工業經營是怎樣的呢？奴隸工作場的組織是非常原始的。五十人以下的小規模的奴隸工場，是支配的形態。在這裏，奴隸是靠着極粗笨的工具以手作業。任何複雜的工具是不能弄到奴隸手裏的。因爲奴隸厭惡那種強制勞動，不愛惜工具，無意識的，甚至有時故意的破壞工具。*故古代的技術水準非常之低，即以水車來說，它遲到紀元前一世紀才出現，而且并未廣

*「古代人常稱奴隸爲有聲的工具，稱動物爲半有聲的工具，稱不會動的器具爲無聲的工具。但奴隸自己卻要使用動物和器具，覺得他不是它們的同種，而是人，他往往虐待動物，損壞器具，來表示他自己既不是動物，也不是器具。因而，奴隸勞動的生產，就有這樣一個經濟原則了：即只宜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不易損壞的工具」（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一五九頁，中譯文一四三頁。）

泛地普及着。構成奴隸工作場之基礎的是單純的合作（Cooperation）其規模雖小，但採用着分工的辦法。

在農業部門也好，工業部門也好，獨立的小規模生產者也是存在的。但因奴隸所有者的生產：第一可能利用極低廉的奴隸勞動力；第二，對奴隸的剝削，可以不必顧慮其生產力的再生產而盡量壓榨；第三，個別的生產者的勞動，總不能和奴隸工作場中奴隸的單純合作形態的勞動和競爭。因此獨立的小生產者在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日益微弱，而奴隸勞動則日加起着大的作用，致使古代社會，完全建築在奴隸制度上面了。

第四節　商業高利貸資本

「在古代亞細亞的古代希臘及羅馬的這些生產方式下，生產物之轉化爲商品，因而人們當作商品者的存在，只起着一個附帶的作用。」（註八）所以奴隸經濟本身，是一種自然經濟。用卡爾的表現來說是根據於「以直接的物理的強制把他人的勞動力之自然的佔有。」然而，這也並沒有妨害到古代社會的，尤其在希臘的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土地的比較貧瘠，金屬，粘土，大理石的豐富，等等條件，逼着希臘不能不和其他國家通商。希臘的主要輸入品是穀類，此外有木材，家畜，蜜蜂，魚類，樹脂，線，毛皮，象牙和其他原料。不用說，奴隸是輸入的大宗，輸出品是葡萄汁，橄欖油及種種手工業品，武器，用具，奢侈品等。希臘全部的貿易總額，概算約達一兆盧布。國內商業也相當發達，各都市都有市場。商業在大道上或小型的天幕中經營着，也有常設的店舖，農民在這市場上販賣其產物。在市場還有種種的事務場，兌換銀錢的案桌，有維持市場的管理人巡行着。

羅馬的貿易是輸入超過輸出的。這是因爲羅馬諸州之征服和掠奪有多量的貨幣貯藏，被儲蓄着。羅馬人用此在東洋市場購買商品，這妨礙了羅馬工業的發展，影響到輸出的衰微。佔羅馬大規模輸入品的主要部份的是奢侈品，這是爲供給貴族富豪享樂用的。貴族官僚等奴主手中非常之多的剩餘生產物的蓄積，促進了商業的發達。商業的發展，加強了奴隸的剝削，促進了大私有地和奴隸

工作場的生產發達，因而又促進了奴隸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在別一方面，隨小生產者之日益附屬於商人，和大規模的商業生產相競爭的小生產者，越加速地沒落下去。因而商業的發展，結局促進了奴隸制生產方式的發達。所以卡爾說：「在古代社會，奴隸的作用和商人資本的發達，常常引起奴隸經濟（Sklavenwirtschaft）」（註九）然而，古代商業資本發展的源泉，還是同樣的奴隸經濟。這就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循環：奴隸經濟→商業資本→奴隸經濟。這說明了：商業資本可能和任意的生產方式相聯絡，但不能創造出任何生產方式。

商業之廣汎的發展，誘導出貨幣之更大的需要和高利貸資本，銀行資本的產生。希臘的銀行業是由兌換店發生出來的，希臘的複雜的貨幣制度，需要兌換商來解決各種貨幣在交易上所發生的困難，除貴族富豪放高利貸外，蓄有大量貨幣的錢商也從事著高利貸的副業」因為一般的說來，戰爭，租稅等等的榨壓，致使小生產者變為商業資本，尤其是高利貸資本的必然的不可缺少的餌食。小生產者一度陷入高利貸的羅網，便少有逃出的可能。若就希臘而言，「益趨擴大的貴族的貨幣支配為對債務者而保護債權者，為認可貨幣所有者，向小農的榨取，又創造一種新的習慣法。雅典所有的耕地，皆豎滿抵當的牌子，上面記載着這一塊地抵押給某某人，值多少錢的字樣。至於沒有被這樣指定的田地，大概是已因為抵押過期或利息而出售，轉讓給貴族的放高利貸者了。」（註十）

然而，在羅馬，高利貸資本會發展到特別的高度。這個發展的基礎，早在紀元前五世紀乃至四世紀已經就奠定了。那時羅馬還是小地產佔優勢的國家。在日漸發展的貨幣經濟的條件下，小農民不斷的需要着貨幣，常常陷入高利貸者的羅網。當時的債務法是非常橫暴的，不履行債者，可能賣之為奴或甚至弄死。這使高利貸急激地繁榮了起來。此後，債務法內於羅馬平民的強烈的階級鬥爭，十分緩和了。代之而起的致富的源泉，就因征服而豐富了奴隸的供給，提供了許多被榨壓的「人類材料。」

第五節　古代奴隸社會的崩潰

建築在奴隸制上面的古代社會發展到一定的時期就漸次走到衰微和沒落的過程上了。其原因：

（1）奴隸經濟，阻止了古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一，因爲奴隸極多而且價格的低廉，致使複雜的勞動工具的使用得不到利益；第二，因爲強制勞動和奴隸不愛惜工具，排除了使用精巧工具的可能性，因而抑制着技術上的進步；第三，隨奴隸經濟的發展，小自由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之不可避免的零落與無產者化，（參照第三節）使國家對於這大批飢餓的流氓，懷着恐懼，怕他們搗亂暴動，曾用種種方法來懷柔他們，并扶養他們，有施麵包，施食的組織等等。遊惰的生活和國家的施食制度，對於古代的流氓及無產者生出了極其否定的影響，在他們之中發生了侮蔑一切的生產勞動的念頭。Engels 在其名著自然辯證法上說：「在奴隸制度佔生產之支配的形態的地方，勞動變爲奴隸做的事情，因而對於自由人是不名譽的。因此而封閉了從此生產方式的出口；別一方面更加發展了的生產，感覺到奴隸制度的限制，而迫使排除這種限制。一旦遇着這種矛盾，那麼以奴隸制爲基礎的生產，及以此爲基礎的國家，就要沒落。」Engels 在別處又說：「……奴隸制是死滅了，因爲他不復有補償。然它留下了牠有毒的刺，即污蔑了自由人的生產勞動爲微賤下劣。它引導羅馬世界走入狹弄中——羅馬人是不能由此逃避。」（註十一）第四，奴隸制下勞動力的再生產，即勞動力的補充，是由粗暴的強制（戰爭）而行着的。都市的破壞，全地域的荒廢，男子的殲滅，婦女及兒童的奴隸化——這些都是奴隸制之不可分的構成部分，這究竟把古代社會的生產力之發展阻礙到了怎樣的程度，是容易想像的。這樣，奴隸經濟的發展，反而變爲阻礙古代社會生產力發達的因素；奴隸社會的生產關係，轉化爲在其內部漸次發達了起來的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種矛盾的尖銳化，當然要引起古代奴隸社會的沒落。

（2）奴隸供給的減少——大戰爭和征服地的減少，限制了奴隸的供給；過勞和蹂殺所引起的奴隸的大量死亡，更促進了奴隸泉源的涸竭。

（3）貨幣經濟的發達，商況的變動無常，使需要突減時奴主不能解放奴隸，這變爲奴主的一種累贅，使他們了解到與其使用

奴隸勞動，反不如使用効能較高的自由勞動。

（4）奴隸叛亂——古代奴隸社會經濟中的許多矛盾，在紀元前二世紀至一世紀，即在奴隸制最繁榮和羅馬國勢最强盛的時代，達到了他的頂點。由前一世紀的三十年代以來，曾發生繼續不斷的奴隸叛亂，經過了六十年的歲月，而且席捲了羅馬共和國的大部分。同時，還有農民和都市貧民的動搖。羅馬政府費了極大的努力，在軍事獨裁和大殘殺下才暫時把這些叛亂鎮壓了下去。繼續，在紀元前一世紀末，羅馬共和國轉化爲中央集權的帝國，軍事獨裁的皇帝的權力，二百年間抑制着了階級鬥爭的發展，防止着了古代社會的瓦解。但自二世紀起，階級鬥爭又從新尖銳化了。構成羅馬政權之基礎的小自由生產者的零落，奴隸與農民之轉化爲Colonus（農奴）使奴隸叛亂獲得了支持着他的同盟者。這樣，在三，四，五世紀間，奴隸，Colonus，都市手工業者，貧民的暴動，形成革命的一大洪流，不斷地進行着。商業鬥爭中斷，手工業沒落了，都市荒廢了，轉化爲大的農村。皇帝的權威衰微了，他變成兵士掌中的玩物。一時有幾個皇帝出現，不斷地相互戰爭，羅馬帝國解體爲幾部分了。

和奴隸社會及國家的沒落同時，在歷史的舞台上，有把羅馬包圍的日耳曼民族出現。他們在五世紀，終於佔領了羅馬帝國的西部，建設了國家，在那裏封建的關係開始發展起來了。

(註一)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一九七頁，中譯一七六頁。

(註二)同上，二二九頁，中譯二〇五頁。

(註三)Engels著：吳理屏譯反杜林論二三〇頁。

(註四)Engels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明華出版社版一六二頁。

(註五)同上，二三五頁。

(註六)Reimes: Ein Gang durch die Wirtschaftsgeschichte. S. 69

(註七)馬恩全集日文版，第十二卷，八五一頁。

(註八)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四五——四六頁，中譯三九——四〇頁。

(註九)資本論第三卷，上册，德文本三一六頁，中譯二六〇頁。

(註十)同註四，一五一頁。

(註十一)同註四，二一〇頁。

本章主要參考書

Engels 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石濱知行著：歐洲經濟史綱(郭伯棒、陳殷琛譯)，

山川均著：唯物史觀經濟史(熊得山譯)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一分册，(日譯)

黎哈特著，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

馬果古舍著：社會構成論。

柯瓦列夫著：古代社會論(俄文，已有日譯本)

瑪瓦略夫著：郭沫若譯古代社會的經濟(組倫文)

第四章　中世封建社會

第一節　封建制的意義

（一）封建制的第一個基本特徵是自然經濟的支配或統治。爲什麼呢？

伊里奇說：「農奴制下的領地，跟其餘的世界，只有非常鬆懈的連絡，它是自給自足的封鎖的一個整體。農奴制的存在的最後時代，特別發展的，以販賣爲目的之地主的穀類生產，已經是預言舊制度崩潰的東西。」（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日文岩波文庫版，上卷二三九頁。）

本來，封建的生產方式，須以生產力的某種發展水準爲前提；在此種水準之下，各個經濟主體，或個人的家庭，不僅生產必要的生產品——即維持全家生活和勞動力及其經濟再生產所必要的一切——，而且還要生產剩餘生產品，即必須生產超出必要生產以上的若干剩餘。但因當時的生產技術幼稚，可能獲得的剩餘生產品是很小的，而且也不是隨時都有的或固定不變的。

封建經濟的特徵之一，是單純再生產。伊里奇曾說：「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法則，乃是生產過程在從前的範圍以內，在以前的基礎上面的不息重演。」（全集第三卷三九頁）這使封建時代的生產，像一切社會關係一樣，有着保守的停滯的傳統性質。剩餘生產品，照例是以封建地租的方式消費了，很少有投於再生產過程以擴大生產規模。雖然在整個封建時代，生產力會有很大的增長，但是這種變遷推進的速度是很慢的，因而在封建生產的一切方面，都印下了頑强的傳統主義的痕跡。

其次，因爲生產力微弱，而且發達得很慢，故社會分工不大發展；工業勞動跟農業勞動還沒有分離開來，而且是以農業勞動爲生

產的基礎，因此，交換是不大發達的。通常投入交換過程或市場的，僅係消費的剩餘，整個兒說來，就是自然經濟統治着。*

（二）封建制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是：「直接生產者被施與生產手段，尤其是被施與土地，而且直接生產者必須被束縛或附着於土地。」（伊里奇上揭書二三九——二四〇頁。）因此，Engels 在英國勞動者階級狀況的序文上說：「在中世，不把人民從土地解放（Expropriation）出來，反之，卻把他束縛（Appropriation）在土地，是封建制剝削的源泉。農民雖已保有土地，但是當作農奴而束縛在土地，而且對地主有貢納貨幣（勞動）或生產物的義務。」

本來，一切的階級支配的物質基礎，是基於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支配階級）獨佔生產手段，而其他一部分人（被支配階級）沒有生產手段。因此，一切的階級社會的基本生產關係，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對直接的生產者的關係。正存在這個關係的形態裏面，生產的根本要素——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實行結合，而且正好是這個關係，曝露了「最內部的秘密，全部社會機構的隱藏着的基礎。」（資本論第三卷，下冊，德文本三二四——三二五頁，中譯本六七六頁。）

土地所有，是封建主階級支配之物質的基礎，封建領主獨佔支配下的土地，是使封建領主從直接生產者搾壓吸收剩餘勞動或生產物的生產手段；同時，土地又是封建社會的直接生產者被掠奪去了的沒有的生產手段。

直接生產者，只有一種生產手段——土地被掠奪，他們沒有土地。而且，「只有土地，是當作他人所有的所有物，當作人格化為土

* 「所謂自然經濟就是：在這種經濟上，經濟條件全部或最大部分，是在同一的經濟的本身內部生產，而且由它的總生產物直接代償和再生產。」（資本論第三卷，下冊，德文本三二九頁，中譯本六七九頁。）

** 卡爾曾用這樣的話來說明封建社會裏直接生產者的特徵。他說：「直接的生產者，在這個場合，有他本身的生產手段，有為他的勞動的實現和他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所必須的物質的各種勞動條件。他獨立地經營農業及與農業相聯繫的農村家庭工業。」（資本論同上，三二三——三二四頁；中譯六七五頁。）

地所有者的勞動條件而與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相對待。」（資本論同上，三二八頁，中譯本六七九頁。）但因封建制社會自然經濟佔着統治的地位，農業的支配，致使土地變爲封建社會生產的「最必要的勞動條件。」（同上，三二八頁，中譯本六八〇頁。）這樣，直接生產者卽使有實現他的勞動和生產生活資料時所必需的其他勞動條件也好，假使沒有土地，那麼這些條件決不能獨立發揮作用而從事生產。換言之，在封建的生產方式下，直接生產者（農民）要可能經營農業，就必須和土地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這「正如蝸牛和牠的殼一樣，（卡爾）」不能分離。這樣，被施與生產手段（土地）的直接生產者，就被束縛在或附着於土地上；同時，這也替地主保證着「人手」的供給。（伊里奇上揭書二四〇頁。）

（三）封建社會的第三個基本特徵是：「超經濟的强制」或經濟外的强制。（同上）

根據上面的說明，可知在封建的生產方式之下，生產者照例是跟生產手段（土地）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的。在這裏，假使地主對農民的人格，沒有直接的權力，換言之，假使農民對地主沒有人格上的依存關係，他不隸屬於地主，則地主決不能强制他——被施與土地而從事於獨立經營的農民——替自己勞動或提供出剩餘生產物。因爲直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直接生產者已具備了可能獨立生產的各種條件，那麼，迫使直接生產者把自己的剩餘勞動或生產物必須提供於地主的任何經濟原因都是不存在的。這樣，地主之所以可能剝削直接生產者，只是由於對於後者的「超經濟的强制」或經濟外的强制。「這種强制的形態和程度，從農奴制起直到農民身分上的權利限制爲止，可能是非常之多而且複雜的。」（伊里奇上揭書二四〇頁。）所以，卡爾說：「在直接生產者是所有者——生產他本身的生活資料所必須的生產手段和勞動條件的所有者——之一切形態上，顯明的，所有關係同時不能不表現爲直接的支配和隸屬的關係，因而直接生產者不能不表現爲非自由者。這裏所說的非自由，可能包含從隨伴着徭役勞動的農奴制開始，到單純的貢納義務爲止。……這樣，人格上的隸屬關係，不管程度如何，人格的不自由，和當作土地的附屬物而束縛在土地，卽嚴密的意義的隸農制（Hörigkeit），是必要的」（資本論同上，三二三——三二四頁，中譯本六七五——

六七六頁。」

這樣看來，封建的生產關係之基本特徵，是土地所有者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削形態在這裏必然地要採取經濟的形態；而且直接生產者也要表現為非自由者。因此，各種形態的農奴制，即人格的不自由，人格的隸屬的各種形態，構成為封建制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一般重要的特徵。

（四）封建制生產方式的第四個特徵是「技術的極端幼稚和停滯的狀態。因為經濟的經營是在小農民手中，他們既受窮乏的壓迫，又受人格隸屬和智力愚昧的侮弄，」（伊里奇上揭書二四〇頁）致使封建制生產方式下的技術非常幼稚，耕種方法和工具，代代相傳，在數百年間都陷於舊態依然的停滯的狀態，這使封建性和後進性差不多成為同義語了。

第二節　歐洲封建制的起源和成立

第一項　羅馬派和日爾曼派的見解

在西歐，奴隸社會崩潰後，從八世紀末葉到九世紀初期，確立了基於封建制的中世社會，它發展到十七——十八世紀的布爾喬亞大革命才崩潰下去，開始了在封建社會胎內孕育起來的資本主義時代。那麼，歐洲的封建制是怎樣發生的呢？關於這個問題，諸說紛紜，意見煩雜，綜其主要見解，可分為羅馬派（Romanist）和日爾曼派（Germanist）兩大對立的主張。

羅馬派在古代羅馬帝國中發見封建時代的經濟機構和政治組織之一切基本要素，而認為封建制是從晚期羅馬帝國的秩序中發生的，因而論證古代日爾曼人的經濟機構和中世紀的社會經濟，沒有任何的關聯。例如羅馬派的最著名代表學者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便認為晚期羅馬帝國的制度，大體上已經決定了中世紀歐洲的以後的發展。個人的私有權，大土地所

有制，農奴避國，這些便是 Coulange 從中得出西歐中世紀社會制度的基礎，

反之，「日爾曼派認爲中世紀封建制度是純粹日爾曼原則的發展。早期的日爾曼派把「自由」（孟德斯鳩）「個人主義，」民兵制度（吉佐，）德國的關官（愛果仁，）認做這種原則。魏茨，尤其羅特則側重於日爾曼人的國家性的原則，把封建關係的發展視作晚期的現象。據羅特的意見，封建關係乃是卡羅林立法活動的結果。G.摩列爾的名著及其馬克論，給日爾曼主義的觀念又添加了新的和實質的內容。」（張仲實譯：封建主義二十頁。）摩氏曾說：「領地這種東西，和最初的移住同時開始，遠在太古的日爾曼制度中，也可能看出來。遊牧民定住下來，所有了抽籤的分割地後，從此開始，領地也就存在了的。」（轉引自 Reihardt 著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日譯本二五〇頁。）這樣，日爾曼派認爲中世紀封建制度起源於日爾曼人的社會經濟機構。

那麽，究竟那一派的見解正確呢？

第二項 我們的見解

我們認爲羅馬派和日爾曼派的主張，都是只看見事實的一面而未看見全面的不正確的見解。「封建制在西歐的發生有兩條路：一由於在羅馬帝國盛行的奴隸社會形式解體的結果；一由於古代日爾曼人＊氏族公社解體的結果。日爾曼人的征服羅馬帝國，聯合了這兩個過程。從牠們的相互影響中，產生了新的社會形式——封建主義，作爲牠們的綜合（參看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二一二二頁。）」（轉引自前揭張仲實譯書二二——二三頁。）所以馬恩二氏在德意志意識形態（Die Deutsche Ideologie）上說：「封建主義決不是當作既成的東西從日爾曼人帶了來的，牠的起源，卻在征服者方面，恰好在征服的期間中軍隊制度的戰鬥組織裏面，＊＊這個戰鬥組織，在征服後受了被征服各國中既存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到了未來的封建主義。」（呂文岩譯文獻叢一二二——一二三頁。）

這樣看來，要想詳細地說明封建制的發生，第一必先把握羅馬帝國末期生產力發展時水準及在此種生產力規定下的生產諸關係，即必須先說明羅馬帝國末期奴隸制如何解體及其結果如何。其次要說明日耳曼人的「軍事組織」在征服羅馬帝期間及以後，受了被征服國的怎樣的影響然後才轉變為封建主義。

第一，在第三章第三節我們已經說過，在羅馬末期的古代奴隸社會內部早已發生了封建諸關係的萌芽和Colonus（隸農。）Engels說：「一般的窮乏，交通，手工業技術之退步，都市的滅亡，人口的減少，農業之復歸於較低的階段——那是羅馬的世界支配之終局。

但在整個舊世界為最卓著的生產部門之農業，如今再獲得未曾有的重要。在意大利，那從共和制末期以來差不多包括全個土的大地主制（Latifundiae）已用二種方法來利用：或者當作牧場，那裏只有牛羊而無人民，用幾個奴隸就可勝任看守之事；或者當作田莊，那裏用大羣的奴隸從事大規模的園圃耕作，半供所有者的奢侈享用，半為向市場出售。大牧場一直保存，而且有幾處還有擴充。惟田莊及園圃耕作，為了所有者的窮乏及都市的滅亡已趨於衰微。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Latifundiae經濟再也不能獲利；然在當時，它是大農業唯一可能的形態。不過現在，小農生產復成為惟一有利的形態。田莊依次區分為小的地面，租給繳納一定租金的佃農，或者借給每年能得勞動生產額六分之一或僅九分之一的與其稱作佃農無寧稱為管理人之帕替阿里（Partiarii）。但這些小農地，大概是分給移民，他們是每年納一定的款，且可與他們的農地一同出售的。這批移民雖不是奴隸，卻仍非自由人；他們不能與自由人結婚，而且他們同類中的婚姻並不認為有效，僅同奴隸似的婚姻一樣，當作偏房（Concubinage）看待。他們實是中世紀農奴之先

* 古代日耳曼人不但是德人的祖先，而且是西歐其他各國（英，法，意，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麥等）大部分居民的祖先。——彭註。

** 當時日耳曼人的發展程度比羅馬人為低，還盛行着氏族的制度。他們跟羅馬人作戰了幾百年，故其軍事戰鬥組織有着特殊的意義。軍事長官，及其軍隊，便是每一部落的領袖。——彭註。

編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明華出版社版，二〇八——二〇九頁。）

第二，上述之 Colonus 奴隸，貧民，手工業的叛亂，日爾曼人的侵入，內外夾攻，終於推翻了奴隸社會。但是，巨大領土的獲得和土地分配於日爾曼人之間，便加强了日爾曼人的擁有土地的貴族。日爾曼諸王，把侵佔羅馬領土時分得的廣大的土地，分給自己的侍從；羅馬富豪的整個莊園連同其奴隸和 Colonus 都落在這些侍從手中去了。*

因此之故，奴隸革命的結果，並未使剝削終止，而只是改變剝削的形式罷了，在這裏，封建的剝削代替了奴隸的剝削；新的日爾曼貴族以及殘餘的羅馬大地主，便成了封建的支配階級。**

---

* 「在羅馬旗下，甚至對日爾曼人作戰的日爾曼擁軍，有大部分是由此等護兵編成的。為日爾曼人之恥辱與禍患的傭兵制度，已於此下了發軔的胚胎。當征服羅馬帝國之後，此等諸王之護兵，與非自由人的羅馬宮廷之使臣，都成為日後貴族的一部分。」（Engels 著上揭書，二〇三頁。）

** Engels 說：「日爾曼的野蠻人因有使羅馬人從他們本國解放出來之功，遂佔有他們全體土地的三分之二自行分配，作為報酬。這個分配，是依氏族制度而行的。因勝利者的人數比較的少，故大部分的土地依然未被分配，為氏族部落或氏族所佔有。各氏族用抽籤的方法，將耕地與草地分給各個家庭。至於那時候的分配是否反復舉行，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種辦法在羅馬諸屬領是不久即廢止的，各人所分得的地，變為可以出售的私有財產，即所謂自由保有不動產（Allodium）。森林及草地依然未被分配，而為共同的利用。這一利用及所分得的土地的耕種方法，由習慣及全體的決議以規定。氏族在它的村落內愈久住，日耳曼人與羅馬人的事情愈融洽的話，親族關係的性質就愈消失，而地域的約束便愈鞏固。氏族在馬可共同體（農村公社）中雖然消滅，但它的成員仍然表現出親族關係的痕跡來。那在馬可共同體仍舊保存的各國——北部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及斯干狄那維亞——氏族制度逐漸沒入於地域制度之中，且因以獲得適應一個國家的能力。……

這樣，在氏族內血統內的約束之自然喪失著作征服的結束，自必引起部落及全氏族的氏族制度機關之廢壞。我們知道對於被征服的人民之支配，是不和氏族制度相一致的。……做那些各屬領的主人的日爾曼民族，自須把他們所征服者加以組織。但是他們既不能把羅馬人當作團體收容到他們的氏族中，也不能用氏族機關去統制。於是在大部分會保存的羅馬地方行政機關之上，不能不設置一個可以代氏族機關之代替物，而這一代替物必須是另一個國家才行。因此氏族制度的圖章不得不變爲國家的機關，且在形勢緊急之際，它就很迅速地成功了。現在征服民族之最初代表人是軍事領袖。爲對內對外希保被征服領土起見，有增大他的權力之必要。由軍政轉入王政的路徑由此到臨，而且這個改變竟實現了。

試舉佛蘭克土爾爲例。勝利的薩利安人（Salians）不僅佔有了廣大的羅馬國有地，且又佔有了未被分配給大小馬可共同體的全部大土地，特別是全部大森林地，如今已成爲獨立君主的佛蘭克王所行之第一件事，便在轉化國民的財產爲王家的財產，從民衆方面盜來以之贈與或借給他的護兵，本來爲他個人的戰時從者及下級的軍隊指揮官之護兵，因爲懂得書法受過教育，熟悉羅馬的語言法律以及成立了的文學而見重於王的羅馬人，即羅馬化的高盧人，其數爲之大增。但奴隸，農民及被解放的奴隸也成爲他的廷臣。從這些人中間，他選出自己所寵愛者，最初，他們獲得公有地的贈與，後來這種利益大抵在王的生存中被授與，這樣，新貴族之基礎，是犧牲了民衆以造成的。」（Engels 著：上揭書，二一一——二一四頁。）

第三節　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莊園制（Manor System）的成立過程

日爾曼人的征服羅馬，遺留下一層廣大的自由農民，尤其在日爾曼人完全居住的地方（英格蘭，法國北部，德國，）更其厲害。Engels 說：「立於羅馬的（Colonus）與新的農奴之間的則是自由的佛郎克」——有土地的自由農民。這種自由農民的零落，及其逐漸轉化爲農奴，便是早期中世紀史的主要內容；同時，也就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莊園制（Manor System，或稱領地制）的成

立過程。那麼，這些自由農民為什麼漸次沒落而轉化為農奴了呢？

「侵入羅馬帝國的日爾曼人，不僅要進行對外的征服戰，同時自己的內部，也常常發生分贓不平的武力衝突和內亂。這樣，「恰如以前在共和制末期的羅馬農民然，如今構成佛蘭克民族大衆的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也因為永遠的內亂與征服的戰爭而趨於疲憊與貧乏了。」（Engels 著上揭書二一四頁。）*

因此之故，繼續不斷的內亂和戰爭，使許多自由農民沒落，他們放棄土地而淪為農奴了。

其次，氏族的聯繫，在日爾曼人大遷徙和日爾曼人移居於羅馬帝國領土的期間，曾經瓦解了。氏族對於其成員的保護終止了。國王權力很薄弱，而完全操在大土地所有者，大領主的手中，在這種情勢下，假使有某個自由農民，不論如何窮困，總不願把自己的土地交出而隸屬於領主，那麼，領主便用盡種種陰謀和強制，務期達到掠奪自由農民的土地的目的。在這種時機，國王也是幫助領主的。例如，第九世紀，頒佈領地法的卡爾大帝，曾下有一個命令：凡不願讓渡土地給僧正，長老，伯爵等的自由農民，直到他們窮困無條件交出財產為止，應壓迫他們，把他們送上戰場。所以資本論上說：「促進羅馬平民沒落的戰爭的義務（兵役），是使卡爾大帝把德國的自由農民變為農奴及僕婢的重要手段。」這樣，自由農民便漸次陷於隸屬的農奴的地位。國王的權力會促進了這一過程，它給了大土地所有者尤其教會以免役權。免役區域的居民，仍給享有免役稅者交納租稅，受他的管轄，以致陷於隸屬的附庸的地位。國王的官吏，尤其伯爵，則利用自己的地位，迫使自由農民來服從自己。伯爵變成了大土地所有者，享有廣泛的政治權利，並對自己的職位享有世襲權，把職位變成他們私人的所有物。這樣，自由農民大半便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的權力之下了。所以 Engels 說：「佛蘭克的農民

---

* 繼續不斷的戰爭，給與自由農民以種種打擊，（一）戰爭破壞了田園，或使自由農民為作戰而無餘暇經營農業，致使田地荒廢，（二）領主因戰爭所受的損失，概由農民徵發賦課來補償，（三）自由農民和制的徵圖農民不同，戰場上必須的武器馬匹，必須自己準備好去親自作戰。（石濱知行）

落後之零落，因國內戰爭，王權的衰弱，以及相應於此的貴族的跋扈而益加甚……

佛蘭克王國的自由農民，覺得他們自己是處於和他們的先驅者即羅馬的移民相類似的狀態。他們被戰爭和掠奪以致零落，祗好求保護於貴族及教會，因爲王權已經過於衰微，再也不能保護他們了。但爲獲得保護計，他們必須付高的代價。與以前的高里亞(Gallie)農民一樣，他們須將土地所有權讓給他們的保護人，轉向他們用種種的形態，當作承租人收回土地，但往常總祇是用勞役及納稅以取回的。一經陷於這樣的隸屬的形態，他們就逐漸喪失他們個人的自由。在數世代之後，他們大都已變成農奴」(Engels著上揭書二一四——二一五頁。)

這樣，自由農民漸次零落，他們跟奴隸和半自由人Colonus 匯合在一起而成了農奴大衆。自由農民之農奴化的過程，會延續了好幾百年，不論在那裏都沒有達到止境，到處都留下了相對自由的農民。不過，此種相對自由的農民，對大土地所有者不得不處於封建附屬的地位，承認他們對自己土地的最高私有權，而給他們交納若干稅捐和年貢。在中世紀的歐洲，自由農民的私有權，只是一種例外。當時的通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張仲實譯上揭書三十頁。)

擁有廣大土地的領主，對於自己的家臣，官吏，武士，按其功績的大小而賞賜「封地」(Fief, Feidum) 或貸與土地，即給與「恩貸地」(Beneficism)，這種恩貸地經過一些年代，便轉化爲封地，領主的侍從，也因此變爲小領主。這些大小領主，利用他們的大土地所有——莊園來謀利，壓搾農奴，奪取自由農民的財產，侵蝕公有地，愈使領主權擴大，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領主和隸屬於他的官吏、家臣，武士，農奴等的關係，以及身分上的區別，變爲固定的絕對的，這完成了莊園制的統治形態。這種基於大土地所有的莊園制普及各地時，中世紀封建制也發展到它那典型的形態；同時，它還構成爲中世紀各國共通的經濟組織。*

* W. Sombart 說：「領地，及在領地中形成的特殊經濟編制，即「莊園經濟」，……它構是中古時代歐洲各民族一種共同的現象，此現象對[illegible]這些民族全部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對於他們經濟生活的形成，曾發生極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現在是沒有爭論的。」(Sombart [illegible]

第四節　莊園制度 (Manor System)*

第一項　農業經營方式

莊園的全部土地劃分爲領主的土地(Demense land) 和農奴的土地 (Land of villenage) 農業經營的方式，依據英國有名的經濟史家 W. J. Ashley (1860—1927年)在其名著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上說：「莊園的大多數通常是由一個村落構成的，在村落中央有一條村道，在村道的兩邊，並列着耕作者的家宅，在家宅的周圍，有一些空地，在當時還沒有構成以後所表現出來的一個一個分開來的耕地。(Farm) 村落的周圍是耕地，通常是三圃農業，就是說，把全部耕地分爲三部分：在一塊土地上栽培小麥或燕麥，在其他的土地上栽培大麥，其餘的一塊土地作爲休耕地。各圃又分成幾個斑田 (Furlong)，各個斑田又分成一個或半個英畝大的地帶，(Strip) 地帶周圍沒有籬笆，是用畦分開，分給各個農的。但同一的個農不得有鄰接着的地帶。這個地帶的保有者，必須用輪栽農法來耕種自己的地帶。除了耕地以外，還有草地，在刈草期間圍以藩籬，由抽籤交替和習慣，分配給各村民。在乾草收獲後，即開放爲牧場。在許多場合下，還有永久當作放牧用的土地、森林存在。在那裏，家畜的數量，不受限制，或者可以放牧的數量能夠相當於各個人保有的 Virgate（細長地，約有三十英畝，或稱爲 Yardland ——彭）的大小。」

moderne Kapitalismus. III. 李子譯第一卷第一冊，四四頁。)

---

* 爲節省篇幅我們暫以英國的莊園制爲主要研究對象，其他各國的莊園制大半和英國的相同，故從略。

第二項　莊園的統治

莊園內的最高支配階級爲領主（Lord）。領主有二：一爲俗人的領主，一爲宗教的領主（教會）。這些領主在執行時，設置管事（Senchal），農地管理人（Land Agent），代辦者（Lawyer Steward），執達吏（Bailiff）等等，實行監督其履行義務。在領主統治下的被支配階級內有自由農民（Freemen, Freeholder, Socmen）和不自由農民。自由農民不同，在莊園制度的初期，自由農民站在領主與領民人間，監督領主使他不要騷擾領民的權益，紊亂領民團體的秩序；制度發展，自由農民不能不一度陷於不自由的境遇。

不自由農民分爲兩種：一爲Villeins，保有三十英畝的土地；一爲Cottars（住小屋者），保有五英畝的土地。還稱民及其所使用的人，都稱爲農奴（Bondsman, Serf）。除此以外，莊園內還有各種各樣的小手工業者，其工作所得的報役及貢稅。

第三項　農奴的權利和義務

（一）農奴權利有：

1，在未開耕地中平均有三十英畝的土地的配分，那個土地可能爲自己自由使用，一直到收穫爲止。在收穫後，不能再成爲莊園的公有地。

2，自由農民和農奴在依古習抽籤得來的刈草場之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地帶上，有收穫乾草的權利。

3，在公有地，森林，抽籤分配的刈草場，或收穫完了後的未開耕地內，有放牧的權利。

4，在森林，荒地有採取柴木，青草，石，砂，礦物的權利。

5，在森林荒地有狩獵的權利。

6，為飼養小家畜，有極小的園地的權利。（但非一般的情形。）

（二）農奴的義務有：

1，Week Work ——即在每一星期內，有一定的時日（三日或五日不等）必須在領主的土地上為領主勞動，通稱勞動地租或徭役。（參看第十一節的長註）

2，Boon Work——農業以外的勞動。

3，Gafol ——不定期的貢納義務。

（三）莊園內一般領民的權利和義務：

1，有出席莊園裁判所（Manorial Court）的權利和義務。——這是民族社會的遺跡和中世紀的特色，約三星期即開庭一次，佔有土地者必須全部出席，決定一切案件，領民的義務，莊園的習慣和規約等等。裁判長是領主或其代理人，領民對於領主的獨斷專橫，是無權控訴的，領主常常利用莊園裁判所來增加領民的義務，奪取他們的財產，所以它完全是被領主利用的搾壓機關。

2，利用莊園內的敎堂作集會之用。

從表面上看來，領民（農奴等）的權利義務還算平等，但在實際上，領民的權利日被剝奪減少，義務反而日益增加，致使當時的苛雜非常繁重，農民慘受種種壓搾。

關於中世紀農民所受的種種壓搾，Engels 曾說：「他（指農民——彭）在各處都被當作牛馬，或比牛馬更壞的東西看待。……他們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其主人的產業上面。從他不多的自由時間之內所得到的東西，又要拿出來繳納雜稅，欠款，地租，戰爭

稅，土地稅，帝國稅，和其他開支。他不支付主人的錢，不僅不能結婚，並且想死也死不了。除了這些正規的賦役以外，他不得不替其主人收集乾草，稿薦，採橘，收集蝸牛殼，打獵，砍樹等等。釣魚和打獵屬於主人，農民睜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收成受野獸踐踏。農民的公共牧場和森林，幾乎到處被其主人強迫沒收。而且主人可照處罰農民財產的方法，更糟踏到農民的本身和他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權（原文爲 "Das Recht auf der ersten Nacht" 即農民的姑娘出嫁，第一夜必須先和領主伴宿，然後才輪到新郎。——彭）無論何時，他可任意把農民投之獄中，在獄內拷問農民正和在預審法庭拷問犯人一樣。無論何時，他可撲殺農民，或者把農民斬首。加洛納林（Carolina）法典各章中，指出「割耳，」「割鼻，」「挖眼，」「斷指，」「斬首，」「車裂，」「焚燒，」「夾火鉗，」「砍四塊」等等，沒有一項不被仁慈的貴族和主人任意實行。誰能保護農民呢？法庭被勳爵閥閱之家，或法律家坐滿了，他們深知自己爲什麼而享受薪俸。帝國的一切官吏，是不憐惜農民血液啊。」（錢亦石譯德國農民戰爭，一九——二〇頁。）

據此可知：封建社會完全建築在對農奴的殘酷的剝削上。但是，殘酷的剝削，阻礙了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并釀成農民暴動（Peasant's Revolt）而構成莊園制度沒落的主要原因。

第五節　財產制度

封建的所有形態，換言之，封建社會的財產制度，反映出封建社會生產諸關係之一切的特徵。一方面，因爲農業是最基本的生產部門，故「所有形態和財產的內容，多少總要帶一些土地所有的性質；」（經濟學批判序言）別一方面，建基於自然的各種關係上的，而且制約此種關係的土地所有制度，沒有隱蔽着地主對農奴的「超經濟的強制」下的剝削關係，就是說，這種剝削關係沒有被商品的「拜物教性質」（Der Festisch-charkter der ware 參照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所隱蔽，因而這種土地所有，構成爲非拜物教的各種關係的源泉。（因爲封建時代的勞動表現在它那自然的具體形態上面。）從而封建社會的生產諸關係，表現爲

人格的隸屬關係。在這裏，人們不是獨立的，誰也是互相依存的。例如：「農奴與領主，家臣與封建諸侯，俗人與僧侶。」（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四三頁，中譯三八頁。）只要人格的諸關係，人們的互相依存，足使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具有一種特徵，那麼聳立在土地所有關係的基礎上的社會關係，就決定封建的所有分配，即封建的生產組織建築在土地所有和分配上面。

封建社會財產制度的特殊性質，表現在限制的（拘束的）身分的財產形態上面。直接生產者之人身的隸屬制度，構成為這種財產制度的基礎。但是，這種隸屬制度，早已不像在奴隸社會那樣，是對於直接生產者（奴隸）的人格之直接的壓搾，把他（奴隸）當作生產手段，却是和土地的獨佔相關聯，因此是把直接生產者（農奴）束縛在土地上的形態。（因此，奴隸和農奴不同。前者是奴主的所有物，是生產手段，他是非自由人，農奴是半自由人，他有獨立的經營，不是別人的所有物。）

這樣，私有財產之封建的性質，其特徵是在私有財產的所有，第一是屬於身分的即法律上所規定的階級的（集團的）財產；第二是有一定的義務（即封建的種種義務）限制着的。封建財產之所以被稱為有限制的，其理由即在此。

因為農業是最基本的產業，故土地所有構成為封建時代的最重要的財產。封建時代的土地所有權，在名義上只是屬於君主。但在封建時代的初期，這名義上的所有權，決不只是名義的。因為君主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把領主的土地自由收回。即使是領主的繼承人繼承其前代的財產，其領土也是君主所賦與的，並且在這個時候，也不能不繳納繼承稅。其次，領主下面的家臣對於領主也是一樣的。但到了後來，君主的所有權漸次喪失其實質，而領主對領土的所有權也就確立起來了。

封建時代的土地財產，在其性質上是不許遺囑贈與的，但長子繼承制度，在早期即已成立。

在封建時代的土地概念中，不僅包含自然的土地，而且還包含着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因此，某個土地變更其所有者時，則在那個土地上耕作的農奴也往往跟着轉移。

第六節　階級關係

在每個封建的國家裏面，支配階級乃是一種特殊的教權制（Hierarchy 或稱爲教階制教會政治的等級制）的領主和臣屬組織。政治經濟勢力最強的領主，使較弱的領主隸屬於己，因而創造出一聯的教權制度（封建的階梯。）在這個制度下層，有非常之多的農奴大衆，在其上部昇爲支配階級的君主和巨大的封建領主等。封建領主權力的大小，是和他所有的土地的廣狹或農奴的多少成比例的。一切的土地所有者，由於相互之間複雜的義務的連鎖來聯結，便構成了特殊的「社會的金字塔。」這種組織——封建的教權制和義務關係——把一切封建主從國王起到最小的封建所有者止，聯結起來，而成爲一個政治體系。這個體系，是放在農奴大衆的肩上，强制他們使其處於隸屬的地位。所以馬恩二氏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上說：「土地所有之教權的組織，及與此相關聯的武裝家臣制度，給貴族階級以壓迫農奴的權力，」保證着封建領主對農奴大衆的剝削。

支配階級，爲維持其統治，爲保持其政權，便把他們團體的權力組織在公共權力或國家裏面。這樣，封建國家的本質，不問其形態是怎樣的不同（中央集權的，或地方割據的，）它總「是爲壓迫農奴及隸屬農民之貴族的機關」（Engels 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明華出版社版，二四一頁。）這種機關的首領是國王。國王之下有普通領主（世俗領主：公、侯、伯、爵等）和教會代表者（僧侶。）這兩種領主，是普通管人的官吏，他們直接管理領民。領主之下是領民，即農奴，隸屬於領主。但兩者之間，也有比較自由的階級存在，普通稱爲小領主。他們的發生，是由於國王或大領主對於有功的家臣，把自己領土的一部分賞賜他們而構成的特殊階級。這普通稱爲騎士（Knight），又稱家臣。他們起先和領民一樣是不自由的，後因戰績或其他功勞而被抬升。因此，他們和一般領民不同，受着特別的待遇；然就全體看來，他們和領民一樣，也負有賦役及參戰的義務。所以領主和臣屬的關係，照例總是和土地關係聯繫在一起的。

在封建制初期，還有從前時代遺留下來一些自由農民。他們最初在領主和領民之間，努力預防領主奪取他們的土地，使他公有地，或作其他越權行爲。但以後領主的威權日增，同時對他們壓迫日甚，因此大多數自由農民不得不轉化爲農奴。領主或領主支配下的農奴，有時也使用奴隸或日傭勞動者（英國莊園中稱爲 Cottars（居住小屋者）和近代勞動者不同，他們保有着一部分土地）來作工，但也是例外的現象。

因爲封建主對農奴的剝削（因而農奴勞動）是封建社會之物質的基礎，故中世紀主要的階級對立，乃封建主和農奴的對立；同時，這也就是封建社會階級關係的主要內容。

第七節　莊園制度的衰頹

莊園制度，自九世紀起發展到了十二十三世紀，已達到了它的頂點，此後莊園制經濟開始衰頹，漸次轉向到都市經濟時代。莊園經濟衰頹的主要原因：

（一）領主對農奴的殘酷的壓搾，使直接生產者的農奴在精神上肉體上現出衰頹狀態；同時，漸次自覺的農奴，對於自己毫無利益的強制勞動，感覺非常不滿和無趣，遂使農奴的生產力完全減退了。

（二）十二世紀以來都市的勃興，貨幣商品經濟的發達，從而勞動地租，實物地租之漸次轉化爲貨幣地租，遂使農奴漸次離開了領主鞭策下的強制勞動，開始了近代佃耕關係的端緒。（詳細說明可參看第十一節。）

（三）1348—1350年黑死病（The Black Death）猛烈的蔓延（這從亞洲傳佈到歐洲，又從東歐傳佈到西歐而達英國，單以英國來說，就幾使英吉利全人口的一半，都死在這可怕的病疫中，其他各國也死亡極多，）種種不斷的戰爭，飢荒，苛捐雜稅等等壓搾，在在都使農奴人數激減。其結果，一方面加強了自由勞動者的意義；一方面迫使領主爲獲得農奴，不能不提出比較好的條件，因而農

奴得以達到相對的解放的境遇（但在東歐——德意志，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俄國——農奴一度解放後，又陷於封建的隸屬狀態，因而會出現了所謂農奴制的『第二版』。這在第二篇第九章及第十一章論及德俄二國的封建制崩潰過程時再爲說明。）

（四）在極端殘酷的壓抑下爆發出來的農奴暴動（Peasant's Revolt）或農民戰爭（Bauernkrieg），是促進莊園制沒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英國1381年各地發生農奴暴動，這大半以英國東南部爲主導，Kent, Essex, Norfolk, Suffolk諸州是暴動的中心。當時著名的領袖爲 Wat Tyler。

法國1358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四日發生甲克里暴動（La Jacquerie）領導者爲 Calle Guillaume。

德國的農民戰爭，最值得注目的是在 1438 年，1465 年，1514 年，1525 年繼續不斷地發生大規模的農民暴動，主要領導者爲 Florian Geyer, Thomas Münzer（可參照 Engels 著，錢亦石譯：德國農民戰爭。）

莊園制度，就在這種農奴暴動和在經濟上日益走入窮途末路的情勢下，漸次衰頹了下去。代替莊園經濟而勃興的是都市經濟，它構成了中世紀中葉以來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

第八節　都市經濟的勃興

在古代希臘，羅馬，都曾有雄壯的都市存在過。因爲當時的都市是最高統治者的所在地，和奴隸生產，商業最發達的地方，而且這些地方大半又在海岸，所以這些都市又稱爲海岸都市（Küstenstadt）。古代都市在羅馬末期曾發展很快，後因日耳曼人的侵入，破壞了都市，過着他們固有的農業生產，遂使古代都市隨奴隸制社會的崩潰而沒落。代此而起的是中世紀的莊園制度。

奴隸社會之轉化爲封建社會，使生產力發生異常的低下。這種事實，最顯著地表現在生產之自然經濟化上面。封建領主的莊園，在一切的關係上，是自給自足的封鎖經濟，因此很少有商業發展的餘地。要使商業發達，必須更進一步的分工，——手工業與農業分

離，發展為獨立的生產部門。

手工業的發達，刺戟着交換的發展。其次，生產力發達，產生出過剩的產物。人們消費同樣物品的有限，更促使交換的發展。最初痛感交換之必要的，不是農民，只是把從農民那裡剝削來的生產品消費不完的封建主。封建主對奢侈品的需要，對別地大生產物的欲求，是促使當時交換發達的主要動力。

最初的交換方法，大半是行商。行商在陸地，在海上，開闢了新的交通路綫。這樣的行商交易，漸次變成有規律的而自然發生了商人的集合場所。最初，是一個商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只有一個商人為媒介而存在。漸次發展到商人與商人之間的交換。因為這個方法，較之前者更易於使商品流通。商人漸次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場所集合，遂形成市場。市場，大半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在國王，諸侯的居住地，教會的所在地，而發達了起來。

市集最初是不定期的，由商人們的商議而決定。這市集漸次固定在一定的時期（年市，月市，日市等，）一定的場所。在一定的地方，一旦設置了市場，同時便為保障市場的安全，以免外敵的掠奪，必須施以種種特殊的防禦設備（障壁，欄柵，藩籬等等。）市場的存在，不僅對領主購買物品非常便利，而且還可以徵收市場稅，增加領主的收入，所以領主也樂於建設保護和支配市場。定期的市場，不久卽變為常設的市場，因而發生了商業都市的萌芽。

跟着常設市場的發生，莊園內手工業者也漸次跑到市場來了。領主并不抑壓這些手工業者，使他們不要跑到都市去，因為手工業者卽使住在都市，也可能替領主作義務的勞動，這和農奴有束縛在土地上的必要不同。這樣，便發生了中世紀的都市。但在最初，流入了都市的手工業者，還不能完全脫離農業，我們只能說是產生了一些特殊的小生產者。因為在當時的生產力發達階段，莊園經濟要養活獨立的一羣手工業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當時所成立的都市，最初是被田原，耕地，牧場包圍着的，手工業者，必須於工餘從事農業勞動。因而在當時被田原，耕地，牧場圍繞着的都市，稱為田原都市或耕地都市（Ackerstadt）。但跟隨生產力的發達，手工業的

進步，手工業者的職業——農業——漸次喪失其重要性。都市的工匠的專門化，使生產技術發達，精良製品的出現，使領主也樂於購買都市工匠的製品，而漸次減少依賴莊園內家庭手工業的必要，致使農村經營農業，都市經營手工業，農村和都市的分工漸趨顯著，都市遂由農村中分離出來而成立了中世都市。

都市一至成熟，其內部發生階級的固定，出現了都市貴族（Patrizier）的專橫。富商，地主和高級市會官吏，形成為都市貴族。他們以市會為中心而團結起來，打倒封建的支配，確保着都市的和平與自由。K. Wittfogel 稱此為都市的第一革命。脫離了封建君主的束縛，在都市貴族支配下的都市，Max Weber 稱為「貴族都市」。

此後，都市手工業者的勢力漸增，他們和都市貴族之間的鬥爭，K. Wittfogal則稱為都市的第二革命。第二革命後的都市，Max Webea 則稱為「平民都市」。至於獲得了完全獨立的都市，便成為自治都市或稱都市國家。因為它能採取一個國家的形態，它不受封建君主的統治，它有自己的軍備，行政組織，更和外國獨立訂約貿易通商，並在各地設立租界（Countier），市區（Quartier），來圖謀發展。最顯著的例是意大利海岸諸都市（Seestadt）和德國的漢撒同盟（Hansbund）＊所屬的各自由都市。它們相互之間有嚴密的規約和統制；同時，對於促進商業的發展，資本的累積，會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九節　基爾特制度（行會制度 Guild System）

＊漢撒同盟的發生，是因中世都市勃興後，有關係的各都市為謀共通的利益，團結起來對抗封建諸侯，掃除盜賊，維持在外特權的一種組織。這個同盟漸大，達到預期的目的，因而加入同盟的都市逐年增加，例如 Wismar, Bremen, Dansig, Köln 等等都市也加入了。在十四世紀初，加入同盟的都市有五十三個之多，其中 Magdeburg, Weinster, Bealin 等等大都市也加入了。（參看第九章第二節第一項。）

第一項　商人基爾特(Merchant Gild)

這樣發達了起來的都市，在最初不能不受領主的庇護。但跟隨社會經濟的進展，都市的發達，領主的保護和干涉漸次變成不必要的了。貨幣經濟的發展，加強了領主對貨幣的需要，使掌握着貨幣形態的財富的商人階級顯然增加其對抗領主的力量。

基爾特(Gild, 行會)最初的組織是：商人和比較富裕的市民所組織的商人基爾特。(Merchant gild) 商人們為謀共同的利益而團結組織了起來。但是，商人要想加入基爾特，只要繳納它必需的金額（會金）決不是把自己的資本集合在一起。為共同經營商業，商人們曾創設了各種商會，各個參加者把自己的資本湊合為一，各商人便喪失了獨立的存在。故商人基爾特和商會不同，它是各個獨立商人的一種組織。

一切的商人，繳納了一定的會金給基爾特之後，便算做加入了基爾特。不屬於基爾特的商人，因為基爾特掌握着特權（商品的獨佔販賣權，免稅權等等）故對基爾特不能不支付一定的款額（當作罰金或稅款。）在英國，販賣自己的生產物的地主和教會也往往加入基爾特。但跟隨時代的進展，商人們恐怕會員太多，發生競爭，往往妨害新會員的增加。

基爾特是獲得了法人權的組織，在基爾特的首腦部，有基爾特的集會上所選出的機關，處理基爾特內部的事務。商人基爾特的目的是在：獨佔商業藉以獲得專利，并助長商業的發達；其次是從國王或領主的壓搾下把都市解放出來，使都市商業漸次繁榮。故Wilnet-Suxton 說：「基爾特的任務，在依組織的結合，規律商業，檢查商品的數量和品質，并將金錢借與都市，監督會員和居民，此外仲裁會員間的爭議，是基爾特的任務。如會員不服從時，則處以罰金。其次救濟窮人，把麵包給與病人和窮人，巡禮也是靠會員的幫助。」(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920. pp. 69——70)

第二項　手工業者基爾特(Craft Gild, Zunft)

在商人基爾特之後，手工業者爲謀自己的利益，也組織一種行會——手工業者基爾特。在英國，商人基爾特成立三十年後，始有手工業者基爾特的成立。手工業者基爾特內部，有嚴格的規則以鞏固其團結；會員大半住在同一區域，這是爲了販賣購買及互相幫助的原故。

手工業者基爾特，是由從事於同種手工業的師傅（Meister, Master, 或稱『老板』）所構成。各種（例如木匠，鐵匠，泥水匠……等等）手工業者基爾特裏面，有它的最高支配者執行公共事務或規約，在會員的師傅之下有工匠（Geselle, Journeyman, 或稱傭工）和徒弟（Lehrlinge, apprentices）。徒弟是爲學習一種手工業，在師傅之下作無酬勞動的人。徒弟的修業年限，因時代，地點，工作性質的不同而有差異；在英國爲七年，在法國爲六個月到十年。徒弟在修業期間，必須服從師傅，修業期滿後，必須通過一定的技術試驗才能成爲工匠。工匠由師傅支付一定的薪金爲師傅勞作，再經過短期的修業之後，才可能升爲師傅而從事獨立的經營。這種制度的產生，是因爲：一方面，當時的生產技術必須靠經驗的知識；同時，爲阻礙同業者激增而發生的過渡的競爭，也是主要的目的。因爲生產規模較小，他們勞動所得的利益較少，因此師傅也不能不和僱用來的人一塊勞動；加以工匠和徒弟都住在師傅家裏，受家屬的待遇，故協調的色彩比較濃厚。

其次，關於商品的品質和價格以及勞動時間，工資，工匠和徒弟的人數，都被手工業者基爾特的規約嚴格規定着。製品的原料，也用手工業者基爾特的名義購入平分給各個會員。爲檢查生產品的必要，特設檢查員。手工業者基爾特：一方面是經濟的團體；一方面又是宗教的友愛的團體。它還是一個選舉的團體。好像現在的選舉按照選舉區域舉行選舉一樣，在中世紀都市手工業者基爾特就是一個選舉區。

手工業者基爾特更有軍事的組織，若有緊急事件發生，各個會員都有集合於都市廣場的義務，而且在平時各人都有自費準備武器的義務。

手工業者基爾特，因爲有它那嚴格的規約和強制，故能長久維持其秩序和團結。這種強制：第一是對於非會員的市民；第二是爲規定各種手工業者基爾特之間的相互的權利範圍；第三是對於市外田園的人們。因爲有這些強制，故凡未參加手工業者基爾特的手工業者，就不能在都市內部營業。像這樣有組織的手工業者基爾特，用它的團結的力量和都市裏的富豪對抗，實行都市的改革，（卽前節 K. Wittfogel 所說的都市的第二革命）在都市手工業的發展上，曾起過相當大的作用。

但是，跟隨生產的發達，市場的擴大和商業的發展，手工業者基爾特漸次不能繼續維持其從來的獨佔的地位和利益了。

第一，手工業者基爾特漸次崩潰的內部原因是：照規約的規定，各師傅不能隨意增加工匠和徒弟。「手工業基爾特的規則，嚴格限制各師傅可能使用的工匠人數，因而有計劃地阻礙了師傅轉化爲資本家。」（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二三頁，中譯二八八頁。）但因日益增加的市場需要，迫使他們不得不破壞這種規約，任意增加工匠和徒弟的結果：

（一）打破了從來修業期滿卽可能昇當師傅的習慣，致使極少數的徒弟才能上昇，而大多數不能不當一輩子的工匠或徒弟，供師傅的驅使和壓榨。跟徒弟人數的任意增加成反比例，師傅人數的限制，更狹隘化了徒弟上昇爲師傅的道路；

（二）徒弟增加的第二個結果是：工資的降低和對徒弟的費用的節減。工匠和徒弟的生活的悲慘，師傅對他們的種種壓榨（這因市場需要增加而越加苛酷）和他們的前途無望，在在都使工匠和徒弟團結組織起來（工匠基爾特的出現），致引起手工業者基爾特的內部衝突。此外，在同一的基爾特的內部，因師傅與師傅之間的貧富懸殊而引起的彼此嫉視和對立，更促進了基爾特的崩潰過程。

第二，手工業者基爾特外部的經濟原因，是促成它崩潰的最重要條件。

（一）因爲師傅可能任意增加工匠，徒弟或使用工資勞動者，於是在師傅階級中發生了擁有鉅大財富的幸運者。但因手工業者基爾特內部有嚴格的種種限制，妨礙資本家的師傅之企業的活動，狹隘化了他們的剝削範圍。這些人不得不另外採求活動地盤，終於在低廉的農村勞動中發見了他們的剝削對象。農村的家內工業，因不受基爾特規約的限制，既可能延長勞動時間至十六七小時之久，又可能剝削婦女和兒童的勞動（故普遍稱農村家內工業爲「苦汗制度」以形容其工作和生活艱苦）這種家內工業，促進了商品的累積。市場的擴大和商業的發展。又刺戟着農村家內工業的發達。反之，都市的手工業，却不合理地束縛在基爾特的狹隘範圍裏面，日益不能和農村的家內工業的低廉製品相競爭而陷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二）在這種情勢下，假使仍有拘泥於基爾特的組織按照基爾特的規約來生產的師傅（小生產者），他必然地就要漸次被商業資本家切斷其與市場的直接關聯。商業資本家，把交易的範圍擴張到市場以外的很遠的地方，他已經是時勢的支配者了。這是因爲他可能把在生產地附近不能十分出售的商品，最有利地賣了出去；而且可能等待最有利的市場狀況的到來。這使許多小生產者漸次被商業資本所支配。從屬於商人的師傅（小生產者）也就是依從商人的意志，廣大的市場的意志。商人拿原料貨幣供給他，他生產着商人命令的指定的東西。因此，他爲繼續工作，保障生活的安定，學會了遵奉商業資本家從經濟的觀點所決定的命令，而日益與基爾特的規約「背道而馳。」

這樣，手工業者基爾特終於在：生產力發達，市場擴大，商業發展，基爾特內部的鬥爭和分裂，農村家內手工業的日益繁榮等等「內憂外患」中漸次崩潰了下去。基爾特的師傅們，有些變爲近代的產業資本家了，有些淪落了工匠和徒弟們，大多數轉化爲近代的工資勞動者了。

第十節　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第一項 商業資本

市場跟隨手工業的發展，都市與農村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而漸次繁榮，終於擴大到小生產者自己必須在遠隔的市場交易的程度。因此，在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在手工業的企業與遠隔的市場之間，有媒介者的必要。商人便開始執行這種媒介的業務；同時。這也是加強了商業資本的權力的主要原因。「都會的產業，其本身和農村的產業相分離時，前者的生產物，從最初即變爲商品，在其販賣上，必需商業的媒介，這是當然的道理。因此，商業爲都市的發達。在別一方面，後者又被前者所制約，這是自明的道理。」（註一）商業資本，便在都市的小手工業生產和農村中的農業生產上面，成長發展了起來。

封建時代手工業之地方的專門化或分工，是使各個都市之間以及各國之間商業發達的主要條件。當時的商人，還沒有以一定種類的商品的買賣爲專業，這些商人，買賣一切商品，他們所處理的流通手段（貨幣，）在當時往往達到鉅大的數額。在紀錄上，十二世紀已有擁有七萬馬克的巨富（德國的；）在十八世紀，參加商業上的遠征的商人，甚至一次即可作兩萬馬克商品的買賣；在十三世紀，英國的一個商業公司，一年間即從英國輸出了一百二十萬馬克的羊毛；在意大利和德國的都市，也有蓄積了很多資本的商業公司。修道院以及在此時發生的銀行，有時甚至國王，也經營商業，國王利用自己的權力，把握着一定種類的商品的獨佔販賣權商業機能和銀行機能的結合，在意大利是普通的現象。跟經營商業的銀行相併存，商人也從事於銀行的業務。

不用說，商業是帶着媒介商品買賣的機能和性質。「商人資本之獨立的發達，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程度成反比例的法則，最顯著地表現在威尼斯人（Venetian），混諾亞人（Genor），荷蘭人等之間的媒介的商業的歷史上。這個商業之獲得其主要的利益，不是因爲把本國的生產物輸出的原故，寧可說是：在商業也好，或在其他的經濟方面也好，由於媒介發達落後的各共同體之間的生產物；由於搾取生產國的兩方面而獲得主要的利益。在這個場合，商業資本是純粹的東西，是由其兩極的；是由該資本所媒介的相互

之間的，各生產部面分離開的。這個事實，構成爲商業資本成立的一個主要源泉。」(註二) 這是因爲：商人和直接的生產無緣，他們決不從事於生產的原故。意大利的商人，在十字軍時代，再三掠奪東方的各都市；漢撒的商人，在北海，在波羅的海，營着海賊的勾當。「這樣，在壓倒的支配地位上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了一切掠奪制度。在新舊任何時代的商業民族也好，這個資本的發達，是和暴力的掠奪，就是說，和海上的掠奪，奴隸掠奪，殖民地征服等等有直接關係。如在迦太基(Karthago) 也好，或在羅馬也好，或在後半的威尼斯人，荷蘭人及葡萄牙人也好，都是這樣的。」(註三) 就是因爲這種原故，當時的商業，多少總帶有掠奪的性質，而各國的海外貿易船，也就是變相的海賊船。

近代資本主義，是從中世紀的商業資本發展來的，這在歷史上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但是，古代商業資本的發展，有時便產生了奴隸制度的結果(Carthago)，有時又自滅了下去(如羅馬)，而中世紀的商業資本，如何能構成爲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呢？

「商業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促進以交換價值爲目標的生產的發達，擴大其範圍，多樣化其種類，而使之普及各地，使貨幣發達爲世界貨幣。卽商業，不問形態如何，對於大半以使用價值爲目標的既存的各種生產組織，不論在那裏，多少總有一些分解的影響。但商業到怎樣的程度可能使舊生產方法分解，却先賴舊生產方法的堅固程度及其內部的組織如何。這個分解過程，產生怎樣的結果，換言之，代替從來的生產方法，要出現怎樣的新生產方法，決不靠商業，却要靠舊生產方法本身的性質如何。在古代世界，商業的作用與商人資本的發達，常產生奴隸經濟。而且，因起點如何，以直接的生活資料的生產爲目標的一個家(父)長的奴隸制度，只是轉化爲以剩餘價值的生產爲目標的一個家(父)長的奴隸制度的事情也是有的。在近代世界，它產生出資本制生產方法。因此，這些結果本身，不是以商業資本的發達爲條件，而是用完全不同的別種事情作條件的。」(註四)

這樣看來，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達，雖能破壞自然經濟，蓄積鉅額的資本，因而造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我們決不能說：商業資本的發達，一定會從此產生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爲：商業資本對舊生產方法的分解程度，以及「代替從來的生產

方法要出現怎樣的新生產方法，決不靠商業，卻要靠舊生產方法本身的性質如何。」這樣，我們千萬不要過於強調流通過程上商業和商業資本的作用，卻應該注重生產的契機。因為商業和商業資本，可能和階級社會的任何生產方法（古代的封建的，資本制的生產方法）相關聯融合，但不能創造出任何新生產方法。這是第一點。

其次，在中世紀，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漸使小生產者喪失其獨立地位而隸屬於自己。故中世紀商業的一個特徵，也就是在商業資本支配着生產，這和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支配着商業的情形恰相反對。不用說，在商業發生的當時，它決沒有支配着生產；初期的商業，多少總跟交換的兩極或兩端——即對生產者和消費者——是獨立的。因為商人只是做着媒介商品交換的業務，而不從事於生產商品，故「商業資本是純粹的東西。」但隨小生產者之從屬於商人；商業資本的支配生產，從事於生產事業，遂引起商業資本之性質的轉化，而商業資本家也跟着轉化為產業資本家。（註五）這，同時就意味着封建制的資本主義化。

第二項　高利貸資本（Wucher Kapital）

「生息資本——在它的古代形態上，我們也可以稱它作高利貸資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資本一樣，是洪水前期的資本形態，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生以前許久就已經有了，並且各式各樣的社會經濟形態內都可以見到。

高利貸資本的存在，祇需有這樣的條件：即，至少有一部分生產物轉化為商品。同時，跟着商品經營業的發展，貨幣也在各種不同的機能上發展。」（註六）所以，和商業資本的發達相關聯，在封建社會的農村和都市，以獲得利息為目標的高利貸資本，也發達了起來。在中世紀，高利貸是商業資本的「孿生兄弟」，是同伴者。許多的商人或商會，同時也就是高利貸者。例如當時德國的大財閥——Fugger，在1519年國王選舉時，曾借了五十六萬三千 Florin 給 Karl 國王，在德國農民戰爭時代，也曾借巨額的金錢給封建領主。「高利貸資本是與小生產，自耕農民，和小手工業老板的支配，照應着。」（註七）因此「高利貸資本有資本制的搾取方法，但沒

有它的生產方法，」(註八)高利貸的榨取對象有二「第一種是靠高利貸的方法，以貨幣貸放於奢侈的闊人，那大體是土地所有者；第二種是憑高利貸的方法，以貨幣貸放於自有各種勞動條件的小生產者，那包括手工匠，但特別指自耕農民因爲一般說來在容許獨立個別小生產者的前資本主義狀態下，必然是以自耕農民階級佔最大多數。

高利貸使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破產，又把小生產者的膏血吸盡。這兩層都喚起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和累積。」(註九)這樣，「高利貸有兩種的作用：第一，它會在商人階級的旁邊，形成一個獨立的貨幣財產；第二，它會把勞動條件佔有，那就是把舊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破滅，所以，它在產業資本各種前提條件的形成上，是一個強大的槓桿。」(註十)「但這個過程，究竟在什麼程度內，像在近代歐洲一樣，把舊的生產方法揚棄，曾否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代替舊生產方法，完全要看歷史的發展階段以及各種伴起的事情而定。」(註十一)例如「在亞細亞的形態上，高利貸維持得很長久，但不致在經濟崩潰和政治腐敗以外，再引起別的結果。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別的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和時候，高利貸會表現爲新生產方法形成手段之一」。(註十二)

這樣看來，高利貸和商業資本一樣，它雖然一方面會把封建領主和小生產破滅，另一方面會把勞動條件集中爲資本，但是，它要可能轉化爲產業資本，卻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別的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和時候纔行。所以，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同樣，可能跟階級社會的任何生產方式相關聯，但不能創造出任何新的生產方式。「它（指高利貸——彭）不改變生產方法，卻當作一個寄生虫緊緊寄生在生產方法上，使生產方法變爲悲慘的。它吮吸生產方法的血，破壞它的神經，並強迫再生產在愈益慘淡的條件下進行。」(註十三)所以，從這點看來，被商業貨幣經濟的發展所規定的高利貸資本，對於生產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進展，多少還有一些否定的作用。

第十一節　結語

從古代奴隸制轉向中世紀封建制的轉化，雖然意味着社會形態的更替，向較高的發展階段的進展，但在轉化的過程上，因爲奴隸暴動，野蠻的日爾曼人的侵入，以及繼續不斷的戰爭和內亂，曾一時引起生產力的降低。故在繼此而來的莊園經濟時代，現出了封鎖的莊園制度和自然經濟的支配或統治。

在「牛步遲遲」的封建經濟的發展情況下也好，因爲直接生產者的農奴，已經不是沒有獨立人格，當作主人的生產手段的奴隸，他們是半自由人，而且有自己的獨立的經營。這，一方面意味着社會的進化；到一方面就刺戟着農奴的生產力慢慢向上發展——雖然它的速度非常緩慢，好像蝸牛走路也好。農業生產力的漸次發達，保證着當作獨立生產部門的手工業的出現和成立，引起農工業之間的分工，更刺戟着交換的發展。商業的發達，在各地創造出市場，建立了都市。都市經濟代替了莊園經濟。

跟隨都市經濟的勃興，商人基爾特和手工業者基爾特，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先後跳上歷史的舞台，開始活躍起來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一方面蓄積了巨額的（原始）資本；到一方面，又使許多小生產者破滅，創造出大量的無產勞動者，因而它們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清掃着道路。※

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的發達，破壞了自然經濟，因而創造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和原料供給地；分化了農民層，由此產生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和工資勞動者；更使徭役勞動地租轉化來的實物地租，再轉化爲貨幣地租，因而把農奴從封建主鞭策之下的强制勞動中解放了出來。※※

農村中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萌芽和發育，配合着巨額的原始的資本蓄積，無產勞動者羣的出現，國內外市場的形成和擴大，海內外商業之飛躍的大發展，新技術的發明和普遍應用等等，終於促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了封建的生產方式而居統治的地位，揭開了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第一頁，（從封建制到資本制的過渡階段的分析和敍述，可參看第五章第二節。）

※　在這裏必須注意：我們不要把早期封建制解作純自然經濟，而把晚期封建制社會解作「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因爲：第一，我們不能以交

換方式來規定生產方式；反之，前者卻被後者所規定。第二，我們在第十節第一項已經說過，商業資本可能和階級社會的任何生產方式相關聯融合，但它不能創造出任何生產方式。故根本不會有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

＊＊勞動地租（Arbeitsrente），實物地租（Produktenrente），貨幣地租（Geldrente）是封建地租的三種形態。封建地租，跟資本主義的地租不同。第一，封建地租的獲得，是由於超經濟的強制；而後者是由經濟的強制交換關係，契約，貨幣關係所獲得的。第二，在數量上，封建地租是全部剩餘勞動部分，有時它還包含著必要的勞動部分，因而在這裏，地租是剩餘勞動的通例的一般的形態，而地租構成爲利潤的界限，地租決定著利潤；但是，資本主義地租，只是平均利潤以上的剩餘價值部分，因而在這裏，地租早已不是剩餘價值的通例的一般的形態，而且平均利潤構成爲地租的界限，它決定著地租。其次，封建地租的三個形態的發展，轉化或更替，跟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發達程度相適應（但決非機械的），故能反映出封建經濟的各個發展階段。

（一）勞動地租，適應於封建制初期的經濟狀況，它是地租的最單純的形態。「在這個場合，直接生產者，以每週的一部分，用實際上屬於他的勞動工具，（犂，家畜等等）用在實際屬於他的土地上，而以每週的別一部分，在地主的土地上無代價地爲地主勞動。」（資本論第三卷下册，德文本三二三頁，中譯六七四——六七五頁。）超經濟的強制和剝削關係，在勞動地租上表現得最顯明，因爲「直接生產者爲自己的勞動，和他爲地主的勞動，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是分離開的。並且他們爲地主的勞動，還直接在強制勞動（爲第三者的強制勞動）的野蠻形態上出現的。」（同上，三二五頁，中譯六七六頁。）

（二）其次是實物地租，「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說，勞動地租轉化爲實物地租，並不會在地租的本質上引起任何變化。」（同上三二七頁，中譯六七八頁。）實物地租，以「他（指直接生產者——彭）的勞動，和社會一般的勞動，已有較高的發展階段」（同上，三二八頁，中譯六七九頁。）爲前提。在這個場合，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勞動，不復在它的自然姿態上，不復在地主直接的監督和強制下實行，而直接生產者，將受情況的驅策，不受直接的強制，將由法律的規定，不由鞭策，那就是，由自己負責來擔任這種剩餘勞動。」（同上）還，第一，「在這個情形下，直接生產者對於他自己的全部勞動時間的利用，已經多少可以自行支配了；」（同上）第二，「實物地租雖爲剩餘勞動表

現的所在，但不一定會把農家的全部剩餘勞動吸收掉。與勞動地租比較，生產者會有更大的活動範圍，可以獲得剩餘勞動的時間。」（同上三二九頁，中譯六八〇頁，）這就形成為生產力發達的剩餘物。（註A。）

(註A)有些人（例如Dobrovsky即其中之一）認為實物地租和勞動地租是兩個不同的社會形式（封建制和農奴制）的基礎，這是錯誤的見解，因為，（一）勞動地租和實物地租，在本質上是同樣的東西；（二）從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看來，農奴制本身就是封建制，因此封建制的特徵，對於農奴制是完全適合的。

（三）最後，貨幣地租是什麼？「貨幣地租……是指那種由實物地租轉形而生的地租，像實物地租只是轉形的勞動地租一樣。」（同上，三三〇頁，中譯六八一頁。）「實物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最初是間或的，此後則多少以國民的規模進行。但這種轉化，還以商業，都市產業，商品生產一般，和貨幣流通，已有顯著的發展為前提，它還以生產物有一個市場價格，并以接近於價值的價格出售這個事實為前提，但在前兩種（地租）形態上面，就不一定要如此了。」（同上，三三一頁，中譯六八一頁。）故貨幣地租的發生，意味着封建地租已經發展到它那最高而最後的地租形態，因而封建經濟也發展到它那最高而最後的階段了。因為：「在貨幣地租發生時，土地所有者和佔有土地耕作土地的農民一部分間的傳統的習慣的關係，必然要轉化為一種契約的依照明文法規來確定的純粹的貨幣關係，所以，佔有土地的耕作者，就在性質上，成為單純的租地農業家了。這種轉化，一面會在一般生產關係許可的限度內，漸次把舊式自耕的土地佔有者剝奪，而以資本主義租地農業家代替他們；一面又使向來的土地佔有者贖免他的納租義務，並轉化為獨立的自耕農民，而對於自己耕作的土地，享有完全的所有權。實物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不僅必然會伴有一個階級的成立，並且必然要以這個階級的成立為前提。這個階級，就是不佔有土地，為貨幣而出賣其自身的日傭勞動者。在這個階級初生的時期，換言之，在這個漸階級尚祗稀疏存在的時期，必然已在處境較優而有納租義務的農民間，發生一種為自己利益而榨取農村工資勞動者的習慣；這好比在封建時代，某一些有財產的隸農，已經為自己的利益，而僱用一些隸農一樣。這樣，他們堆集一定量財產的可能性，轉化為未來資本家的可能性，就漸次發展了。因此，在舊式的自營的土地佔有者間，就有了一個培養場所，他們因此培養成為資本主義的租地農業家了。」（同上，三三二頁，中譯六八二——六八三

頁。）

（註一）資本論第三卷上冊，德文本三一六頁，中譯二六〇頁。

（註二）同上三一二——三一三頁，中譯二五七頁。

（註三）同上，三一五——三一六頁，中譯二五九——二六〇頁。

（註四）同註一。

（註五）關於商業資本家之轉化爲產業資本家。我們『可以發現三種的轉移：第一，是商人直接變爲資本家；以商業爲基礎的各種產業，都是這樣；而奢侈品工業尤其是這樣；在這種工業上，原料和工人當初都是由外國經商人的手輸進來的，例如十五世紀由君士坦丁向意大利的輸入即是。第二，是商人把小老板（小師傅）變爲居間人（Middlemen）或直接向自（家）生產者（Selbstproduzenten）購買，在名義上，仍然讓這種自（家）生產者獨立，也不變更他的生產方法。第三是產業家變爲商人，並直接地爲商業而實行大規模的生產』。（資本論第三卷上冊，德文本三三〇頁，中譯二六三頁。）

（註六）資本論第三卷下冊，德文本一三二二頁，中譯四九六頁。

（註七）同上，一三三三頁，中譯四九七頁。

（註八）同上，一三七頁，中譯五〇〇頁。

（註九）同上，一三三頁，中譯四九七頁。

（註十）同上，一四九頁，中譯五一一頁。

（註十一）同註七。

（註十二）同上，一三六頁，中譯四九九頁。

（註十三）同上，一三五頁，中譯四九九頁。

本章主要參攷書

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十章，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

Engels 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Engels 著德國農民戰爭。

馮恩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

伊里奇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

張仲實譯封建主義。

柴哈特著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

布里古金著社會構成論。

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二分冊，第三分冊。

石濱知行著歐洲經濟史綱。

山川均等著唯物史觀經濟史。

第五章　資本主義社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意義

甚麼叫資本主義？它的特徵在什麼地方？——卡爾告訴我們說：『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自始即包有兩個特徵。

第一，它是把生產物當作商品來生產。』（註一）因此，『在盛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社會，財富表現爲龐大的商品的堆集，而以各個商品爲原素形態。』（Elementarform）（註二）然而，『生產商品的事實，不足以使它和別種生產方法相區別。』（註三）因爲資本主義經濟雖是一個商品經濟（Warenwirtschaft）但一切的商品經濟不一定都是資本主義。『但成爲商品，確實是它的生產物之支配的決定的性質。第一層，它是包含這個意思：即，勞動者自己只當作商品售賣者出現，從而當作自由的工資勞動者出現，勞動一般也當作工資勞動出現。』（註四）所以資本論第一卷上也說：『資本主義的生產，在事實上，本是生產之普遍形態的商品生產，但資本主義的生產之所以是商品生產，而這種事實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發達中之所以益加顯著的理由，便因在資本制之下的勞動，它的本身，是以商品的資格來表現的。』因而又說：『它（指資本——彭）的歷史的存在條件，單有商品流通貨幣流通，還是不够的。資本僅能在那種地方存在，在那裏，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與售賣勞動力的自由勞動者相遇。這一個歷史的條件，包含一個世界史。所以，資本，從它初出現的時候起，便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上，劃了一個時期。※

※ 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徵是，勞動力成爲勞動者自己所有的商品；從而，他的勞動，也成爲工資勞動。他方面，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也成爲從這時起普遍化的（註五）

那麼，勞動力要怎樣才可能轉化為商品呢？第一個條件，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必須能夠處分它（指勞動力——彭）必須成為勞動力的自由所有者，換言之，成為人格的自由的所有者。」（註六）就是說，勞動者必須不受一切的封建束縛（例如：農奴制的，或基爾特（行會的各種束縛）當作自由的人，可能自由售賣其勞動力。第二個條件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不能出賣本人勞動所依以實現的商品，却只能把那祇存於他本人活身體上的勞動力，直接當作商品來賣。」（註七）就是說，勞動者除了他的勞動力以外，沒有別種可以賣的商品。

第一個條件的產生過程，是勞動者從封建的種種束縛（農奴制的或基爾特的，以及其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是勞動者在人格上自由化，獲得人格的自由的過程。

第二個條件的產生過程，是直接生產者被剝奪其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的過程，是他們淪為無產者的過程。

所以，這兩個條件的產生過程，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從封建社會裏發育轉化出來的過程——資本主義的原始蓄積過程。故勞動力的商品化，是區別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單純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之最基本的特徵；同時，它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一。

「第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別一個標記，是剩餘價值的生產，當作生產之直接的目的和決定的動機。在本質上資本是生產資本；但必須生產剩餘價值，它方才能生產資本。」（註八）那麼，要怎樣才可能產生剩餘價值呢？這必須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後，資本便支付一定的勞動力的價格（工資，）在勞動市場上購買勞動力，利用勞動力的特殊的使用價值（即利用：「勞動力除了再生產它的價值以外，還可能產生更多的價值」的那種特殊作用。（註九）使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上提供必要勞動以上的剩餘勞動，因而獲得剩餘價值，達到其增殖價值的目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的企業家都在為追求剩餘價值而從事生產。但在資本主義的財產制度下，一切的生產手段，大半是各人

的私有物，製造出來的東西也歸各人的私有，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許多的企業家，利用着他們的生產手段（工場，機械等等），各不相謀地，無計劃地從事於生產事業因而現出了無政府的生產狀況。這樣，各企業家追求剩餘價值的自由競爭從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的一個特徵。各人的生產及其生產物，是否適合社會的需要，必須先把自己的生產物投放在市場，經過交換過程，價格的漲跌，才可能知道。這樣，價格的變動，變爲調節生產的準繩；人們的社會行動——生產行爲，反被他們的創造物所統制。（註十）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也因商品的交換，反而被物與物之間的關係隱蔽了下去。（這是因爲「商品的拜物教性質」(Der Fetischcharktar der ware) 的緣故。參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眩惑於這種表面現象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不把資本主義解作「機械生產，」便把資本認爲跟勞動工具是同一的東西，總想從技術的自然的觀點來把握資本主義，因而無意識的，或故意的抹殺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剝削關係；從而抹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和社會性。

總括以上的說明，我們認爲資本主義，是一定的歷史的社會經濟制度，它是以追求剩餘價值爲目的（動機，）以剝削工資勞動爲基礎的無政府性的商品生產機構。

第二節　原始蓄積過程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係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產生出來。前者的要素，由後者的分解而被游離出來。」（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六八〇頁，中譯六〇八頁）中世紀「佩劍的騎士，」被「產業騎士」所排除，資本主義的剝削代替了封建的剝削，自由放任的原則，人類的自由剝削，代替了封建制度的種種束縛。資本的近代生活史，開始於十六世紀。「資本，只有在商品生產和發展的商

卡爾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內，把封建社會解體的過程，和資本主義在它胎內的發展，描寫爲原始蓄積 (Die V[illegible]geicke Akkumulation) 的過程。

品流通——商業——發達到了一定的發展程度，才會出現。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是在十六世紀，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的端緒。」（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一〇九頁，中譯九九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前提條件，是資本和自由勞動力的存在。就是說，一方面必須貨幣，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存在；別一方面，必須「像鳥那樣自由的」無產者的存在。

第一項　資本的原始蓄積

（A）商業資本的蓄積和市場的擴大

資本的蓄積，主要地是因爲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商人資本的存在，和到某種程度的發達，其本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達之歷史的前提。因爲：（一）這是貨幣財產集積的預備條件，而且，（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前提是爲商業的生產，以及不以僅少的個別的顧客爲目的的販賣，因而這不是爲滿足自己一身的欲望的目的而購買，却以使許多人的購買行爲集積於自己的購買行爲的一個商人爲前提。在別一方面，商人資本之一切的發達，使生產越加帶有以交換價值爲目標的那種性質，因而起着使各種生產物越加轉化爲商品的作用。」（資本論第三卷上冊，德文本三一一頁，中譯本二五五頁。）

本來，商業在古代社會，就已經相當隆盛了。羅馬沒落後，商業雖一時衰微，但決未消滅。德意志北部和意大利之間的商業，在羅馬衰沒後仍舊繼續着，雖然它的規模較小也好。隨中世紀莊園制度的確立，領主，僧侶等對奢侈品的欲求，常由外國交易來滿足。尤其是因隨生產力的發達，莊園內部手工業的剩餘生產物愈多，促使內外的商業愈爲繁盛。各地方之建設都市，就是因爲商業發達的緣故。在此等中世紀都市之中，具有歷史的地理的好條件的一些都市，就變成了海外交易，世界貿易的中心。例如：地中海沿岸諸都市。十字軍遠征的結果，東洋的各種財貨流入歐洲，促進了模倣此等財貨的生產事業。例如在十二世紀，在Palermo內，希臘的作匠開始了絹

織品的生產。到了十四世紀，此種織物的生產，普及到意大利北部的各個都市。

這樣，跟隨模倣東洋財貨的生產的盛行，利用這種事業，從外國輸入原料，使手工業者紡織，因而想獲得巨大的利益的商人，更加活躍了起來。

然而，促進商業發達，使商人蓄積鉅額的資本的原因，大半是在這個時代的地理上的大發見，海外市場的急激擴大。1492年先發見美洲大陸。跟着發見了經過康士坦丁，黑海，小亞細亞到印度的新航路。本來，直到十五世紀末葉，地中海是國際貿易的海上的大動脈。地中海上的主要商人是意大利商人，他們曾經克服了一切的競爭者。但是，到十四世紀，意大利的商業開始衰微。1453年土耳其滅亡東羅馬帝國，佔領康士坦丁堡及黑海的沿岸全部。這切斷了意大利都市和近東的都市的聯繫，妨礙了東西洋之間的交通，而使德國的商業和手工業，意大利北部的商業諸都市，衰微了下去。爲恢復東亞洋的交通，即爲發見到印度的新航路，歐洲曾經不顧一切的犧牲而努力於新航路的探尋。1486年 Bartolomeus Diaz 發見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Diaz 的遠征，確實證明了非洲大陸可以從南方迂迴。剩餘的工作，只是在越印度洋而繼續航海。十年後，1497年，由 Vasco da Gama 所領率的有名的遠征隊，最初採用 Diaz 的航路，迂迴好望角，沿非洲的東岸北上，終於發見了歐洲到東印度的新航路。

其次，1500年 Cabral 發見了南美的巴西，1519——1522年 Magellan 完成了最初的世界一國的航行，1519——21年 Fernando Cortez 掠奪墨西哥，1532年 Francisco Pizarro 佔領了祕魯(Peru)。

歐洲人發見了這個新航路，佔領了新大陸的直接的結果，先使意大利的各都市，德意志的漢撒同盟(Hansbund)的商業地位崩潰，把貿易的重心，從地中海移到大西洋岸來了。這使後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代替意大利而變爲世界貿易的租賃者。新航路的發見，更使限於舊世界——歐洲大陸——的商業，打破一切的桎梏，而變爲世界商業；使海上貿易，凌駕了陸上貿易。

商業區域的擴大，航海術的進步，打破了從來的商業——遠在羅馬時代以後，由康士坦丁堡，意大利諸都市所實行的和東方的

小規模交易；德意志北部和意大利的交易；因莊園內剩餘生產物的交換而發生的商業都市上 Zunft（手工業基爾特）的手工業生產品的小規模的販賣——的狹隘性，發生了大規模的商業強化了商業資本的勢力。

「地理上的諸發見和與它同時發生的，迅速促進商業資本發達的商業上的各種大革命在十六七世紀，毫無疑問的，是促進封建的生產方法轉化爲資本制生產方法的一個主要因素。」（資本論第三卷上冊，德文本三一七頁，中譯本二六〇頁。）「在十六世紀，一部分到了十七世紀也好，商業的突然擴大和新世界市場的創造，對於舊生產方法的滅亡和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勃興，曾有一個壓倒的大影響。」（同上中譯本二六一頁。）

（B）殖民制度

其次，促進鉅額資本之原始蓄積的主要因素，是十六七世紀以來的歐洲各國的殖民制度——對殖民地的無恥的殘酷的掠奪和壓搾。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於礦坑內部；東印度的征服與劫掠之開始，非洲之被轉化爲商業的黑人獵奪場這等之事實，都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牧歌的過程，就是原始蓄積的主要要素。緊隨此等過程而起的，是歐洲諸國以地球爲舞台而展開的商業戰。那種商業戰，是以尼德蘭對西班牙的叛亂開始，在英國反雅各賓黨戰爭中取得龐大的範圍，並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向前進的。

原始蓄積的種種要素，現在，多少可依時間的順序，特別是分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英吉利等國之間。其在英國，此等要素，已在十七世紀末葉，依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世賦稅制度，與保護制度，整成一體系的總合。在這些方法中，一部分，得使用極凶暴的强力，如殖民制度就是如此。

關於基督教的殖民制度，有一位專門研究基督教的威廉・霍維特（W. Howitt）曾說：「世界各地有所謂基督教人種，他們對於他們所能征服的一切種族所加的殘酷與暴行，非世界史上任何時代，任何兇猛，任何無教育無情無恥的人種的殘酷暴行，所可比擬。」荷蘭是——十七世紀資本制度的標本國，它的殖民地經營歷史，「展示了一幅極度無信義，賄賂，虐殺，卑劣的畫圖。」最有特徵的是：荷蘭人為要獲得在爪哇使用的奴隸，竟在色勒布斯島實施一種盜人制度（System des Menschendiebstahler）……被盜來的青年人，在準備好用奴隸船送出以前，都是拘禁在色勒布斯島的秘密監獄中。政府曾在一件報告中說：「例如：馬卡薩爾道個城市，就充滿秘密監獄；最可怕的事實之一，就是那塞滿在貪慾與暴惡中犧牲的不幸者。他們被強制的與家人分離，並被繫以鎖鍊。」荷蘭人為要獲有馬拉加市曾賄通葡萄牙的總督。1641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入市內，他們立即衝進總督邸，為要「節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鎊的賄金，而把他殺掉。他們足跡所至，即隨發生荒廢與人口消滅的現象。爪哇的本魏汪吉地方，在1750年，居民達八萬以上，至1811年，不過留下八千人，這實在是稱心的商業啊！

誰都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擁有東印度政治的支配權外，還對於茶貿易，對於中國一般貿易，對於印度與歐洲間的貨物輸送業，擁有絕對的獨佔權。但印度沿海貿易，都是歸該公司的高級吏員們所獨佔。鹽，鴉片，檳榔及其他商品的獨佔，簡直是富的無盡藏。東印度公司吏員們，自定價格，任意刼掠不幸的印度人。……大資產像雨後春筍般地一夜簇生起來，原始蓄積的進行，不用墊支一個銅板。在伐倫・赫斯汀格（Warren Hastings）的裁判記錄中，充滿了這種實例。……根據一張提到議會中去的表冊，由1757年到1766年，東印度公司及其吏員們從印度人那裏得到了六百萬鎊的賞物！由1769年到1770年間，英國人竟由囤聚全部米穀以非分價格再賣的方法，在印度造出一次饑饉。」

一 在1866年單是阿里沙一個地方就有一百萬以上的印度人餓死了。但當時的英國人，對那些將要餓死的人們，只用高價販賣生活資料，藉使印度的國庫充實。

對土著居民待遇最壞的，自然要算西印度那樣專營輸出貿易的殖民地，和墨西哥東印度那樣任人劫掠人口稠密的富國。不過，就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蓄積，也不愧有基督教的性質。在1703年，新教主義正氣所鍾的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曾集會決議對每個印第安人的腦蓋或每個被捕紅人懸四十鎊的賞格。……英國議會並宣言，殺戮與剝頭蓋，『係神與自然所授於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使溫室般地使貿易與航海業成長。『獨佔公司』（路德）是資本累積的強有力的槓桿。殖民地對於當時在萌長中的製造業，提供市場，更依市場的獨佔，引起加強的蓄積。在歐洲外部直接由劫掠，奴隸化，殺戮等手段所蓄積的財寶，都流到母國，轉化為資本。」（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一六——七一九頁，中譯六四一——六四三頁。）

跟殖民制度相關聯的，是黑人奴隸貿易。

「歐洲諸國都把一切可為資本蓄積手段的醜惡行為，靦然引以自傲，……英國依烏特勒希特媾和談判，與西班牙人成立英西條約，始由西班牙人，取得一種在非洲和英領美洲之間經營奴隸貿易的特權。英國由是至1743年為止，每年得供給西領美洲四千八百個黑人。同時，這又成為英國走私貿易的政府的掩護。利物浦就是以奴隸貿易為基礎，進於繁榮的。奴隸貿易就是它的原始蓄積方法。」（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二四——七二五頁，中譯六四八——六四九頁。）

關於西歐各國，尤其是資本主義的母國的英國，為資本的原始的蓄積而採用的殖民政策——對殖民地的無恥的殘酷的壓搾和掠奪，W. Sombart 在其名著 "Das moderne Kapitalismus" 上，也有詳細的敍述。Sombart 說：「在意大利各城市國家和西歐各大國的市民的財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充分發展之前，它的起源是受了奴隸經濟一個很大部份之賜。」（桑巴特著，季子譯，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第二分冊，五五一頁。）

「在整個十八世紀——即在最重要的時期中——大不列顛毫無疑義地是站在奴隸貿易的中心點，在大不列顛本國內，利物浦（Liverpool）又是一個中心點：當1771年本國有 192 艘販賣奴隸的船，計利物浦 107 艘，倫敦 58 艘，布里斯它爾 23 艘，蘭加斯德

(Lancaster)4艘。」（同上，五六四頁。）經營黑奴貿易獲得怎樣大的利益，是人所共知的。「利物浦的奴隸販賣商於1736年以1282690磅出賣31690個奴隸。輸入非洲的商品價格達864895磅，奴隸的給養費計15845磅，「運輸費」——這也同樣是賺錢的——的支出達103488磅。所以在這一年流入奴隸販賣人錢袋中的純利潤爲298462磅。……

我們從另一陳述中得知下列的數字報告：當1771年，從非洲輸出的黑人共有47146名，內中29250名是由利物浦的商人輸運的。從他們身上獲取的利益，依舊謹愼的估計，達1500000磅；此項商業其餘的利益達500000磅。

這些數字幾乎完全和涅尼芝(Nemnich)在英國遊記(Reise nach England 1800)三三七頁所提出而沒有指明來源的報告一致：利物浦人從1783年至1793年所販賣的奴隸達303737人。他們在這種商業中共賺得15186850磅。所以每個奴隸販賣商人在這10年中平均約獲得3000000馬克的財富。

但當奴隸貿易宣佈爲海上行劫，並變成私運商業時，此項貿易才獲得非常的利益。」（同上，五六七頁。）

除了奴隸貿易以外，Sombart更指出奴隸勞動，強制貿易！——實際上是搶劫，欺騙，盜取，——欺詐，盜取侵佔，爲市民的財富的形成的重要手段。「當十六，七，八世紀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法蘭西人，尤其是英國人和北美人都以搶劫爲形成財富重要的手段。

我們遇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偶然爲海盜，但尤其爲新發見的南美洲各國的征服者，他們對於此等國家首先實行搶劫。人們曾說過，西班牙人和猛獸一樣蹂躪新國家，和猛獸一樣尋覓食品。他們依次運用欺詐，狡謀，殘酷和橫暴的手段去搾取這些國家幾千年來堆積的財寶，使爲新主人所有。他們向各王公勒索贖身金，盜竊開棺，攫取殉葬的金屬品，强刼各廟宇的金像，並奪取居民身上的飾物。」（同上，五三五——五三六頁。）

因此，J. A. Hobson 也說：「由軍隊的掠奪，不平等貿易，及强制勞動而搾取世界的其他的部份，是歐洲資本主義發達的不可

缺的一個重要條件。「意大利諸都市的富裕，離開了對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各國的搾取，是完全不能發生的。同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之國家的繁榮，也是離開了以前所產生的阿拉伯文明的崩潰，掠奪非洲，蹂躪南亞細亞及其島嶼諸國，即肥沃的東印度，及富裕的印卡(Incas)和亞斯特克(Astecs)等國的貧窮化和解體，到底是不能想像的。」」(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P. 10.)

這樣，「在歐洲以外，由於直接掠奪，奴隸化，强盜殺人所搾取來的實物，流入本國，在這裏即變化爲資本。」(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一九頁，中譯本六四三頁。)所以，我們可以說「資本出現世上，是從頭到脚，每個毛孔都滲透着血和汚物。」(同上，德文本七七二六頁，中譯六五〇頁。)*

(C)國債制度

鉅額資本的蓄積，除了上述的種種方法以外，還有利用公共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來蓄積的辦法。「公債爲原始蓄積之最强有力的槓桿之一。它如像揮動魔杖，使不孕的貨幣有生殖力，把它轉化爲資本。……國債發生時，國際信用制度也成立了。那種信用制度，

---

* 殖民地的征服和掠奪，空前的大規模的世界貿易的波邊，使金銀等貴金屬像洪水似地流入歐洲，這使歐洲的貨幣購買力急激降低，商品價格暴漲。物價騰貴，最初發生於西班牙，因爲貴金屬很早就流入了的緣故。在十六世紀中葉，尤其在十六世紀末葉，物價騰貴，幾遍及全歐洲的各種商品。英國和西班牙的物價騰貴，達150%以上，在法國及德國約達100%。此種現象，普通稱爲「價格的革命。」商品價格的騰貴，顯著地超過了工資的上昇程度，這使勸勞者受很大的打擊。「價格的革命，」對許多地主也非常不利。因爲他們把自己的土地，當作長期的佃租地(往往有以數世紀爲期限的)而租與別人，在穀價非常地騰貴的時候也好，他們也只能收受以前所評定的，即穀價及其他商品未騰貴以前的地租。故資本家常常犧牲勞動者和地主得以大發其財。

往往成爲這國或那國的原始蓄積的一個源泉。」（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二〇——七二一頁，中譯六四四——六四五頁。）

「公債及與公債相照應的國家財政制度在財富之資本化及民衆的剝奪上演了重大的角色，就因此故，如像科培特(Cobb tt)達布爾德(Doubleday)等著作者，都誤以爲近世民衆窮乏的根本原因是在這裏。」（同上，七二二頁，中譯六四六頁。）

其次，「保護制度實不外一種人爲的手段，藉着這種手段，製造業被製造出來了，獨立勞動者被剝奪了，國民的生產及生活資料被資本化了，由古代生產方法向近世生產方法的行程，被強制地縮短了。」（同上）

這樣，「殖民制度，國債，過重的賦稅，保護制度，商業戰爭等等都是眞正的製造業時代的兒童，這些兒童，到大工業的幼年期，都有重大的成長。大工業的誕生，是由大規模的兒童掠奪來頌祝的。英國的工廠，與英國的海軍一樣，是由强募手段招集新兵。」（同上，七二二頁，中譯六四七頁。）

（D）高利貸資本的蓄積

最後，我們不要忽略了高利貸資本在大資本的集積過程上的作用。我們在德國的 Die Fugger 家，就可以發現高利貸的蓄積的一例。Die Fugger 家的財產，在 1487 年達 2500 Gulden，1511 年增到25萬 Gulden，1527 年達 200萬 Gulden，在極盛時代的1546年竟達 400萬 Gulden 之鉅。此等蓄積的大部分，是由高利貸收奪封建領主及小農民而來的。「這樣，高利貸使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破產，又把小生產者的膏血吸盡。造成兩層，都喚起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和累積。」（資本論第三卷下，德文本一三三頁，中譯四九七頁。）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知道了在資本的原始蓄積過程上，商業資本，近世殖民制度，國債和租稅，高利貸資本的活躍，曾起着極大

的作用，還不僅使空前鉅額的貨幣資本得以蓄積了起來，而且還替資本主義擴大了商品市場，造成了資本主義成立的一個主要條件。

第二項　自由勞動者的產生過程

但是，資本主義的成立，除了資本的原始蓄積和市場的形成擴大以外，還必須許多自由勞動者的存在。因爲「貨幣所有者要使貨幣化爲資本，他必須在商品市場上，遇到自由的勞動者。這所謂自由，有二種意義。第一，他必須當作自由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第二，他沒有別種可以賣的商品；那就是，實現勞動力所必要的一切東西，他是自由得一無所有。」（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一三一頁，中譯一一九頁。）那麼，具有這二種意義的自由勞動者是怎樣產生的呢？自由勞動者的產生，是由資本主義的原始蓄積過程。「這個過程，一方把社會生活資料及生產手段轉化爲資本，他方把直接生產者轉化爲工資勞動者。故所謂原始蓄積，不外是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分離的歷史的過程。」（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六八〇頁，中譯六〇八頁。）「生產者轉化爲工資勞動者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爲生產者解脫隸農束縛和基爾特桎梏的運動，我們資產階級的歷史家的眼，是祇看到運動的這一面；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新被解放的人，要在他們所有的一切生產手段，和舊封建制度給與他們生存上的一切保證，都被剝奪之後，才成爲他們本身的出賣者。這種剝奪的歷史，是以血與火的文字，寫在人類記錄中的。」（同上，六八一頁，中譯六〇九頁。）

「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紀十五世紀，已散見於地中海沿岸的若干都市，然資本主義時代的序幕，卻到十六世紀方纔揭開。在資本主義出現的地方，農奴制度的廢止，早經實行了；在中世紀發達至最高點的獨立都市，也早經失其存在了。」

在原始蓄積的歷史上，一切對新興資本家階級有槓桿作用的革命，都是劃時代的，但多數民衆，突然地，強制的，由生活資料分離，當作自由的無産階級，而投到勞動市場上來的瞬間，尤屬如此。剝奪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就是這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

史，在各不同的國度，有其不同的色彩；它是以不同的順序，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其不同的階段。其典型形態，只見於英格蘭，故我們以英格蘭為例。」（同上德文本六八一——六八二頁，中譯六〇九頁。）

（A）封建家臣團的解散

「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附以基礎的革命的前奏曲，係開演於十五紀最後三十餘年及十六紀最初十數年。當時的封建家臣，正好如詹姆斯·斯杜亞（Sir James Steuert）所適當描寫的「到處無用地充滿了房屋和城堡。」這種封建家臣團的分解，纔把許許多多解放出來的無產者，投到勞動市場上來。」（同上德文本六八三頁，中譯六一一頁。）

（B）農民土地的剝奪

「大封建領主對於王權，對於議會，曾作堅決的反抗，他們以强暴的手段，使自耕農由土地（他們和封建領主同樣有封建權利的土地）上，遭受驅逐，並掠奪去他們的公共土地，結果遂造出了無從比較的更多數的勞動者。這種剝奪在英國所受的直接刺激，就是弗蘭德羊毛製造業的勃興，及與所相伴的羊毛價格的昂貴。舊的封建貴族，都為大封建戰爭所消滅了。新的貴族，已經是他們的時代的兒子，在他們看來，惟有貨幣是權力的權力。所以，他們的格言，就是把耕地轉化為牧場。

倍根在亨利七世傳中說：「在當時（1489年）圈地更加習見了，前此非有多數人及其家族即不能施肥的耕地，都轉化為使用三數牧人即容易監視的牧場了；前此為許多小農民（Yeomen）生活基礎的有期租地，給身租地及任意租地，都轉化為領主的所有地了。其結果，人民頹廢，由是，都市，教會，什一稅等等，都不免於頹廢。

許多租地與大畜羣，特別是大羊羣，都集中少數人手中了，由是，租地昂騰，耕地減縮，教堂與房屋拆毀，可驚的多數人，都被奪去了

維持自身及一家生計的手段。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與繼起的大規模盜取寺產的運動，對於民衆土地强制剝奪的過程，給予了可驚的新的刺激。在宗教改革的當時，加特力教會是英國大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對修道院的壓迫，使住在修道院等處的人們，都被投進到無產者隊伍中。教會的地產，則大抵是給與那些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或以近似開玩笑，微乎其微的價格，賣給那些投機的租地農業家和市民。這班人，把世襲寺院領地的租戶，概行驅逐，而合併他們的經營。至若貧困農業勞動者，以前在教會什一稅中，本有取得一部分的法律保障權，這時，這種權利也在暗中被沒收去了。伊利薩伯女王在巡幸英國國內之後，曾嘆說：「到處皆是待救恤的窮人。」

對於國有地的盜掠，本來還是比較和緩地進行，到這時，他們方才大規模的盜掠，來開始執行新的時代。他們對於國有地，或者是由贈與的方式取得，或者以開玩笑的微乎其微的價格取得，甚或是由直接的掠奪取得，以併合於其私有地內。這一切的進行，都絲毫沒有顧及法律上的形式。像這樣在欺詐方法下被人佔有的國有地，連同以前被人盜竊的寺院領地的一部分（未曾在共和革命中再度失去的那部分），就成了今日英國寡頭政府的御用地了。布爾喬亞的資本家，曾助長以上的過程。他們的目的在把土地轉化爲純粹的商品，在擴大大規模的農業經營範圍，在增加被解放的農村無產者的供給。

共有地（Das Quemeindeeigentum）與前述國有地（Staatseigentum）完全不同，那原是古代條頓族的制度，在封建制的外衣下存續下來。我們已經知道，對於這種共有地的暴力的掠奪，是開始於十五紀末葉，而繼續至十六世紀，那大抵與耕地的牧場化相伴。但在當時，那種過程是由個人的暴力行動來推進，立法機關對於那種暴力行動，雖繼續抗鬥有一百五十年之久，都沒有收到效果。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示在這個事實上，即法律自身也變爲共有地盜掠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業者，同時還不斷利用獨立的私人的小方法，來從事盜掠。這種盜掠的議會的形態，就是「共有地圈圍法（Bills for Enclosures of Commons）。這種法律，使共有地化爲地主私有，使人民被剝奪。

任意的佃戶(Tenants-at-will)代替獨立的小農(Yeoman)而出現了。這種任意租戶，就是逐年依契約租地小農業者，是完全受地主意欲支配的隸民。在這種租戶代替小農時，同時又行着國有地的盜掠，特別是共有地的有組織的盜掠。由是大租地(Pattern form)更形擴大，而農民則被「遊離」成爲工業上的無產者。

農業勞動者與共有地的關聯，到十九世紀，自然不再爲人記憶了。姑且不說比較近時的事。由1801年間，地主由農民手中盜掠的共有地，即由議會贈與他們的那3,511,770英畝共有地，會對農民給與一個銅板的代價麼？

最後對農民施行的大規模的土地掠奪，是被稱爲所有地掃除(Clearing of Estates)，那其實是把人從所有地掃除。以上考察過的英國一切方法，到這種「掃除，」才達於絕頂。照前章關於近代情形的描述看，現今已沒有一個要掃除的獨立農民存在了，小屋的「掃除，」遂由此開始。因此，農業勞動者在他們自己耕作的土地上，已不復能找到他居住所必需的地方了。但「所有地掃除」的眞正的嚴格的意義，我們僅可由近世傳奇中的天國（卽蘇格蘭高地，）得到理解。那裏的所有地的掃除，係以如次諸種事實存其特徵，那就是進行極有組織，其一掃的規模極大（愛爾蘭的地主，往往一舉掃蕩幾個村落，在蘇格蘭高地，則有和德意志一個公國那樣大的土地面積，一舉而被掃蕩，）最後，掃除的土地財產，都採有特殊的形態。

在十八世紀，由農村被驅逐的格蘭人，被止移住國外，其目的，是要強制的使他們集中到格拉斯哥及其他製造業都市。至於十九世紀採行的方法，我們祇要把蘇德蘭女公爵成就的「掃除，」作爲一個例子就行了。這位女公爵通曉經濟，她一卽位爲女公爵，立卽在經濟上進行澈底的治療，她所治理的全州，其人口已由過去所行的類似方法，縮減到一萬五千人了，他決心把這全州轉化爲牧羊場。由1814年至1820年間，這大約包含有三千家族的一萬五千人口，都被有組織的驅逐了，剿滅了。他們的村落，破壞了，焚燬了，其田地則全部轉化爲牧場。英國的兵士，執行驅逐剿毀的命令，與住民發生衝突。有一個老婦人拒絕離去她的小屋，竟被燒死在烈焰中。這一來，這位富貴女公爵，把那不知從什麼時代起卽爲氏族所有的七十九萬四千英畝土地，佔爲己有了。

她把她掠奪來的族有（Clanland）全部，分割爲二十九個牧羊租地，每個租地，不過居住一個家族，他們大抵是由葛格爾移入的租地農僕。1825年，那一萬五千格爾人，已由三十萬一千頭羊所代替。這些被驅往海濱的人們，只有依靠漁業維持生活，他們成了兩棲動物；照一位英國著者所說，他們是一半在陸上生活，一半在水中生活。但雙方合起來，僅及生活的半分。」（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六八四——六九六頁，中譯六一一——六二三頁。）

最後，牧羊場的一部分，還再被轉化爲鹿場。

「羊的飼畜，可以作人們衣食之用，多少還有點用，但是，鹿的飼畜，除了娛樂以外，別無用處。爲有人的娛樂，毫無慈悲地犧牲了許多人。但是，「獵區的所有者」決不完全只以個人的娛樂爲目的，他又拿這來做「買賣」。因爲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享樂心的關係，獵區的價值，顯著地騰貴，較之牧羊場還能獲得更多的利益。轉變爲獵區，早已不能供人類生產糧食的土地的價值，在最近二十五年間，騰貴了二三倍。」（Wilhelm Liebknecht 著土地問題論，日譯本一〇〇——一〇二頁。）

這樣，「奪取寺產，欺詐讓渡國有地，盜掠共有地，掠奪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無所顧忌的恐佈主義下，轉化爲近代私有財產，這種種，都是原始蓄積的牧歌的方法。這些方法，給資本主義農業以活動的領域，使土地併合於資本，同時并爲都市的產業造出被追放的無產者的必要供給。」（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六九九頁，中譯六二五頁。）

自由勞動者的大量供給，除了上述的封建家臣團的解散，農民土地的剝奪（圍地 Enclosure 和所有地清掃 Clearing of Estates）以外，還有下列的種種來源：

（C）宗教改革

在宗教改革的當時，舊教教會，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宗教改革的結果，對修道院，寺院的壓迫，使居住在那裏的人們淪爲無產

者。敎會的領地，大半分與國王的家臣，或非常廉價地賣與投機的佃農或市民。這些購買者把從來的世襲的敎會領地的佃農乃至隸農，一齊驅逐了出去，而集中其經營，因而這些農民也變爲自由勞動者了。W. Sombart說：『在修道院解散之前，當英國還崇拜迦特力敎的時候，什一稅中有三分之一是修道院和慈善堂用以維持貧民的，現在有 644 個修道院，110 個養育院和2374個施物所被取消，凡在這裏被賑濟的貧民——據人們的計算，在 88000 人以上——此時看出他們必須另想方法去維持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失業者，乞丐和流氓的隊伍中的確佔一種很大的成分。』（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季子譯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第二分冊六四一頁。）這也是『自由』勞動者的一個來源。

（D）手工業者基爾特（Zunft）徒弟的過剩

中世紀基爾特制度（Gild System）的沒落及其中徒弟的過剩，也是產生自由勞動者的一個源泉。（參看第四章第九節第二項。）

（E）戰爭和苛捐雜稅

關於因爲戰爭和稅捐的壓迫而發生的『自由』勞動者，W. Sombart 說：『戰爭，牠的破壞的影響——特別在法國和德國——是明白可見的；稅捐的壓迫，關於這一項我們可以確切說牠可毀滅當時無數獨立的人，尤其在法國十分厲害，但在荷蘭這樣的國家也是有的。誰看過法國 1650 年至1750年的經濟著作，便知道第一流的專門家如服榜、西伯基爾貝耳（Bors-Guillert）和麥隆（Melon）都認法國人民的貧窮尤其是由其高度的，特別估計不良的並徵收不公平的稅捐。』（W. Sombart 著前揭書季子譯六四三頁。）由戰爭及苛捐雜稅而破產的人們，當然大半要投到『自由』勞動者的陣營裏去。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而產生的無產者，要想一被放逐出來，即爲新興的製造業所吸收，實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這些由舊習慣生活環境突然投出的人，要突然適應新狀態的訓練，也所難能。他們整批地轉化爲乞丐，盜賊，浮浪者等等。這種轉化，一部分雖由習性關係，大部分則由於環境逼迫使然。由是，在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六世紀，西歐各國都製定懲治浮浪人的殘酷法令。「如西班牙始於1351年；英國始於1350年愛德華第三的命令；法國始於1350年約翰的命令，此等法令一致指定浮浪者應當工作，否則當受重罰，各國對於他們幷使用一種同樣的手段；第一次犯禁，加以鞭笞；第二次犯禁，處切斷肢體或烙火印之刑，第三次犯禁處死刑或流刑，或在懲罰處從事強迫勞動。」（Sombart著上揭書六五三—六五四頁。）「於是，土地被強制剝奪，被強制離去家宅，被迫轉化爲浮浪者的農民，又依奇怪而極有威嚇的法律，被鞭打，烙印，苛責等方法，被迫去接受工資勞動制度的必要的訓練。」（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〇二頁。中譯六二一九頁。）

第三項　原始蓄積過程的意義

原始蓄積的過程，不只是資本的原始蓄積和自由勞動者的產生過程；同時，還是替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創造開拓市場的過程。因爲第一，商業資本的活躍，殖民制度的積極推行，以及促進資本蓄積的其他各種因素，同時就是創造市場，擴大市場的主要因素。第二，若就自由勞動者的產生過程來說，「使小自耕農民轉化爲工資勞動者，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及生產手段轉化爲資本物質要素的過程，同時就爲資本造出了國內市場。在從前，農民家族所消費的大部分的生活資料和原料，是由他自己生產並加工製造，但現在都成爲商品，大租地農業者售賣它們，他是在製造業上找到他的市場的。紗，麻，粗毛織物，簡言之，即各農家以自家的原料，爲自家使用而紡織的諸物品，現在都轉化爲製造業的製品。並轉而以農村地方爲銷場。……這就是說，在舊自耕農遭受剝奪而與生產手段分離時，還有農村副工業破壞，還有製造業與農業的分離過程。而且，也只有這種農村家庭工業的破壞，能使國內市場，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

所必要的範圍與程度。」（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一二——七一三頁，中譯六三八頁。）這樣，「一部分農民的剝奪和驅逐，卻不僅為資本「遊離」出勞動者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來，且會由此造出一個國內市場。」（同上）

這樣，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蓄積過程上，卽在封建關係漸次崩潰轉換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上，一方面蓄積了空前的鉅額資本；一方面又產生了大工業所必要的許多工資勞動者，同時更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造出了市場。資本的原始蓄積，工資勞動者的產生，市場的形成：就成了產業資本主義成立和發展所必要的歷史的前提條件。*

第三節　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

資本主義的生產，最初從商業資本支配下的手工業發生了出來。它的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小商品生產，資本制的小手工業（農民的小營業，）第二階段是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 Manufaktur, 資本論的中譯譯為「製造業」）第三階段是大機械工業。

第一項　小商品生產

第一階段的小工業的萌芽，是「家族的合作。」不用說，它必須以使用工資勞動者為前提，才可能稱為資本主義的營業。因此，在

* 根據這項的說明，可知：原始蓄積過程，就是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在它的胎內漸次萌芽發展的過程。市場的擴大，商業的發展，Gild System 的崩潰，工業資本家的發生，農業革命等等現象，卽其明證。

其次，在原始蓄積的過程上，資本的蓄積和工資勞動者的產生是同一事物同一過程的兩面，這兩個過程是同時並進的。

最後，從時代上說來，原始蓄積過程，相當於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代，而且和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時代差不多是一致的。（參看本章第三節第二項的（B）段。）

封建時代，都市手工業受着嚴格的基爾特規約的束縛的地方，基於工資勞動的手工業，最初是從農村發生了出來的。

在中世紀，除了在基爾特支配下的都市手工業以外，農民也有利用農閑時間從事手工業生產的，此種手工業農民的小營業，隨商品經濟的發達而繼續增加，成長。這種小營業的工作如果日益增加，那麼只是利用農閑時間決不足以應付，因而漸次脫棄農業的兼業而專門從事於手工業。如果工作更加增加，那末直到現在為止的單純的家族的合作（協業）早已不够，必須雇傭外人來幫忙。「小農民的營業的擴大發展和改善，……在一方面，產生少數的小資本家，在別一方面，又產生多數的工資勞動者，或比工資勞動者更困難，生活更惡劣的「獨立的小農民經營」。因此，我們在最小的農民的營業上，看見資本主義的最顯明的萌芽。」（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下卷，日文岩波文庫版三五頁。）

這樣，從分散的小生產，從家族的單純合作（協業）發展到了資本家的單純合作（協業）的手工業，不久即發展到資本家的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 以分工為基礎的合作或協業。）

農民的小營業，除了由家族的單純合作（協業），雇用工資勞動者，變為資本家的單純合作，再由此種資本家的小經營發展到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路線以外，農民小營業之轉化為工場手工業，還有別的一條路線。這就是商業資本支配農民的小營業，轉化為產業資本的路線。

農民的小營業，是孤立的，散在各地的。在商品生產不大發達的時代，農民可以把他們的製品直接賣給消費者。但隨商品生產的發達，市場的擴大，交換量的激增，昧於市場的情形的小營業者，難於繼續從前那樣的分散的販賣，只好由商人來作媒介的工作。這些商人，在最初只是收買小營業者的生產物來販賣，以後他們從別處大量地買來小營業者必需的原料，再販賣給小營業者。在許多場合，這種商人是小營業者的生產物的唯一購買者。因而商人利用其獨佔的地位，儘量降低製品的價格，或借錢給缺乏貨幣的小營業者，使他們用製品來還債，而儘量地廉價收為己有。這樣，農民的小營業者，漸次隸屬於商業資本家。這種隸屬的關係，此後更發展到資

本家使家內勞動或家內工業（Hausindustrie）的形態，就是說農民的小營業者由商業資本家供給原料，製造商品，而接受勞動的報酬的工資。在這個場合，他們變爲在自己的家中爲資本家而工作的事實上的工資勞動者；而商業資本家也跟着變質爲產業資本家。這種制度，稱爲資本家的家內勞動制。「資本家的家內勞動，在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的階段上都能夠看見，這正是工場手工業的最特徵的東西。」（伊里奇著上揭書一四八頁。）

其次的一步，就是各個家內工業者間的分工。各勞動者不製造商品的全部分，只做它的一部分。

在這裏，製造部分品的一切的小營業者，爲一個主人——資本家而勞動。家內工業發展到這個階段，卽轉化爲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

第二項　Manufacture（工場手工業）

（A）起源

「所謂工場手工業，都知道的，是基於分工的合作（協業）從它的發生說來，工場手工業是和上述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直接地聯接的。在一方面，或多或少的，有多數勞動者的工作場，慢慢採用分工，因而使資本家的單純合作（協業）轉變爲資本的工場手工業。……在另一方面，我們已經知道了在小營業的商業資本發展到最高階段時，怎樣已使生產者降低到工資勞動者——他接受計件工資而用他人的原料來製造——的地位。如果更加發展，變革小生產者的技術之有組織的分工，採用於生產的時候；如果「獨佔的購買者」把若干的部分的工作加以分割，使這些工作由在他的工作場的工資勞動者來做的時候；如果和家內勞動的分配相併行，而且實行分工——它和家內勞動的有不可分的關聯——的，大工作場往往屬於同一的獨佔的購買者的大工作場，出現了的時候；那麼，在我們的面前，就有資本家的工場手工業之不同的發生過程存在。」（伊里奇著上揭書七二——七三頁。）

『所以，工場手工業由手工業生成，其發生方法是二重的。一方面，工場手工業由異種獨立手工業結合而成。在這場合，這種種獨立的手工業，失去了它們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內，特殊化爲同一商品生產過程的互相補足的部分工作（Teiloperation）。他方面、手工的工場工業則是由同種手工業者的合作（協業）而成，在這場合，同一個手工業，分成許多種特殊的工作，個別化，獨立化，使每一種工作，成爲一個特殊勞動者的專任機能。所以，一方面，工場手工業把分工導入生產過程內，或使其進一步發展，他方面，它又把原來分開的手工業結合起來。但無論特殊的始點是怎樣，結局生出的形態總是這樣的：那就是一個以人爲器官的生產機構。』（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〇二頁，中譯本二七〇頁。）這就是工場手工業的兩種不同的起源。

其次，『在資本主義工業形態的發展上，工場手工業，當作手工業及有原始的資本形態的小商品生產，和機械的大工業（工場）之間的中間的環節，具有重要的意義。手工的技術依然是它的基礎，因此大經營不能急激地驅逐小經營，不能使營業者從農業完全脫離：猶使手工的工場工業接近於小經營……有擴大的市場，有工資勞動者的大經營，無產勞動者大衆完全從屬於它的大資本的形成，使手工的工場工業接近於工場。』（伊里奇著上揭書，七三——七四頁。）據此可知：手工的工場工業，是介於手工業—小商品生產和機械工業之間的地位，是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第二階段的（工業組織）形態。

（B）社會經濟史的地位

『以分工爲基礎的合作（協業），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典型的形態。這種合作，是當做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徵的形態。支配着本來的（或眞正的 Eigentliche）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個時期，大概是從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葉爲止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〇〇頁，中譯本二六八頁。）這就是工場手工業的存在時期。故從年代上看來，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時代，差不多是和資本的原始蓄積的時代（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一致的。不用說，這是因爲從小商品生產發展到工場手工業，再從工場手工業發展

對大規模工業，是以資本的原始蓄積為背景的緣故。工場手工業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過程上的一個階段，因此某種程度的資本的原始蓄積，必須先行於這個時代。所以「工場手工業的初期是浮浪者輩橫行的時代。這些浮浪者輩，是因為封建的屬從的解雇，服務帝王而對抗諸侯的烏合的軍隊的解散，又由農業的改良和大面積的農地之轉變為牧場，而發生了出來的。……在十三世紀，已經有時出現了浮浪者橫行的時代。但是，這個浮浪者輩之普遍而繼續的出現，是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才開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日譯本三八一——三八二頁。）據此可知浮浪者輩的橫行，封建家臣團的解散，是工場手工業發生出來的一個前提條件。

在別一方面，工場手工業的時代，又是從封建的生產方法轉換到資本主義的大產業時代的一個過渡階段。因此，原始蓄積，在工場手工業的時代還在繼續進行。所以我們認為從年代上看來，工場手工業時代，差不多是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蓄積時代一致的。工場手工業的歷史的基礎條件，除了上述的浮浪者輩的橫行，封建家臣團的解散以外，還必須市場的擴大，商業的發達，「因為商品生產及商品流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一般的前提，故工場手工業分工的成立，必須社會內部的分工發展到某種程度。」（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一七——三一八頁，中譯本二八三頁。）

「世界市場的突然擴大，商品流通的倍增，歐洲各國民間想掌握亞洲各種產物和美洲資源的競爭熱，殖民制度等等，對於打破生產物的封建的限制，都有本質上的貢獻。但是，近代的生產方法，在其第一期的工場手工業上，是在中世紀已經造成了它的各種條件的地方，才看見了發達。」（資本論第三卷上冊，德文本三一七頁，中譯本二六〇——二六一頁。）

工場手工業雖然仍舊以手工業的技術為基礎；雖然「其工作仍不失為手工業的工作，故仍依存於勞動者個人處理工具的能力，熟練，迅速，和準確。」（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〇三頁，中譯本二七〇頁。）但因實行分工合作的關係，則使得勞動生產力顯著地發達。*

這樣，「工場手工業的分工，由手工業的活動的分解，由勞動工具的特殊化，由部分勞動者的成立，由部分勞動者的分組及總體的結合，而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創成質的編配和量的均衡，並因而在社會勞動中，創立一個確定的組織，展開一種新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它會增進勞動之社會的生產力，……一方面它在社會經濟的形成過程上，是歷史的進步，是必要的發展要素；他方面，它又是受過洗練的文明化了的榨取手段。」（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二九——三三〇頁，中譯二九三頁。）因爲分工的發達，雖使社會的生產力有了相當的發達，但是，基於分工的「工場手工業勞動者，從其自然的性質上看來，他不能獨立作一件事，他必須當作資本家工作場所的附屬物，才能夠展開生產的活動。……分工在工場手工業勞動者的臉上，烙印了「爲資本所有」的字樣。」（同上，三二六頁，中譯本二八九——二九〇頁。）

工場手工業雖然使社會的生產力發達，社會的生產前進，但是，因爲它是建築在狹隘的手工業的技術基礎上的緣故，故「工場手工業既不能便佔社會生產的全範圍，也不能使社會的生產，從根本上發生革命。當作一種經濟的作品，手工的工場工業是聳立在都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工業（Landlich Hauslichen Industrie）的基礎上。手工的工場工業的狹隘的技術基礎，一經發達到一定的階段，便會和它自身所創造的生產需要相矛盾。」（同上，三三三頁，中譯本二九六頁。）這個矛盾，就是工場手工業以廣泛的市場爲前提，而且越加開拓市場。從國內市場進展到世界市場，但是，工場手工業不久卽不能滿足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市場的龐大需要，而不能不轉變爲機械的大工業。這個轉變的技術的條件，隨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早已漸次準備好了。因爲工場手工業上的分工，「第一使生產過程分解爲許多最簡單的純機械的工作，因而才發生使用機械的可能性。這個機械，先適用於最簡單的工作，漸次慢慢地及於比較複雜的工作。……第二養成了熟練勞動者。」（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下卷日文岩波文庫版一三一——一三二頁。）

※ 分工的結果：第一，可能增加一切專門勞動者的熟練；第二，能夠節省從一種工作轉移到別種工作時所損失的時間；第三，使勞動容易省略勞動，并促勞動者發明能代替許多勞動者的機械（Adam Sm ih, "Wealth of Nations." Cannaned, Vol. I. P. 9）

第三項　大機械生產——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生產方法的革命，在工場手工業是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是以勞動工具為出發點。」（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三四頁，中譯本二九七頁。）

所謂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是從1770年頃起，亘及百年間，在歐洲所發生的機械及動力（蒸氣機關）等之技術的發明與革命，以及隨此而發生的社會組織的變革。產業革命的重大的意義，是在因此而打翻封建制度，確立了近代資本主義。*

那麼，惹起了產業革命的機械是什麼東西呢？要明瞭機械的本質，不能不先研究促使機械出現的產生機械的胚素的工具與機械的差異。

勞動手段，是位於勞動者與勞動對象之間，把前者的活動傳達於後者的東西，或其複合體。比較發達的加工了的勞動手段，便是工具。人類是由發明工具，使用工具，才使人們能夠從事其和一般動物不同的人類特有的物質生產，更因而發生人類特有的文化。

不用說，機械是工具更進一步的發達了來的東西，但此二者的區別標準，是在甚麼地方呢？

（1）有些學者，認為機械是工具的更加複雜化了的東西。但是，只是這點，決不足以作區別的標準。反之，複雜的工具，簡單的機械，也可能有的。

---

*「英國勞動者階級的歷史，是在前世紀（十八世紀——彭）後半，和蒸汽機關及紡織機的發明一同開始的。這些發明，都知道的，給那個產業革命——即同時變革全布爾喬亞社會其世界史的意義到今日才開始認識了的那個革命——以動機。」（F. Engels: 英國勞動者階級的狀態（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1845.1.日文馬恩全集第三卷三五頁。）

卡爾也說，「本章的意義的機械，是在十八世紀末葉產生的。」（哲學的貧困第二章第二節。）

（2）其他的一些學者，想在動力的有無如何上，追求工具與機械的差異。他們主張：工具的使用是由人類動力，而機械則由獸力，水力，風力等人類以外的動力。不用說，跟隨機械的漸次複雜化，必需有使它動的動力裝置——動力機的存在。但是，動力機的有無，不能是區別這兩者的基本標準。例如手縫機便是沒有動力裝置而可能是機械，反之，牛馬所曳的犂就是有動力裝置而非機械。

（3）機械是在作業時自動進行，作業中的勞動者的個性乃至能力，其影響早已不關與於生產物。這個主張，只說明了機械的一面的性質，還沒有指出本質的區別標準。

這樣，機械的本質特徵，是在有操縱工具的工具的裝置——即有預備的裝置。所謂機械，就是工具的工具。工具還受人類的生理上的器官所制約，是主觀的；機械則除去了此種缺點，是自動的，客觀的。

機械通常是複雜的，有動力裝置，是自動的。這些都只說着機械的現象的側面，尚未把握着它的本質。那麼，機械究竟是甚麼呢？資本論上說：『一切發展了的機械都由三個在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發動機，配力機與工具機（即工作機）——構成。發動機（Trieb-aftsmachine, Bewegungsmachine）是全機構的動力。那或者像蒸汽機，熱氣機，電磁機一樣發出它自己的動力，或者像水車（利用水流的力）風磨（利用風力）一樣，由現存的外部的自然力受到衝動。配力機（即傳動機 Transmissionsmechanismus）以飛輪，動軸，齒輪，滑車，帶索，繩，小齒輪，以及各種各樣的聯動機，調節運動，並在必要時改變運動的形態（例如由直線運動變為圓形運動），並以運動分配傳達到工作機上。所以，這二部分專為推動工作機因而使勞動對象得被把捉，為合目的的變更。第三部分為工作機或工具機（Werkzeugmachine, Arbeitmaschine）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實以機械的這一部分為出發點。直到現今，在手工業經營或手工的工場工業經營轉化為機械經營的地方，依然以這一部分為出發點。』（第一卷，德文本三三六頁，中譯本二九九頁。）

這就是關於機械的科學的說明。那麼，機械是怎樣發明的呢？發明和使用機械的過程，也就是產業革命的過程。

由於機械的發明而惹起的產業革命，先發生於英國，以後才波及到法，德等國。*所以，我們的說明，應以英國的產業革命的情形為

例

（A）工業生產部門的革命

（甲）輕工業（纖維工業）

機械的發明，工業生產技術的革命，在英國是先起於木綿業。※在機械未發明以前，織布所經過的過程——首先，必需拿纖維來當作粗原料。用手器具梳櫛這些纖維，藉以拉長這些纖維的構成部分的各條筋。其次，從事紡績。用梳櫛以拉長那纖維，使它成爲細線，同時把這細線和別的細線結合起來，使它成爲較牢的紗線。這種工作，或以手搖的高紡車（High wheel）來作，或以足踏的低紡車（Low wheel）來作，紗線作成時，便放在織機上面。作經線的，需要較牢固的紗線；作緯線的，需要較輕軟的紡線。這些緯線，捲捆在梭子上，用手投送於經線之中，忽往忽來，成水平形。織成之後，再經過整理，漂白，剪切，染色等過程，那布疋才能作縫製衣服的材料。這些工作的動力，不是手就是脚。

到了1730年，Wyatt發明了「捲軸紡績機」(Roller Spinning)在當時的家庭工業裏，兒童和婦女也能容易地紡紗；但是織布卻是較困難的工作。因之紡紗的能力，優於織布的能力好幾倍。於是就迫切需要一種機器，以提高織造工程的速度。因此，1778年，John Kay發明了下落箱及飛梭。（Drop Box, Flying Shuttle）藉此，織匠可以安坐而把梭子運用自如，能使織造工程的速力大行增加，獲得二倍以前的生產力。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保羅（Paul）發明了梳棉機（Carding Machine）。然而這梳棉機，直到後述的亞克來特爵的紡績機發明時爲止，一向不會被人利用。織造工程，因有趙開的發明而進步了；但是紡績方面，卻還沒有進步到足以供給那

※產業革命爲何最先發生於英國，其理由可參看第七章第三節。

參看第七章第三節。

充分紗線的程度，即採用舊來的紡紗方法，已不能滿足新織機的要求了。於是發生了對於新紡績機的渴望。因此，皇家協會（Royal Society），懸賞募集那同時能紡幾條紗線的紡績機。其後過了三十年，到了一千七百六十四年，由來克楞底織匠哈格里佛士（John Hargreaves），發明「吉妮紡績機」（Spinning-Jenny），於一千七百七十年，取得專利。

這個機器，用一根軸去旋轉八個紡錠，其構造甚爲簡單，連兒童也運用得來，而其價格也很低廉。因此，這種機器能夠爲一般人所採用。因此，別的許多紡工，都認這個發明是剝奪他們的工作的，於是襲擊他的家宅，毀壞他的機器。這是關於哈格里佛士的故事。其後這個機器，加以種種改良，進到同時能紡紗至十二根以上。其後到了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亞克來特（Richard Arkwright）改良前述派特底紡績機而作出新的紡績機，這新的紡績機叫做「水力機」（Water frame），由四對捲軸而成；那捲軸則以那依於水車的調帶來旋轉，他把這機器推行於全國。據說他由此一舉而成了富豪。其後，他把他的工廠建設於克勝福特，發明疏棉，運條等新機器，獲得專利權，竭力努力於紡績機底改良。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克倫普吞（Samuel Crompton）採用亞來特底「水力機」底紡績力迅速和吉妮紡績機的能夠生產精巧的製品，這兩種機點，把這兩種機器併合併起來，發明了「茂爾」（Mule）紡績機。因爲這是兩種機器的混合物，所以命名爲「Mule」（其意思是騾。）這個機器，不久爲一般人所採用，前述的保羅底梳棉機，到了採用這茂爾紡績機時，才有使用的可能性，遇到被一般利用之機會。

這些紡績機的發達，能夠供給許多紗線，用以滿足地方手織匠底需要，都用以滿足製襪業等底需要，也有一些是用於輸出國外的。然而能夠利用這樣巨大的生產力（這種紡績機的生產力）的織機，卻除了一千七百三十七年趙闕所發明的採用飛梭的織機之外，還沒有別的發明。於是人們便期望發明優良的織機以利用多量的紗線了。這種期望，由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卡特賴特（Edward Cartwright）底力織機，（Power Loom）來滿足了。

其後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美國的惠特尼(Eli Whitney)發明了軋棉機(Cotton Gin)從此便能供給充分的棉原料，以滿足那發達的紡績機和織機的需要了。這個軋棉機一天能採收五磅並六磅棉以前一天只能採收一磅。此外，一千八百十三年有和洛克斯(Horrocks)底整理機(Dressing Machine)，一千八百三十年有「斯洛司爾機」(Throstle)，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有羅伯(Robert)底「自動茂爾機」(Selfacting mule)，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有巴羅(Bullough)底改良力織機(Improved Powerloom)「林格紡績機」(Ring Spinning)等相繼發明，使紡績業界和織物業界起了空前的變革。(參照唯物史觀經濟史石濱知行著日文本二五二——二五五頁。)

機械漸次改良發達的結果，在一個作業機械內裝置許多工具，致使作業機械的裝置變大了，因而要想運轉它使它工作，必需非常之大的有規則的動力才行。過去所用的牛馬，以及風力，水力等等，因爲力量的微弱和不規則，早已不能滿足上述的要求。在這裏就有發明動力機(發動機)的因素和期待。適應這個需要的，就是用一個動力機同時運轉許多工具的蒸汽機關的發明。發明蒸汽機關的功績屬於James Watt最初，蒸汽機用於鑛山的排水工作，以後才應用到紡績機，鐵路，製鐵及其他生產交通的一切部門。蒸汽機關的發明，構成爲英國產業革命的原動力。由於這個動力機的發明，作業機變成了全部機械裝置的一部分。

這樣，作業機的發明，動力機的發明與革新，又促成連絡這兩者的配力機(傳力機)的出現，這才使近代的機械裝置，以其完整複雜而精巧的姿態出現於世。

(乙)重工業煤鐵工業

機械化發達，那當然的結果便是引起對於煤鐵的激增的需要。其次，我們且來看一看煤鐵工業方面所起的變革情形。

熔解鐵鑛，原爲英吉利的最老工業之一，但其方法卻很原始，而且逐日就衰退。其理由是因爲熔解鐵鑛是使用木材，而政府懼怕森林歸於荒廢，又以法令禁止採伐森林，薛尼(Cheyney)還舉出別一個原因，那就是造船及公園的未來需要已經停止。(Indust-

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P. 214) 其結果，十八世紀鐵的出產額，比十七世紀減少了。例如在一千六百九十五年，還能產出十八萬噸，但到了一千七百四十年，便減到一萬七千三百五十噸了。斯克立有趣在他所著的鐵工業史裏說：到了十八世紀中葉，「鐵工業好像完全沒落於卑賤和輕蔑之中。」然而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年以後，因爲已經開始採用煤爲燃料，所以製鐵業也就漸次旺盛起了。到了一千七百六十年，斯米頓 (Smeaton) 爲羅巴克 (Roebuck) 而建設了衝風爐 (Blast furnace)。從來的熔鐵爐，多設大風箱，以水力馬力去運動，藉運動而送風；但在這衝風爐裏，却設置了送風筒 (Blowing cylinder) 已經比較完全得多，不過動力還是用水力。一千七百六十九年，牛康門 (Newcommen) 底機關裏，利用了瓦特初期發明底結果，使木炭熔爐底作用更加進步，並使鐵的生產量也增加了。一千七百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科特(Cort)在精煉展延工程裏有了新發明，取得專利權，這對於鍛鐵的生產，開闢了道路，在這不久以前，脫變爾·漢底亨茨曼 (Huntsman) 發明了鑄造鋼鐵的方法。到了一千七百九十年，瓦特的蒸汽機關，才移入製鐵工業裏。在這以前，已經使用瓦特所發明的巨鎚（鍛鐵用的）——(Tilt chammer)——以物「啓羅瓦德」(Ellowat)牛的鎚子能夠於一分鐘內打三百度數，在一千七百九十年以後，關於精煉，鍛鐵及其它製鐵發明了許多方法。到了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格拉斯哥底詹姆斯·納爾遜發明熱風法 (Hot Blast) 以代冷風法 (Cold Blast)，因而節省了煤的消耗，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採用粗煤以代焦煤，更能減少煤的消耗。

這樣，因許多發明和改良而起的鍛鐵法底發達，就益使鐵的生產增加了。

其後，到了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有了柏塞麥 (Bessemer) 底發明，能夠把熔解了的鐵，直接從熔鐵爐裏變成了鋼鐵，更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西門司和馬丁 (Semens and martin) 發明了開爐法 (Open Hearth Process)；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託馬斯和季爾克立斯 (Thomas and Gilchrist) 發明了鹽性法 (Basic Process)。這些發明，使鐵及鋼鐵的生產，有了可驚的增加。

今日「鋼鐵時代」底到來，實由柏塞麥底發明。陀布 (Dobb) 把一千七百年中葉以後紡織業方面所行的機器的發明，稱爲第

一產業革命；把柏塞麥以後即一千八百年代底末葉製鐵製鋼方面所起的發明，叫作第二產業革命。

英國在一千六百六十年已經每年消費二百萬噸了。在十七世紀初期，已經實行用煤去熔解鐵了。一千七百三十五年以來，已用焦煤為熔解鐵的補助品了。從這年以來，在英吉利，發現了而且發掘了許多煤礦。在歐羅巴，英吉利是出產煤的第一等國。在十八世紀，英國出煤達六百至八百萬噸；到了一千八百三十年，乃達到一千二百萬噸。尤是因為鐵工業有了空前的發展，蒸汽機關底利用日益繁多，以致對於煤的需要，也日益增大了。（同上，二五六——二六〇頁。）

…………………………………………

根據上面的說明，可知紡織工業中機械的發明，促進蒸汽機關的發明；對於這些機械之類的巨大需要，引起製鐵製鋼業的發達；而這些現象又喚起那用為燃料的石炭工業的隆盛。這樣，社會各產業部門，在那交互關係上，一方的發明，促進他方的發明；他方的改良，又促成這方的改良。所以資本論上說：『一個產業範圍內生產方法的革命，喚起別個產業範圍內生產方法的革命。因社會分工，而各自生產商品，但各皆以總過程一階段的資格互相連繫的諸產業部門，最先如此。所以，機械紡織業，使機械織布業成為必要；二者合起來，又使漂白業印花業，染色業，有發生機械化學革命的必要。同樣，棉花的生產，才能依必要的大規模生產。』（第一卷，德文本三四七頁，中譯本三〇七頁。）

木綿工業中的革命，接着就促使羊毛工業，亞麻及其他製麻工業，花邊工業，絲織業，等等工業中，也跟着採用了機械，此外在裁縫業，製鞋業等中，其生產手段也機械化了。這更刺戟着煤鐵等重工業的發達，而促成工業部門的革命。

（B）農業革命

工業生產技術的革命，必然給予農業以深刻的影響。『大工業，剿滅着舊社會的堡壘的自耕農民，而以工資勞動者代替他們。在這

個意識上，大工業給予農業部門最革命的作用。社會變革的要求，與階級對立的事實，在農村是和都市一樣了。最陳舊最不合理的經營方法，為科學之意識的工藝學的應用所代替了。原來在幼稚未發展形態上使農業和（手）工業互相結合的家庭紐帶，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割斷了。但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又以農業和工業對立發展的形態為基礎，而為一個新的較高級的綜合——農業和工業的結合——造成了物質的前提。」（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四七〇頁，中譯本四〇三頁。）

據此可知：工業生產技術革命的結果，「價廉物美」的資本主義商品，破壞了農村的自給自足經濟，切斷了「原來在幼稚未發展形態上使農業和（手）工業互相結合的家庭紐帶，」這一方面為資本主義生產開拓了市場；另一方面，「剿滅舊社會的堡壘的自耕農民，」使農民階級分化，大多數的自耕農民淪為無產者，極少數的上昇為資產家。其次，陳舊的土地關係，也因此漸漸的或迅速的發生變革，土地降為資本的附屬，土地服從資本，這為資本主義的農業造成了活動的地盤。「最陳舊最不合理的經營方法，為科學之意識的工藝學的應用所代替了。」具體地表現在農業經營的合理化，科學化，商品生產化上面。所以，Engels在英國勞動者階級的狀況上說：「一切東西，都被投入這工業運動的一般的漩渦中了。農業也受到急激的變動了。如我們所已經觀察，不僅土地財產離開那舊來所有者的手裏，而移轉於別的所有者，新耕種者的手中，就是那農業形態，也與以前不同了。大佃農，投資於土地改良，破壞無用的牆壁，施行排水，加用肥料，應用較優良的農具，而且採用了耕種的組織的代謝，即輪栽農業。各種科學的進步，也有貢獻於他們那些大佃農。Henry Davy 應用化學於農業中而成功了。機械學的進步，給予他們以無數利益。……」這樣，農具起了很大的變化，即採用了蒸汽鋤，割草機，自動束稻機，牧草乾燥機，脫穀機，蒸汽犂等，以代替鐮刀，耙子，和連枷。隨農業的機械化，資本主義化，那向來繼續了來的圍剛土地的傾向，即共同耕種的廢止，共同地共有地的私有與獨佔，小農場併合為大農場等等傾向，也日益顯著了。從此，實行對於土地的集約的科學的耕作法，採用輪栽農法，以化學的方法製作較好的肥料，又設立如農會一類的勸農機關，然在別一方面，由這種經過所促成的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在現實上，又把人口從農村裏驅逐出來。這樣，社會變革的要求，與階級對立的事實，在農村是和都

市一樣了。這誠如 A. Toyndee 所說，『在十八世紀末葉的產業大變革中，農業革命也演了重大的劇目，這和那通常引起較多注意的製造工業中所起的革命一樣。』

（C）交通機關的變革

『農工業中生產方法的革命，特別必然地要使社會的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運輸及交通機關的革命變為必須的。Fourier會論及以一個小規模的農業及其家庭的副產業與都市的手工業為樞軸的社會，但此社會的運輸及交通機關，已不能滿足工場手工業時代的生產欲求，因為工場手工業時代，具有擴大的社會分工，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的集中，和殖民市場等。因此，這些運輸及交通機關事實上也起了革命。與這一樣，那由工場手工業時代傳下的運輸及交通機關，不久也變成對於大工業的難堪的桎梏，因為大工業以生產的熱病的速度，生產的龐大的規模，巨大數量的資本和勞動者從這一生產部門向別一生產部門的不斷的移動，以及新造出的世界市場的聯絡等為特徵。因此，雖然不說起造帆船上所起的革命的變化也好，那河川輪船，鐵路，大洋輪船，及電報等一系組織所生的結果，也使運輸及交通機關，漸次適合於大工業的生產方法了。然而同時又生出一種必要，要把那可驚的大量的鐵塊來鍛鑄，鑄接，切斷，穿孔，造形，要做這些工作，又要求各種巨大機械，而這些機械的製造，用工場手工業的辦法是決不可能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四七——三四八頁，中譯本三〇七——三〇八頁。）

這樣，農工業中生產方法革命的結果，笨重的機械的搬運，大量的煤，鐵，原料的運輸，空前的大量商品的輸送，在在都使交通機關有改良的必要。

『英國的鐵道是建築在已存的道路與運河的模型之上。』（L. C. A. Knowle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arial Revolutions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張格偉譯英國產業革命史論。P. 267）

在這裏讓我們先說道路和運河的情形。

「十八世紀以前，英國的公路，只是土道或駝馬及乘馬用的道路。這些未鋪裝的道路依據1555年的法規由各區人民的勞役維持，他們每年爲道路供給六日的强制勞務。一年超過五十鎊收入的人，則必須提供六天人力馬力和馬車的勞務。車輪運輸雖已開始，但十七世紀末期還未普及。不過因商業的擴大和大量貨物運輸的必要而有增加。此等有車輪的運輸器，常將道面壓出很深的轍痕。」「……土道破壞不堪。冬季一至，各城市可預知其因道路的狀態而被阻隔，每逢冬季，他們卽豐貯食物需要品，如備困城久守，因爲達到都市的各道路，特別難堪。冬季鄉村中的孤獨，實難忍耐。「你們尤其知道每逢一年最終的冬季，宴會和拜訪的交遊，不能擔保其無生命與手足之迫切的危險」這是1792年的評語。運搬，在運轉大量原料和製造品而更加需要道路的時期，這種情形也就能夠成了物議之因。假若道路不能改善，則十八世紀驀進的工業發達，便要停止。」（上揭書，P.272—273）英國政府爲動員全國兵卒以禦外侮的必要，爲貨運的流暢起見，在1740年與1760年之間，爲道路的開設及維持，頒佈了四百五十個以上的法令。此後，道路方面，也受了產業革命的大影響，先行Metcalf式的道路修設，隨後Telford又在道路建設上發明了新設計。到了1815年，Macadam以廉價發明了經久的鋪裝方法，牢固路面，由此改善了道路。從1818年到1829年之間，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建設了約一千哩具有六十呎幅員的優良車路，而舊道路也依上述的Macadam式加以改善了。在蘇格蘭的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建築了約九百哩車路，架設了一千以上的橋樑。這種道路的新設的改良，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成了資本主義潮流流入窮鄉僻壤的重要契機。

其次，讓我們看一看運河（Canal）的發達情形。

「英國運河的歷史，可分爲兩個時期。從1760年到1830年之間，運河的興起和發達，是運輸系統中最重要的一部，且爲英國工業的存在所依賴。

從1830年到1914年，是鐵道和汽船發達而使運河相對的衰退時期。」（上揭書 P. 278—279）

「十八世紀，英國開始需要更多的煤炭，有較馬車或騾馬銜鉴更完備和廉價的運煤方法，已成極端的必要。」（同上，P. 277）

這種必要，刺戟了運河開鑿的興工。第一條運河，爲布立芝窩志公爵以私人經費所開鑿的，連接查特摩斯（原註 Worsley）的煤區和曼徹斯特，完成於1761年。……

十八世紀的最後十年，興起一大運河的狂熱（1793—1797）。英國迅速地佈滿了許多私人公司所開鑿的內地水路系統。……因爲這些運河有許多連接河川，也就同時將此等河川改良了，此等改良的河川，即是所謂內地航路（Inland navigations）。

其一般的結果，1830年英格蘭有1927哩的運河與1312哩的可航河川以及812哩的公開河流，蘇格蘭有813哩的改良水路與運河，愛爾蘭則有848哩。」（同上 P. 279—280）

運河與內地航路對於以前已存在的一切交通機關，大加改善。貨物的運送，不但是運費更加便宜，而且是運輸得更加迅速。1770年一短篇論文上說從 Leeds 到 Liverpool 商人若將貨物由陸上運輸，一噸的運費是四鎊十七先令，每需時間三週或三週以上，且多損壞，但用船舶運輸，則異常安全，時間只需三天，一噸的運費爲十六先令。*

運河發達的一般的結果，運輸費約減少四分之一。大量原料有運轉之可能；大體積的貨物，如煤炭和建築材料，獲得新的移動性，並在1767年以後，建築了連絡運河與煤礦及石礦的鐵軌道或馬車道時，容積龐大的貨物移動，得到更進一步的刺戟。

陶器製造業，因爲從哥納瓦爾得到磁土和增加分配此等容易破碎的貨物之便利，受了新的刺戟，製陶區域很迅速地發達。……

燃料能由運河運輸的今日，人民可以從森林沼澤的附近離開內地的水路，其意義就是使家庭得到便宜的燃料，使工場和熔鑛爐得到便宜的動力。1831年Priestley述及牛津運河說：「意義就在從貝明翰附近的煤田，搬運大量煤炭至牛津及其他位於 Thames 兩岸城市的事實。」分配的普通費用大減，英格蘭中部的開發，城市一因能夠得到食物，一因建築材料現在能夠大量使用而勃

* Killick, History of the Leeds and Liverpool Canal.

與；農業獲得更好的市場，而且運河的發達，刺戟大農場的發展和一般的農業革命。（同上，P. 283—285）

這樣，運河刺激一切產業和商業，交通，且爲大規模生產之必需的起點。

英國的運河運輸，1830年達到繁榮之頂點。「此後，運河之爲主要交通機關的地位，迅速地爲鐵道所取代。運河在1909年實際上所運輸的貨物，雖較以前要多，但大量增加的貨運，已握在新機械的運輸機關之手。」（同上，P. 287）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已經知道，道路及運河，也隨同資本主義的成立，而有了很大的發達。但是，道路及運河，原是適應資本主義初期的交通機關，這很難適應那以後的資本主義的空前的驚人的大發展。這樣，鐵道（火車）和海運（輪船，）漸次代替了道路和運河，而變爲主要的交通機關。

英國的鐵道是建築在已存的道路與運河的模型之上。

「英國的鐵道制度，在幾個重要的特點上，與其他一切鐵道制度相異。英國鐵道的開始，亦如道路與運河，是私人的資本，沒有全國劃一的制度，且未得到政府的援助。鐵道是因適應超越運河能力的運輸而建設的；牠們的發生，純粹是商業的原因，即意在爲創辦人獲得金錢上 利益。」（Knowles 上揭書 P. 293）

英國政府，在最初對於鐵道的建設，不但未加以援助，而且議會的調查，竟至判定鐵道的存在是一種危險的革新。

經過了種種預想不到的困難，到了1830年，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之間的鐵道方才開通，其後鐵道的建設及改良屢次施行，遂至現出了鐵道時代。

在鐵道開通當時，牠在運輸上的地位是這樣的：「當火車建設於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之間以前，有二十二輛正式馬車，七輛臨時馬車。這些馬車，全部合計最多可以乘六百八十八人。火車在十八個月間可以乘十萬人，每天平均可以乘一千七十人。馬車乘車費，內部是十先令，外部是五先令；火車乘車費，內部是五先令，外部是三先令六辨士。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之間，用馬車要費四小時，用火車只

清一小時四十五分貨物運輸費用，馬車每噸要十五先令，用火車每噸只要十先令八辨士。在這兩個地方之間，用運河要經過二十小時，用火車只要二小時便行了。」(W. Cunningha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 1921. Part II, P.812—813)

鐵道的運輸，既省時間，又省運費，更能運送大量的或笨重的貨物，故從來的交通機關——道路與運河的地位，漸被鐵道所侵奪，而出現了鐵道時代。例如在1842年，英國僅有鐵道 1,857 哩，到了1854年約增至 8,954 哩，即在此十二年內，英國的鐵道路線增長了四倍半以上。(前揭 Knowles 著書 P.313.)

英國的鐵道史，依據 L. C. A. Knowles 的意見，可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一)1825—1844年，是試驗的時期。

(二)1844—1872年可稱為鐵道系統的統一，大幹線的形成，與運河競爭的解除時期。

(三)鐵道「獨佔」的推測，使議會異常憂懼，議會雖信仰自由放任主義，但亦已產生鐵道統制制度。1873年至1898年，議會關於鐵道的事情竭力設置鐵道運河調查委員會，防止濫用，在1888年和1893年間，更加進展，於新興而且擴大的範圍內，規定最高運費率。

(四)1894—1915年，是各鐵道在便利方面作競爭的活躍時期。股利減少，結果導引1900年後的鐵道合併時期，工商業者及勞動者發生抗爭，彼時的問題是在找出新統制方法或鐵道國有。(同上 P.302—303)

其次，讓我們考察一下給予海運界以一大變革的輪船的發達狀況。

蒸汽力完成了陸上交通的革命，同樣對於海運也給了一個生面。促進造船術急激發達的，是那產業革命的兩個新生產物，一個是造船材料的鋼鐵材料，一個是推進機關的蒸汽機關。這誠如 Knowles所說：使全世界實際上成為一個市場的經濟狀態之改變，蒸

汽機亦與有大力。在這種變遷上，英國仍爲先驅者。雖然美國的發明家幾與英國同時發展一種蒸汽推動的木造船，但英國製造推動兩國新運輸工具的機械，英國是首先發展用蒸汽推動的鐵製汽船者，也是首先發展鐵製汽船爲大洋航行的貨物的運輸者。換言之，英國是在商業範圍內用汽船作世界運輸的先驅國家。（同上，P. 335—336）

Charlotte Dundas 號是用蒸汽運轉成功的第一個船，1802年通航於 Forth and Clyde Canal 船號靠着在 Carron 所製造的機械。1820年，能用蒸汽運轉的鐵船，在斯他佛德州 Tipton的火塞勒鐵工場（Horseley Iron works）製造。新材料與新機械是第一次的這樣相結合。但汽船普通只是很小的船舶，多半用帆航行，只在風小的時候用蒸汽。1860年帆船在船舶中還是一種重要的形式。在當時，英國有六千八百七十六隻帆船，對四百四十七隻汽船。並且在汽船中只有九十隻是從一千噸到二千噸。二千噸以上的僅四隻而已。所以汽船多是一千噸以下的小船。假若他們想載運相當多量的貨物，便不能爲要遠航行裝備充分的煤炭。當作貨物裝運的食品，一般都以爲會在汽船上變味。因此最初的汽船，是用作運登乘客和郵件的定期船而發展的。*

船體，向來是用木材造成的；但到了十八，九世紀，製鐵及製鋼法大行發達，因而用鋼鐵來製造船體，是比較堅固，比較安全，修理也比較容易，保存期間也比較長久，載貨容積也比較多量，而且能够造成較大的船體。於是鋼鐵船便成了輪船建造的主要形態。

---

* 汽船史上重要的年月如次：在英國首先成功的乘客船，是 1812 年製造的 Comet 號。但 Fulton 在美國設計一汽船，Boulton and Watt 公司供給機械，從1807年起，即定規的航行於紐約和 Albany 之間。1814年在寬雷特河建一汽船，按期的航行太晤士河。1813年在寬雷特河造成的汽船不下四隻；1820年增至八隻，1822年增至四十八隻。這些都是木製船。1819年美國船 Savannah 號（三百噸，長三十公尺餘的小輪船）橫斷大西洋，用蒸汽作帆蓬的幫助。1838年橫斷大西洋的四隻船，全程都用蒸汽進行，曾經過十四日乃至十七日之久，證明長途航海可用蒸汽的實在性。1825年 Enterprise 號用蒸汽補助帆蓬，駛往印度。經過半世紀的實驗以後，從1830年至1860年已證明汽船不僅是實用的，而且是很可以在貨物和乘客的運送上營利。（同上，P. 343——344）

其次，如燃料來說，最近造船界的趨勢，有以煤油代替煤炭之勢，更進而有以電動機代替蒸汽機關的傾向，就是有排斥使用煤炭爲燃料的傾向。

隨造船術的進步，船體日益增大，出現了六七萬噸以上的「蒸汽船」，全世界的總噸數，也由1890年的 21,118,523 噸，增至1914年的 49,089,552 噸；1925年的 64,641,418 噸。

交通的發達，交通機關之技術的革命，一定要促進郵政制度的發展。

近代電氣工業的發達，在農工業上和交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變革。（電氣發動機，電氣機械，電車，電話，電報等等）無線電的發明及其普及，更促進了這個過程。

第四節　產業革命的結果

第一項　工場制度的確立與完成

產業革命所引起的第一個結果，便是隨機械之發明而促成的工場制度的確立與完成。那末甚麼是工場呢？——英國的著名經濟史學者 Ashley 告訴我們說：「工場，雖然就偶然的事件來說，實際上雖已在半世紀以前存在，但它是十八世紀末葉產業革命的特徵。工場在資本的進化上，意味着新進了一步。它是資本的所有者或統制者，對於商業媒介的的機能以上的機能——即在事實上統制或監督製造業的過程的機能，實行大規模的掠取的意思，……木棉工場是新狀態的最顯著的實例，所以工場制度，大體上是最適宜於敍述新組織的名詞。然而這個現象的本質的特徵，自然在於因動力機的必要而結合，受統制於資本家的雇主，把多數勞動者聚集於一個工作場」這件事情，也行於煤礦，鐵工所，或機械工作所，和行於紡織工場是一樣。無疑的，工場制度是偉大的機械發明之必然的

結果。」(Ashley,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P.154)

「在工場手工業及手工業上，是勞動者使用工具，但在工場，勞動者却服侍機械。在前者，勞動工具的運動的起點是勞動者；在後者，勞動者却不能不追隨勞動工具的運動。」（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八七頁，中譯本三四一頁。）因爲工場的總運動的出點，是機械，不是勞動者；工場建基於機械經營；機械是工場的體驅，所以 Hobson 也說：「機械生產的發達，在大部分上，與近代工場制度的發達同其意義。」(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P.72)

所以，我們可以說，工場制度，是一種使用機械及非自然的動力（蒸汽力，電力等，）以這爲中心，而把多數勞動者集合於一個工場內，在一定的統制下，從事有機的勞動的方法。那末，這種和機械的發達有密切的關聯的工場制度是怎樣成立的呢？

「產業革命，如上面所說的一樣，是因機械及動力發明的結果而發生的。此等機械，在當時，無論那一種，價格都是很高，貧窮的人，簡直只能在傍邊看看，只有大資本家，才能把它們買到手。這種機械出現的結果，祖先傳來的生產方法，一個不留的，都被它們變化了，用新的機械力來生產，比勞動者向來用他們自己不完全的紡車和其他不完全的器具來生產的，價廉而且物美，因此從來的勞動者，便被這種機械把他們的生產完全奪去了。自此以後，產業全爲大資本家所掌握，縱然不是這樣，而勞動者僅少的財產（工具，）也完全變爲毫無價值的東西了。到了這個時候，在這一方面，資本家一舉之間，把一切的東西，都抓到自己的手中，在他一方面，勞動者轉瞬之下，却陷於一無所有的狀態了。當織物生產上，首先採用工場制度而機械及工場制度之採用對於一般興了一大衝動的時候，其他如染色，印刷，陶器，金屬商品工業等一切的工業方面，都利用這種工場制了。……一般大資本家，他們在本來的工場手工業以外的手工業領域中，也建設大的工場，大事經費之節約與分工之實施，因此一般小經營者如手工業師匠等，都被逐出來，於是連此等手工業，也漸漸地加到工場制度的勢力之下去了。在今日所謂文明諸國，一切的勞動部內，差不多都用工場式來經營，一切的部門中，手工業和 Manufacture 差不多都不見蹤跡，代替他們起來的，便是以工場制度爲中心的大工業了。」(F. Engels: Grundsätze des Kom-

munismus 1921. S. 9—10. 彭漢文編譯，Engels 起草的「宣言初稿」問答第四項。）

所以，在工場制度確立了以後，一般的說來生產的單位早已不是一個家族，也不是一小羣的人，而且不是用少數廉價簡單的工具，來處分極少量的原料，卻是成千成萬的人用高價而又複雜的許多的機械，繼續不絕的精製大量的商品，供給社會的消費者。因此商品也變爲生產的一般的支配的特徵。

產業革命促成了工場制度的確立與完成；工場制大生產的盛行，粉碎了，排斥了前資本主義的小生產者，還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發生經濟上利害相對立的兩大階級：第一是佔有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階級（Bourgeoisie）；第二是專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勞動者階級（Pro'etariat），資本家階級準備好一定的生產手段，并且在勞動市場上購來必需的勞動力後，便使勞動者在他們的指揮與統制下，在工場內爲他們從事於追求利潤的商品生產。

隨工場制度的確立及工場集中在都市的結果，爲出賣勞動力來謀生的勞動者階級，以及以都市爲營利的根據地的大小商人，也跟著蜂湧到工業都市，而發生人口集中在都市的現象。

第二項　生產力的激增

產業革命的第二個結果，便是社會生產力之急激的增大，生產額之非常的增加。

Adam Smith 在他的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上說，在當時，十個勞動者由於分工，每人每日能製造 4,800 根縫針；但到了產業革命後，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 年）第一卷上指出，勞動者使用機械的結果，每人每日能製造 600,000 根縫針；在1905年出版的 A.Seligman 經濟學原論更指出生產力有驚人的增加，即勞動者一人一日能製造 15,000,000 根縫針。這就是產業革命後，生產力急激增大，生產額非常增加之一例。

其次，S. Chase 在其著書 Man and Machines, (1929) 上，也給我們以一個「在特殊的作業上，機械力對人力的比較。」

年度別	工作別	用手來做的場合	用機械來做的場合
一八三〇	棉紗	女三〇〇人	女一人
一八六〇	製造拔栓器	男五九人	男一人
一九〇四	一 Bushel 的小麥	二七〇秒	四一秒
一九二三	每日每人的製鐵量	五〇〇磅	五、〇〇〇磅
	每日每人的砍材量	一〇〇英尺	七五〇英尺
	每日每人的製釘量	五磅	五〇〇磅
	每日每人的製鞋數	四分之一雙	一〇雙
	每日每人的採煤量	二分之一噸	四噸
	每日每人的製紙量	二〇平方英尺	二〇〇、〇〇〇平方英尺

就是因爲產業革命後，生產力急激增大，生產額激增的緣故，於是原料煤鐵等的消費與生產也跟着激增。例如一七六四年，英國從外國僅輸入棉花 3,870,329 磅，到了1810年卽增至132,488,935磅，到了 1860 年更激增至1,390,938,752 磅。（根據McCulloch的調查，見中譯[illegible]夫著英國社會經濟史 P.189—190）據此可知英國自從棉紡織工場開始應用了蒸汽機關以後(1785年)，棉花輸入量及其消費激增的一些情形。其次羊毛的輸入量也從1760年的 1,926 千磅增至 151'218 千磅。英國的煤的出產額，也從1700年的 2,612 千噸增至1800年的11,600千噸，再增至1854年的 64,500千噸。銑鐵生產量從1740年的17,350噸增至1806年的258,206噸，再增至1839年的 1,347,790 噸。生產力的激增，更表現在輸出額的激增上。例如以英國的棉紗及棉製品的輸出額來說：須在1697年僅爲 5,915 磅，到了1764年則激增至 200,354 磅，在 1815 年更激增至 22,289,645磅。毛線及毛織物的輸出額，在1740年爲 3,056,000磅，到了1800年卽增至 6,917,000 磅，1850年更增至 10,040,000 磅。其他鐵條，銑鐵等的輸出也有顯著的增加。商品的輸出總額，自

1783年至18 5年之間，由 13,396,415 磅增至 53,624,550 磅。這不過是單是英國的一個例證，其他各國全產業上的商品之急激的增加，在事實上及統計上都有證明。

由機械的大量生產而發生的商品數量之空前的激增，必然地要使商品價格急劇降低。資本主義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在國內市場，驅逐了手工業製品，擊敗了前資本主義的一切小經營；在國外，侵入了閉關自守的後進國，破壞了那裏的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而醞成她們急激向資本主義發展的氣運。這樣，大工業，把全世界的國民互相結合起來，促使所有的小市場成爲一個世界的市場，而形成了世界的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

第三項　產業革命對勞動者的惡劣影響

產業革命和機械的使用，固然增大了生產力，促進了資本的蓄積，使資本家階級大享其福利，但是，一般勞動者階級，却因使用機械來生產，受了種種不好的影響，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英國雖由產業革命而使生產力急激發達，但在別一方面，却發生了勞動問題，人口問題，救貧問題，失業問題，糧食問題等等，使當時的爲政者及學者專家，煩惱於這些問題的發生及其解決。甚至有名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 D. Ricardo 也不能不慨嘆地說：「從來的一切機械的發明，是否減輕了人類每日的勞苦，是很大的疑問。」（轉引自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機械生產的惡弊，機械文明的沒落，漸次成爲問題了。

現在，讓我們把機械的使用對勞動者的一些影響，加以若干的研究。

（1）機械是節省勞動的，故機械的使用，一定要減少雇用的勞動者，而使之失業。機械使用與勞動者失業的這種關係，在 D. Ricardo 以後，變爲許多學者的議論中心。在生產部門上的這種現象，是誰也能看見的，不能否認的事實。

誠然，機械能降低生產物價格，促使需要增加，市場擴大，因而能產生新的勞動需要；而且機械本身的製造，也會產生若干的勞動

的新需要吧。但是，機械的使用，在資本的正常的蓄積過程上，在絕對的數字上，雖不妨礙勞動者之漸次增加，但因不變資本之增加常大於可變資本的增加，故相對的說來，機械的使用，必使勞動者為減少，產生出產業預備軍（失業者）這是不能否認的現象。

（2）機械的使用，漸使筋肉的勞動歸於無用，因而促進了婦女與兒童勞動者的使用。這也是因為婦女與兒童的工資，較之成年男子的工資為低，且易於指揮與統制之故。因此，便發生成年男工失業，一般工資率降低，社會的衛生問題，風紀的紊亂等等問題。

（3）機械的使用，延長了勞動時間。這一方面投資購買機械的資本家，愈能早日收回其投資，則其獲益亦愈多，因而在可能範圍內，總想使機械終日運轉不息，使它的價值很迅速地移轉到生產物上，得以早日收回其投資。在另一方面，資本家常常怕有新機械出現，使他所投資購買的機械不能和它競爭。這也使資本家為早日收回其投資，不能不延長勞動時間，使機械的價值，在可能的短期間中，迅速地移轉到生產物上。這樣本來用以縮短勞動時間的機械，使用的結果，却發生了延長勞動時間的反作用。勞動時間愈延長，則愈減少勞動的需要，故從這點看來也好，機械的使用，也要使勞動者失業。

（4）因機械的使用而延長勞動時間，一方面要受生理上的限制（決不能延長到每日勞動二十四小時）一方面由於社會的抗爭的發達，決不能長此繼續。限制勞動時間的社會立法或工場法，就可以阻止其延長。這樣，資本家轉向到增加勞動能率的方法。勞動能率的增加，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支出更多的勞動量，即勞動強度的激化。要達到這個目的，主要的方法是：加快機械的速度；增加每個勞動者所管理的機械數；監督制度，賞金制度，罰金制度等等。勞動強度的增加，照道理說，當然工資也應該和支出的更多的勞動量成正比例地增加，但在實際上成比例的卻非常之少。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勞動問題。而且，一定程度以上的勞動能率的增加，常使勞動者的精神與肉體遭受極大的損傷。所謂社會立法，也沒有顧到這一點。

（5）在工場手工業及手工業中，是勞動者使用工具；但在工場中，卻是勞動者伺候機械。在前者，勞動工具的運動的起點是勞動者；在後者，勞動者必須隸屬或追隨勞動工具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上，勞動者是活的機構的構成器官；在工場上，那死的機構——

機械，離開勞動者而獨立存在，勞動者反成了機械的活的附屬物而被併合於機械。在前者，勞動者通過那生產過程全體，是生產過程的指揮者；在後者，勞動者只成了機械的附屬物，常常同一部分的勞動，與生產的全部過程分離，其指揮權則移轉到資本家手裏，勞動者只是遵照資本家的計劃，為死的機械的附屬品而活動着罷了。這樣，機械，不是從勞動中把勞動者解放出來，寧可說是從勞動中奪去其內容。不是勞動者使用勞動條件；反之，卻是勞動條件使用勞動者。這使勞動者對於機械，對於工場全體，對於資本家的無可依靠的隸屬，便完成了。

（6）由機械的發明與利用，產業革命所完成的工場制度，又使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在中世紀的手工業基爾特制度中，我們曾經看見了徒弟制度。在那裏，師傅，工匠及徒弟，住在一起，在同一餐桌飲食，工匠與徒弟，都算是家庭的一份子，在社會上和他們的師匠佔同等的地位。經過了一定的年限和勤務之後，徒弟可以上昇為工匠，工匠可以上昇為師匠；舊師匠為新師匠的獨立，曾有相當的關係並給予一定的幫助。簡言之，做雇主的師匠與做被雇者的工匠與徒弟，屬於同一的社會階級；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協調的，溫情主義的，不是對立的，鬥爭的。但是，產業革命，卻把這種雇主與被雇者之間的關係，從根柢上變革了。他們彼此之間，劃下一條大鴻溝，無論在教育上，在生活起居上，在一切的活動上，已經不屬於同一的社會階級了。他們轉化為：一方面是佔有生產手段，以工資向勞動者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階級；則一方面是除了勞動力以外，什麼也沒有僅靠售賣勞動力以維持最低度生活的工資勞動者階級。資本主義，建築在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制度上；這對於資本家階級是有利的，對於勞動者階級卻是無利的。這種利害關係的對立，使以前雇主與被雇者之間的協調的關係，變為對立的關係；使以前彼此之間的家庭的溫情關係，現在變成了冷酷的單純的契約關係，金錢關係了。

…………………………

根據上列各項的說明，可知產業革命後大機械生產的結果：婦女與兒童勞動的使用，勞動時間的延長，勞動強制的激化，及因此

而發生的勞動者的失業與過勞，以及勞動者之隸屬於機械，勞動的單調和痛苦，勞動者的社會地位的降低及其相對的貧窮化，在在都使勞動者受了極惡劣的影響，促成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頹廢。為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態、勞動條件而勃興的社會運動，便是勞動運動。

第四項　勞動運動的勃興與發展

產業革命後所發生的勞動運動，在最初還是帶有中世紀的色彩的機械破壞運動，此後才轉化為有組織的近代的勞動運動。

機械的發明，引起了生產力的增加，出現了大量生產。價廉物美的大量商品，威脅着手工業者及其勞動者的生存，因而在機械發明的初期，常發生發明家被手工業者迫害的慘事。這些發明家受難的故事，還是比較小規模的。這個運動帶了更大的羣衆的性質，成了社會的大問題，是在十九世紀以後的機械破壞問題。這是根據這種膚淺的見解：假使破壞了機械即可能驅除勞動者的失業和困苦而發生的運動。在英國，1811年至1815年的 Luddites Disturbances，可以說是代表的運動，因首謀者據說是 King Ludd，所以這種破壞機械的勞動運動，又稱為 Luddite Movement，在法國則於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同樣的運動。在德國及其他各國，也有同樣的運動爆發出來，規模儘管不同也好。

這種運動，是把機械和機械之資本制的使用弄混同了而發生的一種反動運動。這是跟隨資本主義的發達，對它的學問的理解前進時，就會消滅的原始的運動。還是一種想阻止經濟發展的無自覺的反射運動。因之這個運動是要想把資本主義社會拉回到中世紀而與歷史車輪相反逆的運動，所以它顯然的帶了中世紀的色彩。

反之，近代的勞動運動，雖同因產業革命而出現，但它和前者的反動的性質不同，它是想根據資本主義的發達，發揮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的偉力的。

「資本主義，到處使勞動階級的發展與資本家階級處於同一的程度。資本家階級越變越富裕，勞動者階級越窮越多。勞動階級之受僱用，是專靠資本，而資本的增加，又必靠僱用勞動者，因此勞動者階級的增加，與資本的蓄積，彼此互爲因果，以同一程度而進行。同時把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都一齊吸收到大城市中去了；因爲在大的城市中，工業的進行，所獲的利益較多。」（Engels「宣言初稿」問答第十一條。）這樣，「隨產業的發達，勞動者不但人數增加，而且漸次集中結成爲大團體，它的力量加大，對於自己力量的自覺也愈深了。而且，由於機械之抹去各種勞動的差別，勞動階級間的利害關係和生活狀況也就漸趨一致；工資又幾乎到處降低到同樣的水準。更因爲資本家階級間的競爭，與恐慌的爆發，遂使勞動的工資越加動搖不定。而且，機械不住的進步，使他們生活刻刻不安；勞動者和資本家個人的衝突，又漸次帶着兩階級間的衝突的色彩。因此，勞動者就結成了團體去對抗資本家。他們聯合的目的在於維持工資的一定的高度，又因爲時時須得反抗，就設立準備糧食或鬥爭經費的經常團體。這種對抗既成，便到處發生騷動的事情了。

在此等鬥爭中，勞動者原是時常得了勝利，但這不過是一時的事。他們鬥爭的眞正的效果，並不在眼前的利益，是在勞動者的團結的繼續與擴大。這種團體，很受了近代產業所造成的進步的交通機關的許多補助。因爲有了這樣的交通機關，遠方的勞動者也得互相接觸了。」（馬恩合著：一八四八年宣言第二章。）勞動者的團體，也可以擴大到全國或全世界了。這樣，勞動運動，漸次變成有組織的運動，採取工會運動，農民協會運動，合作社運動，無產政黨運動；至於鬥爭的戰術，則採取議會政策，同盟怠工，同盟罷工等等。反映這些實際運動的，或給予這些實際運動以理論基礎的社會思想，則有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各國都先後發生工會，農民協會等團體，又因勞動者構成爲一階級，便自然組織成一政黨，於是又出現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勞動黨等無產政黨。到了歐洲大戰以後，各國又產生了共產黨，在俄國它甚至獲得了政權。同時，又發生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青年國際，婦女國際等國際的勞動者運動社會運動，至於現今各國的無產政黨，從大體上說來，不屬於第二國際，便屬於第三國際。此外，工會也一樣

地有國際的組織，如今，Amsterdam 黃色工會國際與 Moscow 赤色工會國際正把世界各國的工會，分作兩大派。

這些勞動運動，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漸次成為行向未來社會的重大的社會勢力。在歐戰後到1923年為止的革命高潮期，勞動運動曾使世界資本主義受一極大的威脅，在俄國甚至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樹立了勞動階級專政的政權。此後，世界資本主義經過了相對的安定期，及至1929年世界恐慌爆發以來，資本的攻勢，使勞動運動在全世界都處於高壓之下，不得不踏着荊棘的道路前進。

第五項　資本主義侵入「後進國」

產業革命的結果，「資本家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牽入文明隊裏」（同上註。）因為，「由機械的生產把工業品的價格一天減低一天，於是使舊式的手工生產完全破壞。一切半開化的國家，反抗歷史的進化，仍然保持手工業直到現在的，也被時勢所迫不能閉關自守了，他們購買英國人的廉價貨物，於是宣告他們本國手工業勞動者的死刑。這樣一來，使三千年來不進化的印度也完全革命化了。甚至於遠東的中國，受了這個影響也達到革命的程度了，這個影響所及，神速萬分，譬如英國發明一個新機械，一年之內便把中國數百萬勞動者的飯碗都奪過去了。」（恩格斯「宣言初稿問題」第十一條。）所以，資本主義的「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砲，中國的城壁為它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為它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為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生產方法，即將所謂文明輸入到他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資本家階級。總之，資本家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創造了世界。」

資本家階級，已使鄉村屈服於都市支配之下，他們已建設許多都市，又將都市增加了比農村更多的人口，因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鄉村生活。他們使鄉村屈服於都市，又同樣使野蠻和半開化的國民屈服於文明國民，農業國民屈服於資本主義國民，東洋

品屈服於西洋。」（馬恩合著：一八四八年宣言第一章。）

這樣，因爲「採用機械的結果，生產物的價格降低，而且在運輸機關上也發生革命，這些事實，變爲能夠征服國外市場的武器。機械經營，由於壓倒國外市場的手工業的生產，把這個市場強制地轉化爲自己的原料生產部面。」（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四一六頁，中譯本三六六頁。）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英國紡織工業發達對印度的影響。「英國的木棉製造機械，對東印度發揮了急性的作用。1834年乃至35年，東印度總督斷言此種窮困，在商業史上，實少有其例。木棉織工的骸骨，漂白了印度的原野。」（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三九六——三九七頁，中譯三四九——三五〇頁。）被英國商品征服後的「東印度，不能不爲大英帝國生產棉花，羊毛，亞麻，黃麻，靛等等。在實行大工業的各國，勞動者不斷地過剩化的事實，是適宜地助長移住及殖民於外國的。因此而產生的殖民地，轉化爲宗祖國（母國）的原料栽培地。例如澳洲之轉化爲替英國製造羊毛的殖民地。和機械經營的主要中心地相照應的新的國際分工出現，地球的某一部分轉化爲以農業爲主的生產區域，其他的部分則轉化爲以工業爲主的生產區域。」（同上，四一六——四一七頁，中譯本三六六——三六七頁。）

總之，產業革命的結果，使資本主義先進國征服了後進國，這一方面使後者變爲前者的市場；而則一方面，又使後者變爲前者的原料供給地，更同時促進了國際分工，後進國的資本主義化。

第六項　經濟恐慌的發生

產業革命的第六個結果，是週期的經濟恐慌的發生。

所謂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是從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結構中必然發生的週期的恐慌現象。這不是因爲飢荒，戰爭，瘟疫，天變地異等經濟外的，偶然發生的經濟生活的擾亂現象。同時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是全體的一般的恐慌現象，這是包括一切生產部門，流

通部門，毫無地方的意義，擾亂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的經濟恐慌。

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內在的各種矛盾的爆發。社會的生產（即生產之社會性）和私人的佔有（即所有之私人的性質）之間的根本矛盾，構成爲恐慌的根本原因，而且還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不能避免的。私人佔有制度下的社會的生產，表現出各個資本家之間追求利潤的競爭。自由競爭，強迫各資本家必須蓄積資本，擴大生產規模。其結果，跟隨資本蓄積的前進，相對地說來，發生可變資本的漸減和不變資本的漸增。這就引起了勞動者階級的所得漸減。在別一方面，因爲資本的有機構成的高度化，引起利潤率降低，而且必須大量投資，致使資本家階級的消費（相對的）漸減。（參看第三篇）故隨社會生產力的漸次擴大，而社會的消費力便跟着相對地漸次縮小。這種矛盾，就是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所以資本論指摘經濟恐慌的必然性說：「直接搾取的條件和實現的條件，並不是相同的。它們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分開，並且在概念上互相分開。前者僅受限制於社會的生產力，後者則受限制於不同諸生產部門的均衡性與社會的消費力，但後者非由絕對的生產力也非由絕對的消費力決定的，卻是由以對立分配關係爲基礎的消費力決定的。這種對立的分配關係，會使社會大多數人的消費，縮減到一個只能在狹隘限界內變動的最小限。加之，消費力，還會由蓄積動機——那就是使資本增大，並使剩餘價值的生產依累進擴大的規模來進行的動機——受到限制。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這個法則，是由生產方法的不斷的革命，由現有資本的不斷的價值減少，由一般的競爭戰，由改良生產和擴大生產規模（爲保存自身和畏懼滅亡而行的）的必要性，引起的。」（資本論第三卷，上册，德文本二二五——二二六頁，中譯本一八四頁。）

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生產，可分爲二大部門，第一是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第二是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社會的消費力，是對第二部門的商品的需要。這也就是說：從剩餘價值中，除去蓄積額後，爲滿足資產階級的個人慾望而使用的部門，加上可變資本，則其總和就是社會的消費力。而且它「還會由蓄積動機受到限制。」

資本家從勞動者剝削來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不用來購買消費資料，卻用來購買生產手段以擴大生產規模。在別一方面，隨生

產規模的擴大，勞動的生產力漸增，而勞動力的價值也隨之漸減。因隨可變資本之相對的漸減，勞動者階級的消費也漸次減少。因此，從資本蓄積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生產力和消費力不均衡的現象，故在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相對的生產過剩，不能不源源不絕地出現，而影響到生產手段部門的生產過剩『所以，在有限的以資本主義爲基礎的消費範圍和不斷要把諸內在限制突破的生產之間，會不斷發生衝突，』（同上，二三九頁，中譯一九四頁。）所以，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爲生產力與消費力之間的不均衡。因此而發生的生產過剩，使是經濟恐慌的基本形態，也就是它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經濟恐慌，自1825年以來，差不多每隔十年即爆發一次：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

週期爆發的恐慌，決不是以同樣的規模出現，每經過一個循環，恐慌的規模便擴大一次。因爲每次恐慌，都要破滅許多小資本家，促進資本集中的過程。並爲克服利潤率的降低，爲增加生產力而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之飛躍的高度化，必然地要加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消費力之間的矛盾，必使強烈地解決這個矛盾的恐慌也更加猛烈和深刻化。這就是恐慌愈演愈烈的原因。這樣，由產

---

* 『在實際上，自從1825年發生第一回的一般恐慌以來，工業界及商業界的全體，即一切的文明國，以及多少尙未開化的附屬諸國的生產和交換，大約十年就大混亂一回。商業停止，市場充溢，生產物堆積完全不能賣出，硬貨（現金）潛伏，信用消滅，工場閉鎖，勞動大衆因爲生產了過多的生活資料而喪失生活資料，破產之後繼以破產，強制執行之後繼以強制執行。這個不景氣繼續數年間，其間生產力與生產物大量地濫費與破壞，結局堆積了起來的商品，或多或少地實行減價，找着買主，因而生產與交換再開始行動。這個步調，漸漸增加速度變爲小跑，產業的小跑一轉而爲快跑，快跑更變爲無統制的賽跑，在工業上，商業上，信用上，及機械上，現出完全的障礙物競走，其結局，在幾個冒險的大飛躍後，又落入原來的恐慌的壕溝中。這反覆循環了好幾次……這個恐慌的性質確實是明白的，Fourier最初稱呼這爲多血症的恐慌（由過剩而發生的恐慌）的時候，這正好恰說中一切的恐慌。』（Engels著吳理屏譯反杜林論三七四——三七五頁）

業革命而引起的經濟恐慌，形成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的無從醫治的「心腹之患」

第五節 資本主義的確立和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

——政治過程的分析——

「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市場，而由美洲的發現開其端。有了這種市場，商業，航業，鐵路交通，便成就了絕大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的發展。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有這樣發達，資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資本愈加增加，且將中世紀留下一切的階級都盡情推倒了。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曉得近代資產階級這種東西，全是長期發達和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的結果。

資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個武裝的自治的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共和都市，（如德意）有的變成君主政治下納稅的「第三等級」（如法）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的器具，且是事實上大王國統一的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的產業和世界市場都成立了，他們就成爲資產階級。」（馬恩合著一八四八年宣言第一章，）這告訴了我們資產階級是怎樣成長起來的。

自從經過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確立以來，資產階級就獲得了國家的政權。「政治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的名言，在任何一國都是妥當的。在任何地方，凡是以大工業來代替工場手工業，必使此地的資產階級的財富及勢力，增加到最高程度，使他成爲此地的統治階級。這種過程的結果，使資產階級拿到政權，排除以前的統治階級——即貴族，基爾特（同業公會，）以及他們代表者的專制政體。資產階級剷除貴族的勢力，不外用以下的幾個方法，即如廢除那承認長子承繼權的種種法律允許分裂及售賣土地上的各種產

業幷取消貴族所享的一切特殊利益。解消同業公會，取消手工業專利，藉以剷除同業公會員的勢力。舊勢力被剷除之後新的代替物即爲自由競爭。怎樣叫做自由競爭呢？這就是說一種社會制度，其中任何人有經營任何部分的生產事業的權利，只要他不缺乏相當的資本，就沒有方法阻止他自由生產的行動。所以自由競爭制度之建立，等於一種公開的宣言，說道：自此以後，社會的各分子，若不能平等，祇因爲各個資本大小不同，資本就是決勝的勢力。資產階級在這個社會中便成了第一等階級了。自由競爭爲大工業開始的先決條件，因爲唯有在這種環境之下，大工業才能發展。這樣，自從資產階級將貴族及同業公會員的社會勢力排除以後，更進一步而剷除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所以資產階級自從在社會上站在頭等階級以後，更宣布他們在政治上也居第一等階級了。所取的手段，乃建設一個代議制度的政府以法律上的平等作基礎；法定承認自由競爭制度。這個方式的政府，首先建立於歐洲，採用君主立憲的政體。在這些君主立憲政體下的國家內祇有資產階級，祇有擁有若干資本的人，始有選舉權。*資產階級選舉他們的代表，他們的代表，於是乎藉著他們的拒絕加稅權來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治。**故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通又稱爲資產階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

*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以限制選舉權來約束一般社會，故投票權是有產階級的特殊權利。恩格斯說這個宣言以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外表現勢，漸漸有所變更。先將教育，報章，教會宣講壇及其他言論機關完全拿到資產階級手中以後，才開始給與一般群衆的選舉權，又用賄賂及移花接木的手段來操縱選舉，用憲法三權分立互相牽制的方法，來防止劇烈的政治變遷，又用警察及軍隊來防止劇烈政治激變的危險，如此則資產階級可高枕無憂的擁護政權。恩格斯起草這個宣言的時候，英法人民對於擴張選權問題，曾表現一種革命的要求，故他在這本小冊子上，指出了資產階級以限制選舉權，來把持政治的重要之點。

** 議會有通過稅則權，這確是無上權力。……政府藉議會，始得有他的收入，如國課及關稅之類，故此使半封建式的君主，也降作資產階級的僕人了。資本主義同時又把舊式貴族的經濟基礎改變了，使他們代表農村資本，作資本主義的一個旁枝。」（彭漢文編譯，恩格斯宣言初稿問答第十一條。）

資本階級權力下的典型的國家形態，也就是跟全部市民——他們當作商品的販賣者和購買者——的形式上的平等相適應的「民主共和國」」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本質，即少數不勞而食的支配階級剝削勞動大衆的搾取關係，被自由勞動契約所隱蔽。這，反映在上層建築的政治關係上，則爲所謂「法律之前的全部市民的不等，」即在幾年舉行一次的議會選舉上，各市民的投票和大資本家的投票同等地計算，因而使各市民發生一種錯覺，誤解他們對於一國的政治，資本家有同等的權力。這樣，自由勞動契約，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係隱蔽了下去；一般的選舉權，把勞動大衆在政治上被支配的關係隱蔽了下去。*故「近代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搾取工資勞動的工具。」（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明華社版二四一頁。）

民主共和國，變成資本主義奴役勞動大衆的「政治的面罩。」人物，黨派，或機關之任何交替，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範圍內，決不能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權力。反之，資本主義的「近代的國家權力，不過是處理全部資產階級的公共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馬恩合著，一八四八年宣言第一章。）

* 「在民主共和國裏面，「富者間接地但因此卻更可靠地運用他的政權，」就是：第一，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例如美國）；第二，用「政府與交易所勾結」的方法（如美國與法國等。）」（伊里奇著國家與革命莫師古譯一三頁。）「在資本主義之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我們非有官吏不行。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之下，因僱傭奴隸制和民衆之貧乏困苦底全部環境，使民主主義成爲狹窄的，殘缺的，變相的。」（同上，一七四頁。）

（註一）資本論第三卷下册，據文本四一六頁，中譯本七五五頁。

（註二）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句。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一三二——一三三頁，中譯本一二〇頁。

(註六)同上一三〇頁，中譯本一一八頁。

(註七)同上一三一頁，中譯本一一九頁。

(註八)資本論第三卷下冊，德文本四一七頁，中譯本七五六頁。

(註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一五六頁，中譯本一四一頁。

(註十)Engels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侵入了商品生產者，個人生產者的社會裏他們的連繫是用他們產品交換的方法來進行的，但是每個根據於商品生產之上的社會都有這樣的特點，就是在他裏面，生產者喪失了統制自己社會關係的權力。每個人以其偶然的生產手段，為自己而生產，並用來滿足自己個人在交換中的需要。誰也不知道，他所生產的那種產品，要有多少供給於市上，不知道所需的數量，究竟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究竟是否為人所需要，不知道他是否能夠抵償成本，不知道一般的是否能夠賣去他的產品。在社會的生產中，統制着無政府狀態。可是商品生產，和任何其他生產方式一樣，有他自己的，他所特有的，不能與他分裂的那些原則，所以不管無政府狀態如何，這些原則還是在此種狀態之中，因此種狀態之助而實現着他們的作用。他們（法則）表現於所保留的唯一的社會連繫之中，即表現於交換之中，而以強制的競爭法則，顯露自己對於個人生產者的作用。在開始時候，這些生產者也並不知道這些法則，後來他們經過長期的經驗，才逐漸把他們發見。因之，他們（法則）的表現並沒有生產者的參加，而且是反對他們的意志的，因此這些法則是他們生產形態的盲目進行的自然法則。生產物支配着生產者。」（Engels著吳理屏譯反杜林論三六八——三六九頁。）

本章主要參考書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三卷第二十章，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

馬恩合著：一八四八年宣言。

Engels：宣言初稿。

Engels：反杜林論。

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

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三，四，五分册。

石濱知行：歐洲經濟史綱。

山川均，石濱知行：唯物史觀經濟史。

布里古金：社會構成論。

K. A. Wittfogel: Geschichte des P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J. A. 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W.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本章其他參攷書，可參看第七章英國資本主義發達史中所列舉者。）

第六章　附論　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東洋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和西歐的社會發展有無不同之處？東洋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發展爲後進性停滯性以及其他各種特殊性（例如農村公社之長期的存續，奴隸勞動的不顯著，特殊的土地所有關係，閉鎖式的農業經營和牧畜業的不發達……等等）是因爲甚麼原故？因爲這些特殊性的存在，是否使中國古代和中世的社會發展產生出與一般的西歐的社會發展不同的地方？復次，因爲這些特殊性的原故，西歐資本主義侵入東洋，尤其是侵入中國時，它遭遇着了甚麼社會？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理論，就是爲解答這些問題而提出的一種新學說。其主要代表者，在蘇聯是馬扎亞爾，柯金，巴揚諾；德人則爲 Karl Wittfogel。這些學者在卡爾的名著經濟學批判的序言（Vorwort）上發現這樣的文句「在大體上，我們可能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市民的生產方式，作爲經濟的社會構造上的相繼起的前進的階段。」（"In grossen Umrissen ko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 Berlin 1930. Kautsky 版 S. L. VI.）他們又在馬恩二氏的其他的文獻上，找着了關於亞細亞或中國社會的許多特徵（例如水利灌溉及其組織，土地私有的缺除（因而租稅＝地租）農村公社的長期存續，後進性，停滯性，專制國家等等）並且馬恩二氏，對於這些特徵，常加以「亞細亞的」或「東洋的」等等形容詞，遂使他們以爲這些東西，只有亞細亞社會才有似的，從而創唱其「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學說。那麼，這種生產方式的具體內容如何呢？馬扎亞爾柯金和

巴巴揚共著的井田的序文上，告訴我們「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特徵：

第一是人工灌溉；

第二是農村公社；

第三是沒有土地私有；

第四是國家形態是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

他在別處又指出：水田耕作，特殊的施肥制度，手力勞動的支配，缺乏家畜，也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特徵。至於柯金和巴巴揚的見解，也大半類此。其次，德人學者 Karl Wittfogel 在其大作：中國的社會和經濟 (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Chinas. Bd. I)上，也根據和馬扎亞爾等差不多的論據來創唱「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學說。想說明中國社會經濟上的種種特殊現象。他首先從黃土（華北），種稻（華中，華南等地）必需水利灌溉等自然條件出發，論證在中國社會：（1）農業建築在人工灌溉上；（2）而且必須灌溉的地面非常之寬大，故在國家權力干涉下的「公共事業」的灌溉組織，是非常必要的。（日文譯本上卷二三四頁，）這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特有的官僚機構，土劣，地主，商業高利貸以及手工業等等之所以構成為「亞細亞的」特殊形態的根源，同時也就是形成「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主要因素。

第二節 Madjar 和 Wittfogel 等的見解及其檢討

上面介紹的馬扎亞爾和 Wittfogel 等等的主張是否正確呢？

第一，從方法論上看來，我們認爲馬扎亞爾和 Wittfogel 等等都犯着極大的錯誤。因爲他們的理論，不僅以水利灌漑爲出發點，而且還以它爲最重要的基礎。例如：國家權力的產生，他們不求之於階級支配，卻在治水事業上發見了它的起源。同樣，他們把治水事

業認爲是官僚統治之「物質的基礎。」這種主張，確是「濕了水的推論」（卽操縱的理論）在方法論上是講不通的。以Wittfogel的大著中國的社會和經濟來說：一方面，把生產力解作技術的範疇，自然的因素；同時，該書的六分之五以上的篇幅都耗費在說明中國農業經營的各種自然條件（土壤，氣候，雨量等等）上面，而對於生產諸關係和階級構成的本質，幾乎沒有說到，這不是把社會經濟的分析和技術的生產方法的說明弄混同了是什麼呢？因此，馬扎亞爾也好，Wittfogel也好，他們總難免被人加上「地理的唯物論者」的尊敬。

第二，土地國有是否可能構成爲特殊的社會組織「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徵，却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其次，他們主張在中國古代沒有土地私有的現象。這種見解是否合乎實際，還是一個問題。

第三，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存在時代如何？它存在於前階級社會嗎？或在階級社會？關於這點，我們從馬扎亞爾和Wittfogel諸人沒有發見一些明白的主張。以馬扎亞爾來說，最初他認爲歐洲資本主義侵入中國時遇着的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但因此種主張接近托派的見解，經「封建派」的圍攻，遂於1931年的第二版加以修正而强調封建殘餘的意義。其次，以Wittfogel來說，他把中國的歷史塗成「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靑一色，因而鑄成所謂「社會平原說」的大錯。

第四，「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發展法則如何？它轉化成長爲什麼社會？關於這些重要問題，他們也沒有替我們解答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陷。*

---

* 馬扎亞爾和 Wittfogel 等等的見解雖有不正確之處，但以不諳漢文的外國人而能蒐集非常之多的豐富的資料，站在新興經濟學的立場，探究我國的社會經濟，這點是非常令人欽佩的。我們在自愧之餘，還須加倍努力，務期中國的社會史研究，不要也讓外國人完全包辦，在這方面也陷於「殖民地」的狀態。

第三節　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各種見解

『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學說，一因新奇動人，一因該學說會提供許多寶貴的値得研究的見解，故在蘇聯，日本等處都引起了激烈的理論鬬爭。論爭的結果，可分爲三種不同的派系。

第一派是主張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也就是原始共產社會，氏族社會，前階級社會，乃至農村公社。這一派的著名學者，在日本爲森谷克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著者），石濱知行，佐久達雄等等，在我國則爲郭沫若氏。

第二派則主張『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古代奴隸制社會乃至它的變形，例如蘇聯的著名學者萊哈特（V. Reihardt）的研究結論說：『我們認爲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特殊性是奴隸制生產方式之獨特的變異乃至奴隸制社會的未發達的形態；同時，我們排斥想把這個生產方式當作特殊的構成的基礎來解釋的一切企圖。』（日譯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一三〇頁，）

日本的論壇健將，著名的經濟學者猪俁津南雄，也和萊哈特有類似的見解，而認爲『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以奴隸勞動爲其特徵。（猪俁氏著農村問題入門一〇八頁以下。）此外，蘇聯的約爾克和日本的羽仁五郎都屬於這派。

第三派則主張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也就是封建主義或變相的封建的生產方式。這種見解，表現在列寧格勒的馬克斯主義者東洋學者協會所舉行的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討論上(1931年)M古德士批評馬扎亞爾等所提出的報告上。古德士認爲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不外乎是封建主義。（早川二郎編譯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四五頁）其次，布里古金也說：『東洋的專制國家，是農奴制國家。因爲「立於高度的發展階段」即在階級社會的階段上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不外乎是在東洋的封建主義之一變種。』（永住道雄譯社會構成論，一四三頁）其次，柯瓦列夫的意見，也和布里古金的沒有多大的差別，而且他們都從農村公社的長期存續來說明封建制在東洋的「變種」或「變形。」這種見解，在研究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說明

上最佔優勢幾成一般的支配的主張。屬於這派的著名學者在日本有早川二郎，秋澤修二等等；在中國，據個人所知道的，則為社會發展綱史的著者。*

第四節　我們的見解

第一，本來，在1849年的工資勞動和資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的第五章卡爾提出唯物史觀的公式時會說：『古代的社會，封建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劃分人類歷史上的發達底特定的發展階段。』在這裏，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是三個階段：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三個繼起的社會經濟形態。但在十年後，即在1859年出版的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上，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上已經多了一個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而變為：（一）亞細亞的，（二）古代的，（三）封建的，（四）資本主義的四種生產方式。（參看本章第一節）那麼，這裏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什麼呢？

* 『「亞細亞生產方法」在其本質上，與封建的生產方法，並沒有根本的區別。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亞細亞諸國農個特殊經濟條件。即是說，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就是附加幾個特殊經濟條件的封建的生產方法。

所謂特殊的經濟條件，就亞細亞諸國說來，有下述幾種：第一，對於土地的統治權，集中於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國王之手。第二，關於農業方面的水利灌漑等社會的事業，是由國家組織的。第三，土地所有者的國家，干涉人民的經濟生活。第四，土地所有者的國家，是土地所有者的獨裁國家。以上這些條件，都是亞細亞的特殊經濟條件。這些條件，明明是與封建社會及封建國家相關聯的。但就基本的生產關係說來，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只是封建的生產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產方法之變種。因而主張「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與封建的生產方法根然不同的生產方法的異論，實是一種錯誤的見解。』社會發展綱史——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三二——三三頁。此書沒有著者姓名也沒有發行印刷所的名字，是一本『身世不明』的小冊子。

我們認爲卡爾在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上論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時是考慮到原始社會的，就是說，批判上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和原始共產社會的生產方式，具有相同的內容，因爲在經濟學批判出版前六年的1853年，卡爾早已發表了他關於原始共產制之深邃的研究。*他之稱爲「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因爲原始共產社會的各種特徵，在當時農村公社的遺跡較多，經濟發達落後的亞細亞各國，相對的說來，還保存得相當多的原故。

跟隨原始社會之科學的研究的進展，尤其是在1877年 Morgan 發表他那名著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以來，證實了原始社會的各種特徵，在東洋以外的其他國家也可能看出，農村公社的存在，決不限於在亞細亞諸國。因而那種生產方式，喪失了純粹的亞細亞的特殊性。故在1884年出版的 Engels 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上，前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已經不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卻是一般的氏族制度。就是說，經濟學批判序言上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實際上是和前階級社會的氏族制度的內容完全一致。因而我們把批判上所說明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解作原始共產社會的生產方式，而贊同上述的第一派的見解。不然，我們便不能說明爲什麼「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市民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構造上的繼起的或前進的階段(Prog

* 1853年六月二十五日New-York Tribune 新聞上載有卡爾的論文英吉利在印度的支配（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其中有一段說：「把原始發生的公有制形態認爲是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或認爲完全是俄國的形態，是在近時流行的一種可笑的偏見，這個形態，我們在羅馬人，日爾曼人，克爾特人之間，也可證明其存在。加之，關於這個形態，——縱然一部分的遺跡也好，——它那各種各樣的模型的樣範圖，在今日的印度人之間還存在着。假使更細心研究亞細亞的，尤其是印度的各種公有形態，可以明白從原始發生的各種公有形態，產生出這制度解消出來的（或在解消過程中所顯現的）種種形態。例如羅馬及日爾曼私有財產制的種種不同的原有典型，是從印度的公有制的種種形態派生的，這是可能知道的。」（此文早已編入卡爾的中國印度論（Über China und Indien）中。）

ressive Epochen）。假如不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解作前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而認為是在亞細亞諸國的奴隸制的「變形」或解作變相的封建制度，那麼，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根本是和古代的或封建的生產方式相並立，則卡爾所說的「繼起的（或前進的）階段」（Progressive Epochen）這句話，便不會是正確的說法，因而唯物史觀的公式，也非加以「修正」不可。但是，必須修正的，不是卡爾的見解，卻是一些沒有細心研究經濟學批判上那段文章的論者。

總之，我們認為經濟學批判上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實際上就是和原始共產社會的內容完全一致的。假使不這樣解釋，那麼我們就不能解答這些問題：（一）為什麼在 Morgan 這些人的著作出版後卡爾也好，Engels 也好，都沒有把他們的見解加以修正呢？（二）為什麼伊里奇在何謂人民之友上引用經濟學批判序言上那段文章的時候也好或在 Karl Marx 傳上論及史的唯物論的時候也好，都一字不改地引用那段文章呢？從這點就可能充分證明經濟學批判序言上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實際上便意味着氏族制度或原始共產社會。

* 經濟學批判上所舉出的那四個社會發展階段，是和當時歷史學的發達水準相照應的。故在馬恩合著的1848年宣言上第一章第一句是：「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過了一些年代，Engels 特別加上了一個註釋說「……在1847年關於社會的前史（Pre-History），即關於一切有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差不多是完全不明白的。……」在原始社會的研究尚未發達的階段也好，卡爾在1859年指出『原始發生的公有制形態』之普遍的存在（見註1）並在1859年的經濟學批判上，在古代的生產方式前面，加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作為代表原始共產制的假說，這種見解確是一種天才的先見。Haxthausen, Maurer, Morgan 以及 Engels 關於各地的原始共產制的發見和研究，一方面證明了卡爾的先見之明；另一方面，又使 Engels 用氏族制度社會的名稱來代替了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因此之故，在伊里奇的文獻上也好，新興經濟學在劃分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時，都分為這樣的四個階段：（一）原始共產社會（即氏族社會，或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二）古代奴隸社會，（三）中世封建社會，（四）近代資本制社會。

第二假使我們不先抱定某些先入觀念來解決問題，那麼我們就應該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解作從經濟過程看來的一個社會體系；而且它還是「古代的生產樣式」成立以前普遍存在的一種生產方式，因此，很顯明的，我們不能把它解作某種生產方式之東洋的變形或變相。其次，所謂「古代的生產方式，」實是以奴隸勞動爲基礎的社會的生產組織；而且奴隸制的成立，意味着人類社會最初的階級分裂，剝削奴隸也就是剝削關係的最初的形態。（參看第三章）這樣，在系統上和「古代的生產方式」不同，而且當作更早更低度的一個社會體系所舉出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明明白白的，決不是指以奴隸勞動爲基礎的生產組織，而且也不是有階級對立內在的社會的生產機構。關於這幾點，許多人差不多沒有考慮到。他們的共通的先入觀念，是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認爲祇是限於亞細亞或東洋各國才存在的社會的生產機構，拘泥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之地域的解釋，而忽視了它的歷史性（它成立於古代的生產方式以前）和社會性，（它是在階級分裂以前的前階級社會。）

其次，退後一步，我們姑且承認：馬扎亞爾等所主張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若就他們所指摘的種種特徵而言，是在說明它不過是封建主義（或奴隸制）在亞細亞各國所表現出的一種變態。但是變態的封建制（或奴隸制）也好，典型的封建制（或奴隸制）也好，只要它的基本的生產關係和生產方法仍舊是封建的（或奴隸制的，）那麼我們就不能以封建制（或奴隸制）以外的範疇去包容它；就是說，我們仍舊要說它是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才行。這樣，我們決不能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當作四大社會經濟形態（原始，古代，封建，資本制社會）以外的獨立的別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假使把變相的封建的（或古代的）生產方式解作「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那麼第一就會使人易於誤解經濟學批判序言上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真義；第二，那就等於在上述四大社會經濟形態以外又添加上一個獨立的別一種社會經濟形態，這不外曲解，便是「修正。」

著者按：「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近年來「聚訟紛紜」的一個主要論題，各國學者見仁見智，曾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本章一因限於篇幅，二因著者從虎口中逃出後經濟史的尤其是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問題的主要文獻都遺留在日本不能帶回，這一方面，毀滅了著

者多年蒐集文獻的努力的果實；一方面參考書的缺乏迫使本章的論述只能依據我平時的研究筆記來寫出，本章以不大詳盡的姿態出現在讀者之前；一方面想「拋磚引玉」同時也想作讀者的一種參考資料。

本章主要參考書

K. Marx: 經濟學批判序言。

Madjar: 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K. A. Wittfogel: Gesellschaft and Wirtschaft Chinas.

柯金巴已編合著井田。

列寧格勒東洋學者協會編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

萊哈特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

布里古金社會構成論

森谷克巳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

社會發展簡史（沒有著者名與出版所名的）

（其他許多短論文不便列舉。）

第二篇 各論·各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本篇前言

我們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上已經說過：歷史是繼續不斷的社會發展過程。現在，是過去發展來的到達點；同時，它還包含着發展到將來的萌芽。因此，在歷史發展的任何階段，過去的遺跡和將來的萌芽，總是同時並存的。我們既沒有經驗過純粹的奴隸制度或封建制度；同時，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發現純粹的資本主義。

「清一色」的純粹的社會經濟形態，是決沒有的。「同一的——就主要的經濟條件說是同一的——經濟基礎，仍可由無數種互相不同的經驗上的事情例如自然條件種族條件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差別來。」（資本論，第三卷下冊，德文本三二五頁，中譯六七六頁）

這樣，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就大體上說雖是同一的；而且「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澈底的作用」（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原著者序文）但因「無數種互相不同的經驗上的事情，」資本主義在各國的發展，總要「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差別，」而形成為各國資本主義的特殊發展及其種種不同的特徵。例如：

（一）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示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自然史的一個過程」（同上序文）顯示出資本主義之典型的自生的發展形態，因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政策，政治上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意識形態（Ideologie）上的自由主義在英國都有過較高的典型的發展；

（二）產業革命的緩慢和不澈底，大機械工場生產和農業資本主義的落後，及與此相照應的獨立小生產者（中小工業者和小農民）和食利者（Rentner）階層的顯著的社會經濟地位，顯示出法國資本主義的特殊發展：

（三）在國家權力的卵翼下哺育了起來的德國資本主義，既沒有經過英國資本主義那樣的順利的原始蓄積過程，又沒有經驗過法國資本主義那樣的比較徹底的布爾喬亞革命，致使農奴制一度崩潰之後又出現了農奴制的「第二版，」顯示出 Junker 經濟的支配。其次較之英法資本主義先進國，獨佔資本主義的早熟，亦不失爲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徵；

（四）獨立戰爭後由英國的殖民地經濟解脫出來的美國資本主義，是在優良的地理環境裏，差不多沒有遇着封建制度的種種阻礙，相當順利而迅速地發展起來的。豐富的資源，廣大的國內市場，刺激着不受傳統和因習的束縛，而勞動力相當缺乏的美國農工業的大規模機械生產化和合理化。

農工業生產的高度機械化及其經營規模的迅速擴大，生產和資本的高度集中，促使美國的獨佔資本主義早熟，跟德國資本主義一樣，變爲集中和獨佔的先驅者；

（五）時代落後的產業革命，布爾喬亞的脆弱，大量的封建殘滓，及其在國民經濟上所發揮的顯著作用，從而在國際鬥爭場上用軍事力來補充代替經濟的鬥爭能力：這些因素，使沙俄和日本的資本主義，帶着軍事的半封建的基本特徵。

由於同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所發生的這些「變異和差別，」是資本主義在各國發展的具體的現實的內容。好像我們必須分析把握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法則一樣，我們也不能不分析這個法則，在各國互相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下，顯示出這樣的「變異和差別，」及其基本原因何在。要這樣，我們才可能使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法則，不會變爲沒有具體內容的空虛的抽象；要這樣，我們才可能了解主要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成長發展摩擦鬥爭以及當前的種種歷史事變。因此，各國——英，法，德，美，俄，日——資本主義的發展情形如何？及其特徵（「變異和差別」）何在？不能不是本書第二篇的主題。在下面，我們按照：英，法，德，美，俄，日的順序，論述這六國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史實。

第七章　英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第一節　產業革命前的英國經濟

第一項　農業

直到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的人口，共約有八百五十萬人，人口的大部分從事農業，而且在土地肥沃的東南部，人口較爲稠密。農業的生產，是很原始的。農產物的大部分，被農民本身所消費。加以交通不便，各村落差不多都處於孤立狀態。土地屬於領主（Lord），地主（Squire）及自由農民（Free Holder）的所有。比較富裕的農民，則稱爲 Yeoman。其他是終身的或永代的借地人，（Copy Holder）——他們是舊農奴的子孫，對地主負有種種義務。土地所有者中最低的一層是 Cottager，或稱爲日傭農夫，他們只有自己的小屋周圍的一些狹小地面，必須到地主那裏去勞動。此外，寺院，王侯等等，也有甚大的土地。

農村中到處保存着舊式農業形態，通常採用三圃農業制（Three Field System）把耕田三等分，每年以一耕地作爲休耕地，其他二耕地則輪流栽種夏禾與秋禾。）地主和農民包含在一定的農村公社。地主的土地，普通不是連在一塊的地面，却常常細分，介於農民的土地之間。因爲土地所有交錯混雜的原故，一切的經營者必須用一樣的方法來耕種，而且必須保守着農業工作的分配期間的一定不變。（強制耕作制，）收穫完了後，各人即將其所有地之間的境界撤除，大家在那裏放牧，這就是所謂「開放田制」（Open Field）供一般所有者的使用。

在當時，農具也是很幼稚粗笨的。英國各地所使用的犂，與羅馬時代的犂沒有多大的差別，仍是極原始的工具。

第二項 工商業

商業和工業則集中在都市。所謂都市，也是人口不多的小市鎮。例如在十七世紀末葉，Liverpool, Bermingham, Shefield 各有人口四千，Manchester 也只有六千人。

在各個都市裏，有團結組織於强有力的基爾特（Gild 或行會）的手工業。政府和基爾特制定規約，規定一切的生產階段，製品的數量，材料的色彩和大小，手工場內工作者的人數，師傅（master 或稱老板）工匠（Journey Man）和徒弟（Apprentice）的關係。同時還統制交換，決定商品的輸出標準和數量。但是，跟隨商品＝貨幣經濟的發達，市場的擴大，基爾特（行會）漸次不能統制生產和交換。基爾特外部的企業開始發生。在基爾特勢力範圍外的環境，即在農村，家內手工業發達了起來。這種工業的發達，大半是因為沒有土地的農民想追求副業的工資收入的原故。農村家內工業遍及英國各地：一部分製造金屬器具，大部份則紡績毛線，製造毛織物。家內工業者的生活狀況，因為在極不健康的狀態下，在自己的小屋裏整日勞作，是非常悲慘的（故名「汗血制度」Sweating-system）。十八世紀後半期，毛織物工業的狀態，即其一例。這個產業，完全是家內工業，其各種部門，散佈在國中。製造人最初乘馬旅行，在農家和大市場收買自己的原料。買來的羊毛分配給羊毛分類者，分類者嚴格決定羊毛的必要的長短，不能用於毛織工業的短羊毛，則或無顧慮地用剪刀或飽刀切斷。長羊毛則交給梳刷羊毛者，梳好後很注意地包裝起來，載上馬背，送到鄉間去紡績。

一切的村落，有製造者的代表，他們接受羊毛，分給農民，而且又收集紡好了的製品。在夏天，我們可以看見在各村落的草地上有工作着的婦女。製造者把自己拿出去的東西完全收回時，他又忙着找織匠。最後，織匠把以後要賣給商人，或交與染房的織物交給製造者。

在十八世紀，發非在生產上漸次起着重要的作用。牠把原料和工具收入己手，牠有許多附屬於自己的工作者，變成了大工業企

業的主人。但是，企業各部分的分散，以及家內工業者在家庭工作的期間較長，都對於發展不利。這樣就把家內勞動者集合在一個工作場，使他們從事生產，因而發生了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

工場手工業較之家內工業制度實爲優越，因爲它有技術的分工，和可能監督勞動者，而顯著地提高了勞動的生產力。例如工場手工業時代英國的著名經濟學者 Adam Smith 在其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上所舉的縫針的例。孤立的家內勞動者一天至多只能做縫針二十根，但在基於分工的工場手工業，十個勞動者每日即能做四萬九千根針，即平均一人一日能做四千八百根針。這樣，工場手工業加快了，增大了商品的生產，造成了機械生產出現的種種條件。互相接聯的，簡易化了的，精細的分工，促進了機械制大生產的出現。

工場手工業，使生產力急激膨脹，生產額激增；大量商品的投放於市場，促進了國內商業的發展，更刺戟着對國外市場的商品輸出。

第二節 原始的蓄積過程

第一項 資本的原始蓄積

（A）海外貿易的大發展

英國的海外貿易，以前多爲外國人所包辦，但自十四，十五世紀以來，就已在漸次脫離被動的地位，而國內商人，也開始積極的自營輸出貿易了。

近世初頭，英國的輸出商品中，毛織物的大半及其他貨物的三分之二，概係英國船舶所運送的。外國商人，特別是漢撒商人的特

護，已於1597年廢止，同時英國的冒險商人也被禁止進入德意志各港，同年，英國爲報復起見，宣佈漢撒商人的倫敦居留地完全撤消了。

從十五世紀末期起，是一個地理上的大發見時代。英國也受其影響，抱有向世界發展的野心的冒險家，也日漸增加。他們得了國王的保護和勅許，以經營海外貿易爲目的的外國貿易公司，就在這個時候開始設立。

* 「本來，在英國，商業的發生，可溯及於羅馬佔領的時候，高盧商人曾專爲營業而到過英國的南部。自丹麥民族入寇以來，已入於衰頹再興的機運，英國商人，曾到過對岸的法國諸港埠從事通交易，在諾曼征服之後，和法國尤其和佛蘭克地方的交通，更加頻繁。不過在交易上佔勢力的，迄十四世紀之前，還是外來商人，其中如漢撒，佛蘭德，意大利等處的商人，是其最著的。他們起初在交易上還受着種種的限制，因而交易的數量和利益都不很顯著，然到十四世紀的中葉，因得國王政府（愛德華三世）的好遇，所受的束縛已完全被解放，於是大批地輸出了羊毛，皮革，錫等的商品。……佛蘭德商人將其本國製的優良毛織品的原料羊毛，運到倫敦，組同盟（Flemish Hans of London）而營交易。意大利人，其中如佛羅稜斯（Florence）商人，在金融業上尤佔勢力，自1290年猶太人被英國逐放之後，他們便乘其乏，由常常貸款於唯一借主的王室及政府，也[illegible]得了不少的利益。倫敦金融中心（Lombard Street）的名稱，也出於此。然入十四，十五世紀以來，由國人直接經營輸出入交易的，也逐漸發展，於是羊毛的交易，遂脫外商之手而獨立了。

英國人直接貿易首先成功的，是1313年獲得了最初特許的重要輸出品（錫，羊毛，鉛等）的經理商（Merchant Staplers），他們獲得政府的援助之後，選定國內九港爲輸出港，定尼德蘭（Nether Land）的數港爲輸入港，而成功了有系統的交易。其次，便是代此而起的冒險商人組合（Merchant Adventurers），於1391年才獲得特許，主要的是經理自國產的毛織物，一方含着統制性，同時又承繼各會員的自由性，往佛蘭德，德意志，斯堪的那維亞（Scandinavia）等處去販賣，爲要對抗漢撒同盟的都市及商人，這是必然的行動，果然，不久也使得漢撒商人逐漸衰退，終於使他們從倫敦撤退了。」（東晉太郎著：歐洲經濟史概論第七二——七三頁）

這一類公司中最主要的，便是在1577年因與西班牙葡萄牙經營貿易而設立的西班牙公司（The Spanish Company）；又1579年爲對於波羅的海沿岸經營貿易而設立的東陸公司（The Eastland Company）；又1581年爲對於土耳其，敍利亞，小亞細亞等經營貿易而設立的雷望公司（或稱土耳其公司 The Levant Company or The Turkey Company）等。

到十八世紀的初期爲止，英國商人在海外貿易所活動的範圍，不但能夠達到全歐洲的大陸，並且又擴大到遠東，以及非洲大陸；一方面政府又竭力加以援助，如實行殖民地政策或實施航海條例，去發揮牠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精神。結果，使得英國對外貿易，得到非常的進步。下面的數字即其例證之一。

	輸出	輸入
1613年	2,487,435鎊	2,141,151鎊
1700年	6,477,402	5,970,175
1750年	12,699,680	7,772,039
1774年	15,916,343	1,327,599

（參看塌經夫著英國社會經濟史中譯七一——七七頁）

據此可知：英國從海外貿易獲得了怎樣多的利益。單以哈得孫公司（The Hudson's Bay Company）來說，在1670年獲得了特許，開始創立，當時的資本僅有一萬五百鎊，到了1720年，其全部財產即增至九萬四千五百鎊，在幾十年間該公司財產增加了九倍，而且其間還分配了許多紅利給各股東，甚至一般稱該公司的利潤竟達二十倍以上。至於壟斷印度的先鋒的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牠曾獲得了怎樣多的暴利，已是一般周知的事實。

英國海外貿易的大發展，不祇是替牠開始了市場，而且還替牠蓄積了龐鉅的貨幣資本。

（B）掠奪殖民地

英國的眞正的海外發展，直到 Elizabeth 朝才開始。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她開始想向東印度發展殖民。最初她想染指於 Walucca, Sanda 等等香料島，想奪取這種貿易，但被捷足先登的荷蘭人所排擠而無從發展。到了1620年，她才設商館於遠東和南洋各地，漸次圖謀發展，其事業則爲東印度公司所獨佔。公司擁有行政、軍事的權限，在交易上則以輸入洋布，生絲，茶，香料等等爲目的。由於買賣價格之間的極大的差別，公司獲得了極大的商業利潤。*

到了1750年前後，英法二國勢力發生直接衝突，法國失敗後，英國從南印度的 Carnetic 驅逐了法人，接着又掌握了 Bengu 一帶地方，同時，還從 Monghol 皇帝接受了徵稅事務。

英國人除了掠奪印度，南洋方面的殖民地，大發其財，還在北美猛烈進行掠奪殖民地富源的工作。

「英人向北美的殖民運動，是在十六世紀末葉，這是歐洲人殖民北美的最後的一起。與原住民印第安（Indian）鬥爭，以及富

---

* 「誰都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擁有東印度政治的支配權外，還對於茶貿易，對於中國一般貿易，對於印度與歐洲的貨物輸送點，擁有絕對的獨佔權。但印度沿海貿易，諸島嶼間的沿海貿易，以及印度內地貿易，都是歸該公司的高級吏員們所獨佔。鴉片，棉花及其他商品的獨佔，簡直是富的無盡藏。東印度公司吏員們，自定價格，任意掠劫不幸的印度人。印度總督也參與這種私人買賣。爲他所優遇的人們，都在比鍊金術還巧妙的從生今的條件下，承受包攬契約。大資產像菌類般地一夜就生起來，原始蓄積的進行，不用墊支一個銅板。……由1757年到1766年，東印度公司及其吏員們，從印度人那裏得到了六百萬鎊的實物！由1769年到1770年，英國人竟由囤聚全部米穀以非分價格再賣的方法，在印度造出一次飢饉。」「單是阿里沙一個地方，就有一百萬以上的印度人餓死了。」（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一七——七一八頁，中譯六四二——六四三頁。）

溫風土病，食料缺乏等困難之後，遂在東部南方海岸先成功以 Virginia 為中心的殖民地，至十七世紀前半，曾夢想移住於東部北方海岸 Massachusetts 地方，隨於中央海岸驅走了先入的荷蘭人，奪取了紐約後，便開始定住了。由於土地及氣候的性質，在北方是小規模的自耕農業，在南方，是由貴族經營的菸草，米，藍等多種的栽培式農業，且兼營畜牧。為要填補勞動不足的缺陷起見，則有依據年期契約之大規模的勞動移入與由非洲輸入的黑奴。特別是後者，從十八世紀初頭以來，輸入極為盛行，多的時候則年逾四萬人以上，至1790年奴隸數計已達七十六萬（主要是在南部。）」（東著歐洲經濟通史，中譯一六三——一六四頁）

這樣，掠奪殖民地的「殖民制度，像溫室般地使貿易與航海業成長。「獨佔公司」（路德）是資本累積的強有力的槓桿。殖民地對於當時在萌長中的製造業（Manufaktur），提供市場，更依市場的獨佔，引起加強的蓄積。在歐洲外部直接由劫掠，奴隸化，殺戮等手段所蓄積的財寶，都流到母國，轉化為資本。」（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一八——七一九頁，中譯六四三頁）這些事實，都逼使有名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 W. Sombart 也不能不承認：原始蓄積時代的殖民地掠奪，替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築了基礎。（詳細說明，可參照第五章第二節第一項的（B）段。）

（C）奴隸貿易

奴隸貿易，也是英國資本原始蓄積之主要源泉之一。奴隸貿易，可能獲得非常之多的利潤，因而英國政府在十八世紀初葉戰勝法國後，就把買賣黑奴的獨佔權，交給英國商人。這個權利，在以前是屬於西班牙人，荷蘭人，法國人的。例如：英國的「利物浦市就是以奴隸貿易為基礎，進於繁榮的。奴隸貿易就是它的原始蓄積方法。那怕在今日，利物浦的「體面」，還存在讚揚奴隸貿易的抒情詩人身上。那種貿易——參照已經引述過的亞金（1795年）的著述——「和同市商業所賴以急速達於現在這種繁榮狀態的冒險精神相一致，都會對於航海業與海員，給與莫大的工作機會，且大大增進了英國製造品的需要。」利物浦使用在奴隸貿易上的船舶，17

20年爲十五艘，1751年爲五十三艘，1760年爲七十四艘，1770年爲九十六艘，1792年爲一百三十二艘。」（資本論第一卷譯文本七三五頁中譯六四八——六四九頁）關於奴隸貿易，W. Sombart 在其著書"Der Moderne Kapitalismus"的第一卷上說「當整個十八世紀——即在最重要的時期中——大不列顛毫無疑義地站在奴隸貿易的中心點，在不列顛本國內，利物浦（Liverpool）又是一個中心點，當1771年英國有192艘販賣奴隸的船，計利物浦107艘，倫敦58艘，布里斯它爾23艘，蘭加斯德（Lancaste）4艘。」（季子譯本第一卷第二分冊五六四頁）從事奴隸貿易的英國商人獲得了怎樣多的利益呢？W. Sombart 告訴我們說「利物浦人從1783年至1793年所販賣的奴隸達303,737人。他們在這種商業中共賺得15,186,850鎊，所以每個奴隸販賣商人在這十年中平均約獲得3,000,000馬克的財富。

但當奴隸貿易宣佈爲海上行劫罪變成私運商業時，此項貿易才獲非常的利益。

我們從英國奴隸貿易史中獲得這個時期正式機關的費用計算如下。依照合法的確證，商號船（Firm）（1838年）所獲的總收入爲145000鎊，舉凡購買口糧，火藥，工資等等的總支出達52000鎊，所以利益爲180%。維那號船（Venus）裝運850個奴隸，計買價3400鎊，送到目的地港口的費用2500鎊，而出賣的價額達42500鎊的非常高度。像這樣的例子爲我們所知道的總以數十計。」（同上五六七頁）

這些事實，都替我們說明了奴隸貿易在英國資本的原始蓄積過程上，曾起着極大的作用。

（D）公債賦稅和保護制度

其次，「公債爲原始蓄積之最有力的槓桿之一。它如像揮動魔杖，使不孕的貨幣有生殖力，把它轉化爲資本。由是，產業投資甚或高利貸業所不可避免的困難與危險，貨幣都不用親自負担了。國債的債權者，實際並不會拿出什麼，因爲他所貸與的金額，轉化爲容

易移轉的公債券了，這種公債券在他的手中和同額硬幣有相同的作用。由是產生了一個無所事事的食利者（Rentner）階級；由是，在政府與國民間盡着媒介機能的金融業者獲得了速成的富；由是賦稅包徵人，商人，私人製造業者，將以國債的一大部分當作從天而降的資本來利用。……

國債發生時，國際信用制度也成立了。那種信用制度，往往成為這國或那國的原始蓄積的一個源泉。……

公債及與公債相照應的國家財政制度，在財富之資本化及民衆的剝奪上，演了重大的角色，就因此故，如柯伯特（Cobbett）達布爾德（Doubleday）等著作者，都誤以近世民衆窮乏的根本原因是在這裏。

保護制度實不外一種人為的手段，藉着這種手段，製造業被製造出來了，獨立勞動者被剝奪了，國民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被資本化了，由古代生產方法向近世生產方法的行程，被強制地縮短了。……

殖民制度，國債，過重的賦稅，保護制度，商業戰爭等等都是真正的製造業時代的兒童，這些兒童，到大工業的幼年期，都有巨大的成長。大工業的誕生，是由大規模的兒童掠奪來慶祝的。英國的工廠，和英國的海軍一樣，是由強募手段招集新兵。」（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二〇——七二二頁，中譯六四四——六四七頁。）

··

這樣，根據以上的說明，這誠如資本論上所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沒於鑛坑內部；對印度的征服與劫掠之開始，非洲被轉化為商業的黑人獵奪場，這等等事實，都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牧歌的過程，就是原始蓄積的主要要素。……其在英國，此等要素，已在十七世紀末葉，依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世賦稅制度與保護制度，達成一體系的綜合。在這些方法中，一部分得使用極凶暴的彈力，如殖民制度就是如此。但它們全部都要利用國家的權力，利用集中了組織了的社會力，並像溫室般的，助長封建生產方法向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轉化過程，並縮短其過渡的推移。」（資本論，同上，七一六頁，中譯

六四一頁）產業革命之所以先發生於英國，而且英國資本主義之可能有典型的自生的發展，就是因爲在原始蓄積過程上，英國資本是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上的緣故。

第二項　工資勞動者的來源

（A）農民土地的剝奪

「英格蘭的農奴制，事實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消滅了。在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英國人口的最大多數，皆爲自由的自耕農（Bauer）……

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附以基礎的革命的前奏曲，係開演於十五世紀最後三十餘年及十六世紀最初十數年，」（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六八二——六八三頁，中譯六一〇——六一一頁。）佛蘭德羊毛製造業的勃興，及與此相伴的羊毛價格的騰貴，直接刺戟着大封建領主，以強暴的手段，使自耕農由土地上遭受驅逐，並掠奪去他們的公共土地，把這些土地轉化爲牧羊場，結果就產生了無從比較的更多數的勞動者。倍根在亨利七世傳中說：「在當時（1489年），圈地更加習見了，前此非有多數人及其家族即不能施肥的耕地，都轉化爲使用三數牧人即容易監視的牧場了；前此爲許多小農民（Yeomen）生活基礎的有期租地，終身租地及任意租地都轉化爲領主的所有地了。其結果，人民頹廢，由是，都市，教會，什一稅等等，都不免於頹廢……許多租地與大畜羣，特別是大羊羣，都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了，由是，地租昂騰，耕地減縮，教堂與房屋折毀，可驚的多數人，都被奪去了維持自身及一家的手段。」（同上，六八四——六八五頁，中譯六一二頁）就是因爲這個緣故，1533年的法令，甚至於慨嘆着有若干地主擁有二萬四千匹羊，而不能不規定羊的所有，不得超過二千匹以上。

這樣，大地主剝奪了農民的土地，轉向牧畜經營，因而羊的匹數激增，農民激減，而發生所謂「羊吃人」的怪事。

「然人民的怨謗，乃至亨利七世後繼續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的禁止剝奪小租地農自耕農的立法都同樣沒有效果。」（同上，六八五頁，中譯六一二——六一三頁。）

這種剝奪農民土地的方法，普通稱為 Enclosure（圍地），這使大地主以强暴的手段，把Copyholder 和 Cottager 從耕地上掃蕩出來，實行所謂「農業革命。」**

---

* Thomas在其著書 More 上說：「羊變為非常貪食的了，牠反抗人們，以人們為食物。王公貴族把家宅村落從地上驅逐了出來，剩下的只是寺院，而寺院裏也有羊圈。」

** 「從十五世紀末葉起，由於對岸佛蘭德地方的毛織物之繁盛，於是對原料羊毛的需要極盛，其收益也遠勝於耕作。這由牧羊需要勞動者較少，羊毛的搬運，亦輕而易舉，正適於資本的經營之故。因此，羊的飼養，遂急速的勃興，所有領主，大佃戶等都開始圍地了。圍地，整整約百有年，由此國的東北到西南，已達五十萬英畝，因而失去生活之術的貧農極多，政府雖亦屢屢公佈限制，禁止的命令，民間論者雖亦作激烈的反對宣傳，但終歸無效。尤其在這當中，基於經濟情形的變化，使反對牠的方策也概歸無用，於1624年竟撤回了禁止法。惟在十七世紀，圍地雖曾繼續行過好幾次，當是和平溫和的事業相關聯而行的。

「十八世紀，尤其到了中葉以後，因種種情形又開始了激烈的圍地。這由技術的進步，更能有利的使用圍地的土地之故。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農業，可稱為歐洲的模範，如休耕地之廢止，土質之改良，新種作物之增加，農業機械之應用等等，都成了生產力增加的前提。可是這時候，人口也有急激的增加（從1750年的六百五十萬增到1800年的九百萬），交通也大加便宜，尤其和法國一開始戰爭（1793年），對食糧的需要遂益增，由是，農產物特別是穀物的價格，遂暴騰起來，……於是以前為牧羊而圍地的，茲則主要的為農產物而圍地了，以前圍地曾遇着朝野人士的反對，茲則當在受獎勵了。為使這件事容易推行起見，議會曾公佈一「私事條例」（Private Act），只要圍地人對於指定的地出五分之四的價格，就可强制的圍地了。」（東晉太郎著歐洲經濟通史，中譯一六八——一六九頁）

但是，關於Freeholder和農民（所有者，）則事情比較複雜。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英國議會，爲要援助地主，實行「土地改革，」規定；只要圈地法(Enclosure Act——這只須有關係的地主的四分之一署名卽可圈地的法案）通過議會，就可能圈地。因此，在議會通過了許多實行圈地的法案。從1700年到1760年議會通過了圈地八十一萬二千英畝以上的二百零八件法案；從 760年到1810年公布了二千個法案，再從1801年到1831年因此而圈地三百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英畝以上的土地。所以，「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示在這個事實上。卽法律自身也變爲共有地盜掠的工具——雖然大租地企業者，同時還不斷利用獨立的私人的小方法，來從事盜掠。這種盜掠的議會的形態，就是「共有地圍圈法」(Bill for Inclosures of Commons)。這種法律使共有地化爲地主私有，使人民被剝奪。」（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六九〇頁，中譯六一七——六一八頁。）

圈地的結果，「概言之，下層人民的地位，無論在那方面，都趨惡化了。他們由小自耕農，小租地農的地位，轉落爲日傭勞動者(Taglöhern)或傭工的地位。在這種狀態下，他們的生活，是比以前更困難了。」（同上，六九二頁，中譯六一九——六二〇頁。）

「由1801年至1831年間，地主由農民手中盜掠的共有地，卽由議會贈與他們的那3,511,770英畝共有地，曾對農民給與一個銅板的代價麼？」（同上，德文本六九四頁，中譯六二一頁。）

「最後對農民施行的大規模的土地剝奪，是被稱爲所有地掃除(Clearing of Estates)，那其實是把人從所有地掃除。以上考察過的英國的一切方法，到這種「掃除，」才達於頂點。」（同上，）這就是毫無慈悲的掃蕩村落，把人民大衆掃除出來，强奪他們的土地而據爲私有。（參照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的(B)段）

這樣，「奪取寺產，欺詐讓渡國有地，盜掠共有地，掠奪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無所顧慮的恐怖主義下，轉化爲近代私有財產，這種種，都是原始蓄積的牧歌的方法。這些方法，給資本主義農業以活動的領域，使土地併合於資本，同時幷爲都市的產業，造出被追放的無產者的必要供給。」（同上，德文本六九九頁，中譯六二五頁）

猛烈的，大規模的剝奪農民土地的結果，廣大的土地，轉變為大地主的所有，而且這些土地，租給了擁有鉅額資本，適於合理的農業經營的資本家。這些鉅額資本的所有者，大半是由投機，海外貿易，掠奪殖民地而蓄積財富的商人；同時，他們是新農業的担當者，農業集約化的主張者，廐內畜產業的經營者，以品種優良聞名於世的英國家畜業的先驅者。

喪失了財產，淪落為無產者的農民，大部分跑到都市，變為工資勞動者。這跟資本之鉅額蓄積原料的貯藏，廣大的販賣市場，以及國內的優良自然條件相併，造成了英國產業革命的基本前提條件。

剝奪農民土地，是產生自由勞動者的最重要源泉。此外，（二）封建家臣團的解散和他們的無產化（參照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的（A）段）；（三）基爾特制度（Gild system）的崩潰及其徒弟的過剩（參照第四章第九節第二項）都是英國自由勞動者的來源。

（B）外國熟練職工的亡命英國

十六世紀以來，法國 Netherland 和對新教徒的迫害和慘殺（例如：在法國，從1572年八月二十四日起亙及三日間，因 Saint Bartholomeu 節日而慘殺新教徒三千人，在這幾天內法國共慘殺新教徒三萬人之多）迫使許多遵奉新教的熟練工人亡命到英國避難。因為當時法國和 Netherland 的工業技術，至少在絲織物工業方面，比較英國進步，這些亡命的熟練職工的流入英國，促進英國技術進步，並且新建了一些英國從來沒有的工業。許多新移民集中在倫敦，其結果，在十八世紀初葉，製絲工業集中在倫敦的 Spitalfields 了。其次，在倫敦以外的地方，例如在 Ipswich 創建 Sail Cloth 製造工業，在 Richmond 創建染布業。麻工業主要是在愛爾蘭和蘇格蘭。製糖業，染業以及十七世紀陶磁業的發達，大半是由於 Netherland 的亡命職工的貢獻。

這樣外國熟練工人的流入，一方面促進了英國新興工業和技術的進步；一方面又形成為英國工資勞動者的一個來源。

第三節　產業革命

促進大工業猛烈發展的最重要條件：資本，勞動，市場，都已經具備了。因而產業革命便先發生於英國。（註一）爲滿足日益增加的市場的巨量需要，生產技術的改進，生產的機械化，變爲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了。生產的機械化，即所謂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先實現於印度傳來的木棉工業部門。（註二）

從印度傳來的棉織物，不久即普及到各地。棉織物的製造，使企業家大發其財。木棉 Manufacture（工場手工業）像雨後春筍似的簇生了起來。棉布的急激普及，引起了羅紗製造者的不安和騷擾。棉布驅逐了從來的絨毛工業。毛織物的織匠，在街市妨礙別人搬運棉布，甚至燒毀棉布，用水潑穿着棉布的人們。但因棉織物非常便宜，大衆樂於使用，因而很容易地佔據了市場。市場的龐大的需要，使手工業的生產（工場手工業也好，）無法滿足。這就刺激着技術的革命，機械的發明。

促進了生產過程的最初的發明，是 John Kay 發明的飛梭，這最初應用於織物業上，使織物的生產增加二倍。由於採用這個新方法，引起了對紡紗方面的巨大需要。織物 Manufacture 痛感着原料——棉紗的不足。「棉紗飢饉」迫使發明家研究促進棉紗生產的方法。這樣，1765年織匠 John Hargreaves 發明了「吉妮紡織機」（Spinning Jenny）假如使用這個機械，則勞動者一人同時能紡織八個紗綫。這使棉紗生產的速度，提高了許多倍。以後再加改良，一個機械上可能裝置十個或十個以上的紡錠。到了1768年，Richard Arkwright 發明了用水力運轉的水力機（Water frame）。他最初把幾百勞動者集中在大紡織工場。吉妮機用於紡細紗線，水力機則用於紡粗紗線。此後，1779年，紡織業者 Samuel Crompton 利用 Hargreaves 和 Arkwright 的發明，加以改造，而首創 Mule 紡織機（混合機）這個機械的紡織速度非常之快，而且用來紡粗紗線或細紗線都可以。棉紗的大量生產，又使織物的速度相對的落後，而發生猛烈的「織物飢饉」的現象。其結果1785年 Edward Cartwright 發明了力織機（Power Loom）提高生產速度到以前的四十倍。

最初，這些機械，是用人力，獸力或水力來運轉。用水力來作爲動力，對於提高生產效能，起着很大的影響。因此，在可能利用水力的

河岸，出現了幾層樓的工場。但是場所的限制，對自然條件的依賴狀態，氣候的影響，限制着生產急遽擴大的可能性。1765年，James Watt 發明蒸汽機關，這在技術上及工業上才引起了決定的革命。最初用 Watt 的蒸汽機關來作發動機的，是在1774年Bermingham 近郊的波爾頓的工場。

這樣，由於紡紗織布之技術的改進，因而在纖維工業方面所引起的生產方法的變革，普通稱爲第一產業革命。這是輕工業方面的革命（生產中心地在 Manchester, Lancashire）。

機械技術的發達，在金屬工業方面也引起了革命。因爲各企業要裝備機械，因而引起了鋼鐵的巨大需要。英國的煤礦和鐵礦雖是豐富，但，直到十八世紀末葉爲止，仍舊是用木炭來製鐵。因此，一時英國瀕於完全喪失森林材木的危機。議會頒佈了材木伐採禁止令。但在當時的英國，用煤來製鐵還不可能。因此從俄國，瑞典等處輸入了鐵和鋼鐵。到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才開始用煉炭，以及與硫黃相混合的煤來代替木炭。煤鐵的生產技術和產額，從此日漸進步。1788年在約克郡架設了最初的鐵橋。1790年發明了鋼鐵的製煉法，因爲機械的鐵製支柱的需要，瓦斯燈的發明，鐵路的建築，使鐵的需要增加了好幾十倍。此時，Watt 又發明了製煉鋼鐵必需的蒸汽鎚來代替手力鎚，鐵的生產，因此在八年間增加了兩倍。機械的製造，迅速地改進發展。鐵的加工機械，漸次形體變大，更加力强，而且很迅速地改良了。

這樣，由於機械技術的發達，因而在煤鐵工業，金屬工業方面所引起的生產方法的變革，普通稱爲第二產業革命。這是重工業方面的革命（生產中心地在 Bermingham）。

工業生產技術的革命，很迅速地影響到農業方面。農村人口的激減，原料和糧食的需要的激增，迫使農業生產技術急激改進以適應時代的需要。資本主義的大農業經營，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合理化，品種的改良，化學肥料的應用，以及新銳的農業技術和智識的普及，在在都使農業生產的面目一新，顯示出空前的農業革命。

發工業的革命，商業的發達，更刺戟着交通運輸機關的革命。輪船，火車，電報，電話的發明和普及，無一不象徵着新時代的到來。

第四節 產業革命後的英國社會經濟

產業革命給英國社會以非常深刻而巨大的影響。從窮鄉僻野趕了出來的人們，都跑到都市，充滿了千千百百的新興工場。在石炭產地附近，簇生了使用石炭的工業。住在這些地方的少數人口，忽然激增，轉瞬就變成大都市。英國的人口，從土地肥沃的東南部，移到石炭層豐富的西北部了。在英國的棉花輸入港利物浦 (Liverpool) 附近，Manchester 的 Lancashire 地方，變爲木棉工業的中心地而發達起來了。Bermingham 變成了金屬工業的中心地。絨毛工業集中在 Leeds。蘇格蘭和南威爾士，也變成了工業地帶。

因爲國內商業的必要，交通運輸機關，也加以急激的改良。舖裝的柏油路，代替了過去的土路和凹凸不平的小道。無數的船舶航路，輪船碼頭，運河等等，都有系統地先後創建了起來。

大工場的機械生產，極端增加商品產額，把商品的價格減低了。使用着時代落後的手工器具來繼續生產的家內工業，決不能跟大工場機械生產相競爭。隨便怎樣延長勞動時間也好，手工決敵不過機械，因而它們總難避免沒落的命運。結局，家內工業者，手工業者，都先後破產了。他們跑到打敗了自己的競爭對手那裏去求工作，因而又增加了普羅利塔利亞(Proletariat) 的人數。

F. Engels 在其名著英國勞動者階級的狀態上描寫產業革命的結果說：「工業的急激發展，必需勞動者工資騰貴了。其結果，勞動者成羣結隊地從農村地方移動到都市。因而人口激增；但此增加，差不多全是普羅利塔利亞的增加。加之在愛爾蘭，從十八世紀初葉以來，漸次恢復秩序。在這個地方也好，在從前騷擾時，由於英人的蠻行，十人中殺戮了一人以上，但人口仍急激增加，尤其是此後工業發達，把許多愛爾蘭人吸引到英格蘭來了，這就形成了大不列顛帝國的大工場和商業都市。但其人口，至少四分之三是屬於勞動者階級；構成小資產階級的，只是小買賣人和少數的手工業者。

新工業使工具變爲機械，工作場變爲工場，因而使中間階級的勞動分子變爲勞動的無產者，從來的大商人則變爲工場主人。這驅逐了小資產階級，把一切的人們分爲兩個對立的陣營——勞動者和資本家。」這兩個基本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是近代社會的劃時代的特徵。經過產業革命而確立了起來的英國資本主義，就建築在資本家對勞動大衆的剝削上面。故跟隨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就發生：手工業的沒落，大衆的無產者化，勞動者的虐待，長時間勞動，婦女兒童勞動，極少的工資，失業等等現象，致使勞動者以復古的絕望的暴力行動，破壞機械襲擊工場和資本家。但因這些行動，反逆着時代潮流，終於在歷史車輪的前進中粉碎消滅了下去。

這樣，英國變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驅者，它利用先驅者的有利條件和工商業上的優秀技術，獨佔着世界市場，變成了「世界的工場」。英國既已在工業品的輸出上佔着非常優越的地位，當然沒有恐懼外國製品輸入的必要，而原料差不多全由本國的殖民地輸入。這樣，它就舉起自由貿易的旗幟，以勝利者的步伐，進軍到世界的任何角落。確實的，1846年英國撤廢穀類關稅，正是以工商業立國的劃期的宣言。在1821年僅有三千七百萬鎊的輸出額，到了1853年即已增至一萬萬鎊。尤其是英國的重工業，因有世界各國的非常繁盛的鐵路建設和輪船的鋼鐵化，顯示出一日千里的大發展。這樣，英國不只是在工業上，在貿易，海運，銀行，金融上也變爲世界的霸者。

在這個期間，英國資本家階級，把他們獲得的龐大的一部分超過利潤，施捨給高級勞動者，由於社會政策的種種設施，會使這些勞動貴族的生活得以暫時改善。因此，在這些勞動貴族統治下的工會，立即放棄其革命的政策和鬥爭的態度，專心於在資本主義制度裏探求改良政策和改善生活的辦法。（這是屬於第二國際的各國無產政黨和工會的共通特點。）

英國資本主義，直到1870年代還維持着世界的霸者的地位，但以這個時期爲轉換點，美德及其他新興資本主義，漸次跟上世界的舞台，日益威脅着英國的獨佔地位。新技術的原料缺乏，舊式技術的墨守，企業經營的弱小和分散，自由政策等等使英國資本主義，被新興諸國的豐富資源，新銳技術，大企業和獨佔組織（Monopoly），保護政策等等所壓迫，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表現出顯著的

衰頹傾向，尤其是在鋼鐵工業和石炭工業方面非常顯著。

鋼鐵生產（以英國作基準的百分比）

	英	美	德	法
1870年	100	24	.59	32
1900年	100	202	129	30
1913年	100	403	227	60
1924年	100	458	120	83

石炭生產（佔全世界產額中的百分比）

	英	美	德
1895年	35%	33%	14%
1913年	24	42	15
1924年	23	43	10

英國木棉工業

	紡錠數（百萬個）	佔全世界的百分比
1900年	50	50%
1912年	55	40
1924年	57	36

輸出貿易額（百萬鎊）

	英	美	德
1880——84年	234	165	153
1900——04年	283	292	236

上列的一些數字告訴我們：英國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衰頹下去，被德美新興資本主義國家所凌駕了。

英國參加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是爲保持「世界的工場」「世界銀行」的地位是爲維持「大英帝國無日沒之處」的威勢和世界霸權，防禦德帝國主義的進攻的緣故。大戰雖伴運征服了德國，然而較之德國更加强大的勁敵——美國，出現在英帝國主義的面前，奪去了它的霸權。加之，佔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業化和獨立自治運動，更給英國以致命的打擊。

從來在英國完全統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用大戰的好機會，顯示出急激的工業化。這一方面縮小了英國商品的販路；同時，又因經濟關係的遲滯和對立，引起了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加拿大，澳洲的自治，印度，埃及的反英運動，日漸猛烈了。美國利用它大戰期間急激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和龐大的金融資本，侵蝕着從來的英國市場；同時，又利用戰債來統治歐洲。「世界的工場」「世界的銀行」，現刻早已移到美國去了。（參照第十五章）這樣，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漸次從倫敦移轉到華盛頓。華盛頓會議，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楊格計劃（Young Plan），胡佛緩付戰債賠欵案（Hoover Woratorium），羅迦諾會議，軍縮會議，不戰條約等等一切的國際政治，大牛在美國的提議或領導下進行着。其次，英國喪失中國市場（因日美的競爭）也是英國資本主義慘敗的一個史實。

這樣，大英帝國的霸權，以大戰爲轉換期被美國奪去了；現刻，老大帝國英國的資本主義，正在日趨沒落的衰頹過程上苦惱着。

第五節 結語

根據上面各節的說明，我們知道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其原始蓄積過程：

第一，英國在商業上克服了先進殖民國的競爭，擁有廣大的國外市場，獨佔掠奪着美洲，印度及其他殖民地的財富，致使龐大的貨幣資本，可能迅速地蓄積了起來。其次，英國政府的公債租稅政策和保護制度，更促進了資本的原始蓄積；

第二，因為牧羊的有利而引起的農業革命；由圈地 (Enclosure) 和領地清掃 (Clearing of Estates) 等積極剝奪農民土地的凶暴辦法，產生出大量的工資勞動者，同時，封建家臣團的解散，基爾特制度 (Gild System) 的崩潰及其徒弟的過剩，外國熟練職工的大批亡命英國，更豐富了英國工資勞動者的來源。

鉅額貨幣資本的原始蓄積，勞動力的豐富，廣大的國內外市場的需要，刺戟着生產方法的改良和普及。加之，封建殘滓（農奴制度的或基爾特制度的）只起着非常微弱的作用，它不會束縛阻止新興企業的發展。這跟政局的安定（相對的）和有利的自然條件相配合，遂使產業革命最先實現於英國而成為「資本主義的故里。」

英國資本主義，利用它那先驅者的有利條件和工商業上優越的技術與組織，擊敗了一切的外國競爭者，變成了「世界的工場。」這樣，沒有內憂外患的英國資本，在國內則倡行自由放任主義；在國外則吹着自由貿易的號角，在世界市場上橫行獨步一直繼續到十九世紀末葉德美新興資本主義國的「異軍突起」為止。

這樣，我們從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看來，可能指出幾種特殊的意義：

（一）產業革命最先實現於英國，以後才及於別國，故英國實為「資本主義的故里；」

（二）跟別國相比較，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其原始蓄積過程上也好，在產業革命及以後的發展過程上也好，都顯示出一個

典型的發展形態，而其表現爲『自然史的發展過程』。故

（三）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自由貿易政策的長期維持，獨佔資本主義的遲遲發展等，）政治上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資本家統治下的典型的議會政治，）意識形態（Ideologie）上的自由主義（Adam Smith, D. Ricardo 以來的傳統思想，法西斯思想與運動的勢力微弱，）在英國都有較高的典型的發展。

＊　關於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詳細敍述，可參照第一篇第五章第二節第一項。

其次，產業革命的結果，在英國也好，在其他各國也好，都大半相同，故不一一詳述。詳細說明，可參照第一篇第五章第四節第五節。

（註一）產業革命爲什麼先發生於英國？其原因：

第一，英國商業，在國內，既有統一的國內市場；在國外，它又征服了先進殖民國（法蘭西，西班牙等，）獨佔了世界的商業，獲得幷收奪了東印度及其他殖民地，使本國蓄積了許多資本，加之，銀行也有相當的發達，1694年設立了英格蘭銀行，其他的金融機關，也同時發達；對於缺乏資金的發明家和技術家，融通資本的方法，也比別國早發現了；

第二，封建制度——農奴制度和都市裏的基爾特組織，——已於十六世紀前後消滅；而且封建殘滓極少，故向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能比其他國家更迅速而順利地進行；

第三，圈地（Enclosure）和領地清掃（Clearing of Estates）——即所謂『農業革命』，一方面擴栽在大農場的發達；同時，因爲土地被剝奪而淪爲無產者的許多農民，就成爲工商勞動者的來源。這使英國的產業資本主義，較之別國，更易於發展；

第四，英國較之歐洲其他國家，政治上的障礙要少得多。法國從十八世紀末葉起，發生大革命。革命後十年間的戰禍，阻止了商工業的發達，直到1830年還沒有恢復革命前的經濟繁榮狀態。這樣，法國因爲國內政局動搖，頗爲厲害，因而沒有工夫施行產業化及經濟上的改革和發展。其次，德國則缺乏資本，而且封建制度的殘滓，還在阻礙產業的進步。國內又分裂爲許多小國，政爭[illegible]國內的交[illegible]

聚，被各小國個別的關稅制度所妨礙，差不多沒有實行產業革命的餘裕和條件；

第五，拿英國的地理環境來說，英國是一個島國，并位於大西洋上的要路，關於工業所必需的各種原料以及生產品的輸出，處於極便利的地位；國內可以航行的江河很多，山嶺也不會妨礙國內交通；工業所必需的煤礦的埋藏量甚多，而且這些東西的產地，互相接近。

因為這些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的有利，故產業革命，就在英國先發生了出來，而英國也就著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故里。」

(註1)生產的機械化，為什麼最先實現於木棉工業部門呢？其原因：

第一，木棉工業，較之當時流行的其他產業，可算是英國的新興工業，因此，它少受傳統和舊習慣的束縛，又少有當局的各種煩瑣的監督和統制，從而可能自由發展，極少阻礙；

第二，棉製品較之毛織物，價格較廉，而且重量較輕，故能當作大衆消費品而易於擴大市場；

第三，棉花的纖維，自然而然地已經標準化，頗適於機械的大量生產；

第四，木棉工業正要大發展時，恰好在英國統制範圍外的美國發見了棉花的主要來源；

第五，木棉工業和羊毛工業不同，羊毛工業散在英國各地，而木棉工業卻集中在蘭開夏及斯塔福州，這增加木棉工業對於新發明或新技術的需要，又使它易於迅速地接受和普及新技術。

本章主要參考書

W.J. 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W. J. Ashley: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England.

W. Cunningham: The Progress of Capitalism in England.

W. Cunningha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A. Toynbee: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18th Century in England

E. Lip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L. C. A Knowle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s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張格偉譯英國產業革命史論)

Knight, Barnes, & Flagel: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高克宜章植譯近代歐洲經濟史)

頡綺人著言嘯天譯英國社會經濟史。

野村兼太郎著：英國經濟史（日本改造社經濟學全集第二十九卷中華書局已有漆璽如的譯本）

東谷人郎著熊得山譯歐洲經濟通史。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李光忠譯近代歐洲經濟史)

F. Engels:英國勞動者階級的狀態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1844).

H. M. Hyndmann: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G. D. H. Col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Lujo Brentano Geschichte der wirtschftlichen Enturcklung Englands.

(本章參考書種多讀者尚可參照第五章章末列舉的文獻其他不及一一舉出)

第八章　法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第一節　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經濟

第一項　農業

英國在收穫產業革命的果實的時候，法國的產業革命還在萌芽期。在十八世紀末葉，法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全國人口中約有80%住在農村。十萬人以上的大都市，只有巴黎和里昂兩個，其他全是很小的都市。

在農村，農民苦於封建的剝削與自然經濟的崩潰。（因商品經濟發展。）

法國土地的最大部分爲貴族所有。貴族有司法權和徵稅權。農民沒有完全的土地所有的自由。領主縱然把土地讓給農民了也好，但在該土地上仍保有領主權和所有權。接受了土地的人，不是完全的土地所有者，他不過是每年繳納一定貢賦的長期的土地保有者。

在法國和英國不同。農民的土地所有，一直繼續到十八世紀末葉。和農民的土地相併立，也有大土地所有存在。其特徵是：把屬於一個所有者的大土地加以很小的劃分。這變爲合理的農業經營的障礙。地主的大部分，把自己的土地細分爲許多的部分，佃與農民。租佃條件非常苛酷。最多的是折半制，即將收穫之一半獻與地主。農業技術非常幼稚，三圃制之外，甚至有實行二圃制的。犂頭是木製的，家畜極少，其結果土地的施肥不足，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沒有肥料，致使地力枯竭，常常發生凶荒。荒年的數目，從1700年到1780年，達三千次之多。Wilhelm Liebknecht在其所著「土地問題」中引證幾伯爾教授描寫當時法國的農業荒廢情形時說：「這個農業是

沒有魄力，也沒有科學，尤其是沒有資本的農業。在當時的英國，每一 Hectare 的費用平均達到 240 Liver，但在這個時代法國的租佃土地上不過是六乃至（30 Liver……。英國能收穫所播種籽的十二倍，而在法國每一 Hectare 收穫七乃至八公石(Hecto litre)即只能收穫所播種籽的五乃至六倍。……十公石的收穫物，差不多不是養活家族，因而要想出賣賺錢，是不可能的。」（日譯改造社版，四四頁）因此農民不能不從事於家庭小手工業以獲得副收入，故在土地貧瘠不能養活許多人口的北部，家庭工業特別發達。

在當時，農村疲弊不堪，耕地的三分之一（九百萬 Hectare）不能耕種而荒廢了。

農村之不幸的悲慘的狀態，更由支配階級的種種壓搾而更加深刻化。法國的農奴制，在很久以前已經廢止了。路易十六世在1779年全廢其王領內的農奴，因此，農奴的數目，總計法國全國不過百五十萬人，還佔全部農民人口的10%，然而其他的農民，也不過是名義上的自由農民。這樣農民的大部分，雖已從農奴的從屬狀態中解放了出來。但是他們耕作的土地，對於地主仍在種種從屬狀態下。此等農奴制的殘滓表現在農民所負担的種種貢納上面。農民的義務，除了繳納國稅以外，還有年貢，什一稅，現物稅，牲畜稅，渡河稅，通行稅，漁稅，……等等，不勝列舉的封建的苛捐雜稅。

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貴族，最高興狩獵，因此他們毫不客氣地蹂躪踐踏農作物。其他，因爲狩獵而豢養的兎，鷓鴣，鳩等等，也很隨便地吃農作物，糟踏耕地。

支配階級的淫威和奢侈，農民的地獄般的生活，終於促成爲大革命的爆發。

第二項 工商業

工業 在工業方面，主要的是農村中的家庭工業和都市上勞動者不及十人的小生產佔優勢。大工業大半集中在北部，這表示出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之傳統的聯繫。主要的工業都市，是以紡織爲中心地的里昂。

十八世紀末法國的工業水準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呢？米拉波指出在當時的法國有「九萬人在一個人指揮下從事勞動的聯合的工場手工業」和「跟小農業相結合的個別的分散的工場手工業」並存的事實。

根據一些資料，我們知道當時的法國，是以手工技術爲基礎，以都市的手工業及農村中家庭的副工業爲背景的工場手工業時代。

故在當時，法國工業的三個主要形態是：1，都市手工業者行會的手工業。2，發莊制家庭工業。3，工場手工業。

1. 行會的手工業(Metiers)

在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工業上，都市手工業所佔的地位還相當大。1721年，巴黎人口五十萬人中就有 757 人（每六百六十人中一人）的縫針製造業者。1890年，這個比例變爲人口二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五十七人中有千五百二十二人（每一千六百八十人中一人）。從此可知十八世紀手工業者的百分比，較之一世紀後佔極大的地位。這些手工業者的大部分組織於行會（Metiers）中。所以行會就是十五、六世紀廣泛地普及歐洲的手工業者的同業組合（在英國稱爲 Craft Gild, 在德國稱爲 Zunft）行會內部有嚴格的規約，行會老板所有的工匠和徒弟的人數，製品的種類，販路，販賣價格等等，都有一定的限制，故企業者的創意，全被抹殺。行會使用祖先傳來的時代落伍的方法來繼續生產，極力排斥技術上的新發明。這種限制，以後隨市場的擴大，變爲工場手工業及機械工業發展的障礙，致使行會與工場手工業之間的矛盾愈加激化。其次，在行會相互之間也好，在行會內部老板和工匠之間也好，也因爲利害的對立，而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使行會漸次踏上崩潰的道路。

2. 發莊制家庭工業

這個制度，是商業資本侵入生產領域後所形成的一種產業組織。

當作農民經濟之必然的附屬物而發生的農家家庭手工業，隨商品經濟的發展，爲支付貨幣給地主和高利貸者，其生產越加變

爲以市場爲目標的商品生產因而產生了農民與市場之間的媒介人——商人。

最初商人只是買收好了的製品，以後卽利用其經濟的勢力，借錢，或借材料，勞動工具給農民，致使農民變爲計件工資的勞動者。因此商人漸次的決定生產的方針，範圍等等，而變爲產業資本家了。

在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和工場手工業相並立的，還有許多散莊制家庭工業散在農村各地。（尤其在富倫坦地方，豐遮魯皮卡爾農地方。）

約翰・爵萊士描寫皮卡爾農地方的散莊制家庭工業情況時說：『絲車在旋轉。機械在工匠或農民的可憐的家中運轉。工業還和農業的生活相混合。』（約翰・爵萊士法蘭西大革命史，第一卷第一章，日譯本一二一頁。）

『在皮卡爾農生產了羊毛織物麻織物等等。二萬五千的機械，在這裏活動，其中只有六千五百架在都市——都市的機械的一部分和鄉村中差不多全部的機械，在收穫時便停止使用。刈穫，村木的採伐，播種及其他農村的工作，在許多鄉村非常妨礙工作。這些機械，一年之中只有八個月活動。』

『這些小製造家，不能爲廣大而遼隔的市場生產。故富裕者供給機織者以材料。這些機織者，在其村落的貧家的四壁中做完了工作時，他們便夜以繼日地拋梭，只有在鄉間的必要時日停止工作時，才把製造的東西拿到大企業家那裏去。在此家族性質的產業中，顯明的，婦人佔重要的地位，小孩子也是這樣的。』

農民從自家用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漸次轉向爲市場的生產。同時，生活資料，不是由自家生產，而不能不從市場購買。這漸次形成開拓了國內市場。

3. 工場手工業

這是把從來的家庭手工業者，集中在一個工場，比較有計劃地實行分工生產的制度。

法國的工場手工業最初是在重商主義者諸王的保護援助下發展了起來，國王從行會和地方的封建的各種限制中保護這個新工業，給予各種特許，賞賜年金及獎勵金等。由國家設立的工場稱爲『王家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 Royales)只有特許的工場，則稱爲『特許的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s Frivilegues)。

下表即指出在織物工業上『王家工場手工業』的生產額和其他手工業相較，工場手工業的生產額佔絕對多數的情形。(1703—1713年)

王家工場手工業的生產：	32,735疋。
手工業者行會及其他的生產：	17,710疋。

在十六世紀末葉，里昂已經有使用工匠三千人的製造絲綿麻布的工場手工業。在十七世紀，在阿威蘭市出現了織機一百架，工匠一千六百九十二人的羅伯經營的製造羅紗的工場手工業。十八世紀末葉在蘭斯羅威等地出現了許多製造毛織物的工場手工業，在阿來阿爾羅安等處的各種企業發生了一千二百人乃至二千三百人的工匠在同一工場內工作的工場手工業。

工場手工業發達到一定的階段時便逃不了技術上的限制，爲克服這個限制，開始採用『同時能操作同一或類似的許多工具，……由單一的原動力』所運轉的『機械』。

商業 十八世紀末葉法國的商業，尤其對外貿易，是在一切經濟部門中發展得最顯著的。法國的對外貿易，雖然喪失了許多殖民地也好，也很確實的發展下去。下列數字所指出的外國貿易差額，即可說明當時法國對外貿易的盛況之一斑。

1717—1720年	21,480萬 Liver
1784—1788年	101,160萬 Liver

即兩年度相較，約激增五倍。

在當時，佔輸出品中第一位的是農產物。1787年的輸出額五萬萬二千四百萬 Liver 中三萬萬一千一百萬是農產物，其餘的二萬萬一千三百萬 Liver 是工業品。

但若只以工業品的輸出而看，1716—1789年之間，從四千五百萬 Liver 增加到一萬萬三千三百萬 Liver 這是由於市場擴大，促進手工業轉化為工場手工業的結果。

從十八世紀的開頭（1716年）到十八世紀末葉為止的期間，法國的殖民地貿易（即與亞細亞，非洲，美洲，的殖民地的貿易，）從三千六百二十四萬五千 Liver 增加到三萬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萬三千 Liver。（商業的中心地，在地中海沿岸是馬賽；在大西洋沿岸是波爾多（Bordeau），南特（Nantes）。

隨市場的擴大而引起的國內產業的發達，第一必須統一了的，保證商品能夠自由流通的本國市場。但是，革命前的法國，還沒有轉成為統一的經濟組織。國土分為若干獨立部分，其一部分稱為「五郡法蘭西」。在「五郡法蘭西」的內部，商業自由，不納關稅，商品即能由此郡運送到彼郡。在法國的其他部分，縱然在國內也好，也必須繳納關稅。

在當時從阿爾立安輸送一定量的葡萄酒到波爾多，因為途中的關稅，至少要增加二十倍的價格。法國的商業的自由發展，第一是被這種國內關稅妨礙了。其他特許的商人（例如巴黎的葡萄酒商人，）因為從王朝得來特別的權利，很阻礙商人們的自由競爭。

這樣只有掃蕩舊制度，統一法國的國內市場，才可能保證法國商業及與此相關聯的工業之今後的發展。

第二節　原始蓄積過程

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及 Napoleon 戰爭以前，產業已經相當進步了。法國雖缺乏石灰，卻富於水力，故工業發展的自然條件，並且在所謂發明時代的初期，是決不欠缺的。因此，十八世紀的法國織物業相當發達。各種機械的發明與輸入，很早即已開始，例如愛

蘭人 Hulker 在 Rouen 執行安置紡績機械的事業。Grenobb 的 Vaucanson發明織物機械，也發明了生絲撚絲機械。其次，Jacquard 的織物機械也是著名的發明。這樣到十八世紀爲止，英國的吉尼紡紗機(Spinning Jenny)，Arkwright 的水力機 (Water Frame) 渡過了多維爾 (Dover)海峽而輸入法國，英國技師 Abcosck 在 Roanne 及 Gharite sur Laire 設立金物工場，Wilkinson在 Laire 河畔設立工場鑄造直加農砲。其次，利用 Dawphine 河的豐富的水力，發生了絹，製紙，及金屬工業，在別一方面，法國較之英國，在人口方面也好，在法國大革命前，英有 900 萬人，而法國則有2600萬人。貿易的增加也非常顯著。例如革命前的英國貿易額爲3200萬鎊，而法國則在4000萬鎊以上。從1715到1787年之間，英國的貿易增加三倍，而法國則激增四倍。

這樣，在工業，貿易，人口，各方面，法國決不劣於英國，但爲何產業革命的發生反較英國爲遲呢？這不能不從法國資本主義的原始蓄積過程中探求解答，因而我們不能不先研究產業革命的前提條件。

第一項　資本的原始蓄積

在法國，資本的原始蓄積，主要是從下述的各種源泉來的：

（1）爲國王及法王徵稅的 Fermier（包辦徵稅者）的財富，以及由貴族大地主的收入而來的資本蓄積。

（2）由都市人口增加而發生的土地價格騰貴，使不勞而獲的都市貴族，激增其資本的蓄積。

（3）里昂交易所及定期市的發達，使放款資本及商人資本的蓄積激增。

（4）公債的發行，也促進了法國資本的原始蓄積。在法國 Cardinalde Tournon 企圖創造一種基於公共信用的制度，他爲國王的便益而活動，在至少給予10%的報酬的契約下，吸收了里昂各銀行的存款。其次在1554年在里昂募集公債（Grand Farti）各種人都買公債。應募公債者接受公債證書。但不久債券價格暴跌，最初降低15%，其次在1559年降低30%乃至50%。因此由於犧牲

許多應募公債的民衆，而使投機業者獲得巨富。

（5）經過以上的各種過程，蓄積了巨額的貨幣資本。但在資本蓄積的過程中，最重要首推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法國的國內商業，因國內的關稅障壁及其他障礙弄來非常窘竊，而海外貿易較之國內商業卻遠爲發達。依據 Levasseuret Dubbis 看來，十六世紀中葉以來的法國海外貿易，分爲五大販路：

（A）美洲，西印度的貿易；

（B）近東貿易，（Levant）尤其是和土耳其領的地中海各國的貿易；

（C）經過好望角的東印度的貿易；

（D）西歐貿易；

（E）北歐貿易。

在法國的海外貿易國中佔重要地位者是西班牙，荷蘭，英吉利，及近東地方的土耳其。其次若就法國的主要貿易品而言，輸出品中爲麻織物，絲紗，麻織品，染料，油，小麥，羊毛等農產物及原料品，以及葡萄酒等飲料。輸入品中是所謂殖民地特產物，絹物，陶器，玻璃製品，等等奢侈品。固然法國的貿易由法國人自己來經營的較少，這大半是由外國人，尤其是由荷蘭人來經營。但若將十六世紀的中葉和十七世紀的中葉之輸入品相比較，即知法國漸由農業國進爲工業國。又如海外貿易的增進使里昂市那樣的商業金融中心地以後又變爲工業中心地，更促進了馬賽，羅安等海港的發達。

十六世紀中葉以來，以上五大販路之中，最重要之一爲美洲西印度的貿易。故關於此點稍加考察。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一因和西班牙直接貿易，一因和西班牙領殖民地的祕密貿易，流入了多量的白銀。西班牙人不直接送許多船隻到本國的殖民地去，大半是法國的許多船舶在西班牙的國旗下，航行於西班牙領殖民地。其次，法國派遣軍艦到 Sville Erpagre（西班牙的一州）去，捕獲

滿載美洲白銀的西班牙船。法人模倣西班牙的商品和商標，把法國的羅紗當作西班牙的商品，在西領殖民地販賣而獲得巨利。在(Cadiz)因此種秘密貿易而生活的法國人實不在少數。其中更有和西班牙的商人相勾結，和殖民地直接交易的。法人不只受領事的保護，在西班牙的宮庭中也有特別的保護者。此等保護者，在西班牙人妨害法人的祕密貿易時屢屢派遣軍艦，加以威脅，而從法國商人接受許多報酬。由於這些貿易，很多的白銀流入了法國。

其次，就近東貿易看來，在東方貿易上法國很早即已築好了堅固的地盤。1610年，法國在近東諸國有五個領事館，地中海中法國帆船，約在一千隻以上。這些法國船，也訪問敍利亞，埃及，馬其頓。1620年乃至30年頃在近東，法國商人的販賣額約當威尼斯(Venice)及英人等的二倍。但因荷蘭及英國的勢力漸次增加，地中海方面的法國貿易就跟着減少了。尤其是美洲的發現，和到印度去的大西洋航路的發現，使地中海貿易的重要性漸次喪失，法國對海外貿易的關心，不能不轉向到新大陸及印度方面去了。

Colbert 以來，法國曾非常努力於印度貿易的發達。法國的東印度公司創立於1664年，最初，從印度輸入了許多棉花，後因國內的工業家反對這種商品的輸入，遂使棉料，香料等以後變爲主要貿易品。到十八世紀，法國由 Dupleix 的努力，在印度擴張了本國的勢力，在孟加拉（Bengal）創建了堅固的地盤，一時從英國手中奪去了馬德拉斯（Madras）。但在 Dupleix 回國後，又受英人的壓迫。

由於上述的各種過程，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法國曾蓄積了相當多的貨幣資本。但是，法國資本之原始蓄積，在數量上既已不及英國而且蓄積的貨幣資本，一方面消耗在戰爭（百年戰爭，宗教戰爭，封建貴族的叛亂）及其他不生產的目的（例如：國王貴族的奢侈靡費，官僚制度的費用等等）上；別一方面，又因國家破產，財政極端窮困下的苛歛誅求，國內關卡林立，致使擁有財富者大都不願投資於新興企業，而大半用來買官爵購買土地，坐享封建年貢。這樣，只從資本的原始蓄積過程看來也好，法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便不能不落伍在英國之後了。

第二項　工資勞動者的產生

（A）行會制度的崩潰

商品需要的激增，市場的擴大，使行會制度轉變爲時代落後的進步的障礙。但是，法國政府爲徵稅上的必要，及其他理由，不僅准許行會制度的存續，且進而維持它的存在。在這裏也好，我們也可以指出法國產業革命落後一個原因。因此，若就一般的說來，直到法國革命爲止，行會制度仍是最普遍的工業經營形態。在行會制度下，維持傳統是根本的特色，技術是墨守着從來的舊法。故在行會制度繼續存在的場合，大規模的工場制度的發生，是很困難的，從1774年到1776年，Turgot 廢除非常狹隘的行會制度的各種特權，頒佈了各人能自由選擇職業，自由移轉的法令。但是，這個命令，實際上未能充分執行，致使 Turgot 退職後行會制度又復活了，在十八世紀末葉，對於行會制度的見解，鄉村與都市極不相同；同時在當時法國的各社會層之間的見解也是對立的。鄉村及都市郊外的家庭工場的工匠，渴望着行會制度的廢除，反之都會，尤其是馬賽，Lille, Rheims, Rouen 等工場中心地，則流行着行會制度的辯護論。在1789年大革命時，貴族用緩和的語調要求廢除行會制度，第三階級的大多數則猛烈主張其廢除，其他則主張其繼續存在。行會制度之應否廢除，變爲煩惱國民議會的一個難題。經過很久的考察之後，1791年二月十六日頒佈法令，四月一日以後各人的職業選擇自由，但是，個人須從政府獲得特許，且須遵守警察規定。在此警察規定之中，有禁止勞動者一切的團結的一項。這樣，在法令上雖未指明完全廢除行會制度，但是它那種種獨佔權及其他特權卻沒有了。這樣，行會制度漸次迅速開始崩潰，在九十年代已陷於臨死的狀態了。然而，到了拿破崙時代，產業的自由，部分地又受侵害，以統制物價和商品的品質爲目的，尤其是以維持所謂產業和平爲目的，再設立了獨佔的類似行會制的制度。但在當時，行會制沒有廣泛地復活普及，1815年後，大概的職業，至少在形式上對任

何人都是自由開放的。縱然 Napoleon 時代的一些行會制團體，曾維持到十九世紀中葉也好。（例如：肉舖的行會制是在1858年，麵包舖的行會制是在1863年，印刷業的行會制是在1870年才開始廢除的。）

這樣，在法國，行會制度的崩潰，較之英國遙爲遲緩，這一方面妨礙着自由無產勞動者的產生；那一方面由於拘束着工業技術發展的緣故，而使法國的產業革命遲延了下去。

（B）農奴制度的崩潰

法國的莊園制度及在其下的農奴制度，決不是全國一樣同一程度，同一形態的，這因地方的不同而有特殊性。法國的莊園制度最有組織地發達了的，是東北部地方及鄰接南 Netherland。在 Normandie 及 Bretagne 和南部同樣，其發達是不完全的，較之典型的莊園制度，有種種異色。

法國的莊園制度，就其一般的隸屬關係看來，和英國的 Manor 大略相似，但是，法國領主的權力，較之英國的遙爲廣大。例如：莊園住民的權利，也只有森林及教會的牧場（Communie）的利用權，此外就只有種種苛酷的封建負担和束縛。大多數農民，既在這種農奴的狀態下，縱然都市上需要着自由勞動者，但因爲封建的各種束縛，他們不能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因而阻止了資本主義工場制的發達。

法國農奴制的崩潰，因地方的不同而有早遲之分，這在東北部最遲，因爲那裏的莊園制度，曾有顯著的發展。從產生無產勞動者羣的觀點看來，農奴制的崩潰過程可分爲農奴自由化的過程和無產化的過程。這雖是同一過程的表裏二面，但在法國，這兩個過程沒有同時并進的場合也是有的。

法國農奴自由化的過程，從十二世紀起漸次有所表現，到了十六世紀，農奴已獲得人格上的自由了。其原因：

（甲）由十字軍及其他原因而引起的都市的勃興，同時隨貨幣經濟，生產物商品化的進展，致使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莊園制度，不能不漸次崩潰。在這個場合，一方面因爲十字軍及其他各種戰爭而增加國王的經費的支出，國王漸次依賴都市商業資本家，因而加强了後者的社會勢力。這樣在封建的隸屬關係下，苦於苛重的種種負担的農奴，由於逃亡到自由的都市而獲得自由，這使領主要想使農奴定住在自己領土上，便不能不多少與以自由。

（乙）都市的勃興增加了都市對農作物的需要，致使從來生產效能低下的農奴制，不能充分滿足社會的需要，而促成農奴制的崩潰。

（丙）更重要的原因是十字軍和其他軍事的事業，以及十字軍以來的奢侈風習，在在都使封建領主的貨幣支出激增；爲獲得貨幣，領主允許以貨幣來代替農奴的一切負担。這樣，特別在非常的場合，繼續地，或立即納款，則領主與農奴以自由。

由於這些理由，在法國的各地方，引起了封建的莊園制度崩潰和農奴的解放。法國莊園制度的崩潰和農奴的自由化，不像在英國那樣，農奴立即變爲無產者。在英國，由於圈地（Enclosure）小農民的保有地，漸被併合於貴族的大所有地。跟隨這種貴族的大土地制度的確立，在別方面，在此土地上卽實行大農制度。但在法國，相反的，貴族的大土地制度不發達，寧可說農民的土地保有制度才是支配的形態，而且實行的是小農制度。法國和中歐的大部分，尤其是和東歐不同，在後者，貴族的大土地所有繼續擴大，到現代更大。像這樣的土地分配的現象，給予法國社會以一特殊性，而且使法國的歷史發展受其顯著的影響。那麼在法國爲什麼小農民的保有地多，而且小農制度是支配的呢？關於這點，只看中世紀末葉以來英國農業的發展卽可明瞭。在英國，羊毛工業的發展刺戟着貴族及新興布爾喬亞把耕地變爲牧場，由於圈地（Enclosure）而擴大了他們的所有地。莊園制度的衰微及中世以來借地的不安，使此變革容易得多了。英國的貴族，對於只能給他們以極少利益的借地制度，沒有多大的關懷。而且，因爲十七世紀之間的各種革命，土地貴族和新興布爾喬亞中的一些人，利用政治權力，自由併呑許多土地而據爲已有。但在法國，情形却完全不同。商工業的發達，較之英國

論遂，貴族在十七世紀以後卽屈服於國王權力之下，而且國王爲防止貴族跋扈挽回其勢力，故反對擁護的土地收奪和貴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加之貴族有利益較大的廣大的領主權，他們也不想破壞隸屬於領地的農民的土地保有制。這樣，小農土地保有制度得以存續發展，這跟法國農業發展遲緩的事實相隨伴，致使小農制度可能長久存在。Arthur Young 在法國大革命前夜，旅行法國，驚嘆和英國大農制度完全相反的小農制度之佔優勢地位，此等農民，他認爲是自耕農，當時法國的農制他認爲是以自耕農制度爲特色。但是，實際上這些小農民不是完全的土地所有者，不能不服從於貴族的土地支配權，他們不是今後的自耕農，而且當時的農制也不是眞正的自耕農制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之確立，是由法國革命把封建的諸制度完全排除了以後的事情。

以上我們已經略述法國農業制度的發達情形——尤其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因此在法國雖早已實行農奴解放，然而這只是身分上的自由化的過程，決不像英國那樣是同時無產化的過程。* 因此，在法國大革命前，農民所有土地佔較大的比例，而且實行的是小農制度。這是和英國的原始蓄積過程不同的特殊點。

但是在革命前，也決不是沒有創設大農制度的運動。在法國大革命前三十年，採用所謂英國式(A l'anglaise)的大農制度的運動，在地主方面發生了出來。

此種大農制產生之理由是：（一）英國式大農制的利益較大，能增加食料供給漸增的人口；（二）因法國農業不進步，較之當時人口，糧食的生產不足，差不多每年飢饉，故不能不設法增進農產；（三）法國農民普通都很貧乏不能要求他們改良生產，故只好由地主方面想辦法。此等情形，和重農學派「回到自然」的宣傳相呼應，採用英國式大農制的運動，遂在地主方面發生了。

* 在英國，農奴的自由化的過程和無產化的過程同時出現。反之法國的農奴解放，和自由化同時是把土地讓與農民。農民被奪去土地，跑到都會變爲無產者的事情是少有的。這是法國流行小農經營的原因。但是，結局還是無產化。在此卻有一般性存在。卽小農民因生活困難離開土地到都會變爲自由勞動者。——總之還是隨伴着封建的殘滓的自由化，不完全的自由化。

這個運動，沒有達到徹底破壞從來的小農制的力量，但在巴黎及其他大都市附近，部分的實現了大農制。這說明了爲當時大農的利益而驅逐小農之社會的重要意義。一方面，苦於當時物價騰貴的地主，爲增加收入而提高地租，分割公有地的運動，在地主方面也發生了。這奪去了無數農民利用森林（燃料和建築材料的來源）和牧地的機會，無疑的更促進了農民的窮困化。加之，領主用於農業改良的費用較大，因而增加借地農的負担，更要求達到現在少有支付過的「封建的支付」。由此釀成的一般農民的不平，是法國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時都市的新興布爾喬亞，要求憲法和租稅的改革，而農民則要求更大的土地，而且要求從封建的負担解放了出來的土地。

這樣，1789年八月四日終於發表了所謂萬人之自由與無償廢止領主權的宣言。這樣，當時還殘存的人格的不自由，領主裁判權，領主權，什一稅等等都撤廢了。這個宣言，由八月十日的勅令，得國王的裁可，但其實施尚須更精密的規定。因此，在原則上，在形式上廢止了的舊制度，在事實上還依舊存在。立憲議會下的法律，在最初，事實上沒有實行，其結果農民失望，各處發生暴動和叛亂。八月四日的宣言與八月十一日的勅令，不過是空文，這從百姓向立法議會請願，強迫實行廢止封建的各種權利的事實，卽可判明。由1792年六月十日的勅令，從來農民最感痛苦的 Droit Casuels 結局無償廢止了。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到二十八日，這個原則擴張適用到封建的年貢及其他每年的支付。由於這些命令，從1792年末到1793年封建領主的各種制度，事實上已經廢止了。但是對於封建的各種權利的廢止，還有一定的限制。於是發生了農民要求廢除此等制度的運動。這種反封建的農民運動的强大化，以及外國的干涉，和王政復古的危機，迫使革命議會全部實現農民的要求。卽由1793年七月十一日的命令，一切的支付，一切的封建負担與年貢，不問是經常的或臨時的，由1792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命令還殘存的一切封建負担，都宣告無償廢除。故農民可能不支付任何代價而變爲完全的土地所有者。

其次，再看法國革命給與土地所有的分配以何種影響。十八世紀農民所有的土地面積，在革命時期增加極微，因從貴族及教會

所沒收的土地，不過是全法國的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而且這些國有地的出賣，是因為財政上的目的。即主要是為籌集戰爭必須的經費。其結果貧農不能購買國有地。固然，由貴族及教會的土地出賣，而復活舊時的封建制度，是革命後新政府所反對的，故最初的方針，決定分配土地給無數的小農民。這樣1792年的命令，許可農民分作十二年繳納，後因要速籌財政上的收入而廢此條件，故對於一時支付全部金額者給與一種優先權，而土地也不一定有細分的必要。其結果，此等土地變為許多新興布爾喬亞的所有，許多農民卻難於購買土地。總之，法國革命，雖使農民得了一些土地，但入布爾喬亞之手的土地則較多。

由上述可知：新興布爾喬亞變成了相當大的土地所有者了，但此等土地，決不像在英國那樣，在大農制下作資本主義的經營，卻加以細分而借與小佃農經營，故革命前小農制佔優勢的這種特質，在革命後仍維持如故。這樣，封建制度的廢除，在法國比之英國，其產生自由無產勞動者，是遙為微弱的。這種事實，也可能說是法國資本主義在原始蓄積過程上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殊性；同時這也就是使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和英國的「典型的發展」發生差異的一種根據。

第三節　產業革命

據上述可知法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在其原始蓄積過程，第一因資本蓄積的緩慢；第二因行會制度，農奴制度的崩壞較遲，使自由無產勞動者的發生也非常緩慢，致使法國的產業革命比英國落後五十年之久。法國產業革命之落後，下列種種因素亦不無影響：

（1）市場的狹小——在法國國內，則因全國的統一的市場形成較遲和農業的自給自足的傾向；在國外，則因殖民地的喪失（由1713年的 Utrecht 條約，法國不得不以重要的經濟的領土讓與英國。例如：Gibraltar, Minorca, Newfoundland, Hudson 灣之南俗稱 Canada 之前哨的 Novascotia），而使市場狹隘化。

（2）貿易政策的失敗，拿破崙統治下的消極的關稅政策。

（３）煤鐵的缺乏——「……法國比較缺乏法人所謂工業之「麵包」的煤。雖則法國煤的生產，已由1850年的稍爲超過4,000,000公噸，增至1913年的41,000,000公噸，但這增加量比之德國1913年的279,000,000公噸和比之英國1913年的292,000,000公噸，是不足引人注意的。法國也缺乏鐵礦去建築他的基礎工業，以利用這些煤而製造新的經濟社會之腕力的機器。當甚件的製法可改善這種情勢的時候，洛林被人奪取了，並且失掉他在盧森堡的優勢，在萊因河上，突然建立了一個比之英國爲新的及較爲危險的敵人。」（Knight, Barnes & Flugal: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區克宣章植中譯本三三六頁。）

（４）因維持巨大的軍隊而使勞動力減少。

（５）歐洲的各種戰爭，尤其是拿破崙戰爭，使法國的社會經濟受種種不良的影響：

a. 勞動力的喪失——拿破崙戰爭的戰死者約有二百十萬人，其中百萬人爲法人，因戰爭而發生的間接的人口減少尙未算入。

b. 原料機械輸入的杜絕，輸出的激減，法國工業受一極大打擊。本來在大陸封鎖令發布以前，法國的工業在某種方面也開始利用機械，大陸封鎖的結果，英國的機械輸入杜絕。法國工業的發展受一大打擊。例如在里昂1787年有機械一萬五千架，到了1841年則激減到八千架了，因此 Ame 說：「和英國工業家的生產物的平常一切接觸疎遠了二十五年間以後，恢復和平時，陷於較戰前更落後的狀態了。一方面，在英國，機械漸次發達了起來；反之，在法國差不多就沒有發達。」

c. 貿易的激減。（單位百萬鎊）

	輸入	輸出
1799—1802止年平均	14.5	12.0
1805—1806止年平均	18.4	15.0
1807—1810止年平均	13.4	14.0

1811—1814止年平均 11.0 14.5

d.財政困難——因拿破崙戰爭，法國公債增加46萬萬佛郎以上。

總之，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歐洲的各種戰爭，尤其是十九世紀開頭的拿破崙戰爭，一方面使法國及其他歐洲諸國的產業發達受了很大的打擊；同時，卻使英國一躍面為產業資本主義國，現出了比其他各國更為繁榮的狀態。牠沒有根本阻止基於產業革命的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能力。

這樣，在法國，產業革命在1820—1835年才漸次開始。因為一方面，1789年的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的打擊，到了1825年頃才漸次恢復，國內的一般的繁榮狀態給工業發達以一大刺戟；在別一方面1825年才解除了從英國輸入機械的禁令，此後法國才可能易於利用英國的進步的機械。1830年的七月革命，更促進了這種情勢。因為七月革命是新產業勃興後掌握社會實權的新興布爾喬亞反抗從來的保守主義的結果。固然，法國的產業革命因法國國情的特殊性，沒有像英國那樣的大規模的進行，因此到1850年為止，有許多地方還維持着手工業的舊態。

縱然就是這樣，法國的產業從十九世紀開頭以來，也有顯著的發展。今試分類言之：

第一項　工業

纖維工業　法國的主要工業，就是各種織造業。『在十八世紀，在 Flanders Normandy, Britany 這些地方，由手工的生產，製造了一些非常精美的麻布。法國革命的時候，這種工業曾受過一時的打擊，此後又再發達，但是由動力運用的紡錠漸次採用了，因為知道動力紡錠的使用，只是多數的各等級的棉紗的製造價格低廉，而並不致影響棉紗的質量。一直到1850年，動力的機器還沒有大量的應用於麻布的織造，這動力的機器就先是在附近於法比兩國邊界的地方採用着，這些地方既有豐富的煤的供給，而所製造的

棉布已很適合於機器的生產。Normandy，尤其是 Britany 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是用以前的手工業方法製造最好的棉布，并不感覺着機器生產之嚴重的競爭的。1850年之後，麻紗的輸出一天一天的增加，到了1859年，其輸出價值已達到15,000,000法郎，五年之外，又增至24,000,000法郎。在紗棉的生產上，機器的生產是很普遍的，其直接的競爭是在於亞麻的生產方法的不同。所以英人開始劇烈的競爭，尤其用一半由棉製造或全由棉製的麻紗代替品和機器的麻紗競爭。1870年之後，法國的棉綫生產現出絕對的衰落。偶然存在的是手織的麻布而不是由複雜機械所生產的麻布，在歐戰將近產生的時候，差不多用於製造麻布的機器都是各種的手織機。棉布是用機器製造，并且在市場上奪取一些麻布的銷路的。在分工上說來，法國是有他本國最好的手織貨物」（上揭 Knight 等著書三四三—三四四頁。）

羊毛的紡績和織造，在十九世紀初期，分配於整個法國，其種種程度的集中情形，可以在 Reims, Amiens, Evreux, Sauviers, Sedan, Roubair，這些地方發見，法國南部集中的情形則比較少。用動力紡績和用動力梳刷，比之用動力製造，其發展較為迅速，這種用動力的織造，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差不多是不關輕重的。不像英國所顯實的顯勢，毛織物的輸出，從1830年代後半期起，計三十年間，增加五倍而達於一千六百萬元。原料羊毛，在1835年以前，由國內供給，其後因為事業的發展，輸入額漸次增加，戰前需要額約八分之七，是來自外國產羊毛。

絲織物以出產高級貨物馳名。1801年享受特許的自動織機甲跨兒（Jacquard）代替了從來煩瑣的踏板操作。這種織機，1824年全國有一萬部，十五年後便增加到五萬七千部了。然而法國普遍使用動力機的非常少，1866年計有絲織機十二萬部，其中動力機不過五千，直到大戰前夜，還只增加了四百部。絲織物工業，大部分在法國的南部，以里昂為中心點。絹織的貨物（包括長襪在內）是在 Troyes 生產，室內裝飾品則在 Roubaix 和 Tours 生產，花邊則在 Saint-quentin, Caudry 和 Calais 這些地方生產，其他則在北部生產。阿爾沙斯也有一些絲織物的工廠，都受着關稅的保護而安全經營着生絲，因十九世紀中葉，蠶虫的微粒子病猖獗，及蠶

彝士運河開通後，東洋生絲輸入額的增加，產額漸減，今日僅能出全國消費量的四分（1/4）了，但是人造絲的出產，却在歐洲佔第四位，近來年產約有三千萬斤。

棉業從1815年恢復和平後，消除了原料棉輸入的困難，這個工業就很迅速地在關稅保護的壁壘下發達了起來，產業革命一起首，便使用著動力出產以阿爾沙斯的 Mulhausen 爲中心，1815—40年之間，增加了三倍，此後因1871年的普法戰爭，喪失了阿爾薩斯，棉業中心遂移於北部的 Rouen 地方。在1913年，在法國的輸出貿易中，棉織物僅次於絲而佔第二位，輸出的總價值爲385,500,000法郎。在歐戰之前，法國棉織物紡錠的數目佔全世界第五位。因爲法國大概只有七百萬個，而俄國有八百萬個，德國有一千萬個，美國有二千八百萬個，英國則有五千六百萬個。歐戰後，德國喪失阿爾沙斯洛林之後，約有二百萬紡錠割讓與法國，使法國一躍而居全世界的第三位，歐洲的第二位。

重工業　其次，讓我們看一看煤與鋼鐵的生產。法國煤的生產，往往不足供本國市場之用。在十九世紀初葉，年產百七十萬噸，至該世紀中葉即增至五百萬噸，末葉更增加到二千六百萬噸，歐戰前已躍進爲四千一百萬噸了。法國煤礦的開採，其位置的適宜和開採費的低廉，是比不上英國的煤礦的；煤產量也不及英國的七分之一。煤的產地，主要的是在北部與比國接境的地方，歐戰後因爲獲得了薩爾煤區，又接受德國每年須支付七百萬噸的煤，使煤的供給量激增，1928年達於五千三百萬噸。但因從德國獲得其鐵礦的三分之二，遂迫得必須輸入製鐵用的煤了。這就是1923年要佔領魯爾和1926年要組織大陸粗鋼同盟(Continental Steel Combine)的主要原因之一。煤產量的缺乏，妨礙了法國的工業發展，故法國不能不從水力發電事業上去探求彌補的方法。法國的大量水電力，（供給了法國全部的九百萬馬力的三分之一）使它成爲歐洲第一的水電力國家。

法國的鋼鐵工業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因鐵礦和焦煤較少，以及鐵礦和焦煤的產地距離太遠，而受了相當的阻礙。一直到1580年間，熔鐵還是多用木炭。一般工業的發達，鐵路建設的急進，鐵的需要激增，非常刺戟着生產，1816年至1828年間生鐵的出產額差

不多增加了兩倍，以後二十年內大約又增加了兩倍。1847年的生產額爲六十萬噸，比之1821年的二十二萬噸增加了一些。到了1880年代後有百三十萬噸的鋼產額，大戰前約達三百八十萬噸，戰後因有從德國收回了洛林的鐵山，出產鐵礦二千萬噸以上。但是洛林的鐵礦，從品質及位置各點上說，都依舊運往德國魯爾地方精煉的多，結局1927年法國產鐵爲九百三十萬噸，產鋼爲八百四十萬噸，約比德國少九百萬噸之多。

最後，試對法國的機械，造船，化學工業，稍加說明。法國的機械製造工業，發達遲緩，通十九世紀不能成爲有力的事業。工場使用的馬力較少，多數使用手機。例如在拿破崙時代，大多數機器不及十個馬力。據1847年的調查，蒸汽機共有4853部，而馬力的總數則爲62,000，換言之，是每部平均馬力爲十二又四分之三。到了十九世紀末尾，法國工業所用的機器爲75,000部，而馬力則爲1,750,000，這雖表明了工業上之極大的進步，但蒸汽機平均大小在50年內還未增加一倍。可是到了二十世紀，馬力的使用便迅速增加，戰後輸出大增，發展到對德輸出品的第五位。汽車工業，稱爲歐洲第一，1926年創立的 Andre Citroen汽車工廠，是在大戰中按照美國式而簡單製造設計的，其設備的完美與能率之高，堪稱歐洲無比。反之，船的建造卻不甚起色。1880年法國商船在世界上佔第二位，但到了1914年又降到第五位。當歐戰將近爆發的時候，法國約有 500 隻輪船和 400 隻帆船，總噸數約爲1,400,000噸。單是德國一個漢堡美國輪船公司（Hamburg American Line）便超過法國的輪船有餘。但戰後，「都隨德國的沒落而勢力增高，爲了確保殖民地及準備發展南美間貿易，改良造船補助金法，以圖商船增加的結果，近來已達到三百五十萬噸了。化學工業是從二十世紀初頭特別開始發展的工業部門，近時關係從業員數，計十萬，由於進得了硫酸，硝酸，燐酸，煤脂（Coaltar），染料，酒精，防腐劑（Arbos）從德國輸入的苛性加里（Potash）醫藥品甚多。

據上所述，可知法國工業發展的大概情形。一般的說來，法國的工場經營規模較小，十九世紀末，五十七萬個工場中，就有五十三萬個僅使用不滿十人的從業員，多數皆用小馬力。」（東晉太郎著，歐洲經濟通史，中譯本二五四頁。）這是因爲在戰前法國工業資

本主義化的速度較緩以及資本累積的落後，致使中小工業得以廣汎地遺留了下來。

第二項　農業

直到1789年，農奴仍是構成法國農村人口的非常重要成分，尤其是在東北的地方。但是，「隨着大革命的爆發，封建的特權也被廢止了，隸農階級不須作何等的賠償，而被免除了從來的負租義務。但所免除的，並非那種確定的契約，只是習慣上的封建上的特權，故如佃作制度，仍被保存，而與從來一樣。不過由確定的契約所賃借的土地，在混亂中，所有權轉屬於隸農的也不少，市民階級購入的土地也多。稍後即原住於公有地的農民，只要獲得權利者三分之一以上的贊成時，也可分割公有地而變爲私有。關於這種土地分配的新制，在拿破崙之下遂確定爲法律，就是到了王政復古時，也未加以變更。結果在大革命前全國地主爲四——五百萬人的，茲則大概又加上了五十萬人。」（同上，一五六頁。）加以由於大革命而沒收封建貴族僧侶的大所有地，分配給獨立小農民，愈使小獨立農民在國民經濟上佔着主要的地位。大革命的結果，廢除了一切的封建負租，確認農民階級的社會自由，所殘餘的僅經濟的契約關係，致使農村經濟的全貌變爲現代的姿態。然而法國却與英國不同，農業技術的改良還不急進，土地的小所有制度，妨礙了他的發展，更進而遲延了農業的資本主義化。但在和平恢復後，到了該世紀的中葉，因爲對土地的愛護與勤勉，加上政府的援助，却造成了堅實的進步。從當時每年增加人口二十萬，革命後六十年中，小麥的生產量增一倍半，葡萄增二倍半，馬鈴薯更增至五十五倍的事實觀之，就是證據。

所以，「大致說來1815至1847年是農業猛進與農村興旺時代。國無外患，人民雖有時爲政治問題所煽動，而大致都得安居樂業。這個時期中的順利情形，可證之於事實，在1815年至1846年之間人口增加率每年約二十萬人，總計增加六百萬人。1789年至1848年，小麥產額由九千三百萬袋升至二萬七千五百萬袋，葡萄酒產額由三萬七千四百萬「加倫」（Gallons）升至九萬二千四百萬「加

倫」1848年之後進步稍滯，因推翻阿連斯黨皇（Arleanist monarchy）而致政治上之不安寧，第二次帝國（The Second Empire）之建立，The Crimean War, 1859與奧國戰爭，霍亂症之流行，1853及1855年之歉收等事，致使人民棄土地而破壞農業的功積。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中，法國農業利益覺不曾有一時恢復以前的盛況。然而1863年之後，開墾曠地之事在各地舉辦起來，農業機器亦經大量輸入。有一位英國觀察家說法國在1840年時用馬輾穀是常見的事。但據1862年的公家報告書表現法國有打穀機十萬部以上，其中約三千部是用蒸汽轉動的。科學的輪種方法，土壤培壅法，和施用肥料法都傳播開了。」（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中譯本二〇八—二〇九頁。）實行科學的農業經營的結果，小麥在1815年，收穫二千五百萬石，至1850年恰增一倍而達於五千萬石，1870年以後，又增至年收五千四百萬石。其間收穫率也增加四成餘，每二英畝半收七石八斗。在歐洲小麥生產國中，次於沙俄而居第二位。其次則稱大麥玉蜀黍，裸麥，尤其特別的是甜菜和馬鈴薯，葡萄。在1812至1888年之間，畜牛之數增加了一倍以上。養牛業急增，酪農漸次發達。

到了1870年，法國農業也遇到了英國所曾經驗過了的農業恐慌——因與國外競爭，農產物價降低而引起的恐慌。因爲法國政府對農業上的援助，雖沒有遇到像英國那樣的大打擊，但農業資金銳減，農產物價降低，很嚴重的妨礙了法國農業的發展。「隨着農業不景氣的進展，農村的土地的所有形式，也起了變化，到了1890年以後，二英畝半以下的小土地所有，非常減少，相反的，二十五英畝以上的大所有地，日益增加，尤其農業勞動者的逃散日加顯著，現出了急激的土地集中運動。（雖然如此而自耕農却有增加的傾向，全國農地四分之三都屬於此。）

其次，歐洲大戰對法國農業的打擊更加深刻：農地荒蕪，動產毀滅，農業勞動者被徵發出征。但是，戰後的復興工作，努力進行，短期中即挽回了戰前的狀態。「由官廳的調查，指明歐戰時約達3,337,000,000畝的荒蕪土地中，約有95%已在1925年頭恢復原狀，其餘許多土地在最初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上揭 Knight 等著書二五二頁。）同時，差不多減半了的農業產額，六年內也就現出了

以前的數量，到了最近，小麥產地達三百七十五萬英畝，釀酒額達於三千二百餘萬石。

最後，法國農業雖有其弱點，但在歐洲各國情形中要算是最滿人意的。出產的種類甚多，而且大部分的耕地面積非常良好。歐戰後，加上了良好的農業區域，同時也是工業極發達區域的阿爾沙斯·洛林，則比之歐戰前的統計所指明的45%為耕地4%的葡萄園19%的森林，12%的草地，其中只有17%的「不生產的」土地，等等的情形也沒有什麼差異了。（所謂「不生產的」土地，是包括着城市位置的地面，住宅區，河流，山地和其他不可利用的土地。）

第三項　交通運輸機關

公路　優良公路的建築，法國比之歐洲大陸各國都較早，而且在現今歐洲沒有那一個有比法國更好的道路制度。第一法國有空闊的道路，名為「國道」(Routes nationales) 以巴黎為中心，由此分達於各省會。國道是由國家保持的，在1905年法國國道總長度為二萬四千英里。其次是「郡道」(Routes Departementales) 通常是照馬加丹 (Macadam) 法修築的上等大路，在1903年時總長為九千七百英里。郡道由各郡保持，但須受Minirtry of Public Works監察，再其次有里數更大由各自治區主持的各城市通道，名為「局道」(Petite Vihie) 縱橫交錯的公路，促進了法國經濟的發展不少。

水道　「法國包有四條便於商旅的大河，此外尚有多數小河，或為大河支流，或單獨流行，這四條大河是色因河 (The Seine) 通航長度339英里，勒列河 (The Laire) 通航長度285英里，龍河 (The Rhone) 通航長度309英里。色因河支流密佈，縱非全歐洲的最長河系，也可算法國的最長河系。」（上揭Ogg著者二七一——二七二頁。）

三百年間法國政府曾經用種種的方法把以前狹小的低淺的急湍的河流改變運河，并且把這些運河連接起來成為彼此相通的內河水道。當歐戰爆發之初，天然水道改良約有7,000公里，而其他橫的和接續的運河約有5,000公里——用英里計算，兩者合計

起來約爲 7,460 哩。這種水道全體，在歐戰之前每年可載運三千八百萬噸的貨物。約爲鐵路每年所運輸的一萬萬九千萬噸的貨物的五分之一。單巴黎一埠，所有此項水運貨物之總數爲一千三百萬噸。

鐵路　法國大約是因爲煤鐵較少和道路異常良好之故，所以開始建築鐵道比隣國較遲。法國於1832年第一次購得一個火車頭，而里昂 (Lyon) 和聖德田 (St. Etienne) 之很短的路線，可以說是法國鐵路建築的開始。可是就直到1841年，法國鐵路的總長也只達到 306 里。

當十九世紀的後半期，鐵路的建築，繼續進行，只是由妨礙一般工業之發展的一些力量所阻着，以致政府希望所給與鐵路之廣大的財政上的援助辦法取消了，這時(1859年)只可保證一些鐵路之債額的利益。然而一直到1850年法國鐵路的總長只有 7,167公里。1885年增至29,839 公里，1900年增至38,109 公里，到了1913年增至40,933 公里，歐戰的時期，鐵路的總長則略爲減至36,000公里，到了1920年連合併的區域包括在內，鐵路的全長又增至50,000 公里，若以英里計算，1913年約爲25,600 英里，歐戰時期約爲 24,400英里，歐戰之後則略爲超過31,000 英里。

……………………

交通運輸機關的改進和發達，一方面表現出工商業的發展；同時，更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達。

第四節　結語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知道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它那原始蓄積過程上，因爲：

第一，資本的原始蓄積不足（因爲政局不安，大部分資本不投放在新興企業上，却用來買官，購置田地，或浪費在宮庭的靡費和戰爭方面）

第二，市場的狹小（國內市場，則因政局不安和苛酷剝削下民衆購買力低微；國外市場，則被英國獨佔）；

第三，大革命雖將農民從封建束縛裏解放了出來，但因被沒收的大所有地（從前屬於封建貴族和僧侶的土地）分配給了獨立的小農民。這，一方面使小農民在法國的國民經濟上越加佔着主要的地位；同時，因爲農民的被解放他們的自由化，却沒有跟他們的無產化同時併進，致使工資勞動者的供給，不像英國那樣的順利；

第四，因戰爭革命等等而釀成的政局不安。

這種種原因的湊合，遂使法國的產業革命，比英國落後約五十年之久，直到1825—35年頃，才漸次開始。

大戰（1914—18年）前法國工業的發達，跟英德等國相較，其速度比較緩慢，其基本原因，是缺乏煤鐵等主要工業資源；而且這些資源的產地，散在各處，故難有集中的重工業的發展，從而輕工業，需要特別技術和熟練的特殊工業，構成爲法國工業的中心。

工業資本主義化速度的緩慢，資本蓄積的落後，致使許多中小工業可能殘留下來。例如以法國的工場經營規模來說，在十九世紀末葉，五十七萬個工場中，就有五十三萬個是使用小馬力而用人也不上十人的小工場。

工業資本主義化的緩慢，影響到農業的落後；在法國國民經濟上佔着主要地位的獨立小農民（因而小農制）的優勢，更遲延了農業的資本主義化。

這樣，廣汎的獨立小生產者，中產階級，以及他們的放款資本的貯蓄，正是使法國資本主義帶着食利者(Rentner)的特質的主要根據。因此，我們可能指出法國資本主義的特徵：

第一是因爲產業革命的不徹底資本蓄積的落後，而形成的小生產者（手工業，中小工業，獨立小農民）的優勢；

第二是食利者階層的顯著地位，因而「法蘭西人是歐洲的高利貸者。」（伊里奇著，吳清友譯帝國主義論一二四頁。）

本章主要參攷書

Knight, Barnes, & Flugel: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臨宪黃秉植譯近代歐洲經濟史。)

F. A.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李光忠譯近世歐洲經濟史。)

平貞藏著：法國經濟史（日本改造社經濟學全集第二十九卷，中華書局已有淺壓如的譯本。）

東乞太郎著，熊得山譯：歐洲經濟通史。

住谷亮一著：近世社會史（唯物論全書中之一）

波查洛夫等著：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四分冊。

Gemain Martin: Histoire economrque et financiere.

Henri See: Esquisse dune histoire economrquo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Lamprecht: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frangosischen Dirtschaftslebens.

J. H Clapha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第九章　德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第一節　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經濟

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在政治組織上也好，在經濟發展上也好，都比英法兩國要落後得多。例如在1816年，德國總人口2480萬人中1900萬人（即76.6%）是農村人口。在德國資本主義發達最早的普魯士也好，其總人口1000萬人，73%是農村人口，其他的人口雖然集中在都市，但是都市人口的半數還是農民。所以當時德國全人口80%以上，是從事農業的。1800年柏林僅有15萬餘人口；人口五萬以上的都市，僅有 Warsaw, Breslau, Königsberg；人口超過一萬的都市，只有十四個；而這些都市還充分帶着村落的風味。其次，以德國的工業來說，到十九世紀中葉為止，手工業依然佔支配的地位。在英國和法國，因為集中在大都市，尤其集中在首府的有力而富裕的布爾喬亞，破壞了封建制度，再不然，至少在英國那樣，縮小到不足取的程度了。反之，德國的封建貴族，還保持着舊日特權的大部分。當時德國諸邦，分裂為 36 個小國家，各有獨特的法令，關稅政策，和各不相同的度量衡。農業佔有支配的地位，在都市，行會制(Zunft) 的手工業還佔着堅固的地盤。德國的農業革命，到了1840—50年才開始就緒。

到了1848年，德國才發展到「法國的1789年」的程度。即國內資本主義諸關係的成長，急切要求國內市場的統一，統一的政府，勞動力與商品的自由移動。1803年由「法國革命之子」的拿破崙所主唱而召集的德意志帝國諸侯會議，整理合併了 112 個小國，這正是德意志統一的最初的曙光。此後，1834年，以普魯士為盟主的北德十八國，結成了「關稅同盟」(Zollverien)，撤毀了相互之閒的經濟的國境，其結果，這個地方的商工階級的利害統一，而勢力也集中了。這樣，增加了財富與勢力的普魯士布爾喬亞為改革妨

礙自己利益的舊德意志政治結構，結成自由主義的反對派，站在全德意志商工階級的最前線鬥爭。

農業 大略到十八世紀初期爲止的德國農業，依然被封建主義固有的原則所支配。即第一，是自然經濟的支配。封建領地，好像是封鎖了的獨立國，它和其他地方，只有極鬆懈的連絡。領地內的生產，差不多全是自給自足，農業經營的規模和方法，長久不變流行着三圃式的強制耕作。第二，在這種制度下，必須把生產手段（土地）分給直接生產者（農民），并須把他束縛在土地上。在德意志，農民的土地處分權，受了顯著的限制，或者全被禁止。第三，是農民在人格上隸從屬於地主，領主對農民有裁判權，警察權，完全束縛着農民人格上的自由，而且農民的土地，由領主的命令，隨時都可能自由沒收。從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初，在德國的一些地方，雖然實行了農民之人格的解放，而緩和了農奴制，但從大體上說來，到了1848年爲止，各種封建關係的種種的重担，仍然壓在農民的肩上。

德國的土地所有關係，因地方的不同而發生相當的差異。在西北德意志，從十二世紀末都市便開始發達，農產物價格騰貴，農業收益增加，致使許多領主廢棄了用農民的賦役來經營的自家農場，改變爲農民的定期租佃地。到了十六世紀，國王爲加強農民的納稅能力，增加國庫收入，因而保護農民的耕作權，禁止領主增徵貢稅。在西南德意志，由貨幣經濟的發達，漸次盛行繳納貨幣代替徭役勞動，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係，漸次轉變爲收租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總之，在西部德意志，因爲貨幣經濟的發達，農奴制度多少解體了。

但是，在東部德意志，領主經營着利用農民徭役勞動的企業的大農場。在這裏，農奴制的地主經濟，一方面相當保存其特權的性質，而又漸次使自己適應資本主義的各種關係，在這個農場勞作的農業勞動者，他一身兼有近世工資奴隸的貧困和中世農奴的無權利。

工業 在1846年的英國，四人中有一人從事工業；而在德國，十二人中只有一人。在德國，資本的蓄積，就是到了1865年，較之法國的1789年猶處於劣勢的狀態。德國工業發達較遲的原因極多，據 Engels 看來，一因德國地理的位置不利，遠離世界貿易大道的大

西洋」因從十六世紀起到現今為止，有把德國捲入漩渦中的，而且在德國國土上繼續不斷的戰爭。

十九世紀初期的德意志工業還顯然是行會制手工業的勢力依然佔支配的地位。在1846年的普魯士，下面的數字就告訴了我們這個事實。

	人數	經營數
手工業者	840,000	457,000
工場勞動者	551,000	79,000

（小林良正，德國經濟史要，一〇六頁）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在發確制家庭工業上可以看見，其次是工場手工業。機械工場的發達，還是微不足道的。蒸汽機械的使用，1837年在普魯士為400餘架，1846年亦僅1000餘架，棉紗紡錠數約達50萬，而其中使用蒸汽力的差不多沒有，用水力運轉的佔58%，由獸力運轉的佔29%，由人力的佔13%。德國產業中很早即佔優勢的是纖維工業和鑛山業。棉紗紡績的中心，是在普魯士，薩克森，[illegible]內的機織業的中心，是在Silesia，石炭業的中心是在Ruhr（魯爾）地方。

商業交通 十九世紀上半期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如何呢？1830—50年間，德，英，法三國對外商業的總價格是這樣的：

	1830年	1840年	1850年
英	1,760	2,260	3,380
法	710	1,320	1,320
德	660	1,120	1,120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德國經濟之落後，及其資本主義漸次發展的情形。十九世紀前半期的特徵是對外貿易的入超，和代表農業

國性質的顯著。1842年輸入總額為五萬萬六千六百萬馬克。輸出總額為四萬萬八千八百萬馬克。輸入品中，木棉原料，糖，咖啡，佔一半以上；輸出品中，棉織物，穀類佔大部分，這是表示農業國的面貌。輸出貿易，次於英，法兩國，而居第三位；它的急激發展，是在中葉以後開始的。

商業的發達，和國內交通機關的發達有相互作用的關係。陸上的交通，可舉出大道路的增加和鐵路的通車。普魯士的大道路，在1816年有414英哩，1842年增至1,313英哩，1848年更增至1,537英哩，在此期間，發生了領土統一的機運，在北德成立了「關稅同盟」，交通組織的變更愈形必要，因而建築了鐵路。即在1840年鐵路長470公里，1845年增至2,300公里，1850年更增至6,[illegible]公里。其次，水上的交通由曳舟而發達了起來，1818年以後威悉爾河，萊茵河，愛爾伯河，多腦河等等河川，開始了輪船的交通。

海上航路普通是不發達的。在十九世紀的初期，有「漢堡輪船公司」「漢堡美洲輪船公司」的創立，形成為海外商船活動的中心。

第三節 原始蓄積過程

第一項 資本的原始蓄積

在德國，產業革命遲延的根本理由之一是在它的原始蓄積過程上的特殊性——資本的不足。*

資本的原始蓄積的源泉，除了商業以外，還可以舉出金銀礦山的採掘，包稅人，及收稅吏的貨幣資本的蓄積；高利貸，及諸都市人口和財富的增加而引起的都市地價的騰貴等等。

在德國資本的原始蓄積過程上，曾起著重要作用的，是中世紀及此後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蓄積。

十二世紀以後，到十五世紀地理上的大發現爲止的歐洲，在商業上可分有三大地帶：第一是北部地帶，這包括波羅的海及北海沿岸的諸國；第二是南部地帶，這包含地中海沿岸諸國；第三是在此兩地帶中間的中部地帶。

在這些地帶中，北部是活動的主要地盤。蓄積的巨額商業資本，及與此相關聯的，對高利貸資本的蓄積也有所貢獻的，第一必先指出「漢撒同盟」(Hansaland)（參看第四章第八節。）

其他在以南部地方爲舞台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蓄積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是 Augsburg 的 Die Fugger 家。

中世德國的資本蓄積，許多地方是爲漢撒同盟和 Fugger 家的活動。在當時，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蓄積，會超越英國之上。

那末中世紀的資本蓄積過程是怎樣的呢？而且在中世紀所蓄積的此等巨額的資本，爲什麼到十九世紀後半期復歸消滅呢？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德國，甚至較之法國也好，資本的原始蓄積爲何非常微弱的呢？在下面讓我們把這些問題稍加考察。

---

* W. Sombart 認爲中世的商業，對於資本的原始蓄積，沒有多大的貢獻。他爲證實此事，會指摘中世的商業利潤是非常之少的。但 Sombart 所指示的資料，爲數頗少，因而要想從此得出一般的結論，是相當危險的。加之，他專門只指出地方的商業的資料。然而，地方的商業，和在中世紀已經漸次發達的國際商業須分別考察。而且從中世紀外國貿易所獲得的利潤，也決不如 Sombart 所想像的那樣微少。而且都市經濟也決不像 Bucher 所想像的完全是封鎖的。例如意大利和 Netherland 的羊毛織紗商業等在中世紀這些國家裏，產生了許多利潤，這是在比較早的時代，在這些國家中所蓄積的巨富，這和以後英國的情形同樣，是不能否認的。其次，當時的商業組織尚未分化，例如商業與金融，在漢撒同盟的商人，常常是由一個人來經營的。從以上各點看來，Sombart 所斷定的中世商業對資本的原始蓄積沒有多大的貢獻，實在是使人疑問的見解。Sombart 本人也好，在其論及資本的起源上，只高調地租的蓄積，其他，在中世紀手工業者和商人蓄積了財產的事實，他也不能不承認。

甲，漢撒同盟的資本蓄積過程。

漢撒同盟以柏林爲中心，在北部由於主要地交易鰊、鱈等魚類及木材而蓄積了巨額的商業資本；在東部，則以俄國的 Novgorod 城爲中心，以俄國的皇室及貴族爲對手作羊毛及其他的交易；在倫敦以 Steelyard 爲根據地，把英國的羊毛和羅紗交易收入己手，一方面再作這些商品買賣的媒介而造成巨富。其次，又由通融金錢與英國皇室，而蓄積了巨額的高利貸資本。漢撒同盟又把東洋的香料，絹絲輸入各國，因此也蓄積了相當多的商業資本，這樣，漢撒同盟的勢力漸次強大，有時甚至廢立王侯。其次，促進漢撒同盟努力的，是劃時代的對丹麥的決定的勝利。由於十四世紀以來對丹麥的幾次戰爭，基於1337年的 Koln 會議，漢撒同盟除了是商業的同盟以外，更加強了它那軍事的政治的意義，健全其組織，整理共通的貨幣與度量衡；其次爲防備海盜而準備軍艦，爲保障陸路的安全而配置軍隊，有一個時期，完全壟斷了北歐的商務。故在德國中世的資本蓄積上，漢撒同盟實有很大的功績。但從十五世紀中葉起漸次衰微，其次由三十年戰爭而更加衰頹，終於在十七世紀完全解散了。*

乙，Die Fugger 家等的資本蓄積過程。 Die Fugger 家以南歐爲活動舞台，不僅蓄積了商業資本，更進而通融巨額的資金給西班牙德國等的皇室，蓄積了許多高利貸資本。德國西南部的都市，尤其是 Die Fugger 家之根據地的 Augsburg，是在黑海→多腦河→南德的商業大道，和意大利阿爾卑斯山→西部德國→萊茵河→北部德國的商業大道的交叉點上。這些都市，因爲地理上佔着

---

* 漢撒同盟衰亡的原因，約有之：(1)十五世紀發現新大陸和新航路的結果，使外國貿易的中心，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方面，致使漢撒同盟失去地利；

(2)英蘭等國在波羅的海的猛烈的競爭；

(3)德國內大諸侯國勢力興旺，同盟大受壓迫，且無強大的政治權力，尤其是統一國家的後援；

(4)同盟內部的統制到了十五世紀後半期以後愈漸鬆懈，

有利的地位，自中世紀以來曾蓄積了相當多的資本。Die Fugger 家借錢給當時歐洲一流的王室，其報酬是向這些王室强要對己有利的各種經濟條件，更進而左右歐洲的和平與戰爭，保有決定神聖皇帝選舉權的勢力。Die Fugger 家的資本在1527年爲 300 萬 Florin，1546年卽增至 800 萬 Florin。因此十六世紀甚至有人稱這爲 Fugger 時代。其次，巴塞爾最富的資本家，在十五世紀卽繳納 14500 Florin 的租稅，在 1453 年，大金融的資本家只是在巴塞爾便有26人。蘇里希的資本家 Waldmann 的全部財產，據稱有 33,000 Florin 之多。

在十五世紀，Welser, Grossenbrot, Herwast, Meuting, Laufruger, Pfister, Rehm, Sulzer 等八大商人，在參加葡萄牙的第一次遠征東印度，以後又參加對里斯本 Antwerp 的貿易，對於當時的金融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這八大商人，在十五世紀對 Venezia 的貿易也相當活躍。以十六世紀的 Augsburg 爲中心的他們的財富，大半是由這些商業活動的結晶。因爲在這些商業活動未開始以前，他們的財富極少，較之以地租與年貢爲生活的都市貴族還不如。但隨他們商業活動範圍的漸次擴大，這些商人的財富竟凌駕了都市貴族的財產。

Fugger, Welser 等等在德國西南部蓄積的大財產，一方面是經過 Venezia 交易藥品，香料，工藝品等東洋物產；一方面是因爲 Augsburg 及其他在十七世紀已經隆盛了的家內工業的發達。世界有名的 Augsburg 的大商人，例如：Die Fugger 家等，在十五世紀不只是買賣棉花，同時販賣 Augsburg 地方所生產毛織物，麻織物，及在該處加工的毛皮製品，而蓄積巨富。這些財富的基礎，除了上述的織物業，金物業之外，鑛山業也是必須舉出的。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了從中世紀到十六世紀德國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蓄積過程，知道了由漢撒同盟及西南德意志的大商人們的活動而蓄積了巨額資本的事實。但在十七世紀以後，德國却苦於資本的不足，這是什麼原因呢？普通都認爲這是因爲十五世紀末地理上的各種發現，把世界商業的中心由地中海轉到大西洋去了的緣故。但此理由，只能說明此後德國商業資本蓄積的

困難，却不能說明直到十六世紀所蓄積的資本，爲什麼到十七世紀，便大部分歸於消滅的事實。因此我們不能不追尋其他的理由：

第一，西南德意志的大商人們，尤其是 Fugger 家借給各國國王的鉅款，常常遇着停止支付的打擊；國王的破產宣告，不久便使這些債權者破產。例如1557年西班牙的國家破產 Fugger 家所受的損失；其次是1575年的國家破產，其次是1607年的第三國的西班牙國家破產時 235萬 Fuk 的 Fugger 家的損失，即其顯著的例證。故據 Ehrenberg 算來，綜合其他，Fugger 家因 Hapsburg 家的而受的損失，達 800萬 Culden 以上。其他，因通融金錢與法國國王而受的損失，也促進了 Augsburg 的大資本家破產。這樣，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南德的商業資本家開始沒落。在此場合這些大高利貸者不得不沒落的一個最大理由，就是當時德國沒有強力的統一國家存在，因此在他們背後，沒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作後援。

第二，十七世紀初葉以來，威尼斯開始衰微，因此南德與意大利之間的貿易衰退，其中 Antwerp 的衰微，商業中心轉移到印度的葡萄牙殖民地，海外貿易移於荷蘭人之手等等事情，和三十年戰爭及德國的政局混亂，更促進了資本的損失。

第三，在德國，從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所蓄積的財富，不像英國那樣，用於生產的產業方面，而投於消極的方面，這也是一個原因。這樣，在十六世紀，在財富的蓄積上優於別國的德國，自十七世紀以來，一轉而苦於資本的不足。其結果，在十七世紀，在工業方面也好，購買原料，及支付家庭勞動者的工資所必需的資金，換言之，即比較少額的經營資本，也痛感不足。固然，在新大陸發現後曾流入了多量的金銀。但德國差不多未受其恩惠，金銀只是通過西班牙，富裕了英法及荷蘭等國。不僅如此，金銀的流入，致使西南德國的鑛山不能繼續經營，德國反而受一大打擊。

其次，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資本的極端不足，除上述種種原因外，還有：（一）1815年以來拿破崙戰爭的影響；（二）由於低廉的英國工業品的流入而引起的巨額入超，從而正貨大量流出；（三）貨幣與銀行制度發達的不充分等等原因。*

第二項　工資勞動者的產生

在德國，無產勞動者羣的發生，也是非常落後的。其理由（一）行會制度（Zunft）長期維持；（二）農奴解放較遲。

（A）行會制度的崩潰

在德國，工業最發達的是普魯士。十八世紀末，在普魯士已流行着法國的Physiocracy（重農主義）和英國Adam Smith的自由主義。1791年法國之採用營業自由的原則，決定地影響了普魯士。但，在十九世紀初葉，普魯士的爲政者也好，學者也好，都對於撤廢行會制度相當躊躇。當時普魯士的先覺者們，採取一種妥協的折衷態度，注目於行會制度的好的方面，而對於壞的方面，則依據時代精神的自由主義，勸告應加以若干改良。在普魯士想改革行會制度，是在1800年以後的事情。1806年乃至1810年間，僅僅企圖部分的改革，只是對於若干工業部門，廢除了強制加入行會的規定。其次，實行了Stein Heidelberg Reformen。倣照1810年法國的例子，在

---

* 以上諸原因中，德國的幣制與銀行制度的發達較遲，也可以認爲是德國政治不統一的一種反映，因爲當時德國分爲許多小侯國，其間的形勢區區不一。德國的諸國，大半是銀本位制度，也有金貨流通。當時雖使用着相當於 3 Mark 的銀 Thaler，但此 Thaler 在各諸侯國內種類各異，而且金銀的比價也不一樣，加以還有小貨幣及代用貨幣流通，故德國當時的幣制，非常混雜。其結果許多銀行的主要業務是掉換此等混亂的貨幣。誠然，德國在1619年在 Hamburg 設立了銀行，但是主要的工作，是在救濟貨幣的混雜，銀行對於生產發揮重要的積極的機能，在德國是非常之遲的。總之，到十九世紀的前半期爲止，一般的德國銀行，大半以受動的業務爲主，其經營組織，也是很幼稚的。

現代的生產組織，不只是要有巨大的財富的蓄積，而且還須將此財富弄到企業家的支配下，必須使他資本化，換言之，必須一個信用組織。但是，德國的信用組織，較之英法二國，非常落後。這不能不說是德國產業革命的發生，爲什麼非常落後於英法的一個理由。德國信用制度是如何的落後，只看這個事實卽可證明，卽到 1840 年也好，資本及包含存款的金融力，德國尚不及英國的十分之一。

必須接受營業免許狀的義務下，宣言了營業的自由。誠然，像在1811年的法律上那樣，行會雖尙存續，但其基本因素的强制加入却被廢除了。這樣，各個手工業者，雖是脫退了行會，還可能擁護自己的營業，因而行會的會員早已不能享受特權。加之公定價格制度，又被廢除，由行會會員的大多數可能決議解散行會，而且在都鄙之間的工業警察上的差別待遇也廢止了。

行會制度的崩潰，主要的是因爲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新技術的勞動手段的發明，人口的增加，市場的擴大，使從來狹隘的行會制度不能適應新的環境而漸次沒落。其次是因爲行會相互間的內部爭鬥，致使行會組織的統制破壞了。最後，在德意志行會制崩潰的理由中，有一特殊的理由——政治的契機存在。在德意志，隨生產範圍的縮小，不只在經濟上，行會漸次變爲閉鎖的，在政治上較之英國也有一種特殊性存在。即在德意志，有都市的獨立自治主義存在，各都市在可能範圍內實行積極的行會政策。都市雖然合併到諸侯的領土內，都市依然實行行會政策，諸侯爲維持治安而監督行會，但沒有決定地左右都市中行會政策的力量。因此在十六世紀的那種重大時期，在德意志，行會仍可能普遍存在，實行着行會的決議。這個事實，確是德意志在中世紀末及近世紀初不能轉變爲所謂早期資本主義的理由因而也就是使德國的行會崩潰遲緩，使產業革命落後的理由。

至於上述的跟隨商業的發達，行會因此漸次崩壞的原因，在德意志則因國內關稅障壁的存在，交通不便等等理由，致使國內商業發達較遲，加以在十五世紀以來的國際商業戰爭上，德國常處於不利的地位，尤其是殖民政策之落後，使德國的國際商業的發展較之英法二國遠爲落後。因爲商業的刺激比較微弱，因而德國行會內部分工的進步，比較英法尤其較之英國，非常落後，總之，因爲上述的經濟的政治的理由，致使行會的存續在德國較之英法二國更爲悠久。

德國的行會制度崩潰的遲緩，一方面使熟練的自由勞動者要遲遲發生；他方面妨害手工的技術發展到機械的技術，又使大規模的工場經營的發展不可能，因而遲延了德國產業革命的發生。

（B）農奴制度的崩潰

關於德意志的農奴制度的崩潰和農奴解放，我們必須分爲南部西部和東部地方分別研究。

（1）西部及南部的農奴解放過程——農奴解放，在 Baden 州是在1783年受了重農學派影響的 Markgraf Karl Friedrich 統治下開始的。這樣，在 Baden 州，到處都廢止了無限制的徭役貢納，以及封建的其他種種壓搾。在 Bayern 州，在1808年 Montagias 的治下廢止了隸農制，還由1818年的憲法而加以確定。在 Hessen 是1811年，在 Württemberg 是1819年廢止的。這樣，在南部及西部德國，1820—1830年間，確定了農民移轉的自由，最後創定了有利的所有權。但從現實考察，Bayern 地方的農奴之眞正的解放，直到1848年爲止，還沒有完全實現。在這年，由國家信用機關的力量，用金錢或無償地，到處廢止了農奴負担的最後的封建殘滓。其結果，在德國西部和南部，農奴制度崩潰，土地從領主手裏移到農奴手裏了。*

據上述可知在德國的西部南部地方的農奴解放過程和法國的非常類似；即農奴的自由化，決沒有和他們的無產化併行；不同之點是：法國的農奴解放是急激的革命的，而德國的農奴解放却很緩慢，而且大半是由「合法手段」來執行的。故西部及南部德國農奴制度的崩潰要當作無產自由勞動者羣的源泉却沒有多大的重要性。

（2）東部的農奴解放過程——德國東部的農奴解放過程和西部的顯然不同。本來，在德國西部，沒有成立大規模的領地經濟（Gutswirtschaft），却流行着分散所有制，即所謂地租莊園制度（Renten Grundherrschaft）是支配的形態；反之，在德國東部，領地經濟或企業的莊園制度（Gutsherrschaft）却是支配的形態，這兩個地方的農業制度之根本的差異，決定了在工資勞動者發生過程上德國東西兩部的特殊性。

以下試以普魯士爲典型的例證來說明德國東部的農奴解放過程。關於普魯士的農奴解放，誠如 Knapp 所說國王領地的農

＊ 1848年的七月革命，實現了農奴解放，這些過程就是農奴的無產化的過程。因爲農奴獲得自由，同時土地也從領主手裏移到他們的手裏，在兩國，農民成爲其土地所有者，並獲得了人格上的自由。但是，德國的農奴解放與此不同，比較之法國的也有特殊性

奴和私人領地的農奴有相當的差異。因此我們最初先看國王領地的農奴解放過程，其次再看私人領地的。而且爲便於敍述，我們暫分爲自由化過程與無產化過程來說明。

（甲）自由化的過程

（一）國王領地的農奴解放過程——在普魯士的國王領地，Friedrich 大王廢止了所謂徭役勞動的義務。其次，1776年更許可了農奴的所有地的繼承。Friedrich 實行這種政策的理由，是因爲農民是從來的主要的租稅負擔者，而且是兵役的服務者的緣故。其次，1799年 Friedrich Wilhelm II 宣言了在原則上免除徭役義務，即一切王領地的新佃農，在締結租佃契約時，可能明白表示拒絕徭役義務。這樣在國王領地上，近代的農業制度慢慢擴大起來了。同時，更准許農民拿出一定的代價即能私有一定的土地，其理由是因爲（一）土地購買金是國庫的主要財源；（二）跟隨自由財產的獲得，減少了王領地農奴對國家的種種要求，而且徭役

＊＊那麼，東部和西部的農業制度的差異，究竟因爲什麼原故呢？

（1）由於市場關係的差異：即南部和西部的農民，靠近都市，他們在那裏可能把農產物有利的賣出；然而東部農民，在近處沒有都市，地方市場不能充分消化農產物，勢必要賣給英國及荷蘭等遠地方。因此在德國南部及西部，地主領主可能利用農民爲地租源泉；反之，在德國東部，領主只能把農民當作勞動力的供給者來利用，這就是前者以 Grundherrschaft 後者以 Gutsherrschaft 爲支配的農業經營形態的主要理由；

（2）在德國西部，較之東部，更多數會的地主所有，而教會在傳統上，較之世俗的普通領主，更加相對的對農民生活多加考慮；而且教會不大注重販賣農產物而從事大經營的辦法；

（3）西部及南部的農民戰爭，結果雖歸失敗，但給予諸侯領主以威脅。故在西部及南部的農民的土地收奪，終不像東部[illegible]

[illegible]；

務的煩雜也減少了。

（二）私人領地的農奴解放過程——私人領地的農奴解放，卻有一些困難。這是因爲貴族及貴族出身的官吏極力反對的緣故。跟拿破崙作戰的敗北，衰化了貴族的勢力。此後農奴解放才開始就緒。這先由1807年十月九日的法令，完全廢除了世襲的隸屬的關係（Erbuntertänigkeit）。但是，這一方面卻承認了Junker（封建地主）的土地自由處分權，因而事實上沒却了解放農奴的宗旨。其次，1811年九月十四日頒布了所謂Regulierungs Edikt。根據這個法案，農奴如果提供其佔有地的一部分給領主，則獲得其餘的所有權，並無藉此解除封建的勞動義務。但因戰爭，迄未見諸實行。

其次，由於1821年的法律，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免除農奴的封建義務，但這和1825年的義務除解法同樣，其適用範圍是非常狹小的。此後，到了1850年，宣言了一切的農民負担，可能用賠償金來代替或免除。這個法令，實際上到此時爲止，還停頓在舊日的狀態，只能對於少數的農民層適用。因爲這個法令，十九世紀前半期的領主的土地所有，反而顯著地增加了。*位於Elbe河以東的普魯士的部分，在這以前也好，和德國的其他地方相反對，流行着大土地所有制度，1850年以來，這個特色益加顯著了。

從農民的立場看來，由於1850年的法律，日傭勞動者，工資勞動者那樣的一切農民，被解放了，從來徵課於農民的一切負担，例如：世襲的地租及其他負担，也可能由賠償來免除了。

（乙）無產化的過程

從無產化的過程上看來，重要的大半是德國東部，尤其是那裏的私領地的農民解放。1816年的統制條例的結果，普魯士的私領

* 東歐（德意志，奧國，波蘭，羅馬尼亞）尤其是普魯士的封建領主，利用他們的權利，使農民局部失掉土地，漸漸地把自己的莊園改爲資本主義的剝削，而實行『農奴解放』，但是對於已解放的農奴仍保持好多封建的權利。因此便出現了農奴制的『第二版』。這種事實，一方面促求着經濟發展的落後和沮滯，同時更意味着資本主義化的困難。

地農民，可能私有自己的住所，免除了封建的役務和貢納。但是，別一方面，同時也喪失了對土地的權利。這些農民，不能不喪失或放棄：緊急援助的要求權，領主對於修理建築物的補助，公有牧場，公有森林的利用，納稅時向領主先借錢的權利等等。而且農民必須把世襲財產的三分之二讓給領地的領主，這是農民的很重的負担。

這樣，德國的大多數農奴，獲得了人格的自由後，同時就遇着經濟的社會的種種困難，尤其重要的是公有地分割後，不能再利用樹林，牧草的悲慘的結果。這誠如 Goltz 所說：1821年的分割法，和1811年乃至1816年的法律同樣，單是對於領地的所有者和富農有利，小農民和沒有土地的人們，即「住小屋的百姓」的利益，全被抹殺了。以前只要是居住在村鎮地域內的人，沒有土地和房屋也好，也有森林和牧草地的共同利用權，但在公有地分割後情形大變。這些人的這種利用權被無價沒收，他們在分割牧草地的時候，一片土地也得不着，因而不得不停止使用家畜。有些人雖然分得了一些，但土地太小不能彌補牧草地利用權的喪失。這樣，他們把這一點土地賣了跑到都市去，被迫出賣自己唯一的財產的勞動力。這構成了自由勞動力的源泉。脫離土地而形成了無產勞動者羣的大多數農民的不平不滿，是1848年革命運動的一個社會原因。

總之，德國的農奴解放，一般的說來比較英法為遲，而且農奴解放的結果，在許多的地方，自由化的過程，直接的沒有和無產化的過程相隨伴，致使產業革命的必要條件之一的工資勞動者發生較遲，因而遲延了德國產業革命的發生。

據上述可知德國資本主義原始過程的特徵：（一）貨幣資本的原始蓄積，在十六世紀本已多於別國，但到了十九世紀前半期却還落人後；（二）行會制和農奴制的崩潰較遲，而且農奴解放沒有和農奴的無產化相隨伴——這是和英國不同和法國相同的地方；（三）德國農奴制的崩潰過程較之資本主義曾有典型的發展的英國，其速度既已緩慢，而且又出現過農奴制的「第二版」沒有經驗過法國那樣的急激的革命的過程，這一點不僅和英國不同，而且和法國也不同。這種特徵不能不表現在德國資本主義的特殊發展上面。

第三節　產業革命

英國是在世界上發生產業革命最早的國家。英國的第一期產業革命，從1770年代即已開始，一直繼續到1830年代。法國的產業革命較英國爲遲；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雖然打破了從來的封建制度，剷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然第一期產業革命的波浪眞正開始波及法國，是在1825年英國的機械輸出解禁以後，所以法國織物工業界的革命，完全是英國機械輸入的結果。

德國的產業革命，比法國更遲二十年，據一般的見解，它是從1845年乃至1850年才開始，換言之便是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的二三十年前。

德國的產業革命爲何要比英法遲半世紀到一世紀才就緒呢？其原因：

第一，德國社會經濟的特異性——資本原始蓄積的微少，商業資本因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的不發達，因而資本的蓄積者和蓄積量都比較微少。

第二，封建諸關係的廢除較遲；而且沒有經過法國革命那樣的大掃除工作。

第三，國內小邦分立，有關稅制度及其他種種限制存在。

第四，信用機關，特別是銀行組織，沒有充分的發展，Frederic Austin Ogg 在其著書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上說：「……由一方面看來，因人民貧乏，生活簡單，和儉約成習之故，製造品作本國需要額在近今數十年前並不算大；同時國內運輸困難，也足以阻遏適於消費所需的物品生產量，復之德國那時缺乏殖民地，德國的船業也不足與人競爭，自然不能與英法在外國市場上較量長短，因此德國所佔的經濟地位，不但不如英國，甚至不及法國，英國工業所以進步很早，也是由於英國商業遍於世界之故，尤以英諸島旅居國的海外地方需要英國製成品爲甚，德國工業沒有這樣的興奮劑。最後可以說一說因德國政治情形而

生的阻礙，1815年之後，德國是36邦泛泛集合的，關於工業商業的事體，每邦各有自己的法律，至1833年時所謂關稅同盟，才稍有確定的性質，但關稅同盟的規律完全關於商業，不涉及工業。十九世紀中葉之際，各邦政府對於認自己境內的工業為歲入的源泉，監視之嚴緊，至於一磚布，一雙鞋都得按公家規律製造。」（李光忠譯二四二頁）

因此，W. Sombart 認為：德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在1850年時——和平恢復之後15年——比1802年更無進步。（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S. 135）

據 Reines 在其著書「經濟發展史」（Ein Gang Durch die Wirtschaftsgeschichte）上說：「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蒸汽機械，都是限於英國一隅，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機械漸漸普及於全世界，成了勞動及交通機關……在1840年以前，德國勞動，絕對的只有人力。普魯士在1840年，只有634個蒸氣機關，總計起來，計有13,378馬力。」（36）在前揭書中說：「就是到了1846年，普魯士的紡織工場，僅有106處，機械是很壞的，用蒸汽作動力的非常之少，大抵都是用水力馬力來運轉的。」

但是，上述的妨礙德國產業發展的種種因素，到了1850年代大部分消解了，而且因為：（一）在和平繼續的期間，增加了富力；（二）由英國輸入了新式機械；（三）Schlesien，薩克森及其他工業地方，招聘了英國的熟練職工；（四）因為撤廢了國內的關稅障礙，建設鐵路，所以市場擴大，刺激着資本制生產的發展。這樣，德國的產業革命就漸次成就了。

第一項　工業

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德國工業急激發達，這從工業勞動者人數的增加就可以看出。德國工業勞動者人數在1861年為51,000人，1882年增至356,000人，1895年再增至582,700人，1907年更增至1,120,000人。其次，看普魯士的主要蒸汽機械的馬力數，也可以看出德國大工業的發展。1846年蒸汽機械馬力數為七千馬力，1859年增至六萬二千馬力，1875年增至95萬馬力，1900年增至三百七

十萬七千馬力，1908年更增至六百三十七萬二千馬力，1914年更增至六百四十九萬三千馬力。

紡織工業——德國之爲棉織製造業的國家，比之英國是較遲的。但是，德國一經建立穩固基礎以後，其發展是非常之快的。1836年至1840年間，每年的棉花消費額，已達一千八百五十萬磅；到了1851至1855年間則增至五千六百萬磅；到了1861年——1865年間更增至九千七百萬磅。德國所紡的紗，在1871年幾達二十萬萬磅，而從外國輸入的紗縷僅四萬萬磅，並且在1851至1867年間，紡錠數和每個紡錠的生產額也漸漸地增加了。但是棉織物機器的採用非常遲緩，尤其是在織造方面如此，一直遲到1850年，一切棉織機，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用動力推動的。1850年至1871年動力推動的織機大大的增加了。

1871年 Alsace-Lorraine 的合併，對於德國棉業的發展有極重要的意義。棉紗紡織在萊茵省 (Rhein Provinz)，西利西亞 (Silesia) 巴威，耶爾登堡和巴登等處最繁榮。

其次說到毛織工業。1861年1067家毛織工場有 2,592架機械織機，11,818 架手搖織機，其他 622 個毛織所，有 3,655 架機械織機，9,068 架手搖織機。在毛織業也好，手工業的經營，也漸次沒落了。

絲織業的中心地是 Kol，Wulkeim，尤其是包含瓦來非爾特在內的萊茵省，1861年，家庭工業有32,882架織機，而 314 家的工場，有 1,270 架機械織機，和 5,392 架手搖織機。

煤礦業——德國的煤礦在十八世紀只略有一些開採，木炭是最重要的工業燃料。早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德國西部的煤已經開採了一些，最顯著的是魯爾地方，但因資本的缺乏，妨礙了大規模的經營。這樣，遲至1845年，普魯士煤礦的產額僅略爲超過三百萬噸，而且幾乎一切重要的煤礦區域都是在普魯士或普魯士的各州如像魯爾，薩爾，西利西亞各處地方。1852年普魯士的生產約達五百萬噸，十九年後的生產額則增至一千八百五十萬噸；1871年更增至二千五百九十五萬噸，包括盧森堡 (Luxemburg) 在內的全德煤產量，1871—1875年平均有三千四百四十八萬五千四百噸；1900年再增至一萬萬九百二十九萬噸；1910年更增至一萬萬五千二

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噸。歐戰後，德國每年被奪去了約六千萬噸，或約當戰前生產額三分之一的煤，所餘的不及歐戰前消費額的三分之二，這樣德國工業受一致命的打擊。

鋼鐵工業及金屬工業——鐵的產地，以 Rhenishe-Westphalia 區域為中心，其產量的增加，是非常迅速的。1852—1875年，單就普魯士的鐵礦的熔爐來說，其生產額已由 160,000 噸增至 1,395,000 噸；就整個德國的生產看來，都有同樣的增加，即由1862年之685,000 噸，增至1875年之2,000,000噸。

德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實有一日千里之勢，在短期內即超越先進英國的產額，而稱霸歐洲。下表即其證明。

生鐵生產額比較表（單位千噸）

	1885年	1910年
德	3,700	14,800
英	7,500	10,200
美	4,100	27,700

1890年以後，更發明了一種鎔鑛爐，可以利用電氣來鎔鑛，因此煤炭及製鐵業，更得大的發展。其結果，不但鑛山工業，就是鋼鐵工業，也異常發達。於是鋼鐵的生產激增，同時更出現了大資本家的企業團體。

1913年幾個主要的帝國的鋼鐵生產額，可由下列的約略數字表明。（單位百萬噸）

	美	德	英	法
[illegible]	31	17	10	5
[illegible]	[illegible]	17	7	5

1870年至1900年，德國冶金業的生產增加了若干倍，英國冶金業的生產則只增加了30%，故在歐戰前德國的鋼鐵生產已超越英國而爲世界上的主要鋼鐵生產國。其所以如此，係由於德國的發展非常之大的。

歐戰後Lorraine的歸法，損失了德國鐵礦蘊藏量四分之三的鐵礦，而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的一部分最後劃歸波蘭，使德國礦業和冶金業之另一個中心地點又失掉了。以鋼鐵爲主要原料的金屬工業，是製造各種機械的大工業，戰前總產額曾達十四萬萬克，戰後1927年已恢復戰前的狀態，從業員達四十五萬人。

電氣工業，化學工業——在德國，鋼工業之外，其次最繁盛的是電氣工業。特別到了十九世紀末葉，電氣工業曾有突飛猛進的發展。1833年Göttingen地方的Gauss和Weber發明電報機，1866年西門子(Werner Siemens)發明發電機，造成了電氣工業劃時代的發展。這種發電機此後復經Pacinotti，Gramme二氏發明改良，漸臻完善。1891年富蘭克福爾(Frankfort)與勞芬之間，便有電氣技術的設備，電氣工業因此種種的發明，逐漸進步，所有電燈、火車頭，及起重機等都應用電氣了。這種電氣工業，自1883年以後，更加發達，在大企業經營中，乃有以Emil Rathenau(1838—1915)爲領袖的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普通電氣公司，簡稱A.E.G.）出現了。到了1930年合計有電氣公司195家，股份資本達十二萬萬馬克。

電氣機械工業，在輸出額上，在世界佔數一數二的地位，1928年，其輸出額達二萬萬七千萬元。

同時，形成一個重要產業部門的化學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繼保持獨一無二的地位，尤以機械工業以及製糖工業等等，都很需依德國輸出工業的重鎮。化學工業的勞動者在1882年有二萬二千六百人，1925年即增至十七萬二千人，年產量超過了十萬萬馬克。僅煤膠(Coal tar)染料一項，戰前每年約輸出一萬萬二千萬馬克。尤其要算那給染色工業以一大改革的安尼林染料的輸出和藥品工業的發展，使德國化學工業名實相符的執全世界的牛耳。

德國的農業經營，在1834年關稅同盟成立的前後，就已臨到了加以科學改良的機會。例如輪種法之實施，農業化學之應用，農業教育之設施，農業機械之採用；農業肥料之應用等等。這些方法，在大經營中更容易實行，故東德意志便成了進步的中心。1850年以後，因建築鐵路後交通之便利，此地的小農也逐漸開始活動了。因此，1816—37年之間，全德的耕地面積，由二千三百萬英畝，增至五千四百萬英畝了。但是，到了1875年前後，因受歐洲一般農業的不況，德國農業曾受了相當的打擊。再加以工業的急激發展和海外移民的增加，使德國的農村人口激減。例如農村人口從1871年到1900年，已從64％減至46％，再減至1910年的40％。為補救農業勞動的不足，還在從俄國，波蘭，奧國等處吸收外國移民。

其次就德國的土地所有關係看來，在西南地方，因隸農自由化的實現，又加以拿破崙征服時所實行的均分繼承法的影響，一般的土地所有，都非常的小，反之在東北地方，大所有地仍照從來的狀況進展，二百五十英畝以上的土地，仍有從38％到60％的。德國是一個土地所有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的國家；100公頃以上的土地所有，掌握全面積的四分之一；200公頃以上的掌握五分之一；500公頃以上的掌握着十分之一。這種狀態，就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也沒有什麼大變動。所有關係上幾乎沒有變動，同時，農業經營關係上，也沒有顯著的變動。然而，這並不否認德國農業內部結構的變化。因為德國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雖然相當迂緩曲折也好，却是無從否認的事實。※

牧畜業的發展也不劣於農業。二十世紀初和十九世紀初比較起來，馬增加62％，牛增加75％，豬增加259％，山羊增加62.6％，但綿羊反而減少了85％。這是因為向英國的輸出，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由於英國內地飼羊而減少了，飼養家畜的，主要是德國農業的中小經營，這是顯明的特徵。

其次，德國山林之富，和林業林學高度的進步，也是一個特徵。據 Dawson 的說明，這些山林之中，在到1900年的二十年間，約有二百二十八萬公頃，種植森林了。

價格，耕地，牧畜，森林的面積擴大及其出產的增加，在在都表示德國農業的進展情形。

大戰的結果，德國國界之再次劃定，在許多地方擾亂了全國的農業組織。喪失土地的影響特別在裸麥的生產中覺得，因喪失土地而損失產裸麥區域的土地約達 1,133,000,000畝，或當以前全部產裸麥區域的 17.7%，種小麥的土地之割讓於別國的，約達 293 458,000 畝，種大麥的約達270,829,000畝，約當歐戰前的區域 14.8%和 16.4%的面積，所以小麥生產的低降是非常嚴重的，由1913年之4,656,000米突噸減至1921年之3,000,000米突噸。此外德國還喪失了超過11%的種植雀麥的土地。這種損失更爲嚴重，因爲這些土地所生產的糧食超過了地方的消費額的。歐戰以後，德國倚賴外國的穀類，因此乃大量增加了。再加以喪失以前用於生產牛肉及其他肉類的土地，使德國的糧食問題更加嚴重，而構成德國資本主義之最弱的一環。

第三項　交通運輸機關

道路——德國道路的發展，跟法國不同，到拿破崙時代的末期，都不會注意改良，但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則急激建造道路。例如

＊伊里奇論及農業資本主義化的二大途徑時說：「布爾喬亞的發展，以地主的大經營爲先鋒，漸次越加布爾喬亞化，可能把農奴制的方式漸次變爲布爾喬亞的剝削方式而進展。同時，也可能以小農民經濟爲先鋒，用革命的方法，從社會組織上除去農奴制大土地所有的贅瘤，不久卽以資本主義的經營方法而能自由發展前途。——上述的客觀上可能的布爾喬亞發展的二途徑，我們命名爲普魯士型和美國型的途徑。在普魯士型的場合，是農奴制的地主經營，分化出少數的大農，給與農民以數十年最痛苦的剝削與債務奴隸化，慢慢的成長到布爾喬亞的 Yunker 的經濟，……在這個場合，在封建領主，地主，Yunker 的土地上，農奴制的債務奴隸的剝削，成長爲資本主義的剝削，便構成爲進步的基本內容。……」（全集第九卷，四四三頁，日譯農業綱領批判，下卷，一九八——一九九頁）

德國主要道路公里數，在1864年有二萬八千八百公里；1891年即增至七萬九千餘公里，1900年更增至九萬五千九百餘公里。

其次，德國國內河川，可航的部分較多，且頗能供輪船的航運。運河的開鑿，大概是從十九世紀的末期起的，至於大的運河，都是利用 Rheine, Elbe, Weser, Oder, Danau 等大河流，而構成了巧妙的運輸系統。其次連結北海與波羅底海的 Kiel 運河，係作為國家事業，而於1891年完成的。運河的延長，達二千二百哩。

其次，以輪船來說，1819年長三十米達半載三百噸的世界最初的輪船 Savanyab 號橫航大西洋，要26日，然而世界大戰以前的德國 Hamburg 造船所造的 Vaterland（祖國號），據一般說，差不多還不要四天工夫，便可以橫斷大西洋了。漢堡美洲輪船公司，北德羅伊德輪船公司，構成了德國航運界上的柱石。

鐵路——德國最初建築的鐵路，是1835年 Nurnberg 和 Furth 之間的六公里的鐵路，德國鐵路的建設，在1840—45年間，有急激的進步，在當時就已達三千餘哩。1860年德國有鐵路 7,169 公里，1880年即增至 20,348公里，1913年更增至 61,159公里，即在此在五十餘年間，德國鐵路延長了八倍餘。

德國的鐵路，就是到了1879年，有一半以上還是屬於私營的；從這時候起，經過俾斯麥國有鐵路計劃的督促，鐵路國有運動就興起了。到了1880年代的中葉，鐵路的國家支配權已經確立。十九世紀末，全德國鐵道的國家經營，已經普及一般；到了1910年，私營鐵路總於只佔全德鐵路的6%了。

交通運輸機關的發達，是工商業發達的一種象徵；同時，這更促進了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四節　結語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知道：德國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德國的產業革命，在1848年革命後才開始，道先實現於紡績和織物等輕

工業方面，急激地驅逐了手工業。產業革命後機械和蒸汽力的使用及其普及，引起了生產手段的生產。這樣，從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的前後開始，德國工業，經過第二期的產業革命，轉變爲以鋼鐵業及其他重工業爲中心了。尤其是1871年普法戰爭的勝利，五十萬萬法郎賠款的收入，Alsace-Lorraine（織物業等的中心地而且煤鐵也豐富）的佔領，越加促進了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樣，以1896年爲轉換期，德國資本主義，已經很明白地發展到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階段了。鋼鐵工業，電氣工業，化學工業等近代工業非常隆盛，企業規模由小變大，因而股份公司代替了個人的企業，生產集中，資本集中的傾向非常顯著＊，遂使德國資本參加世界市

＊「例如……在每千個工業企業中，雇用50個工人以上的大企業，在1882年有3個，在1895年有6個，在1907年有9個，在上述幾年中，這些企業所雇用的工人數目佔22%，30%和37%，但是生產底集中比工人的集中，要快得許多，因爲在大企業裏面，勞動底生產性要高得多了；蒸汽機和電氣發動機的統計，便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3,265,623個企業中，大企業佔30,588個，即佔總量的0.9%，在14,400,000個工人中，它們佔5,700,000人，即佔總數的39.5%；在8,800,000蒸汽馬力中，它們佔6,600,000馬力，即75%；在1,500,000啓羅瓦特電力中，它們佔1,200,000啓羅瓦特，即80%。

不到1%的企業，佔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與電力。……佔企業總數的91%的小企業，卻只有7%的汽力與電力！幾萬個最大的企業，掌有一切；而數百萬個小企業，卻一無所有。」（伊里奇著吳清友譯帝國主義論三——五頁。）這就是德國的生產集中狀況。在這種生產集中的基礎上，產生了獨佔（Monopoly）。德國的獨佔組織（Cartell）的數目，在1896年約有250個，1905年即增至385個，參加這種獨佔組織的工場，至少有一萬二千所。產業資本的集中和獨佔，同時就是銀行資本的集中和獨佔，1907—1913年，柏林的九大銀行，保持著全部銀行存款的一半；把總銀行資本的83%，掌握在自己手裏。由於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融合，及因此而產生的金融資本，就確定了金融寡頭政治。同時，德國比英法稍稍落後，也開始輸出資本，這種事實，也可以反映在德國領有殖民地和爭奪殖民地上面。這樣，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了。

場的爭奪和金融資本的國際鬥爭舞台。

這樣，1900年代，新興的德國帝國主義，挾其大規模的獨佔組織，金融資本，新銳的技術和非常旺盛的生產力，威脅着英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了。其結果，便釀成1914年的大戰。

大戰後，因有領土和資源的喪失，一時工業爲之急激衰頹。但在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的安定時期，以犧牲勞動者爲基礎的產業合理化政策，把重工業又恢復到接近以前的水準，而電氣工業和化學工業，甚至超過了戰前的水準。1929年世界經濟悲慘的爆發，使德國工業受了特別深刻的打擊，輕重工業都現出了極度的衰頹狀況。希特拉握權以來，德國經濟仍無好轉的徵兆，只有軍需工業顯示出畸形的繁榮狀況。

總括上面各節的說明，我們因爲論及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有兩個必須指出的基本特徵：

第一，資本的原始蓄積不足，農奴制度和行會制度(Zunft)的長期維持，遲延了德國的產業革命；尤其是農奴解放的不徹底，致使農奴制一度崩潰之後，又出現所謂「農奴制的第二版」，顯示出 Yunker 經濟的支配，而構成爲德國資本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

第二，爲對抗英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在政府的保護政策下哺育了起來的德國資本主義，到1871年即已轉入飛躍的發展時期。1871年普法戰爭的大勝，市場的擴大，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的收入，Alsace-Lorraine 的佔領，刺激着，而且保障了集中的重工業的急激發展，新興企業經營規模的迅速擴大，生產和資本的高度集中，使德國的獨佔資本主義早熟，超過英法資本主義先進國，而變爲獨佔資本主義的先驅者——這就是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主要特徵。

本章主要參考書

Knight, Barnes & Flugel: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騏克等，章楷譯：近代歐洲經濟史。)

F. A.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李光忠譯：近世歐洲經濟史)

加田哲二著徐漢臣譯德國社會經濟史

東晉太郎著熊得山譯歐洲經濟通史

小林良正著德國經濟史要

石濱知行著德國經濟史（日本改造社經濟學全集第二十九卷，淩璧如譯中華書局版）

佐谷亮一著近世社會史（唯物論全書中之一）

波革洛夫等著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三四分册。

J. H. Clapham: Economic Developm 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W. H. Daw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Germany.

J. Borchartt Deutsche Wirtscha'tsgeschichte.

C. Gruber: Deutsche Wirtschaftsleben.

Inama-Sternegg: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Sana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Georg von Below: Probleme der Wirtschaftigeschichte.

W.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Marx Web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第十章　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第一節　殖民地時代的美國經濟

第一項　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美洲殖民地

英國資本主義原始蓄積過程中最活躍的商業資本，從十七世紀初超越大西洋，在世界各地追求市場的時候，美洲沿岸的重要地方，早已被他人佔領完了。沿墨西哥灣的全岸，中美的全部，以及南美的大部分，已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掌握，北美的沿岸，多被法國和瑞典先奪去了，英國纔能在北美未佔領的沿岸插一隻脚，但是，要想發展，必須侵略環繞西南北三方面的別國領土才辦得到。這樣英國的美洲殖民史，是以不斷的戰爭開始的。

英國的最初殖民者，大都是英國的亡命客——政治上的或宗教上的被壓迫者。他們追求自己的天地來到北美，在那裏，他們遇着了溫和的氣候，發見了廣漠的草原，不知斧鉞的處女森林，便於航行的江河，以及水量豐富的湖沼。在那裏，早就有半遊牧民印第安人居住。據英國人說，他們想把「基督教文化」普及於印第安人，而用「和善的方法」開始殖民。但據 Pokrovsky 看來，「英國撲滅土著民族的政策，和西班牙的不同之點，只是在部分地實行，亘及二世紀之久，和帶着清教徒的僞善的面具。受了宗教上及政治上的迫害從歐洲逃了來的移民們，在美洲，却用他們本身在故鄉所受的殘酷手段來迫害印第安人」。（Pokrovsky 著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日文譯本一四頁。）

爲開拓印第安人所住的新世界，最初組織了探險隊，這大半由富裕的企業家或商館來實行。1607年，這種商館之一所得的廣袤

的地域，爲紀念一生處女的 Elizabeth 女王而命名爲 Virginia——處女。1620年納爽將軍獲得 Carolina，1632年伯爾起摩勳爵獲得了 Maryland，1664 年約克斯基公爵從荷蘭奪來了 New Amsterdam 的地域而命名爲 New York，1682 年資本家彭恩獲得了 Pennsylvania。因此，北美殖民地的最初的主人翁，已經是富裕的地主了，他們都和英國的名門貴族有非常的親族關係，不久卽轉化爲美國的地主貴族和上流階級的前身。

爲開墾廣大的土地，他們向本國極力勸誘移民，一切的工匠——鐵匠，木匠，桶匠，造船師，漁夫，釀酒匠，石匠，農夫，織工，靴匠，其他男女勞動者等開拓新天地所必須的人們，都以誘惑的言辭叫了來。不用說美洲決不是「自由的天地」。但隨自由移民的增加，殖民地漸次開始發展商業，是賣火酒給印第安人以交換毛皮，或者是砂糖，火酒，黑奴的買賣與密運，出現了大膽而且活潑的布爾喬亞。同時也發生了手工業勞動者，農業勞動者，階級對立雖不尖銳，然而對於掌握權力的商人和富裕的工業家的反感，卻在各處爆發出暴動。因此，在「自由的天地」也好，從初期起卽有一些階級對立的特徵，隨歷史的進展，逐愈加明確化了。總之，在那裏利用自然的富源農業和商業漸次發展，互相獨立的一些殖民地：New York, Massachusetts, Virginia, Pen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Georgia 等等，就是主要的地方。

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北美各殖民地的連絡，僅靠海岸勉強維持，各殖民地和倫敦直接往來，在倫敦有統治殖民地的皇帝直轄的特別會議，各殖民地爲擁護自己的利益，派遣全權委員到倫敦去。在最初，英國政府差不多完全不干涉這些殖民地的內政問題，只是由政府所任命的總督來統治，而總督的權力，則被國民代表的意見所限制。

各殖民地的人口，依照當時的計算，每隔二十年卽增加一倍，隨地域的擴大和印第安人衝突，和法國殖民地人民鬪爭，致使英國殖民地互相接近。帶着清教徒的僞善面具來撲滅印第安人的政策，不斷地遭受印第安人的猛烈的反攻，農民的捕俘，殘殺，剝去頭皮，等等行爲繼續實行，在印第安人的背後有法國及西班牙的援助和武器的供給。只是英國本國的正規兵，決不能對抗殖民者，因此有

進而建設自己的國民兵的必要。農民同時就是軍人，一隻手拿鋤耙，一隻手拿槍，殖民地本身就形成了一種軍事勢力。對印第安人，對法國人的戰爭訓練出了許多有經驗的勇敢的指導者。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也是這種殖民者的子孫，奴隸所有者，土地買賣的媒介人，勇敢的殖民地農民兵的指揮者。這樣在十八世紀中葉，在現在的合衆國東岸一帶地方建設了十三州的殖民地；在1714年三十七萬六千人增加到1756年的百三十萬人。

第二項　殖民地時代經濟概況

（A）農業

和西班牙殖民地注重金銀礦山的採掘，法國殖民地以毛皮交易爲主要產業相對照，英領殖民地普通都以農業爲主，在土地貧瘠，從事漁業及造船業反而有利的 New England 也好，90％的住民仍從事農業。(E. L. 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75）因此在殖民地時代，美洲經濟生活的中樞可說就是農業。

農業的經營形態，在東北部 (New England 諸殖民地）及中部 (New York, Pennsylvania, Delaware, New Jersey 等諸殖民地）主要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經營，作物不只是穀類，蔬菜也栽培果樹，砂糖楓，飼養家畜等等，除了鹽以外，一切都用自家製品。東北部以玉蜀黍爲主要作物；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的中部，則以小麥大麥爲主要作物，因而有「麵包殖民地」(Bread Colonies) 之稱。所以在十八世紀的時候，New England 的輸出是以木料和船舶爲主，而 New York 和 Pennsylvania 的輸出則爲小麥和小麥粉及其他食料品爲主。

在南部地方 (Maryland, Virginia Carolina, Georgia 等殖民地）也盛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營，從耕地經營面積看來，不管這是自給自足地栽培穀類等的也好，或者和 Plantation 同樣栽培輸出農產物的也好，90％的地主，是用自家的勞動力來經營的小

地主。(H. U.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3.ed, P. 73)但是，從作物看來，在南部，煙草，米，藍等輸出農產物的栽培在經營上較爲有利，故大半努力栽培這些作物，因此，Plantation 的大農經營發達，大農場主在經濟上擁有雄厚的勢力。

在輸出農產物中最值得注目的是煙草的栽培。自從1612年煙草的栽培法從西印度傳來以後，因有歐洲的巨大需要而急激發展。一直到以後棉花的出現爲止，煙草常佔輸出品中的第一位，即自從1619年輸出二萬磅以來，每年遞增，1730年乃至50年，每年的輸出額竟達四千萬磅以上。(E. F. Humphre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P. 53)這樣，煙草的栽培，成爲南部農業的中樞。因此，巨額的財富，便很快的流入煙草栽培業者之手，而在此業中的富裕者，又依政治機構的統制力，不斷地增加其所有地。除煙草以外，米與藍在宜於栽培的地方，(如 South Carolina) 也成爲代表的農產物。於是從粗野農作法的發展中而達於有採用 Plantation 制度之必要。由此可知南部的農業，是特別帶有商品生產性，故需低廉勞動力的供給，這使南部農業經營中奴隸的使用漸趨繁盛了。

最後，若就殖民地農業的經營技術看來，普通是非常不合科學的。在歐洲，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已由中世紀以來的三圃式經營進步到輪栽式經營；施肥的智識也普及了，農具也在改進中，但是這些都未能很快地傳播到美洲大陸。因爲美洲土地寬濶，與其實行集約的經營，莫如順次開拓荒地，粗放的利用，反而更加有利，這樣，美國的農業，與其說是受歐洲的影響，實可說受美洲印第安人的影響較多。第一，玉蜀黍是美洲大陸特有的作物，其他荒地的開拓方法也好，作物的栽培也好，再印第安人的地方實在不少。因爲他們在五大湖地方及大陸的中央部，大半是由狩獵來生活，在密四西比河的東方，大部分的種族，則過着定住農業生活，他們有特別的土地開發和耕作的方法。(Bogartibid, P. 77).

(B)工業

在整個殖民地時代，工業的發展，大部分都還沒有脫離手工業的範圍，其生產差不多全是用以滿足家庭及地方的需要，這種工業，可說是停留在自給自足的產業中，或者可說是剛踏出這一步，因為資本與熟練工的不足，人口稀薄，通貨不充足，運輸機關不完備，技術不良，市場狹隘等等，都是當時工業不能大發展的重要原因。此外，英國的產業政策——使殖民地長久成為宗祖國工業品市場的政策，也是束縛殖民地工業不能發展的一個原因。

專門栽培輸出用農產物的南部殖民地的農民尤其大地主，雖不以此為苦，而小農民則對輸入品沒有購買力，必需品大半仰給於國家生產。故東北部及中部殖民地的自給自足經濟，應當將此點包含在內而加以考察。

自家生產物的第一是紡織物，紡車及手織機，是各家不可缺少的工具。當時棉花缺乏，主要的織物原料是羊毛和麻，這些都是殖民地的產物。其他，農具，家具，蠟燭，洋鹼等等，都是自家製造，在當初，從織物起，其他的工業品，少有不是家庭子女自製的。但是，這些自家用工業，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漸次轉變為製造販賣用品的工業，專門的手工業者也出現了。他們最初是巡回手工業者，更進而保存自己的工作場和店鋪，在殖民地時代的末期，小規模的工場手工業也出現了。其他例如皮革，鍛冶，陶器等工業都相當發達。

除以上各種工業之外，木材工業尤其船具及造船工業，因有繁茂的森林，和漁業海運業上的需要，以及政府的獎勵，曾有特殊的發展。船舶的建造費，較之歐洲要便宜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故在1760年，揭有英國旗的船舶總噸數中，約三分之一是在美洲建造的。(H. U. Faulkner: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P. 29)

此外，殖民地時代所採掘的金屬，則有鐵，銅，鉛等物。就鐵來說，如沼鐵或鐵鑛，在事實上，凡在殖民地都可能發見。而在各種鑛業中發達最早的，就是製鐵業，因為釘，廚房用具，槍及其他輸入鐵製品，價格甚高，迫使他們自己製造，同時又因鎔鐵燃料的木材非常豐富，便於製造，所以製鐵業很早就發達了起來。

最後，漁業，水產製造業（這是 New England 的重要富源之一，）和林產財源，都是殖民地時代美洲的主要產業和富源。

（C）商業及貿易

在初期的殖民地中因爲殖民者彼此的生產物大半屬於同種同類，所以很難找到國內市場；加以在未開發的土地上，交通非常不便，故商業的發展，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各殖民地都各有其特產物，加以許多江河和海岸可以航行，故商業也隨時代的進展而漸次發展，尤其是所謂沿海貿易（Coastwise Trade）的發達，頗值注目。沿岸貿易是海港都市間，因而是殖民地相互之間的交易，在陸上交通不發達的當時，殖民地相互之間的商品交換，主要的是利用運河水道來執行。例如：中部殖民地的穀類及其他糧食，東部殖民地的手工業製品，則送到南部，由南部輸出煙草及其他特產物。而且開闢了貨物和旅客的定期航路，使殖民地相互之間的結合更爲緊密，這樣，沿岸貿易的數量實凌駕外國貿易以上。(E. F. Humphre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P. 93)

其次，以外國貿易來說，數量雖不及沿岸貿易，但其重要程度則遠爲優越。因爲美洲殖民地從全體看來，精巧的工業品必須仰給於歐洲；而且殖民地的各種特別產業隨海外販路的擴大而發展，外國貿易變爲殖民地商人致富的重要根源。

殖民地的主要輸出品，在 New England 則以毛皮，木材，船舶輸出到英國，水產物，穀類則運到西印度，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火酒則送往到非洲；在中部殖民地，則以毛皮，木材送到英國，穀類，肉類及其他糧食，則運往西班牙，葡萄牙，西印度；南部殖民地，則以煙草送往英國，荷蘭，皮毛輸往英國，糧食運往西印度。不用說，和英國本國的貿易，是殖民地貿易的骨幹。

第三項　獨立戰爭的原因與結果

（A）原因

在最初，不用說殖民地人決沒有和英國分離獨立的思想，尤其是支配階級，在十八世紀中，大都以皇帝的忠良臣民自許。但隨殖

民地形成為一種勢力時，他們就痛感英政府的殖民政策，——其理論的基礎與表現則為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轉化為妨礙自已發展的最大的桎梏去了。正在產業革命過程上的英國產業資本主義，必須從殖民地供給低廉的原料品，賣出本國的既成品。不用說，這是英國布爾喬亞資本積蓄之必然的有利的政策。掌握英國政權的保守黨（Tories）認為殖民地是英國支配階級的世襲財產，為自己的利益，他們對於妨害殖民地產業的發展，是毫不遲慮的。這樣，（一）殖民地對於宗祖國的英國，只能夠供給她不能生產的貨物；（二）禁止殖民地使宗祖國的競爭者富裕獲利，並禁止殖民地創設工業以與宗祖國的工業相競爭；（三）殖民地必須負擔宗祖國的行政費及海陸軍費。殖民地所必須的商品，必須從英國購買，而且必須用英國商船運輸。

1669年的 Woolens Act, 1732 年的 Hat Act, 1750年 Iron Act 頒佈的結果，美洲的鐵，只能夠當作銑鐵或條鐵來輸出，不許做成既成品來輸出。在殖民地不准設立製鐵所或鑄鐵工場，並且絕對禁止建設鑄鐵工場和鋼鐵工場。殖民地甚至連一頂帽子，一根釘子都不能製造，栽培甘蔗，採取糖液是可以的，但是禁止精製砂糖。

這樣，商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實行祕密的買賣。殖民地人拒絕繳納租稅，放逐官吏，排斥英國商品。加以1756年七年戰爭的結果，殖民地已沒有武裝對法國的必要，因而發生了從英國分離的遠因。英國在七年戰爭後財政窮困，1765年頒佈了印紙法令（Stamp Act）和宿營法令（Quartering Act），以資彌補，但因遭遇強烈的反對，1766年即取消印紙法令。不料翌年又頒佈了 Town Hend Act，對於輸入的茶，紙，玻璃，鉛，鍋，繪具等生活必需品課徵關稅。這可大受殖民地人的反對，1768年到69又發生排斥英貨的風潮，英政府為保持對殖民地的「威嚴，」只允取消上列課稅品目中的一部分，而每磅茶三辨士的茶稅，則繼續如故，這引起了1773年的有名的 Boston 茶船事件。1773年，Boston 的人民，憤慨於對英國產茶即課以關稅的行為，宜曾排斥英國茶」。十二月十六日夜，青年九十餘人，化裝為印第安人，侵入英國所屬東印度公司的茶船三隻，把搭載的茶箱三百四十二個投棄海中。英政府立即下令封鎖Boston港，Virginia 國會，對此即提出抗議。因為這個機會，北部的商人工業家和南部使用奴隸的殖民地地主提攜起來了。

南部的主要問題，是奴隸買賣的問題。奴隸貿易在1713年甚至宣言爲安娜女王的特權，這畢竟是英國王家最有利的買賣，但由英國船輸入奴隸，却侵害了美國船主和 Virginia 殖民者的利益。在 Virginia 爲販賣給其他殖民地而自己養着奴隸，因英政府所獎勵的黑奴的輸入，減低了奴隸的價格，使 Virginia 受了大損失。「這樣美洲殖民地和英國本國的不和的根源，是經濟的原因。但是表現在煽動反英的正面的，却是政治上及意識形態 (Ideologie) 上的動機。」(V. U. Potrovsky. Ibid. P. 25—26).

（B）艱苦的獨立戰爭

這樣，Boston 茶船事件，引起了英國和殖民地的嚴重衝突；獨立戰爭，早已到了不能避免的時期。1774年九月，各殖民地的代表者（除 Georgia 州以外十二州）在菲列得爾菲亞舉行第一次大陸會議 (Continental Congress)，議決停止與英國通商。此後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永久從本國分離，殖民地的十三州，各有完全主權的獨立州，並結合爲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從此起到1783年爲止，即開始了獨立戰爭。革命的基礎份子是中產階級以下的急進主義者；富商（例如 Hancock）銀行家（例如 Morris），豪農（例如 Washington）等則任爲指導者。

在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武備艦船的不整，訓練的不足，軍資的缺乏，在在使革命軍遭受了種種嚴重的困難與危險。

這種異常艱苦的革命戰爭之所以獲得最後勝利，大半由於革命派的拚命搏鬥，而英國本國對美洲殖民地的意見不一，以及法國，西班牙，荷蘭等之精神的物質的援助，也有大的關係。自英國 General William Howe 繼任 General Gage 爲美洲派遣軍司令官以來，應該配備主力的地方，則僅代以劣勢的軍隊；在稍加追擊即能全滅革命軍的場合，則任其安全退却，致使革命軍乘勢而興。這種事實，就是因爲 Howe 將軍本人信奉急進派的主義，反抗保守派 (Tories) 的政策，對獨立革命軍極表同情的緣故。因此 A. M. Simons 說：「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爲具有美洲的形相的英國內亂之故。這與其說是殖民地和英國政府的分裂，實可說是在大西洋

兩岸上英國人分派鬭爭的一個局面。……這個革命，確實只是相對抗的社會階級在巨大的世界鬭爭上的一個戰爭；在這個鬭爭中資本主義打倒了封建主義。」(A. M. Simons: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P. 70) 這是很富於暗示的一個說明。

其次，法蘭西，西班牙，荷蘭諸國之對於英國的抗爭，尤其是法國對於美洲殖民地之財政的援助，（計自1777年至1783年法國借款六百三十五萬餘美元與殖民地，）也是革命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十七世紀中葉以來，英國的殖民即已凌駕法，西，葡，蘭諸國之上，這些國家對於英國的嫉視和對抗，使他們援助英屬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以打擊英國。例如1778年美法同盟的成立，1779年成立法西同盟，1781年荷蘭對英宣戰，這都是促成革命勝利的有力原因。所以 F. A. Shannon 說：「如果沒有歐洲同盟的危險，說不定大不列顛恐怕要調練更多的軍隊，有更多的時間，而能征服各州。」(Shann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P. 125).

（C）獨立戰爭的意義

美國的歷史家，把這個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1861年至1865年間的內戰）相區別而稱爲革命，但是，這在怎樣的意義可以稱爲革命呢？（下略）

其次，卡爾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文上，認爲十九世紀的美國南北戰爭，是對歐洲勞動者階級的警鐘；而「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卻是對歐洲中產階級的警鐘。」Pokrovsky 則認爲「美國的農民和勞動者，在獨立戰爭中，爲把他們從君主國政府解放出來而戰鬭，爲共和制的理想而戰鬭。」又說「合衆國的宣言書，宣佈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自由原則，市民平等的原則，封建特權的廢止等等。美國的革命，是歐洲布爾喬亞革命的警鐘。……這個獨立戰爭的經驗，對於以後的法國的革命戰爭有不少的貢獻；英政府的敗北，給與支配的地主貴族以打擊。」(Pokrovsky: Ibid. P. 38）這些都是獨立戰爭的深刻的意義。

然而，這個解放的獨立戰爭，對於合衆國內部階級關係，沒有加以多大的變化；對於 Democracy 的動向，也沒有多大的進展。在

獨立革命中，各州所採用的憲法，對於自由主義者，勞動者，及鄉僻民衆的願望，都不與以滿足，如關於選舉所限定的財產資格，即表明證，因之大多數的成年男市民，都沒有選舉的資格。其結果，西部及一般的民衆雖因戰爭得到勝利；可是勝利的果實，都給與有資力人們了。

北部的商人，工業家，中部的農民，南部的地主等，雖然同是參加戰鬥，但是農民的社會地位，却沒有特別的變化；北部和中部商工業布爾喬亞的對內權力依然強固，南部地主貴族的支配也好，殖民地大土地所有關係也好，都牢固如常。因此，在自由的土地合衆國也好，從當時起即有階級的對立關係存在，雖然其形態決不尖銳也好。在戰爭的繼續中，農民們對於布爾喬亞的處置，常常表示不滿，因為缺錢，不發薪餉，直至在華盛頓所領率的軍隊裏也發生過叛亂。七年的獨立戰爭後，失業者繼續出現，農民徬徨在飢餓線上，他們[illegible]窘作者不得不向高利貸借款。貨幣制度破壞了，物價隨紙幣價值的降低而騰貴了。這樣，英國的武力雖已驅出美國的領土，美國的資本主義已有了準備，而同時合衆國內新的階級對立，實際上又開始展開了。

第二節 南北戰爭前的經濟發展

第一項 概說

從十八世紀末葉起到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正在遇革命和戰亂的時代。英法二大商業國，陷於大亂的漩渦中，其他各國，也被捲入了。只有美國立在漩渦圈外，而利用此形勢來發展商業，和交戰國的雙方通商，在封鎖的當時供給了巨量的戰時違禁品，獲得了資本主義原始蓄積過程上奴隸買賣以上的巨利。十九世紀初葉1805年的美國國際貿易非常繁榮，大約把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一，握在自己手中；商船噸數，達百五十萬噸，合衆國的輪船，一直到東洋，印度，任何港埠都可以看見。

南部諸州，以米，砂糖，煙草，棉花等供給全部歐洲，也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工業也急激地發展了。1805年，有四千五百紡錠的紡織工場，全國只有四個，但是，到了1815年，只是 New England，紡錠總數就有十三萬個，1811年，合衆國的織物工業勞動者有四千人，1815年即超過五萬人，製造了二千七百萬磅的棉紗。

其次，領土也顯著地擴大，在十八世紀，幾乎毫未踏入阿巴那茱山脈以西的內地的美國人，在北美的南部和西部，創建了許多新州。耕地擴大，新領土的耕作，以及由工業的發展而引起的對內對外的商品流通，都非常增大了。從法國買了 Louisiana，從西班牙購買了 Florida，合併 Texas，割取 California，在亙及太平洋大西洋的廣袤領域上，國民經濟急激發展，變成了美洲大陸上的最大強國。而且還由1823年抱着外交政策的大綱，出席國會的大總統 James Monroe，用所謂「門羅主義」的名稱，在「美國人的美國」的原則下，加以保護。

第二項 西漸運動

西漸運動 (Westward Movement) 又稱爲邊境運動 (Frontier Movement)，這是指美國人移殖到美洲印第安人的西部未開發地的運動。事實上，這是領土的開發，國境的擴張。在殖民地時代，英國政府，深恐與印第安人衝突，阻礙毛皮交易的獨佔，並且慮到發展西部的結果，英國的支配不能及於廣漠的地域，所以不願人口移殖於西部。獨立革命後，新政府積極開發西部，交通的不便，自然的障礙，印第安人的妨害，便逐漸克服，人口源源移殖到西部，從此美國的資本和勞動力，漸次離開通商及海運業而轉向到西部的土地及東部的工業。於是一般的注意點，便從對外政策，轉向於國內的發展。這種轉向，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可說是美國社會經濟史上的主潮，促成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立與發展。

西漸運動是因爲：（一）獨立革命後新政府的領土開發和擴張政策；（二）獨立革命後，接着東部各州發生了普遍的不景氣；

（三）在紙幣政策中債務者的苦境；（四）因革命及其他原因而喪失了財產；（五）對於參加獨立戰爭的兵士交付了地券；（Land Scrip）（六）因土地公司而發生的土地投機（七）因許多投機家及冒險家的投機心或冒險心而形成了西漸的潮流。

西漸運動，因經濟狀況的好壞而呈一起一伏的波動現象，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就活動起來，在好的時候即歸於停滯。這終於激成一個大主潮，向前不斷的湧進。例如從1820年起十年間，西北部諸州的人口增加爲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百五十，若就 Ohio 州的人口而言，從1800年的四萬五千餘人增至1810年的二十三萬餘人，1820年再增至五十八萬餘人，1830年更增至九十三萬餘人，即三十年間人口增加二十三倍以上，Indiana 州的人口1800年僅有五千六百四十一人，到了三十年後的1830年即增至三十四萬三千三十一人，即三十年間人口增加六十八倍以上。（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00. P. P. 5—6）。

反之，Virginia, 及 Massachustts 州的人口差不多呈靜止的狀態，這種事實，說明了西漸運動是怎樣的把東部人口弄竭涸了。

(H. U.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3. ed. P. 205)

西漸運動的概況，在1800年後約二十年間，是向密西西比平原及 Ohio 平原移動；1820年以後約二十年間，主要地是在密西西比上游地帶及 California 移動。（1849年 California 發見金礦）西漸運動的第一個階段，是移殖的先驅者開闢了荒涼的土地；第二階段，是一般人民繼續的移殖；第三階段，就是資本家的侵入，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

最後，西漸運動在美國社會經濟史上的根本影響，就在西方可能開發的地方很多，因而遇着生計緊迫的時候，即以移殖西部之法度過難關，而使經濟及社會的問題，易於解決。此外，並因西漸運動的結果，使東部，西部及南部確立了地域上的分工，即東北部變爲工業區，西北部變爲穀類農產區，南部變爲棉花栽培地。但是就反面而言，卻因經濟利害關係的對立，又發生了種種的抗爭，終於在政治上發生了地方分權制的問題，釀成了南北戰爭。在西漸運動的時候，並無任何特權或傳統關係存在，任何人都在同一條件之下，遇着同樣的困難，靠着各個人的努力而進行，所以民主主義的風習，極其濃厚。在西部地方的這種民主主義的風習，不久即反映於東部

以至形成了美國政治的根基，

第三項　交通運輸機關

西漸運動的發展，促進了交通機關的發達。因爲：第一，要使人和貨物易於移動，才可能促進西部的開發；第二，必須使西部及其他地方之經濟的結合緊密化，才可能避免政治的分裂。

（A）道路　西漸運動的初期，沒有完備的道路，普通只是利用小徑（Trail）。此後因客觀的需要，自1792年至1794年在非列得爾菲亞與 Lancaster 間，建築了六十二英哩的馬卡丹（Macadam）式道路。這是利用者必須交付路金的稅道（Turnpike）。以後成立了許多築路公司，稅道的建設，像雨後春筍似的急激增加。同時，聯邦政府，在1838年也建築了一條834英哩的國立大稅道，而成爲數十年間連結 Ohio 地方與東部的主要道路，給與西漸運動以不少的貢獻。稅道的建設，雖已減低了許多交通費，但由陸路運輸貨物，每噸每百英哩平均需費十美元，這對於農產物運輸非常不利，故世人的注意，漸次轉向水運去了。

（B）水運　美國的水運，很早就相當發達，尤其是 Ohio 河及密西西比河利用得最多，平底船（Flat boat）積載着西北部的穀類與小麥粉運輸到南部。但是，這種平底船要溯流而回到西北部，却很困難；尤其是當時的要求——東北部和西北部的交通，差不多不能利用江河來滿足。此後1807年 Robert Fulton 製出實用的蒸汽船以來，才克服了水運上技術的許多困難。因此1824年以來，蒸汽船迅速普及各地，它在東部和西部都成爲主要的交通機關，自1830年至1860年之間，出現了汽船的黃金時代。

其次，運河的興築，以1817年起工，1825年完成的 Erie Canal（長 362 英哩）爲嚆矢。自這運河通航以來，使大湖水的交易，與大西洋的貿易連絡起來，西北部的農業者有了來往於東部市場的機會，促進了他們的生產；縮短了 New York 與 Buffalo 之間的交通；減低運費至四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因爲 Erie Canal 的刺戟，各地都興築了許多運河，總計運河的延長里數在 1830 年爲

1,270英哩及至1840年則增至3,326英哩。(Lippincott and Tucker: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U. S." P. 300)

（C）鐵路　美國的最初的鐵路，是1830年通車的波爾梯摩阿和Ohio之間的十三英哩。此後鐵路的築造迅速增加，有如下表：

1830年	32哩	1850年	9,021哩
1835年	1,098哩	1855年	18,374哩
1840年	2,818哩	1860年	30,626哩
1845年	4,633哩		

這樣，到了1860年，鐵路哩數約達運河的五倍，輸送的貨物幾相當於總輸送量的三分之二。

此外，電報的發明與實用化，郵政事業的改進，在在都使美國的交通更趨便利，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流通。

第四項　農業

（A）北部的農業

這裏所謂的北部，是對於以棉作爲主的南部以外的地域而言，即 New England，中部諸州，及由西漸運動新興發的所謂西北部這些地域。從整個看來，北部的農業，是栽培玉蜀黍，小麥，蔬菜，果樹等等，飼育家畜，製造肉和乳酪品，這和南部農業顯有不同之點。這種事實，雖和殖民地時代差不多沒有什麼差異，但隨時代的進展，產業革命和交通機關的發達，漸次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狀態，而發展爲商業化的農業經營了。

其次，西北部的農業，在西漸運動的初期，差不多是自給自足的，但隨南部地方發展爲棉作地後，剩餘農產物之運往南部，漸漸繁盛起來了。運出最多的是：鹹肉，玉蜀黍，猪油，牛油，乳酪，小麥及小麥粉，威士忌，果物，工業品等(T. M. Van Metr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P. 285) 尤其在南部，當作奴隸的糧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南部的棉作經營者，與其自己栽種糧食，還不如從別處購買糧食，把奴隸的勞動力，完全用在棉花上的有利，因此，西北部的農業，首先在南部即發見其市場。此後，西北部到南部的道路，水運，鐵路等交通運輸機關，大加改進後，農產物的輸出，更加旺盛，西北部的內部，也發生職業專門化的傾向，例如：織物工場，麻繩工場，製鐵所，造船所，機械工場，精穀製粉工場，製肉工場等等，在各處都建立起來了。但是，這只能滿足需要的一部分，還必須從東部運來多量的織物，家具，靴，各種器具等等。這樣，西北部也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經濟，和別的地方，尤其是和東部的商工業地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最後，更發生了農業地域的分化，以及穀類生產中心地向西移動的現象。

（B）南部的農業

南部農業，在殖民地時代，即已進展到商品生產的領域。例如煙草，米，藍這三大主要農作物，都是在 Plantation 制之下而後經營栽培；以後，藍因英國補助金的斷絕和印度藍的競爭而發生急激的生產減少，煙草的栽種又不算旺盛，遂有另求新的主要農作物之必要。終因對於棉花的需要大，致使栽種棉花，成為南部農業的中心。

最初，因為除去棉子及其不純淨物極感困難，且需相當的經費，故很少栽種棉花。但是，1793年 Eli Whitney 發明了鋸式攪花機 (Saw gin) 以代替從來的 Roller gin，這樣，從來黑奴一人每日至少只能攪棉花一磅重的，如果使用 Saw gin 用手運轉，每日可得五十磅至一百磅；用水運轉，則每日可得千磅棉花。因此，棉花的收穫，七年間增加百倍，英國的紡績業為之急激發展，廉價的棉織物，非常迅速地驅逐了羊毛和亞麻。美國南部，變為包辦供給棉花與英國紡績業的獨佔者。當作商品的棉花之出現於產業界的舞台，不久即凌駕了米，砂糖，煙草的重要地位，廣漠的美國原野，被棉花的栽培所掩蔽了。南部諸州對英國輸出，到 Saw gin 的發明為止，全部僅為二十萬磅，1800年增至二千萬磅，1824年增至一萬萬七千萬磅，1844年達四萬萬磅，1861年即南北戰爭的前夜竟有十五萬萬磅之

多。這樣，「棉花負擔爲南部諸州的資金了。」因爲棉花的栽培，南部三州的人口二十年間差不多增加了三倍。但是「要獲得更多的棉花，必須更多的黑奴，要購買更多的黑奴，必須栽培更多的棉花。」（世界史教程第五分冊三二頁）「最初，棉花原由白人自耕農去栽種的；及對於棉花的需要增大時，才於大規模的 Plantation 制之下，加速的利用黑奴的勞動力。因爲種棉簡直是整年都要勞動，而且差不多不要什麼栽培知識和監督，加以黑奴的生活費低廉，養育黑奴的全部家族來種棉，較之使用白人的勞動者更節約有利。這使南部的棉花栽培，和奴隸使用之間，形成了不可分的關係。捕黑奴，輸入美國各港的專門商人，每年遠征非洲「狩獵」黑奴來出賣。Virginia 和 Maryland，當作「飼育奴隸」的場所而發見了新的富源，把奴隸供給別洲，這個經濟部門，也建基在資本主義的原則上」(Pokrovsky: Ibid. P. 69) 奴隸市場是卡爾登，新阿爾安斯及其他南部諸州的各都市。這樣，十九世紀的奴隸制度，不是古代的單純的遺物，却是近世資本主義的產物，其運用者是「文明開化」的資本家。奴隸是近世的商品，是交易所的投機物，是大量輸出入的對象。在黑奴的飼育和買賣上，投放了鉅額資本，老人，病人以及把勞動力消耗完了的黑奴，如像渣滓似的從殖民地排泄了出來。當時南部諸州的黑奴勞動者數有如下的數字：

1800年	893,041人	1810年	1,191,364人
1820年	1,541,688人	1830年	2,009,053人
1840年	2,487,355人	1850年	3,179,509人
1851年	3,200,000人		

(Pokrovsky: Ibid. P. 71)

奴隸收益，奴隸的需要，不用說都增加了。同時，奴隸價格也貴了，在十九世紀初期黑奴一人值百五十美元，到了中葉則漲到二千五百乃至三千五百美元，1861年南北戰爭前，已漲到四千美元了。因此，廢止奴隸制度，解放奴隸，對於南部的社會經濟當然有致命的

打擊，影響到大地主土地所有的命運，「這樣，隱蔽在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背後，在認爲是自由的理想鄉的國家，其領土的一半以上，却在殘酷的奴隸主的支配之下。地主在自己的所有地內，完全是專制君主……在合衆國的南大半，實行腕力和暴力的政治，這較之尼古拉一世時代俄國農奴制的支配更加殘忍，更加亂暴。」(Pokrovsky, Ibid, P. 73).

第五項 工業

獨立戰爭時的排斥英貨，軍需品的需要，對外貿易的停頓，以及紙幣政策下的物價高漲，國家的工業哺育政策等條件，在在都促進了美國工業的發展，而尤以纖維工業，鋼鐵業，以及其他必需品的工業爲最顯著。但是，「美國的產業發展，在當初是沒有受到傳統及習慣的封建制度的阻礙，而能勇敢的踏到了有其特徵的新道路。若就英國的毛織工業而言，原分爲幾種過程，各在不同的場所去工作，例如梳毛，紡毛，織染等工作，各有其獨立的一部門，各有其獨立的工場，所有者，產業組織及分配的組織。這種分工，到了採行工場制度後，依然存在。但在美國却不然，像英國那樣的分工情形，美國在當初即已一齊排除，其全部過程，是作爲生產活動的一部分，在同一工場與同一管理之下去經營。」(Simons: Ibid, P.P. 105—106).

美國產業革命的動力，可以說是在木棉工業的發展。本來，在獨立革命以前，一切的纖維製品，都是專用手工製成的。及至1774年後，英國爲獨佔其產業革命的先驅的利益，曾禁止輸出紡織機械，設計圖，模型等，以及熟練工的海外移住。然而，英國的職工中，有些人不滿意資本家的剝削，想移居美國，而美國的資本家也從英國招請職工，或者直接到英國去學習新工業，把新技術傳到美國來。例如傳來了 Arkright 式紡織機械的 S.Slater，曾及梳毛機有功的 Schofield 兄弟，都是自發的到美國的。尤其是 Slater，一般都稱他是美國工場制度之父。力織機是從英國傳來的，即 Boston 商人 F.C. Lawell 在1810年頃旅行英國時，細心研究該處的織物業，回美後創製機械，最初建設工場。這個工場，不只是織布，而且也從事紡績；它是績紡織布一貫作業的工場的嚆矢，非常有名。至於蒸汽機

關也是移植 Watt 所發明的，這些機械被採用以後，織業品的製造逐漸脫離了手工，並且不在家庭工作，而到工場去工作。若就木棉紡績工場的發達而言，其在1800年尚只有八個工場，紡錠亦在二萬錠以下，及至1810年，工場便增至 269 所，其錠數增至八萬七千之多。且自1814年使用力織機以後，從來在家庭用手織的部分，也移到機械化的工場去了。計自1824年以來，木棉紡績實已踏入改良而且進步的過程。1830年紡績工場達 795 所，錠數增至一百二十四萬五千個，到了1860年工場更增至1091所，而錠數更增至五百二十三萬五千個之多。(Bogart: Ibid: P. 412)

羊毛工業的發達也非常顯著，1840年產額達 20,696,000 美元，1860年卽增至 68,865,000 美元。

其他的各種工業，也各有相當的發達。故就1860年超過了二千五百萬美元生產額的產業部門，舉其發展程度的順序如下：原製粉業，棉業，製鐵業，製靴業，被服製造業，製皮業，毛織業，機械製造業，精糖業，印刷業，車輛製造業等是。由此看來，當時的主要產業，都屬消費品工業；至於製造生產手段的工業——重工業，則於南北戰爭後，才有大規模的發展。故這一時期的美國工業，還停留在輕工業的階段。

第三節 南北戰爭後的經濟發展

第一項 南北戰爭的原因與結果

（A）原因

第一，獨立戰爭以來，產業革命剛具萌芽，工業開始發展的北部，爲對抗資本主義先進國英國工業的侵略，保護自己，曾積極主張保護政策和關稅。反之，使用奴隸勞動栽培棉花的南部，卻利於和歐洲自由貿易而反對保護關稅。因爲（一）生產費的主要部分，

（糧食，工業必需品，羊毛等）將因保護關稅而昂騰；（二）假如對英實施保護關稅，則有喪失最大的顧客；且由產業革命的發展而迅速增加棉花消費量的英國市場之慮。這樣，以保護關稅問題為中心，南北兩部的利害正面對立，美國布爾喬亞的對英經濟戰爭，不得不轉化為南北的政治抗爭。但是，各種情勢，對於北部，對於新興產業資本主義，卻非常有利。拿破崙戰爭和大陸封鎖，減少了西歐工業品的輸入，促進了國內資本主義工業的勃興；同時，卻減少了棉花向歐洲方面的輸出，給與南部奴隸制度農業以打擊。在拿破崙戰爭一度告終，英國工業品的大洪水，便怒潮似的襲擊美國東海岸，同時，在產業革命絕頂的英國木棉工業又需要巨量的棉花，頓使南北的利害對立，尖銳到最高點了。

第二，南部的棉花栽培，是在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大農制度——Plantation 下經營的。因為經營的粗放，必須不斷開拓處女地，故經營者要求未開墾國有地的出賣，必須單位較大，而且價格要低廉。反之，北部的農民，卻希望出賣的單位小而價格低廉。總之，不論接受那一邊的要求也好，這都能夠促進西漸運動，但是北部的商工業布爾喬亞，卻為隨西漸運動的發展而缺乏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市場的分散，因而希望國有地出賣的單位較小而價格較高。在這裏，我們也可能發見南北兩部利害對立的根據。

第三，英國產業革命的進展，勞動力的不足，提高了工資，獎勵了機械的採用。英國產業革命的結果，迅速轉到美國，以航行江河為主的交通條件的刺戟，汽船的發明和普及，鐵路的興築，便利了西方開拓者的道路，幫助了北部資本主義商品市場（全國的）的形成。開拓者終於在1849年發見了 California 的金礦，加以歐洲1848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波瀾，又促使移民的洪水流到美國來了。這些開拓者發見了限制他們勞動力的價格的東西，是現存的奴隸勞動，而北部的布爾喬亞又不斷的遭遇南部奴隸主排斥自由貿易的威勢。北部的布爾喬亞，假如沒有西部開拓者的支持，決不能保持其對南部的政治上的優勢。尤其是因為大農業經營和紡織的工業首先於歐洲的農業機械的製造，當作資本主義產業的一部門，勃興了起來的時候（從五十年代開始），南部的奴隸，是限制美國[illegible]北發展之直接的桎梏。因此，美國人便高呼「奴隸制度是人道之敵。」

反之，從南部的棉花栽培業者看來，從奴隸主看來，棉花的栽培和奴隸勞動的使用，有不可分的關係，奴隸是他們的最重要最確實的財產，因而堅持奴隸制度的存在。在這裏，南北兩部也發生了嚴重的利害衝突。

第四，南北美的利害衝突，在其他的地方也引起了。南部棉花生產者，為擴張栽培棉花的土地面積而發展到西部；同時，北部的農業企業家也和他們競爭而湧到西部的自由天地，這些人們在國境上衝突起來了。「農民的先發部隊，一個一個攜帶着家族，手拿鐵鍬，馬車上載着破舊的家具前進時，和南部地主或監視人發生了衝突，這些人押送着許多被鎖鏈着，背上有鞭傷的家畜似的黑奴。」(Pokrovsky: Ibid, P. 79—80)

南部的地主，奴隸所有者，自合衆國成立以來，認為是文化的代表者，大多數的總統，都從他們裏面選了出來；南美人構成其幹部的民主黨，直到五十年代，掌握着國家政權。因此，合衆國全部政治機構，可以說是在奴隸所有者手中。但是，這個社會經濟的機構，變成了利害對立的南北兩部的鬭爭舞台。即北部由國家權力而實行的保護政策（同時，跟共和的中央集權制的主張相結合，）和南部的自由貿易的主張，（同時，還是民主的共和政治的實行；）北部的工業資本家，農業企業家，手工業者，勞動者的大部分，對於南部奴隸所有者的情望政權，及其經濟的獨立與優位，都是不能妥協的。南部諸州，都認為只有和北美分離獨立，才能打開經濟發展的途徑。這樣，1861年南北兩部分離，發生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戰爭或一般人所說的內戰。(Civil War)

（B）結果

在開戰時，南部過信棉花的力量，不僅可作戰爭的財源，而且可能獲得歐洲各國的援助，使北部屈服。不料一旦遭受北部的經濟封鎖，南部便慘敗了。

南北戰爭的結果：第一，棉作地的貴族主義大農經營制度衰頹了；第二，貿易政策變化了，改行保護關稅政策；第三，通貨的統一和

國立銀行制度的創建總之南北戰爭，打破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的桎梏開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平坦大道。此後，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為止的期間，美國的資本主義，以人類空前未有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一日千里地發達起來了。

第二項　工業

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1860年代已與先進國德法二國比肩併立，到了1894年，便一躍而為世界第一的工業國，其產額二倍於英國，達全歐洲的半數。*

* 主要資本主義國工業生產的發展。（生產額單位為百萬美元）

	1820年	1840年	1860年	1894年
英	1,411	1,883	2,808	4,263
法	1,168	1,606	2,092	2,900
德	900	1,484	1,995	3,357
美	268	467	1,907	9,498

(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426).

其間雖因1873年及1893年的恐慌而一時發展較遲，但到了二十世紀受了世界大戰的影響又急激發展了起來。下列數字，即其證明。

年	工場數(單位千所)	職工數(千人)	資本(百萬美元)	原料消費額(同上)	生產價額(同上)
1859	140	1,311	1,009	1,031	1,885
1869	252	2,053	2,118	1,991	4,232
1879	253	2,732	2,790	3,397	5,369

1889	355	4,251	6,525	5,162	9,372
1899	512	5,316	9,835	7,344	13,014
1909	208	6,615	18,428	12,142	20,676
1919	214	8,990	44,569	36,289	61,737
1925	187	8,384	——	35,935	62,717

* 在1919和1925年的數字裏，年產額五千美元以下的工場工業未算入 (Faulkner; Ibid., P. 481)

在上列表中，在1899年，每年產額五百美元的工場產額約佔工業品總價格的百分之八十七餘。工場製品佔最大部分，是美國工業的最大特徵，還較之英德等國工業中還有相當多的手工的要素，是一個顯著的對照。因此手工的精巧製品不及英德等國，尙有待於輸入，而機械的製品則凌駕這些國家之上。其原因是勞動力相當缺乏，節約勞動力的機械生產比較發達的緣故。

為便於明瞭美國各種工業的演進趨勢，及其地位，最好我們參照下表（產額單位百萬美元）

順位	1860年	產額	1900年	產額	1925年	產額
第一位	製粉	248	鋼鐵	804	汽車	3198
第二位	棉製品	115	木材	790	鋼鐵	2946
第三位	製材	104	鋼鐵和機械	645	煤油	2377
第四位	製靴	91	製材	567	鋼鐵和機械	2233
第五位	鋼鐵和機械	88	製粉	561	電汽機械	1540
第六位	衣服及家具	88	男子洋服	415	汽車車身	1523
第七位	皮革	75	印刷和出版	347	印刷和出版	1448
第八位	羊毛製品	65	棉製品	339	製材	1421
第九位	酒類	56	木工品	316	車輛	1249
第十位	蒸汽機器	[illegible]	羊毛製品	267	製紙	972
第十一位	鐵絲	36	靴	261	靴	925

(Bogart: Ibid, P. 558)

據上表可知1860年以農產物爲直接原料的工業佔其大部分，而且都居前幾位；但到1900年以鑛產物爲直接原料的工業躍升第一位；到了1925年，以農產物爲直接原料的工業在上述十一種工業中差不多沒有了。這種事實，說明了：美國由輕工業消費品的生產，怎樣迅速地轉化爲以重工業生產手段的生產爲主的大工業國家去了。

其次，讓我們對美國的主要工業發展情形，稍加以概略的介紹。纖維工業中棉紗的紡錠在1860年爲 5,236 千個，1920年即增至35,481千個；羊毛工業的產額，在1860年僅爲六百萬美元，到了1925年便激增至八萬萬八百萬美元。生鐵的產額，1860年僅82萬噸，80年代增至 380 萬噸，1900年再增至1370萬噸；1920 年竟激增至 3690 萬噸，變成世界第一的生鐵出產國，約當全世界總產額的三分之一，略與英德二國合併來的產額相當。鋼的產額1880年僅有 120 萬噸，1920 年便激增至 4213 萬噸。至於食料品工業的產額，1860年僅有2900萬美元，1925年便增至萬30萬美元。農業機械製造工業的產額，自1860年起約六十年間，從二千萬美元增至三萬萬四百萬美元。汽車工業的產額，1904年僅爲 21000 部，1914年即增至58萬七千部，1924年更增至四百三十二萬五千部。據1928年的調查，美國登記的汽車數爲二千三百二十六萬部，佔全世界登記汽車的總數的70%。平均五個人即有一部汽車。由此可知美國汽車工業的發達。

最後，石炭的生產則佔世界第一位，1929年的產額達 608.9 百萬美噸；煤油的產額在1929年達1,007.3百萬桶，其他鑛產，例如金，銀，銅，鉛，天然煤氣等的產額，都非常之多，常在世界的前幾位。

1920年美國的工業品，已佔了國內消費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六，確是足夠自給了。

美國的工業發展，不僅在其速度上非常驚人，而且經營規模迅速擴大，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早已發展到獨佔團體，（如 Cartell, Syndicate, Trust等）確實支配人們經濟生活的高度了。

第三項 農業

南北戰爭後美國農業曾有極顯著的發展，其速度雖不及工業，然而也可以說是現出了農業革命的時代了。例如耕地面積，在1870年後三十年間增加了四萬萬三千餘萬英畝，農業人口，從五百九十萬人增至一千三十餘萬人。(Humphre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P.588) 其次是所謂「農業革命」。這第一表現在農業的機械化上面。因為戰時平時勞動力的缺乏，1865年刈取機即達萬25架，1878年 L. F. Appleby 更發明了割刈稻草同時即加束縛在一起的 Twine Bindn 或 Twine Harvester；1885年發明 Combined and Harvester and Thresher（這是刈禾，打穀，裝袋都由同一機械來執行）大大地增加了農業生產力，此外更發明了各種耕耘機，播種機，施肥機，刈棉機等等農業機械；1905年開始試用 Tractor 來代替驢馬牽曳這些機械，1917年 Fordson Tractor 出現後迅即普及和實用化，計自1918年至1932年，馬匹已從二千六百四十萬頭減至一千七百十七萬匹（約有農場原動力的一半；）同時，牽引機則從八萬架增至八十五萬一千架，這機，機械力早已代替了家畜力。

農業革命的第二個表現，是在科學的經營，農業之合理的企業化。例如：農事試驗場，農業教育機關的普遍設立；大規模的農業調查和農業指導；農業知識的普及，和優良種子的散布，農業之科學的設備等等。

農業革命後，農業生產機械化，農業經營科學化合理化的結果，每一人從事農業者的平均生產力，有很大的增加。若就每一勞動者在穀物生產上的增加來計算，計自1850年至1860年這十年間的增加率為25%，自1850年至1900年這四十年間的增加率為百分之五十，而在1900年以後五十年間的增加率則為約百分之三十。

耕地面積的擴大，生產力的發達，當然要引起農產物的激增。

主要農產物生產額

年次	玉蜀黍(百萬美斗)	小麥(百萬美斗)	米(百萬磅)	砂糖(百萬磅)		棉花(百萬包 包五百磅)	羊毛(百萬磅)
				甜菜糖	蔗糖		
1860	839	173	106	——	275	3,84	60
1880	1,717	499	112	1	285	6,36	233
1900	2 505	603	253	172	624	10,12	289
1920	3,209	833	1,446	2,178	352	13,44	287

(Shann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448)

從上面的數字，我們就可以知道美國農業的發展，是怎樣的迅速。

美國農業的這樣發展，伊里奇特別命名為『美國型』的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途徑。他說：『在美國型的場合，地主經濟不存在，或被革命所粉碎，封建領地被沒收，被處分。在這個場合，農民變為農業的唯一代理人，漸次進化為資本主義的農業者而佔著優勢。』（見第九章第三節第二項，全集九卷四四三頁。）

第四項 交通運輸機關

（A） 鐵路

南北戰爭後工業和農業的迅速發達，有助於鐵路的地方甚多。鐵路的發展，可從下列數字推知：

年次	鐵路總哩數	主要幹線哩數
1860	70,626	——
1880	93,276	——

1900	258,784	192,556
1920	407,579	259,941
1930	429,883	260,440

在這一時代的鐵路建設中，最要注意的就是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大陸橫斷鐵路。自1849年 California 發現金礦，西漸運動進展，移居極西部的人民日益加多，益使大陸橫斷鐵路有迅速建設的必要。1862年議會通過了第一次援助大陸橫斷鐵路建設的法案，決由 The Central Pacific 和 The Union Pacific 二大公司承辦；前者由 Sacramento 向東方建築，後者由 Omaha 向西方建築，至1869年五月十日在 Utah 州 Ogden 附近兩相連接，而完成了。此後，大陸橫斷鐵路的建設，在1882年完成了南太平洋鐵路；1883年完成了北太平洋鐵路；1893年又完成了大北鐵路，三十年之間，竟建築了幾條橫斷鐵路。

（B）電氣軌道和汽車運輸

自1884年在 Kansas 市電氣軌道通車以來，電車發達爲城市的交通機關，十年後郊外電車也發達了。據1922年的調查，電車軌道共長四萬四千哩，其中41%屬於郊外電車。電車的主要任務，是在供人口稠密地域的乘客之用；郊外電車，一面是在連絡都市與都市之間的交通，同時，貨物的輸送也漸次發達起來了。

汽車的實用化，是在1893年以後。此後，隨汽車工業加速度的進步，其部數急激增加，1928年登記部數達2326萬部，佔全世界登記汽車的76%，平均每五人即有汽車一部。汽車交通的發達，給與電車和火車以很大的威脅，因而廢棄了許多鐵路，但是，同時卻促進了道路的改良和稅道（Turnpike）的建設。

（C）水道

在獨立戰爭後的西漸運動時代，在運輸交通上，水運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隨南北戰爭後鐵路的急激建設，汽車交通的突飛猛進，早已失去其過去的重要地位。巴拿馬運河的通航，雖一時刺戟水運，但對於大局，卻沒有多大的變化。交通運輸的重心，早已移到鐵路上了。

第四節　結語

根據上面各節的說明，可知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一，是在資源豐富的廣大殖民地，差不多沒有受着封建制的種種束縛和阻礙，相當順利迅速（1776年獨立戰爭後產業革命剛具萌芽，但在1860年即可能和法德二國比肩併立，1894年已一躍而爲世界第一的工業國）地發展了起來的。這是殖民地經濟，擺脫了宗祖國的種種羈絆，成長轉化爲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事例；

第二，優良的地理環境，封建束縛（農奴制和 Gild System）的鬆弛，廣大的國內市場，刺戟着勞動力相當缺乏的美國工業和農業的機械生產化。其結果是：跟英，法，德，沙俄，日本等國相比較，大工場機械製品的絕對優勢，和手工的精巧製品之仰給於輸入；

第三，農工業生產的機械化及其經營規模的迅速擴大，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集中，致使獨佔資本主義早熟，迅速而確實地統治着美國國民經濟。——這些都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殊發展及其基本特徵。

本章主要參考書

E. L. 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 M. Simon :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H. U. Faulkner: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E. F. Humphre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T. W. Van Metr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F. A. Shann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E. C. Kirkland: A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

Lippincott and Tucher;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U. S.

H. J. Car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猪谷善一著張定夫譯美國社會經濟史。

丸岡重堯著美國經濟史（日文經濟學全集第二十九卷中華書局已出版有潘璧如的中譯本）。

Pokrovsky著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筆江保藏著美國經濟史概說。

波查洛夫著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四，五分冊。

第十一章 俄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第一節 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俄國經濟

對農奴的慘酷剝削，以及俄國特有的自然環境和人口稀疏，妨礙了生產力的發達，阻止了俄國經濟的進展。但是鄰國的不斷侵略，提出了國防與軍備的嚴重問題，使當時的俄國政府，痛感優秀的技術和豐富的資源的必要，因而促進了國內產業的開發和經濟的發展。然而，就是經過十七——十八世紀的彼得大帝時代，到了十八世紀的卡他利娜女皇時代也好，農奴制的俄國，在社會經濟上，較之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英法等國，依然是非常落後的。在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帝俄封建主義的侵略政策，為開拓俄國商品的市場，為謀商業資本的利益，竟與經濟上最强有力的英法二國發生衝突，而釀成大吃敗仗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56年）戰後俄國的經濟，曾有顯著的發展，到了六十年代，解放了封建制度之基礎的農奴——雖然那樣的解放是極不澈底。這樣，俄國漸次踏上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俄國的近世社會史，亦以此為樞軸而展開在我們面前了。

第一項 農奴制

十八世紀的俄國，是典型的農業國家，人民的極大多數是農民，他們束縛在自己耕種的土地上，是毫無自由的農奴。彼得大帝（1685—1725年）治下十八世紀初期的社會組織，是由下列三個基礎階級而構成的。

（一）文武官員，領有土地的地主階級；

（二）工商業者；

（三）農民，隸屬於地主的土地，國有地、皇室地的農奴。

在這三個基本的階級以外，還可以把僧侶當作第四階級加了進去。此外，還有如次的各種社會集團：（1）農業奴隸（Kholop）有永久的與一時的之分；（2）家內奴隸，地主家中的奴隸；（3）流氓，乞丐等；（4）寺院的僕役奴隸；（5）僧侶子孫出身的貧民，（佐野學著俄國經濟史，一三〇—一三一頁。）

彼得大帝的人口調查與農奴政策——彼得大帝在1718年着手於人口調查，其目的：第一，是在擴充軍隊；第二，是在探求軍費的財源而徵稅。他雖未完全達到這個目的而早死，但人口調查和徵稅（人頭稅）已當作俄國政府的根本「施政」方針，嚴厲地執行了下去。

這種人頭稅制度，變成了促進經濟發展的刺激物，因爲在從來以土地面積爲標準的田賦制度下，地主和農民，可以用擴大耕地的辦法，來避免繁重的租稅負趨於繁重，但因負擔同額的人頭稅的緣故，他們就不得不努力於農業生產。這雖促進了十八世紀俄國農業的進步，然而農民仍不能脫離貧苦的困境。彼得大帝最初想把調查人口的範圍限於在地主土地上勞動的農奴，以後卻將範圍擴大到國有地，皇室地，下級士族，負擔租稅的工商業者，以及奴隸，流氓，寺院的僕伴，僧侶的子孫等基本階級以外的社會集團，把這些無用的人們，強制徵發來當兵，或者編入負擔人頭稅的階級，人頭稅，省略了社會之階級的編成，把本來的奴隸或奴隸的社會集團，編爲國有地農奴或地主農奴。這樣，農奴的社會地位，淪落到奴隸的地位；而本來的奴隸，從新負擔租稅；比地主農奴要自由的國有地農奴，也完全變成隸屬的了。

此外彼得大帝的農奴政策：（一）強制徵發農奴當兵；（二）命令農奴作賦役勞動，提供馬車和馬匹，建築橋樑，道路等。1708年到1714年，全國合計徵發了二十萬農奴，因爲過勞和慘酷的待遇，死亡者竟達十萬人之多；（三）准許買賣農奴；（四）隨工業的發

達，更復發國有地農奴當工場勞動者；（五）更以購買農奴的特權，給與私人設立工場的工業家；而且農奴還是國家財政的最大支持者，1714年繳納人頭稅的農奴共爲四百九十萬人，佔全部納稅者的百分之七十三，稅額達三百四十二萬五千盧布。（J. Mavo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Vol. I. P. 177）根據1762年至1766年的第三回人口調查*，我們知道：全部農奴中地主農奴最多，佔全體的百分之五十三，國有的農奴次之，佔百分之三十九，農奴數共有7,153,890人，如假爲都已結婚，則共約有男女農奴一千四百三十萬人。據1762年的人口調查，當時的人口約爲一千九百萬人，故農奴人數要佔俄國全部人口的九分之七的絕對多數。由此可知：十八世紀的俄國，是以農奴制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俄國農奴的悲慘生活，是衆人周知的事實。農奴沒有財產所有權，不得地主的允許不能自由結婚，對於地主的任何刑罰必須服從忍受；地主常常掠奪農奴的金錢，姦淫他們的妻女，住在都市的地主，每年巡行領地一次，玩弄農奴的妻女，名爲「巡迴娛樂的旅行」，地主可以自由買賣農奴；對於地主的一切暴行，農奴無權控訴。這種比畜生還不如的悲慘生活和殘酷的剝削，一方面阻止了社會生產力的發達；一方面又使農奴忍無可忍而釀成許多農奴叛亂。蘇維埃農業辭典中舉出1826—1861年間，農奴叛亂次數共達1186次之多，（1855至1861年間卻有474次）其中尤以十七世紀後半的拉新叛亂和1773年的浦加徹夫叛亂（Bugachev Rebellion）最爲有名。這些農奴叛亂，威脅了沙皇黑暗的封建統治，而構成爲1861年農奴解放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二項　工業

在十八世紀初，從事定貨生產的俄國手工業，只是在都市佔優勢，就是在彼得一世時代的彼得堡也好，除製靴，製革，裁縫等舊式手工業以外，只發生了製造馬車，製造飾鈕的新式手工業。在農村中，因爲專靠農業難以生活，因而家內工業的生產發達起來了。到了

* Mavor, 同書 P. 192.

十八世紀末葉，才漸次開始發生大工業的企業——工場手工業。國家爲製造紗，帆布，武器，玻璃等業，自己經營工場手工業和工場，使農奴從事於勞動。在伯姆的九個冶金工場，有二萬五千農奴從事勞動。善斯脫列茲的金屬工業中有六百八十三人；莫斯科的帆布工場中則有一千一百六十二人，從事勞動，其大部分是利用各個家內工業的家庭勞動，經濟生活的性質，一面是農奴制的；一面是商品生產的。在這種家內手工業勞動的基礎上所創立的官營企業，不得不被私人企業的發達而壓倒了下去。商人把逃走的農奴，免役兵士，流氓，乞丐等等集中來工作，爲擴張商人的利益，1721年就許可設立這種私有的農奴工場。此後不久，貴族，地主也創立了工場，使農奴從事勞動，在彼得一世統治的末期，竟建設了二百多工場。這樣「最初對於大工場的設立有所貢獻的，不是村落的手工勞動者；也不是大商人，却是國家本身。瑞典使彼得一世建造了一個艦隊和新式的軍隊；而且他爲建設其軍事組織，他的國家便直接從屬於漢撒諸都市，荷蘭及英國的工業了。在這裏，設立能夠供給軍隊和艦隊的國內工場手工業，變爲國防上的死活問題了。在彼得一世以前，從來沒有談及工場的生產；但是彼得一世以後，大規模的國營企業或私營企業，設立了一些艦艇工場，兵器廠，帆布及其他類似的工場。構成從新建設這些工場之經濟基礎的，一方面是國家的收入，別一方面是商業資本。商業資本跟隨新工業部門的創建，同時輸入了外國資本，這種事實，終於也不算稀少了。」（羅治維一：近代俄國社會史研究，三九四——三九五頁）

西歐資本主義的成立與發展，給予俄國工業以莫大的刺戟。技術家，建築家，熟練勞動者的移住；新技術和機械的輸入；外國資本的流入，在在都促進了俄國工業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棉織物生產急激發達，五十年間消費的棉花原料便增加五十倍。因爲應用機械於紡紗和織布，紡織物變成了最低廉的衣料。1808年在莫斯科設立最初的一所紡績工場，四年後的1812年即增至十一所。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以後，俄國開始從英國輸入紡織機械，在五十年代，紡錠數便佔到全世界的第五位。紡織工場中所使用的自由工資勞動者，佔了絕對多數。1804年，6566人的勞動者中，有5436人是自由工資勞動者。棉花生產業，雖未得政府任何借款和特權，但因市場的需要而發達起來。羅紗工業，在十八世紀初，雖有政府種種援助，其發達却相當遲緩，工場的大多數，是貴族的工場，使用農奴，在

28,689人的勞動者中，自由工資勞動者僅佔了2,788人。這種貴族的和私有的農奴工場，它和市場的隔離，妨礙了羅紗工業的發達。1816年政府解除其對於羅紗工場的義務後，出現了以市場為目標的自由販賣的工場，致使羅紗的品質顯著地改良了。尤其是商業資本之出現活躍於羅紗工場，以及俄國南部外國人移住者所經營的羅紗工業的發展，動搖了貴族私有的農奴工場的羅紗生產，這樣，商業資本侵入農奴經濟，構成了從內部使農奴經濟崩潰的因素。貴族雖然全面的把握着農奴經濟的各種手段和可能性，但因資本不足，很少可能創立大規模的工業企業，在這裏便有商業資本侵入的間隙，因而出現了由商人合作使用賃貸方法的過渡期工場形態——「前資本主義的」工場。（日譯世界史教程，第四分冊，三四〇頁）這樣，俄國的經濟發展，漸次便和歐洲資本主義的經濟有機體合流了。

第三項　商業與貿易

國內商業，也隨工業化的進展而呈活況，原料品的需要增加，定期市場上日見其販賣的增加，「哈利可夫的定期市場，販賣額達二千萬銀盧布；烏克蘭近郊，有二百七十多個小市場，這由於把商品拿到農村，農場村落去的大俄羅斯活動家（行商人）的全部隊，把農民聯繫在市場，影響了這些農民的一切階層。尼傑古路德的定期市，每年的販賣額達五千萬銀盧布。對於西伯利亞及伏爾加河沿岸地方有重大意義的，是依爾比克的定期市。從這裏把小麥送到外國去，在外國加工後，出賣給歐洲和俄國的購買者。因此依爾比克的定期市，甚至有世界的意義。」（同書，第四冊，三三七頁）

商業的發達，因為交通不便而大受其阻礙，但是，鐵路之急激的建築，運河，港灣的開闢，是使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之有力的大動力。最初的鐵路，是在1851年通車的彼得堡與莫斯科之間的路線；華沙與維也納之間是在1848年；彼得堡與扎斯可·獲路間，是在1835年連接起來的。1861年的最初的十年間，有7,000俄里（Versta 1,067公里）其次的十年間即增至12,000俄里，再其次的

十年間又增至16,000俄里，在1891年代，只是在歐洲的俄羅斯，卽有20,000俄里。全帝國共約有30,000俄里的鐵路。1894年鐵路網共長了18,000俄里，這樣在南方的黑海及亞速海方面，都可能販賣俄國製棉織物，製造家自已搬運商品，他們卜居於途中的中心地點，掌握商業權；同時，開始經營工業的企業。這樣商業資本開始踏入工業資本的進程，俄國資本主義以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為境界，顯示出極迅速的發展。

其次讓我們看一看對外貿易。俄國的經濟到了十九世紀的上半期也好，仍是商業相當發達的農奴制。此後內部漸次發生變化，對外貿易顯著的增加。對歐洲是農業國，是「穀倉」的俄國，對近東諸國及亞細亞，却是工場手工業的國家。1815—1825年的十年間，棉布的輸出增加十倍，毛織物輸出增加六倍，金屬製品增加二倍；從外國輸入的機械，器具1815—1825年的十年間，其增加竟達十三倍之多。1802年的輸入額為四千九十萬金盧布。輸出為四千五百八十萬金盧布。1861—70年平均每年輸入增至184.5百萬金盧布，輸出增至184.9百萬金盧布。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俄國經濟，正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途上邁進。

第二節 農奴解放的原因與結果

第一項 原因

第一，跟隨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的萌芽成長，工場增加，自由工資勞動漸次成長，穀價昂貴，和領地的「穀類工場化」暴露了農奴制度下的勞動出產力是非常之小的，那農奴經濟制下的强制勞動，較之自由勞動是非常不生產的。農奴經濟生產力早已不能供應十八世紀末葉以來漸次發達的穀類輸出貿易的需要，因而地主也感覺到有解放農奴的必要。

第二，農奴制度如果長此繼續下去，還必使工業資本家第一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勞動力，第二國內市場無法擴大。因為農奴旣

被領主束縛在土地上，沒有行動的自由；而且領主對農奴的殘酷剝削，又使農奴過着乞丐的生活，當然沒有餘裕購買工業品。這樣，「俄國工場生產品的購買者，主要的是都市住民。但因束縛農民在農村裏的農奴制度的緣故，都市住民的增加，是非常遲緩的。俄國的都市人口，在十八世紀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也不過百分之六。解決方法是解放農民，如果從領主的搾取解放出來，自己有一點收入，則農民會變爲「購買者」吧！——1861年後俄國工業的歷史證明了這個假定的正確。」(Pokrovsky, Brief History of Russia, 第二卷，第一章，第二節，日譯本，一一七頁) 這樣，布爾喬亞也在熱烈的希望解放農奴。

第三：農奴的叛亂。(見第一節第一項)

第四：對外戰爭失敗的教訓，尤其是對英法二國的克里米亞戰爭的慘敗，俄皇尼古拉斯一世因此服毒自殺，教訓了帝俄，要戰勝敵人擴大海外大市場，只有改善國內的產業組織，發展大工業才行。這是促成農奴解放的一個原因。

第五：新興資本家階級與新思想家 Radishtchev, Speransky 等對農奴的制度之一切悲慘和不合理處的儘量暴露與宣傳；以及最初的資本家革命者團體十二月黨(Decembrists)的革命陰謀，在在都促進了農奴的解放。

所以，1861年俄國的農奴解放，既不是由於支配階級的良心發現；也不是由於地主的慈悲心，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伊里奇說「大概是什麼力量，使農奴主不得不實行「改革」(農民改革，即「農奴解放」)的呢？這就是使俄國取了資本主義的路徑的經濟的發達力。地主——農奴主既不能阻止俄國和歐洲的商品交換的發達；又不能維持瓦解了的舊式經濟形態。克里米亞戰爭，暴露了農奴制俄國的脆弱和無力，在「解放」前十年中漸次增加的農民「暴動」，使第一個地主亞歷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認：與其等下面來崩潰不如從上面解放。「農民改革」是由地主所實行的資產階級的改革。」(全集，第十五卷，一四三頁) 這明白告訴我們，1861年農奴解放的內容，是資產階級性的。

第二項　結果

1861年二月十九日頒佈的農奴解放命令，給與農奴以自由民的地位，并分與一部分土地。故從表面上看來，農奴解放好像對於他們有天大的恩惠似的；但是，「分有地」不是無條件分給農民的，他們必須支付賠償金或土地收買金給地主，不然，卽不能成爲自己的所有物。在未支付以前，依然爲地主負徭役，納年貢。這叫做「一時的義務負担者，」依然爲農奴制所支配。農民不能支付土地收買金時，國家卽代爲付與地主，由農民分作五十年按年分還國家。但是，分與農民的土地價格却決定高於市價。這使農民們除了市價只要五萬萬四千四百萬乃至六萬萬四千八百萬盧布以外，又多付了一萬萬一千九百萬乃至三萬二千三百萬盧布。這種超過額，當然是「人格賠償金」了。這樣，農民不但要出高價錢收買地主不要的劣等地；而且還要出錢贖回人格，才能獲得自由，肩負着巨額收買金的農奴，不能靠此僅少的土地來彌補，隨於「解放」以後，不得不淪爲債務農奴，仍受封建的壓搾。這樣，跟德國東部的情形相仿彿，出現了農奴制的「第二版。」同時，農民不得農村公社（Mir）的同意，不能隨便離開農村。因爲關於租稅的繳納，土地收買金的支付，農村公社內部的各個人自，負有互相連帶的責任，還由農民全體共同負責，因此，一個農民離村，則留在村中的其他農民們，勢必要繳納更多的租稅，因此農民仍然束縛在土地上。「在徭役的黑壤地帶，隨農民「解放，」巨大面積的「分有地」當作「切取地」被地主收奪了去，加以農業所必需的森林，牧草地，飼水場，牧場等等，依然爲地主所有，農民喪失其獨立經營農業的能力，陷於債務農奴，而不得不以「雇役」爲條件，再從地主租借土地。這樣，在黑壤地帶，「徭役制度之直接的殘存物」的雇役制度，又出現了，確立了。這樣封建的剝削形態，不但沒有廢棄，此後反而長久保存下去。別一方面，在非黑壤地帶，農民雖增加其土地面積，但又不得不苦於「土地收買金」之過重的負担。所謂「土地收買金，」不外乎是年貢的形態變化而來的。這樣，在年貢制度佔支配地位的非黑壤地帶，又以封建年貢之直接的殘存物—收買金」的形態，長久保存着封建剝削之另一形態。從這點看來也好，「農奴解放，」決不是意味着農奴制度的完全廢棄，這不過是變形了的「直接的殘存物」的支配，卽農奴制度之妥協的解消形態。」（小林良正，俄國社會經濟史，頁二〇〇—二〇一）這種極不徹底的農奴「解放，」因而封建要素之大量的殘存，（所謂農奴制的「第二版，」）影響了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其帶有一種半封建的特徵

那末，俄國的布爾喬亞爲什麼不能徹底解放農奴，打倒農奴制，及其上層建築的封建專制統治呢？爲什麼他們不能完成其歷史的使命而非妥協不可呢？這是因爲俄國布爾喬亞的脆弱與卑鄙的緣故，「愈往歐洲的東方走，則布爾喬亞愈卑鄙的事實，在恩格斯的時代，已經是周知的事實了。但是，俄國布爾喬亞這種非常卑鄙的狀態，能用什麼神祕的原因來說明呢？俄國布爾喬亞的這種性質，是在血液裏面嗎？不，這有經濟的原因存在。在俄國，資本的蓄積，有負於外國的信用（Credit,信用借款。）名義上是俄國的企業也好，卻常常由外國資本，而且是由政府當作外債借來的錢，作爲補助金，交給工場主人而建立起來的。然而那個信用，是由外國借給國家，不是借給私人企業的，因此資本家知道，如果反對政府，則不能獲得信用。」（Pokrovsky,同書，二九三——二九四頁）

其次，俄國的工業家，沒有達到英法的工業家早已達到的目的——即未獲得通過布爾喬亞議會，參加國家組織的權利。俄國的工業家，甚至沒有拿到德國布爾喬亞所獲得的國政協贊權。在俄國，工業資本沒有達到單獨支配的地步，（例如在十九世紀英美二國那樣的，）它常常和商業資本瓜分支配權。俄國的布爾喬亞在1905年革命的時期，才開始獲得了國家的中央權力的一部分，由此可知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怎樣的微弱。（同上，157—158,183）

本來，在典型的資本主義諸國，例如在法國的布爾喬亞革命之際，布爾喬亞極力利用農民，勞動者及小市民的叛亂，來作爲打倒封建制度的鬥爭手段，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當時俄國的情形則不然，布爾喬亞因爲自己的階級基礎非常脆弱，所以不但不能利用大衆運動之變革的醱酵力，反而在農民運動面前，表現其戰慄和恐怖。

這樣：當時俄國布爾喬亞的脆弱無力，既不能廢棄專制國家之物質基礎的農奴制度，因此更不能一舉而清算一切的封建統治與束縛，開闢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道，所以伊里奇說：「農奴改革是農奴所有者的改革，這不會是別的，因爲實行改革的人，是農奴所有者的緣故。」他又說：「1861年的「改革，」其各種利益只是局限於單純的改革。這是因爲要求改革的社會分子（首先是農民）是

極端柔弱無自覺太分散之故。因此在這個改革上，農奴制的特質，既如此顯著而富饒興味，又這樣充足，遂使農民所受的貧困，就不可以數量計了。」（全集十五卷九十七頁）又說：「從賦役解放了出來的農民，除了服從賦役制度以外，不能採取任何手段，以至於從改革者的手中出來時，即被人敲打，掠奪，推倒在自己的分有地上。……在地主抑壓上，又加上了資本的抑壓。貨幣的權力，以其全部重力壓在半農奴的百姓身上。……農民淪落到乞丐那樣的生活水準。他們和家畜同住，身穿破衣敗絮，以藜爲生。農民陷於慢性的飢餓，在漸趨頻繁的荒年因爲饑饉和瘟疫，他們成千成萬的死了去。」

農奴解放，就這樣告一段落。這對於地主非常有利的不澈底的解放，不久之間，便在各地爆發了猛烈的農民暴動。但是，這對於從來過着非常悲慘的生活的農奴，較之「解放」前，表面看來，似乎又要好點，因而農奴解放令，大體就實行了。這個改革，採取了封建大農業及其同盟者商業資本所必須的那樣的歐化形態。

商業資本，獲得了從（束縛在農村公社裏面半自由的）小生產者搾取更多的剩餘生產物的可能性。它常常使農民把必要生產物也拿到市場去賣，爲償還未付的錢，奪去或出賣其家畜和房屋，或使農民出賣其尙未取穫的穀類，而蓄積了資本。但在經營方面，因爲沒有可能完成從地主經營的舊式方法，直接轉移到新興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因此，在俄國，農奴解放後，賦役的農業和資本主義的農業並存，不得不經過發展到純粹資本主義農業爲止的一切的中間形態。因而出現了農業資本主義發展之「普魯士型」。*

縱然是這樣也好，結局因爲農奴解放，才促進了俄國社會和近代歐洲文化相融合和世界史的本流相交流。這樣俄國經濟漸次資本主義化，因而勞資對立也跟着漸次普遍化。然而遲遲發展，以及慢慢地才和世界史的本流相交流，致使俄國社會構成爲內包着封建要素與資本主義關係的矛盾的特殊社會形態，

* 「……普魯士型的場合是農奴制的地主經濟，分化出少數的大農，使農民以數十年的最痛苦的剝削與債務奴隸化，慢慢成長到布爾喬亞的 Yunker 的經濟。……」（伊里奇全集九卷四三頁『論農業綱領問題』，下卷一九八——一九九頁）

第三節　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一項　農業的商品生產化

農奴解放之極不澈底的妥協性質，農奴制度的「再版」與確保，極端妨礙農業生產的資本主義化，故在「解放」後，至少二三十年間，俄國農業資本主義，沒有大的發展。這二三十年間的特徵，寧可說是在：由於農民和地主的半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貨幣經濟，終於使舊經濟形態，趨於崩潰之一途。據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統計，沒有馬的極貧農民也好，或每戶有四匹以上的勞役家畜的最富裕農民也好，其收支的最大部分，是由貨幣來表現的。」（Pokrovsky, 同書 P. 249）農業的商品生產化，使農民經濟日益隸屬於商業資本，因而在農奴解放後，商業資本的作用，更加增大了。

「解放」後農業生產的特徵，依然是以穀類為主的三圃農法，技術又很幼稚，在1881年播種面積佔耕地的百分之六六・六，而全部播種面積中的百分之九十一是穀類作物，這證明在這個時代也好，主穀農法仍佔支配的地位；同時，在俄國輸出貿易中，穀類輸出，從1861年——65年的五千六百萬盧布，增至1891—95年的二萬萬二千八百萬盧布，即在此三十多年間，穀類輸出增加五倍；而且在總輸出額中的比率，也從百分之三一增至百分之四七・二。其次若就穀類收穫量來說，在「解放」後四十年，即從二十萬萬普特，增至四十萬萬普特，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俄國確是「歐洲的穀倉」；同時更說明「解放」後俄國商品生產化的農業之發展情形。俄國農業生產的商業化，還表現在穀類以外的大農產物輸出的迅速增加上面。

「解放」後俄國農產物輸出的增加

	1861—65年	1891—95年

穀類	56.3百萬盧布31.0%	296.7百萬盧布47.2%
砂糖	0.5　0.3	18.3　2.9
鷄卵	0.01　0.0	14.3　2.3
乳酪製品	0.3　0.4	3.4　0.5
家畜家禽	0.02　0.0	4.6　0.7
牛脂	10.8　5.9	0.7　0.1
亞麻	17.8　9.8	54.2　8.6
大麻	9.1　5.0	14.8　2.4
總額	181.6　100%	296.7　100%

農產物輸出的增加，促進了商業的成長，耕地面積的增加，生產力的發達，以及農業生產的分工與專門化。這些條件更促使農業生產形態高度化，即從來粗放的三圃農法進展到集約的多圃輪作農法；同時農業生產的種種部門也分化發展了，除穀類以外，工藝用作物，即亞麻，馬鈴薯，甜菜等等的生產發達，集約的商品生產的牧畜業，乳酪業，也開始發達了。

新興商業的穀類生產地方，是在歐俄的東南邊境地方，新俄羅斯的斯特普諸縣，以及伏爾加河對岸地方。這些地方的穀類生產，尤其是輸出穀類中小麥的生產，凌駕中央黑壤地帶諸縣，而躍居首位。在這個地方有許多近代資本主義的農場，應用相當高度的農業技術和機械，雇傭多數的工資勞動者。

商業的牧畜業，乳酪業，則盛行於彼羅底海沿岸，西部諸縣，北部地方及若干的中央地帶的諸縣，跟都市生產和工業的發達相關聯，而開始發達起來了。

其次，最重要的亞麻生產地方是布斯可夫，斯摩倫斯庫，菸納的各縣，其生產額，從六十年代末的一千二百萬普特，增至1896—97年的二千六百萬普特。同時，這個地方的亞麻輸出也在急激增加，從1859—61年的平均四百六十萬普特增至1894—97年的平均一千五百萬普特。

最後，給與農業生產與農業技術以革命的影響的是農產物之技術的加工經營的發達，其中值得舉出的，第一是以馬鈴薯爲原料的火酒製造及澱粉工場。火酒製造場的馬鈴薯消費額量，從1867年的六百九十五萬普特，增至1896—97年的一萬萬二百萬普特，即約增十五倍；馬鈴薯澱粉生產額，則從1860年的二十七萬盧布，增至1890年的一百七十六萬盧布，即在三十年間增加六倍多。第一最新的，而且資本主義的性質最濃厚的農業，是甜菜生產。甜菜的收穫量及加工量的增加，更加迅速，自1860年到1895年約增加八倍之多。

這些集約的商業的農業經營之發達，當然要促進高度的農業技術和機械的採用，增加自由工資勞動者的雇傭，因而要引起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跟隨農業資本主義之進展，農民層分解爲農村普羅利塔利亞和農村布爾喬亞；一方面改良機械的改良耕作，越加廣汎地普及，別一方面農民層之轉化爲工資勞動者的過程也更加迅速。在這裏，讓我們離開流通過程，轉眼來看農業的生產過程。首先，讓我們把土地分配狀況，稍加說明。

第二項　土地所有關係

農奴解放後，俄國的全部土地，分爲（一）私有地（101.7百萬俄頃，Desyatina＝16139市畝＝1.09Hectare）。（二）分有地（138.8百萬俄頃）（三）國有地及其他（154.7百萬俄頃）。私有地的大部分，是在解放之時，留給地主的土地；反之，分有地是由地主分與農民（直接分與農村公社）的土地，故前者爲地主的土地；後者爲農民的土地。私有地的百分之六一·九屬於貴族的所

有，在這裏表現出高度的土地集中；反之在農民所有的分有地上，則表現出土地所有的分散。例如除去沒有分類在土地所有面積別的百九十萬俄頃以外，其餘的土地面積一萬萬三千六百九十萬俄頃，由一千二百二十五萬農家來分配，平均每戶只有11.1俄頃，但在這裏也好，土地所有的不平等，也是存在的。因爲分有地農家一千二百二十五萬戶中約佔一半的六百二十萬戶，每戶所有土地是在八俄頃以下。屬於這個範疇的農戶，是連一匹馬也沒有，或只有一匹馬的貧農，其家族三千萬人，是被救恤的貧民。在分有地農民之間雖沒有極端的土地所有不平等的現象，却依然有中世紀傳來的農奴制的身分的區別存在。

第三項　農業經營

在這種土地所有關係上的農業經營，是怎樣的呢？匯我們先看地主經濟，其次再看農民經濟。

（A）地主經濟：地主經濟，是在地主所有土地佔私有地的大半上經營着的，其主要特徵是在雇傭自由勞動者的資本主義制和使用徭役勞動雇役制度的互相滲透融合。所謂雇役制度，就是賦役制之「直接殘存物」，是農奴制度之運緩的繼續，因而「經濟外的強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同時，這又是從徭役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的制度。

一般的說來雇役制度下的強制勞動，是妨礙農業生產力發達之一因素。商品貨幣經濟的發達，市場的擴大，使雇役制度的農業經營，不能適應轉變不定的漸趨龐大的農產物需要。因此在地主經濟中，自由工資勞動的雇傭，農業機械的採用，漸次勃興起來。這樣，資本主義，完全明瞭地，在這個領域內，開闢了自己的道路。這正在從以賦役勞動爲基礎的經濟，變形爲以自由工資勞動爲基礎的經營。跟以賦役爲基礎的經濟相比較的，以及和小農民經濟相比較的資本主義農業之技術的進步，從各方面看來，都明瞭的現了出來。

但是，這個進步，較之近代之資本主義各國，是非常緩慢的。例如以北美合衆國來說，依據1900年六月一日的調查，農業企業家的農場五百七十萬個，每一農場平均有土地六十俄頃；而且機械生產額在1900年共爲一萬萬五千七百七十萬美元。俄國在1900年—1903

年的農業機械國內生產額，僅爲一千二百萬盧布，兩者相較，可知農業資本主義「美國型」發展的迅速，以及「俄國型」即「普魯士型」發展的緩慢。那麼美國同俄國，同樣有廣大的耕地面積，而其農業發展爲什麼又發生這樣大的差異呢？這就是因爲：在美國，在土地所有上沒有封建的殘渣妨礙農業的發展；在俄國，却有大量的封建殘渣，阻礙其發展。因此，俄國到了十九世紀末也好，也有全社會發展的各種要求，和農奴制度之間的最尖銳矛盾存在。（前揭小林良正，著書，二四三——二四九頁。）

總之，在地主經濟上，賦役制度的强制勞動，漸次被自由的工資勞動所驅逐代替，慢慢的顯示出從 Yunker（封建地主）經濟，進展到純粹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傾向。

（B）農民經濟——農民層的階級分化——

其次，農民經濟是怎樣的呢？在這裏最顯著的根本特徵，是農民層的階級分化，——少數上升爲富農，最大多數淪爲農村無產者。

第一，以農村公社（Mir）分與農民的分有地來說，其分配雖沒有很大的不平等，但多少總有厚於上層農民，而薄於下層農民之處，因而有農民層分裂爲上下層的的萌芽存在。同時，本來應該是保證土地所有的平等性的分有地，却發生出租的現象。依據八十年代的統計，從全體看來，出租分有地的經營數及出租的面積，沒有多少，但值得注目的事實是，主要的是貧農脫離開土地，而富農租佃土地的最大部分。脫離百分之二十的最富農所有的土地，僅佔全部出租地的百分之〇・三——一二・五；反之，脫離百分之五十的下層農家羣的土地，約佔全部出租地的百分之六三・三。這些出租地的大部分，便被富農佃用。出租分有地的現象，明白指出農村公社（Mir）內部資本主義關係的成長。

第二，是關於農民租借別人土地的問題。在經濟的意義上，貧農的借地與富農的借地之間，有極大的差異。貧農的借地，是因爲貧困的緣故，這是地主經濟因此可能保證勞動力供給的賦役制度。富農的借地，意義完全不同，這不是「因爲貧困而借土地」，是「爲賺錢而借地」。從借地的農家數看來，大多數農民，無疑的，是爲貧困而借地。對於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借地必然要和債務農奴制相隨

件。從借入地的面積看來，其中至少一半，無疑的是在富農層手中，是在、經營資本主義農業的農村布爾喬亞手中。

第三，以買入地來說，租和借地的情形差不多，當作私有財產的土地買入，明白表示農村布爾喬亞的成立。買入地的分配是百分之二十的富農，他們手中集中了買入地的百分之五九・七乃至百分之九九；反之，百分之五十的貧農只有全部買入地的百分之〇・四乃至百分之一五・四。因此，農民們在1877—1905年間，共買入地七百五十萬俄頃中，其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是在極少數的富農手中。

從以上看來，可知：貧農們因為窮困和沒落，其土地經營日漸縮小，變為工資勞動者而脫離了分有地；富農則因農業經營的擴大，超過祖先傳來的分有地，而不得不借入土地，或買入土地以擴大再生產過程。農業經營的中心，也漸次從分有地轉移到借入地及買入地了。這樣，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農民層中發生分解作用，最上層日益上昇為農村布爾喬亞，而最下層則日益淪為農村普羅利塔利亞。

根據上面的說明，可知：（一）在地主經濟上，屬役制度的强制勞動，漸次被自由的工資勞動所驅逐代替。地主經濟，慢慢進展到純粹的資本主義農業經營（二）在農民經濟上，農民層發生階級分化，極少數的最上層，上昇為農村布爾喬亞，而大多數的下層農民，則淪為農村普羅利塔利亞，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俄國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情形。

除了上述的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以外，在歐俄的南部及東部邊境地方，還可能發現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在這裏，雇傭者多數的勞動者，採用農業機械從事生產。這樣，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不只有最發展的「美國式」純資本主義農業經營，同時還有純中世紀的賦役經濟的方法存在。俄國農業關係的這種複雜性，即淵源於農奴制剝削方法和資本主義剝削方法的相滲透與融合。

第四項　結語

根據上面的說明，可知：俄國農業，正在決定地向着資本主義發達的方向進行。在土地所有上，中世紀的所有形態，漸被清算；在地主經濟上，資本制和雇役制一同採用，而且經濟的中心，正從前者移到後者；在農民經濟上，迅速發生農民層之兩極的分化，一方面正形成富農或農村布爾喬亞，一方面形成貧農或農村普羅利塔利亞。不用說，農奴制的巨大土地所有，地主的土地所有，雇役制度和債務農奴制，「分有地」及其身分的隔離，以及其他的一切中世殘存物，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的發達，是巨大的障礙或桎梏。然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命令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粉粹這些障礙和桎梏。而且粉粹的方法有二，以此二種方法為中心，展開了二大對立階級之猛烈的鬪爭。這兩個方法就是：一舉而清掃封建的土地所有，為布爾喬亞的發展，開闢大道的方法，和一面保存地主的土地所有，使農村公社解體，准許富農從事略奪，保證着比較稍多一點的布爾喬亞的發展，前者是由下而上的農民的社會民主黨的解決方法，後者是由上而下的地主的 Stolypin 的解決方法。從農業發展的型式看來，前者代表「美國型」；後者代表「普魯士型」，這兩個方法，是「十九世紀留給二十世紀的遺言，」一方面有七千五百萬俄頃土地的一千五十萬農家（約五千萬人）和別方面，有七千萬俄頃土地而有三萬戶家族（約十五萬人）之基礎上，在二十世紀初所展開的農民與封建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確是這個遺言的執行。在最初，地主的方法，當作1906年「Stolypin 的改革」而實現了，但在1917年「農民的社會民主黨的方法，」獲得了最後勝利。（前揭小林著書二六七——二六八頁）

第四節　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1861年極不徹底的農奴解放，農奴制度之妥協的解消形態，不只是妨礙了農業，而且對於工業之資本主義的發達，也有很大的影響。農民層分化的緩慢和不充分，國內市場的狹隘，以及缺乏英法等國那樣大規模的原始蓄積，使帝俄工業的發達趨於緩慢，非到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產業資本的支配，才算確立了起來。

農奴解放後三十年間，因有土地賠償金及土地出賣金，地主階級的收入，約達十七萬萬盧布，到1882年爲止卽有十一萬萬盧布，落到地主手中。其次，穀類輸出貿易的擴大，以及農產物國內交易的發達，在在都促進了資本的原始蓄積過程。

爲促進外國貿易，而聯絡莫斯科，彼得堡以及南部和中部穀類生產中心地帶到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鐵路建設；爲開發國內市場，以莫斯科爲中心貫通各生產地方的鐵路建設，給與國民經濟以革命的影響。這使穀類生產中心地由黑壤地帶，移到南部地方，把直到現在處於國民經濟外的邊區地方，也編進了商品生產和流通的國內市場，從而分解了從來自給自足的封鎖的農村經濟，推進到商品貨幣經濟的領域。這樣，農業經營的商品生產化，增大了好幾倍，而形成了更加寬廣的國內市場。在這種情勢下，大產業企業開始勃興，尤以銀行業的發達，現出了驚人的速度，卽在1870年，國立銀行及私立銀行的存款總額，到達二十七萬萬五千四百萬萬盧布之多。

近代信用制度的設備，鐵路的建築，國內市場的開發，在在刺戟着工業的發達。農奴解放後十五年間，帝俄工業發達的情形，由次表卽可知其一斑（單位百萬盧布）

	1860年	1876年
棉織物	42.9	96.3
毛織物	34.9	52.7
棉紗	28.7	44.2
銑鐵	18.2	25.5
機械	14.0	43.4
鋼鐵	11.7	17.1

石炭	7.3	111.3
石油	0.6	10.9
毛線	0.45	2.5
鋼鐵	0.1	1.1

據上表可知若干工業部門的棉業及羊毛工業，生產增加二倍餘，石炭石油，製鐵等新興重工業部門，也有顯著的發展，這奠定了資本主義工業的基礎。

在1873—75年，1881—82年，帝俄工業雖曾苦於恐慌的襲擊，但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却能通過時而好轉時而惡化，轉變不定的經濟情況，貫徹其歷史的使命與必然性。

工業大經營中機械製工場的數目，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開始壓倒以手工勞動爲基礎的工場——工場手工業。只有機械生產的大工業，才可能徹底掃蕩跟封建殘滓相融接的小規模手工業，在這點，它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機械化過程，在各種工業部門，既不是一齊發生，也不是以同一的速度進行。最初採用機械的，是纖維工業，尤其是棉業。1866年，機械織布工場僅有四十二所，勞動者也只有九萬四千六百人；反之，手工織布的勞動者，却有六萬六千二百人之多。但到了1894—95年，工場勞動者增至二十四萬二千人；而手工織布的勞動者，則減至二萬五百人，這證明了機械織布的大勝利。但是纖維工業的其他部門，例如在絹織物工業上，機械化的現象非常之少，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依然佔支配的地位，而且在這裏還長期保存着資本家的家內勞動和半農奴的農村副業的家內勞動形態。其他的纖維工業中，毛氈工業，帽子及頭巾工業，麻及麻繩工業等等，都處於同樣的狀態。其次，重工業部門中礦山和冶金工業的機械化，更加遲緩。「礦山業的主要中心地，在俄國的改革後（農奴解放後——迪先）發展的初期，是烏拉爾。……烏拉爾的「勞動組織」的基礎，從古就是農奴制，這一直到今日，即至十九世紀的末葉，在礦山生活之極重要的各方面，都能看得出以

前農奴制是烏拉爾最高的繁榮的基礎不只是帝俄，也是支配歐洲一部分的基礎。在十八世紀，鐵是俄國主要的輸出品之一。鐵的輸出在1782年約有三百八十萬普特，1800—1815年爲二百萬—百五十萬普特，1815—38年約爲三百十三萬普特。早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俄國所得的銑鐵，比法國多一倍半，比普魯士多四倍半，比比利時多三倍。」但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把烏拉爾抬到這樣高的地位的那個農奴制，在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卻變成了烏拉爾沒落的原因。鐵工業的發展，在烏拉爾進行得非常緩慢了。1718年約採掘銑鐵六百五十萬普特，1767年約爲九百五十萬普特，1806年約爲一千二百萬普特，三十年代約爲九百萬乃至一千二百萬普特，四十年代採掘一千一百萬乃至一千三百萬普特，五十年代採掘一千二百萬乃至一千六百萬普特，六十年代採掘一千三百萬乃至一千八百萬普特，1867年採掘了一千七百五十萬普特。百年間生產沒有增加一倍。這樣，俄國較之大機械工業引起了冶金術之巨大發展的其他歐洲各國更加落後了。

烏拉爾停滯的主要原因是農奴制，礦山業者是地主，也是工場主，其支配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資本和競爭上，同時也建築在獨佔及其所有權上，烏拉爾的工場主，在今天也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烏拉爾，勞動者的獲得方法，不僅雇傭，而且有雇役，例如據柏姆縣庫弗拉諾賀姆斯庫郡的 Semstvo 統計，可以數出無代價或廉價利用工場所有的耕地，牧場，森林等等的數千農民經營。這種無代價的利用，顯然的實際非常之昂貴。因爲工資因此而降低得極多。因而工場獲得束縛在工場上的自己的低廉勞動者。」（伊理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下卷，岩波文庫版二〇五—二〇六頁）

「這樣，改革前的秩序（農奴制時代——彭）之最直接的殘存物，雇役之強大的發展，勞動者之緊縛，低度的勞動生產性，技術的時代落後，低廉的工資，手工勞動的優勢，這個地方之自然富源之幼稚，而原始的濫掘，獨佔，排除競爭，跟當時一般工商業運動相隔絕與孤立：就是烏拉爾的一般的姿態。

南部的礦山業地帶，有許多地方正和烏拉爾相反。如果認爲烏拉爾具有「數世紀間神聖化了」的諸習慣是老朽的，則在發育

期的南部地方正是年青的。最近十年間在這裏發生了的純粹資本主義工業傳統，身分制度，民族性，一定住民的孤立化等等都不知道。外國的資本技師和勞動者成羣結隊地陸續流到了俄國南部，而且現刻還在往那裏流。在現今的熱狂時代（1898年）從美國正在移去幾個工場。國際資本突破關稅障壁，毫不躊躇的把基礎固定在「外國的」土地上（Ubi bene, ibi patria（「住着舒適的地方，就是祖國」）……這裏有一個南部地方驅逐烏拉爾的統計資料。

年度	銑鐵精煉量（一千普特）						全國石炭產量（百萬普特）
	全國總計	%	烏拉爾	%	南部地方	%	
1867年	17,098	100	11,084	65.1	56	0.3	26.7
1877年	24,579	100	16,157	65.4	1,596	6.5	109.1
1887年	37,389	100	23,759	63.3	4,158	11.1	276.8
1897年	114,782	100	41,180	35.8	46,349	40.7	683.9
1902年	158,618	100	44,775	28.2	84,273	52.1	1,005.21

根據這些數字我們明白現在俄國正在經過怎樣的技術革命；大機械工業生產力的發達有怎樣巨大的能力」（同上，二〇九—二一一頁）

大機械工業從1890年代中間起迅速發展，驅逐從來的工場手工業及與此相隨伴的各種小工業，變成了資本主義工業的支配形態，然而總不能徹底掃蕩其他的工業形態。就是說，它總不能拒絕工業各部門上的工場手工業及其他手工業之廣泛的殘存，因而都市與農村勞動者與農民的分離，也不能徹底，例如工場手工業勞動和農村勞動密切連繫，從下表即能明白。

從事農耕的勞動者的百分比

工場

有染色場的木棉手織工場	72.5	手工生產
絲織物工場	63.1	
陶磁器工場	31.0	
上等棉布印花場及經絲分配事務所	30.7	

（同上P.273）

尤其是小工業的商品生產工業的經營者是富農勞動者是有『分有地』的農民，在這裏以工業爲中心農民層分化爲農村布爾亞喬和農村普羅利塔利亞的過程也會進行。在這裏農民是『有分有地的工資勞動者』，是農奴的勞動者。

俄國工業在這個發展階段也好，還不能夠從農奴制的殘滓完全分離開，在輕工業工場手工業上，以及鑛山業（例如上述烏拉爾）上都使用着相當多的半農奴勞動者，卽其明證，可知在當時的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三階段——小商品生產，工場手工業，大機械工業，同時併存；而且和中世紀遺物的農奴制殘滓，多少有點關聯。俄國的產業資本就建立在這種基礎上，形成爲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半封建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工業的發達到了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卽轉入加速度的發展過程。促進九十年代工業發達的第一個因素，跟七十年代的繁榮同樣，是鐵路的建設。1891—95的五年間新築鐵路一萬五千百三十九俄里，（包含西伯利亞及中央亞細亞鐵路）1896—1900的五年中又新築七千二百五十五俄里，這使全國鐵路共達五萬六千百三十俄里。換言之，在1896年代的十年間，新築全國鐵路的百分之三七，達到以前五十年所建設的一半。鐵路的建設，十幾萬萬盧布的投資，大大的促進了石炭，鋼鐵，機械工業等重工業的發展。

第二，八十年代農業恐慌所引起的農民層階級分化，及因此而形成的廣大國內市場，刺激輕工業部門之迅速的發展。紡和

Narodniks（民粹派，人民主義派）的議論相反，農民層的階級分化，正好為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開發了廣大的國內市場：八十年代的農業恐慌，更促進了這個過程。

第三，帝俄政府的保護關稅政策，在這個時期完全現出它的作用來了。在高率關稅保護下的俄國工業，顯示了驚人的發展能力。俄國工場的棉花消費量，在1880年為八百萬普特，1898年即增至一倍以上的一千七百萬普特，1888年俄國只鑄鍊了三千一百萬普特的鐵，到1890年即增至八千七百萬普特；1898年更增至一萬百三千六百萬普特，1880年代初舊式的彼得堡金屬製品工場，陷於沒有工作的解雇勞動者的困境；但到八十年代末，即現出了完全不同的情況。「到1887年止，俄國南部只有猶卓夫和巴新托褐夫的兩個鐵加工工場，從這年起，鐵工場好像「雨後春筍」似的開始簇生了。短期間創立了許多巨大的鑄鐵工場。製鐵工場的勞動者，在猶卓夫的工場有一萬人，其他的工場比這稍多一點。1899年在南部有29個鑄礦爐的十七個大製鐵場，和十三個正在建設中的。」這是當時觀察者之一人的描寫。（Pokrovsky 著上揭書 P. 274）

這樣，在1890年代，俄國資本主義，以一日千里之勢，確立了產業資本的統治。其間，經營數，勞動者人數，生產價額，現出了如下的激增情形。

年　度	經營數	勞動者人數(千人)	生產總額(百萬盧布)
1887年	30,888	1,318.0	1,334.5
1890年	32,254	1,434.7	1,502.6
1898年	39,029	2,098.2	2,839.1

據上表可知：十年間企業數增加百分之二六·二，勞動者增加百分之五九·二，生產價額增加百分之一一二·八，生產價額之一倍以上的增加，尤其值得注目。「確實的，俄國大工業的發達在這十年間有極大的成功。世界上任何一國，大企業的發達，沒有像語

樣迅速的。若就紡綻數來說，在1890年俄國雖不及英國，在歐洲卻僅次於英國，1889年—1899的十年間，歐洲紡綻數的增加其百分之三十三，而俄國卽爲百分之七六，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德二國銑鐵生產的增加，在美國是百分之五十，在德國是百分之七二，而俄國竟達百分之一九〇，1889年俄國銑鐵的加工佔世界第七位，1899年便上昇到第四位。工業的發達，不只表現在工場生產力的增大，也表現在工業原料的增加上。石炭的採掘量，在這期間，俄國增加百分之一三一；德國僅增加百分之五二，美國僅增加百分之六一。石油的採掘量也好，俄國增加百分之一五三，美國僅增百分之九，1899年石油的採掘俄國佔了世界的第一位。」（同上，三〇三—三〇四）

可知在1890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現出了飛躍的發展，其速度凌駕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先進國，而迅速參加到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

其次，若就工業各部門的發達情形來說：第一纖維工業的產額在1887年爲463百萬盧布，1897年便增至946.3百萬盧布，卽增加百分之一〇四・四。棉紗的產額在1890年達119.6百萬盧布，1900年增至233.7百萬盧布，卽增加百分之九九，棉織物產額1890年爲146.8百萬盧布，1900年增至259.8卽增加百分之七七。礦山業的產額也從1887年的156百萬盧布激增至1897年的393.7百萬盧布卽增加百分之一五二・四。其中，石炭採掘量，在1816年僅有18.3百萬普特，1870年增至42.4百萬普特，1890年又增至200.6百萬普特，1890年再增至367.2百萬普特，1900年更增至995.2百萬普特，卽四十年間石炭採掘量增五十五倍，1890—1900年的最後十年間也增加了三倍。石油產量，在1880年僅有34百萬普特，1890年卽增至241百萬普特，1900年更增至632百萬普特，卽在十九世紀末的廿年間，石油產量增加了二百倍，其大部分是由巴庫油田出產的。至於冶金工業的發達，也非常顯著，由1887年產額112.6百萬盧布增至1897年的310.6百萬盧布，卽增加百分之一七五。在同樣的1887—1897年十年間，化學工業的產額，從21.5百萬盧布，增至56.6百萬盧布，卽增加百分之一七七・二；陶磁器工業的產額從28.9百萬盧布，增至82.6百萬盧布，卽增加百分之一八五・八。這也可以證明十九世紀末葉俄國工業的發展是怎樣的迅速。

大機械工業之加速度的發達，大經營驅逐小經營，其結果發生了資本與生產的集中，因而促進了獨佔組織及金融資本的形成。這使得俄國在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即踏上了帝國主義的階段。這樣，俄國早已決定的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了，由此可知：俄國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Narodniks）主張俄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怎樣的不合道理。俄國資本主義在這個無盡藏的自然資源上，到了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便迅速開花繁榮。然而這種繁榮是立脚在泥沼上的。農奴制度的廣泛的殘存，農民的束縛於土地，身分的隔離性，農民層緩慢的階級分化，國內市場的狹隘性構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極大的障礙和特徵。* 近代資本主義雖曾有驚人的迅速發展，然而俄國新興布爾喬亞，要想在國民經濟上掌握完全的霸權，在社會生產上完全斷除專制的地主的各種制度；在政治上，掃蕩封建的政治勢力，都沒有成功。反之，俄國的新興布爾喬亞，因為它的脆弱的存在，寧可和過去的封建階級舊政治勢力妥協提攜，來維持自己階級的利益。但從這個時代以來，資本主義已產生了與此相對立的徹底革命的普羅利塔利亞，它在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躍，越加起着強大的作用，終於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廿六日，完成了它那歷史的任務。

* 時代落後的產業革命，布爾喬亞階級的卑鄙和脆弱，農奴制度的廣汎的殘存，農民之束縛於土地，……等等，規定了俄國資本主義的半封建性；對勞動大衆的苛酷剝削所引起的國內市場的狹隘化，刺戟着對國外市場的熱烈要求。在國際鬥爭場上，用軍事力來補充代替經濟的鬥爭能力，使俄國資本主義，帶着一種軍事力的特性。所以，伊里奇說：「在沙俄，最近代類型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是在沙皇政權對於波斯，滿洲，蒙古的政策中找到了最完全的表現，然而在大體上，在沙俄還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佔優勢。」（伊里奇著，徐冰譯：社會主義的原則與1944年的戰爭，載新華日報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第四版第三欄。）

本章主要參考書

伊里奇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Die Entwicklung der Kapitalismus in Russlands).
Pokrovsky: Brief History of Russia.

J. Mavo : An Econemic History of Russia.

V, O. Kluche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S. A. Howe: A Thousand Years of Russian History.

J. Kulischer: Russieche Wertsehaftsgeschichte.

Knight, Barnes, & Flugel: Econc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盟克會章楠譯：近代歐洲經濟史）

小林良正著顧志堅譯俄國社會經濟史。

羅治隆一著俄國經濟史（淺野如譯世界經濟史中之1部）

東晉太郎著顧得山譯：歐洲經濟通史。

羅治隆一著近代俄國社會史研究。

佐野學著俄國經濟史研究俄國社會史。

住谷亮一著近世社會史。

波萊洛夫著憲唯物史觀世界史教程第四分冊。

第十二章　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

第一節　明治維新和日本資本主義的萌芽

第一項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經濟

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的前夜，還是封建的農業國。幕府，諸侯，武士等等支配階級收入的百分之八五，來自農業生產部門，只有百分之一五是手工業和商業的收入。人民的大部分住在農村，都市住民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封建的支配佔着絕對的優勢。所以資本論上說：「具有純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零細農民經濟廣汎發達的日本，較之在許多地方，被布爾喬亞的先入觀念所貫徹着的我們一切的歷史書籍，更顯示出真實的中世歐洲的情況。」（註一）

日本較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雖爲落後，她遲到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末，才開始踏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程。當時的日本，正在封建制的崩潰過程；同時，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需的前提條件——商品生產，資本的原始蓄積，自由勞動者的產生——的成熟過程。當時，勞動之社會的分工，交換關係的發達，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在封建諸侯的獎勵下，或在他們自己的經營下，棉織物，蠶繭，絲織物，陶器，漆器等等工業，已有了悠久的發達歷史。九州的採炭業，本州西南部的砂鐵採取業，銅產量的豐富，促進了日本製鍊金屬製品工業的發達。鍊銅所達數千所之多，十七世紀，尤其是十八世紀，銅由中國商人和荷蘭商人輸出海外，在這時期的末期，資本主義的家內勞動和工場手工業開始發生了。

在1868年明治維新的前夜，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浸潤到一般民衆，由於漸次破壞了舊生產關係而獲得佔領經濟生活上的一

切領域。結果，破壞了德川日本的米穀經濟，致使日本的封建農業組織也瀕於深刻的危機。亙及數世紀之久發展來的商業高利貸資本，不僅摧毀了封建的各種關係，而且也是形成產業資本的各種前提之一強力槓桿。

同時，在大阪，江戶（東京）京都，名古屋，仙台，大津，堺等等地方，形成了許多大市場和商業都市。跟隨商品流通的發達，市場的擴大，商業商利貸資本也滲透到農村。封建諸侯和農民，已益編入新的商品=貨幣經濟網。其結果，促進了農民層的階級分化和封建的所有關係的分解。

第二項　明治維新的原因

（A）封建的所有關係的分解

明治維新前掌握日本政權的德川幕府，爲維持其封建的統治，一方面，在1639年（寬永十六年）斷行與外國絕緣的「鎖國政策」，實行閉關自守；別一方面在1643年（寬永二十年）頒佈禁止田地永代買賣令，以後更頒佈限田法，藉以預防由土地兼併而引起自耕農減少，因而預防由於純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崩潰而發生資本家的私有。

封建的生產方式，主要是小規模農業和手工業，尤其小規模農業是封建制的基礎。爲增進其生產力，幕府和各藩政府都很努力過。但是，在苛酷的封建剝削下，農業生產力是無從發達的。同時，更因封建的領土的限制，引起了農村人口之相對的過剩。其結果，加深了農民的貧困，促進農民離村，墮胎，棄兒等等抑制人口增加的現象。這樣，封建權力之基礎的農村人口，尤其是自耕農民，相對的，或竟絕對的漸次減少了。

在德川氏的封建支配下，本來禁止將土地買賣和一町步（約合14.9市畝）以下的土地零細化，但因對貨幣的需要和農民的沒落，這種禁令，常常被種種巧妙的方法所破壞。農民爲獲得納稅和維持生活的手段，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抵當給別人，致使土地越

加集中在富豪手中。

違反法令買賣土地的結果，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土地的貸借，也變爲一般的現象，農民層的分化，更加顯著，更加擴大了。在德川時代的前半期，農民的階級分化，還不大顯著，但到了末期，便派生出：許多完全沒有土地的小佃農，大量的農業勞動者，包含佃農和自耕農的中農層，以及數量雖少，而在經濟上政治上有相當勢力的農村富裕階級。

農村人口內部勢力的變化，跟隨高利貸的活躍，商人們把他們的經濟勢力伸張到農村，變成了大地主。在獲得了土地，新開墾土地的地方，他們的勢力日益增加了。

這樣，封建的舊所有形態漸次崩潰，造成了轉化爲布爾喬亞所有關係的各種前提。土地集中在新人物的手中了。這些新人物，一部分是從舊武士，官吏；一部分是從富農及新興布爾喬亞產生出來的。因爲土地是收入的源泉，他們可以利用土地剝削農業勞動者和佃農。

其次，在封建的農業生產關係下，全部剩餘生產物，普通是當作「年貢」被地主剝削去了，可能使用改良農具，擴大生產規模的，祇限於少數富農。這樣，在封建的剝削下也好，富農層還可能保留着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這些少數富農手中生活資料和生產手段的過剩，漸次轉化爲剝削農業勞動者和佃農的工具。誠然，這種內在的矛盾的發展，在封建的各種拘束下。在數量上不一定露出了顯著的外觀，但在性質上，卻意外深刻地浸透到封建的所有關係內部。這樣，封建權力之源泉的農民，尤其自耕農民的分解，及與此相照應的資本主義土地所有關係的萌芽，漸次蠶食土地所有之純封建的組織，構成爲推動明治維新的一大動力。

（B）社會各階層對立的尖銳化

這樣，跟隨生產力的發達，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及其與封建的生產關係——封建的土地所有和 Gild System 等——之間

矛盾的尖銳化，在社會各階層間引起了怎樣的對立鬥爭呢？在這裏，我們可能看出四個主要的對立形態：

第一是農民與封建支配者之間的對立——這是封建社會裏最基本的階級對立關係。在德川氏的封建統制下，支配者階級都認爲：「芝麻油和百姓，是愈搾愈出油的東西。」（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所以，當時的「農民政策」是：「統治百姓的方法，是替他們留下只够一年的糧食，其餘則作年貢；使他們手上不能留錢，但不能使其不足。」（德川家康的謀臣本多正信獻策）因此，「務使百姓不生不死的範圍內取其財貨」是當時統治者的「官箴」！其結果，農民除了繳納收穫物百分之五十以上作年貢外，還要負擔諸種苛捐雜稅，替國家，替領主，作無酬的各種不同的許多徭役勞動。這種殘酷的剝削，竟使農民們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商業的發達，使「諸侯的胃腸」不能「形成爲誅求農民的界限，」貨幣的需要，更加強了封建主對農民的剝削，致使兩者之間的矛盾愈益尖銳化了。在這種情勢下，農民們還來不得不反抗封建支配者。農民對封建統治的鬥爭，第一採取積極的農民暴動的方式；其次是實行消極的反抗，例如：農民離村，墮胎，棄兒等等。農民暴動的頻繁和農村人口之相對的絕對的減少，即其明證。

第二是市民（町人）尤其商人高利貸者和封建支配者的對立——武士的集中都城，人口的集中江戶（東京），參覲交代制度所促進的全國交通的發達，在在都迅速地擴大了國內商品市場，使封建主不能不依存於商品經濟。其結果，加強了他們對農民的剝削，農村淪爲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吸血場所。農民，尤其自耕農民的減少，削弱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使封建主不得不以年貢爲代價，向江戶，大阪的富豪請求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點，佐藤信淵在天保九年（1838年）的物價餘論上說：「當今天下之財貨，其七分皆被豪家所併吞。縱有大國之諸侯，其身平所處置之金銀，大半均係由豪家借來的。」（註二）「天下之通用銀，皆入商賈之手，富豪之名，限於商賈；永祿長者之武家，類皆貧乏，故商賈之勢愈盛，超出四民之上。據余探索，當時商賈之收納，如以日本國爲十六分，則商賈收納其十五，而武家僅收納其一。」（本多利明經濟祕策）（註三）這樣，封建的支配者，被市民，尤其被大商人和高利貸者制其死命，封建的所有關係及與此相照應的身分制度，漸次被商業高利貸者所侵蝕而發生根本動搖。

第三是封建支配者的下層對上層的鬥爭——封建制內在的各種矛盾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達，自耕農的沒落在在都使幕府和各藩政府陷於極端的財政窮困狀態。財政的拮据，使當時諸侯發給家臣的早已不是全薪，家臣的薪俸，遭遇對折以上的折扣，弄來「其怨主有如怨敵。」（註四）這樣，因為大封建主收入激減，致使喪失了封土，專靠以祿米（米穀薪俸）爲生的下級武士的生活極端惡化，而釀成封建家臣團的不平不滿，對幕府和各藩政府的政治鬥爭。而且這種鬥爭，早已不是單純的封建統治權的爭奪，甚至對封建的生產關係和剝削條件的廢棄，對於下級武士們也不是當面的痛癢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封土，沒有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經濟的根據。這種對現狀不滿的下級武士羣，便構成了推動明治維新的主體；而且因為他們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猛烈的敵愾心（攘夷論，）使他們痛感到統一國家或國民的統一的必要，展開了打倒封建制的實況的政治鬥爭。

第四是王朝的絕對勢力和封建的支配勢力，尤其和幕府勢力的對立——其意識形態爲「尊王論」。這是「討幕運動」的實行者（下級武士和浪人等）的政治革命標語，它替明治維新開闢了大道。

（C）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

德川氏統治下集權的封建制度，雖有內在的各種矛盾的發展，然而仍然可能維持二百餘年之久，不能不說是「鎖國政策」的功效。但從1800年（天明，寬政）前後開始，外國船漸次渡日叩關，強迫開港。幕府雖然在1825年（文政八年）頒佈了「外國船擊攘令，」嚴行鎖國政策，但不久即因國際情勢的演變（例如：1840年頃中英鴉片戰爭對日本的嚴重教訓，）不允許長此閉關自守；同時，幕府也知道了徒煽動排外，反而要刺戟國民覺醒，危及封建制的存立，所以幕府的方針，也漸次趨向「開港論，」而各藩政府（上級支配者，）也大半追隨了幕府的辦法。在這種情勢下，「攘夷論」的沸騰，便把幕府及各藩政府陷入內憂外患的窘境了。「攘夷論」終與「尊王論」相連繫，進展到「尊王攘夷」和「討幕論」而形成了以下級武士，浪人爲主體，獲得了農民，市民，以及其他反

封建份子一致參加的明治維新運動。這樣，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構成爲明治維新的直接導火線。

第二節　明治維新後的經濟發展

第一項　封建的身分制度的廢除（註五）

慶應三年（1867年）十月，繼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之後，同年十二月頒佈所謂「王政復古的大號令，」翌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三月發展「五條誓文，」四月更發表「政體書，」因此才實行了由幕府到王朝的政權移動，宣佈了新政治原則。明治二年（1869年）一月，薩，長，土，肥，四藩連署上書「奉還藩籍，」到那年六月爲止，全國封土先後還給王朝了。其間，廢止諸侯和公卿的各種稱號，一律稱爲華族，其餘的武家與公家之間的各種等級，也完全廢棄不用，只分爲士族和卒的二等級；而且，卒的稱號，在明治五年（1872年）一月後，也被廢除，其一部則編入平民。這樣，身分上的族稱，變爲華族，士族，平民的三等級。

其次，明治四年（1871年）十二月，規定除官吏以外，准許華族，士族也可以從事商工業。九年（1879年）八月，總於廢止封建的俸祿制度下的家祿和賞典祿（明治維新的論功行賞俸祿，）一時發出一萬萬七千餘萬圓的公債券，按照俸祿的多少，交給這些有祿可享的人們。

這樣，封建的身分制度，及與此相關聯的各種特權，總算廢止了。但是，在廢除封建身分制的過程上，却從新形成了以君主爲中心的華族，藩閥的官僚，軍閥和政商等等特權團，給與日本資本主義的成立和發展以極大的影響。因爲布爾喬亞階級解放的條件，只是廢除封建的身分制度還不能算充分，他們要上昇爲支配階級；要使社會轉變爲布爾喬亞社會，必須廢止一切的身分，等級及其各種特權。因此，他們必然地要和專制君主制度及其支柱的華族，藩閥的官僚，軍閥，政商等等專制支配的勢力相對立。這種對立爭鬥，由於

1874年（明治七年）「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和愛國公黨的組織而開始其實踐的第一步。但終因下列種種原因，日本的布爾喬亞革命，終於不徹底而罷。其原因：

第一是日本布爾喬亞的脆弱——推動明治維新的主要動力，既已不是布爾喬亞，而且日本資本主義，大半是在專制政府的卵翼下保護哺育了起來，故布爾喬亞的成長，也要仰使專制支配勢力的鼻息，不能和它作徹底的鬥爭。

第二無產階級的迅速成長，促進了勞資對立的發展，其結果，不但對於專制政治的鬥爭不能組織成統一的戰線，而且布爾喬亞最怕無產階級之政治的覺醒和勢力膨脹，動搖其地位。*

第三是因爲「產業革命」的急激發展，及在此過程上的專制勢力的布爾喬亞化，和地主的二重性——封建地主和產業資本家的二重性。（註六）

第四，在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剛踏上成長的過程，而世界資本主義，却在1870年前後，超過了自由主義的發展的頂點，發展到了獨佔資本主義的階段，這樣，保護主義代替了自由放任，獨佔代替了自由競爭；金融寡頭支配代替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環使日本布爾喬亞尙未肅淸舊專制勢力以前，而後者又以利用國家政權，實行保護主義的担當者而維持其存在了。

* 「我國（指日本——彭）布爾喬亞之階級的覺醒，因而它們的結成，從最初卽在專制官僚政府的庇護下温室培養起來的，因此它們對於封建的生產關係；對於民主階級之執拗的鬥爭經驗，完全沒有，所以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也好，不，甯可說是發展得太迅速的原故，反而很不充分，非常遲緩的。但是，勞動者却處於正反對的地位，這個逆轉的關係，普羅利塔利亞的覺醒先行於布爾喬亞的覺醒，而且前者迅卽成熟到階級的自覺和團結，這些事實，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尤其在世界資本主義漸次轉入帝國主義階段的過程，或在已經成熟爲帝國主義後才發達的國家，——多少總可以說是一般的現象，尤其資本主義像我國那樣發展的國家是那樣的。」（野呂榮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八〇頁）

因爲上述種種原因，日本布爾喬亞革命既不徹底，而封建的身分制度的廢除，也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致使大量的封建殘滓遺留了下來，影響到日本資本主義之特殊的發展。

第二項　資本的原始蓄積

除了商業高利貸資本的蓄積以外，日本的封建領主，也從事於投機和資本的原始蓄積。他們盡量利用自己的封建特權，發行龐大的紙幣（例如藩札）或獨佔有利的商品的買賣，蓄積了鉅額的貨幣資本。

其次，公債也是促進資本的原始蓄積的重要槓桿之一。公債的發行，必須近代租稅制度的確立，以償還公債的本利。近代租稅制度，和明治維新的土地改革彼此相依靠，強制收奪了小生產者和小農民們。其次，公債賦與不生產的貨幣以生產力，使它轉化爲剝削剩餘價值的資本(註七)日本在明治六年（1873年）三月，頒佈公債券發行條令，發行公債以代替弘化元年（1844年）以來各藩的債務，把公債券交給債權者的富豪。這一方面，確實保障了他們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又使貨幣轉化爲資本。1876年爲廢止封建俸祿所發行的一萬萬七千餘萬圓的公債，促使封建的剝削者轉化爲資本家的剝削者了。公債券的所有者，不僅是以公債利息爲生的寄生蟲；同時，他們更利用公債的流通性，轉化爲銀行，鐵路，及其他新興企業的投資者。

在資本的原始蓄積過程上，起着强烈作用的，是明治維新的土地改革。明治五年（1871年）二月，解除禁止買賣土地的禁令，在法律上確認土地的自由私有和自由買賣。明治八年（1875年）五月又解除從來的限田法，准許土地的自由分割，兼併，抵當，租佃。這樣，一方面解放了土地上的封建束縛，同時更促進歷來暗中進行的土地兼併過程——農民土地的掠奪。尤其明治六年（1873年）的田賦改正，是促進這個過程的主要動力。

在明治維新的初期，日本還是農業佔絕對優勢的國家，政府的財政，當然是以土地收入爲基礎。日本政府的田賦收入，繼承德

川幕府時代的現物年貢（米。）但因米的收穫，搬運等等技術上的困難，以及每年的收穫量時多時少，米價漲跌不定，影響到財源的不安，因而一定的財政預算無從實施，故在明治六年，田賦收入便由米納（實物）改爲金納（貨幣；）納稅義務者，則從現實的耕作者改爲地主或自耕農；課稅標準，也從土地收穫量改爲法定地價了。

田賦改正，給與日本經濟，尤其農民經濟，以極大的影響：第一，田賦的繳納，由用米改爲用貨幣，在當時貨幣經濟已有顯著發達，年貢米的大部分運到江戶，大阪販賣的情勢下，可以說是當然的辦法。但是，這種米穀交易，還沒有充分發展來普及到農村各地，田賦金納，把農民強制編入商品經濟網，使農民慘受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因而通過流通過程，促進了對農民的收奪。第二，納稅義務者從佃農轉換到地主的結果，土地所有權，越加確實地被地主所掌握，佃農喪失了耕作權，不能再享受政治的庇護，因而明治維新的土地改革，可以說是以地主的利益爲中心的。何況法定地價一定不變，而米價又漸次昂貴，當然要增加地主的所得部分。（在德川幕府物納貢賦時代，領主收37%，地主收23%，佃農收35%；田賦改正後，國家收34%，地主收34%，佃農收32%；到了明治十一年（1878年），變爲國家收12%，地主收53%，佃農收11.5%（註八）了。）第三，繁重的田賦，超過了小所有者的負担能力，『因爲滯納田賦，受了強制處分所有地的人數，在明治十六年到二十三年之間，有三十六萬七千七百四十四人，其中二十六萬三千九百六十五人（即77%）是因爲貧困而滯納的。他們滯納的金額共爲十一萬四千〇七十八圓，每人平均僅滯納三十一錢（三角一分。）但因此被充公拍賣的土地，……地價額爲四百九十萬四千三百九十三圓，所以他們實際被收奪三百十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二圓，即一人平均爲八圓三角一分，竟達滯納金額的二十七倍。』（註九）第四，在明治十三，十四年頃，米價最貴，農民經濟情形最好的時期也好，農民以土地作抵押的負債約達二百萬件，負債額達一萬萬四千三百餘萬圓。其次，從明治十七年到十九年，『僅僅三年間，因爲一萬萬六千五百七十五萬圓的負債，相當於二萬萬三百三十三萬圓的土地，即約當耕地的七分之一，脫離了農民的所有，轉移到高利貸或高利貸的大地主的所有去了。』（註十）其結果，促進了：土地兼併，佃農增加（明治維新以來的二十年間，出租土地約增一倍，（註十一）農民離村（這

表現在都市人口之急激膨脹上面，）零細農民增加（還表現在平均耕種面積的縮小上面）等等現象的發生，

根據上面的說明，可知：明治維新政府的公債，租稅制度，田賦改革，是怎樣的促進了：資本的原始蓄積，農民土地的收奪，農民的貧困化，無產化過程。這不但蓄積了產業資本發展所必需的鉅額資本，而且也替它提供了大量的無產勞動者，開闢了國內市場，完成了資本主義原始蓄積過程的歷史的任務。

第三項　新技術的採用和新興工業的發達

實實了「求知識於世界」的明治維新政府，不但從英，德，荷，法，美，意，瑞士各國聘請了各方面的專門家（例如在1872年日本政府各部中差不多有三百多外國專門家工作，）同時又派遣幾百日本人到各國去留學。英國和德國的技術利用得最多。英人技師，多半用來創建紡績工場和洋紙工場，礦山業，造船業，建設鐵路，製造機關車等等。德人技師，則聘來設置化學研究所，化學工場，洋灰工場，製鐵及其他金屬工業的創設，尤其是建設兵器工場。德國人許多參加到機械製造工場和電氣技術企業。最初的毛織工場和麥酒釀造所，也是由德人技師建設的。荷蘭人的專門家，則用來建設陸海軍企業及其技術的裝備。法人和意人專門家，則聘來改良日本的製絲工業。美國的專門家，便從事地質調查和礦業，尤其是石灰和石油工業。他們也廣汎地傾向發電所和電氣技術企業的裝備。（註十三）

在別一方面，明治政府在可能範圍內曾派遣許多官吏職工到外國去觀察學習，努力於新技術，資本主義文明的輸入。其他，為普及工業教育，又開設講習所，開辦勸業展覽會，設置工業試驗所；為促進新興工業發達，發給各種補助金，或者出讓，賞賜各種工業機械，直接間接地為新興工業的普及和發達，費了極大的財力和人力。此外，撤廢各種封建的限制，以改正田賦為樞軸的租稅制度的確立，發行秩祿公債：都可以說為促進新興工業發達的設施。若就與工業的發達，尤其和重工業的發達有密切關係的礦業來說，明治政府在1868年先設置礦山局，一面保護獎勵礦業的發達，翌年又選定生野礦山，佐渡金山，小坂銀山，三池炭坑，大葛金山，釜石鐵山，中小坂鐵山，

院內銀山，及阿仁銅山等十個鑛山爲政府直營的鑛山，派遣外國技術指示鑛山經營的新技術方法。此後，明治十八年至三十二年間，極便宜地先後出讓給三井，三菱，藤田等財閥去了。

明治政府的產業政策，一方面剝奪了獨立小生產者的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建設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同時，和這相照應的，又努力於促成商業金融組織以及通信機關的發達。例如設立「通商司」組織通商公司及外匯公司，頒佈「國立銀行條例」（明治五年十一月），創立「橫濱正金銀行」（明治十三年），「日本銀行」（明治十五年）整頓金融體系。鐵路的建設，從明治五年（1872年）東京橫濱間的十八哩通車後，明治二十六年即延長至二千餘哩。在水運方面，三菱郵船公司，日本郵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等三大輪船公司，在當時政府的極力保護與獎勵下，建樹了水運事業的基礎。總之維新政府的產業政策：

「（一）給輪船公司以極大的補助金（交給三菱，共同運輸及此二者合同的日本郵船等）

（二）保護日本鐵路，山陽鐵路，九洲鐵路等的利潤率，而且無代價地交付國有地及其他種種特別保護；

（三）投資極多的，或前途有望的官營工場，造船所，鑛山，炭山等則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讓給「政商」

（四）爲促進外國貿易的發達，政府通過正金銀行，或用其他方法，給與不少的保護；

（五）把鐵路，交易所等的權利獨佔權交給政商，而助長其發達。」（註十三）這樣，跟隨官營模範工場的設立，以及明治政府的其他保護獎勵政策的積極實施，採用新生產技術的工場制工業勃興了起來。這從機械製絲業開始遍及到紡紗，紡絲，機械織布及其他纖維工業，造船，車輛及製造各種機械的重工業，洋灰，玻璃，煉瓦等的窯業，火柴，製紙，製革，洋漆，人造肥料等化學工業，麥酒，精糖，製粉等食料品工業，瓦斯，煉炭，電氣，金屬精煉等特別工業，到印刷以及其他雜工業，差不多亙及了全部產業部門。

這些新興工業發達的樣式，順序和程度，固然各不相同，但從大體上看來，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的概括的結論：若就各產業發達的生產方式來說，在大體上，重工業和輕工業中的紡紗業，洋紙業，麥酒業，精糖業，人造肥料業等在從來日本手工業中完全沒有的，或

發達不完全的部門，則依據比較大規模的工場大機械制生產；至於輕工業，尤其在日本從來即已相當發達的製絲業，織物及染物業，陶磁器業，以及本來手工業的生產過程較多的玻璃，火柴，煉瓦等製造業，則依據比較小規模的資本主義家內工業制或工場手工業。在前者，從開頭即相對地集中在少數企業而發達了起來。因此，這些工業，採用比較進步的工場制生產，而且大部分是由組織公司，尤其是組織股份有限公司來經營的。尤其因爲：（一）這些企業的大部分，不能不在與外國商品激烈競爭的過程中發達起來；（二）當時日本還沒有關稅自主權，沒有充分的關稅障壁的保護；（三）而當時世界資本主義早已發展到了過渡到獨佔資本主義的階段：因而這些工業的大部分，從發達的初期起，早已就採取了 Cartell, Trust 等獨佔 (Monopoly) 形態。反之，後者，即輕工業，尤其是在從來即已相當發達的手工業，因爲採用新技術，及由社會制度變革而引起需要的變化，必然地要促成生產方式的變化，而促進機械的利用；其次，以榨取不熟練勞動者爲目標的新興工業，雖然也要利用機械來生產，但是，這些工業的生產過程的主要部分，仍是手工業的，因而各企業的規模，普通都比較小，而且是在明治維新後迅速發展的商業資本的支配下，依據所謂汗血制度來生產的。這種工業，和前者中的輕工業，在明治時代，尤其在日俄戰前，構成爲日本工業生產的主要部分；而且從發達的順序上看來，這些工業，在和大規模經營下的外國製品急激競爭，工場制生產還在萌芽狀態的時期，早已佔了日本工業，尤其佔了輸出工業的主要部分，這一點是值得注目的。（註一四）

總之，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眞有一日千里之勢，我們從下面的統計資料，即可概見其一斑：

	明治七八年（1874—75年）	明治二七年（1894年）	二十年間的增加
鐵產額（噸）	916,683	5,182,467	六倍弱
碳產額（噸）	567,221	4,261,218	七倍半
銅產額（噸）	639,727	33,180,250	五十二倍

棉織物產額（千圓）		27,167	八倍（十年間）
鐵路哩數	38	2,118	五十六倍
船舶噸數	26,120	169,419	八倍強
輸出總額	18,364	113,246	七倍弱
貿易總額	42,775	235,463	五倍半
銀行存款	2,676	1,819,357	六百五十七倍

從明治二十一年到二十七年，僅僅七年間，工場數即從1694增至5985；勞動者從123,327人增至418,140人，各激增三，四倍。尤其是使用蒸汽力的新式工場增加率，更比工場數的增加為顯著，其蒸汽機關在七年間增加了四倍半（即從明治二十一年的413增至二十七年的1858）。（註一五）

但是，日本資本主義的這種急激發展，同時就是它那內在的矛盾的擴大和尖銳化的歷史。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在出發點上生產力發達的不充分，資本的原始蓄積的不足，因而只有基於對勞動者農民的封建剝削和租稅徵收上的種種政策（巨額的不換紙幣和公債的發行，保護主義和國營主義，）才保障了上述的那種迅速發展。這樣，通貨膨脹一次即躍進一次，通貨收縮一次便集中一次；跟隨着軍備和國營企業的發展而同時哺育成長了起來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不得不常常和與此成反比例日益貧窮化狹隘化的國內市場的限制相衝突，致使外國市場的獲得，從早就是資本之必然的要求了。加以樞軸產業的建設和軍備的擴張，猛烈刺戟着對原料產地的渴望。這樣，「活躍海外，」「發揚國威，」好像是小島帝國之「自然的民族的要求，」很早就大叫起來了。（這是日本資本主義之軍事的特徵的一個根據。）

日本資本主義的海外侵略政策的對象，不用說是抵抗力最弱的中國，尤其是它的初步據點的朝鮮。然而，當時歐美帝國主義侵

略的焦點，正要集中在遠東了。中國既不能輕易拋棄其在朝鮮的宗主權，而東進的帝俄也想侵略朝鮮，而且事實上日益露骨的策動着。這樣，明治十九年（1886年）以來迅速發展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它不可缺的市場——朝鮮，日益受着別國的「威脅」。因此，爲確保原料產地和市場，不得不擴張軍備。這使後進資本主義國日本，跳上帝國主義列強的鬥爭場；而且它要與列強爲伍，建立一條確實發展的大道，只有先在朝鮮實現其獨佔的支配。日本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挑戰，在這種意義上，規定以「國運」爲「孤注一擲」的一決戰。

第三節　日清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1894—95年的日清戰爭，給與小島帝國日本以意外的戰利。日本勝敗的結果：

（一）獲得台灣，澎湖島，擴大了領土；

（二）確保着原料供給地

（三）擴大了商品市場；

（四）獲得了在中國各地建設工場，企業的特權及其他商業上的許多權利；

（五）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關稅自主權；

（六）從中國獲得三萬萬六千萬圓的賠款，這使日本可能用以統一幣制，改爲金本位制，改善外國貿易，使外國資本更易於輸入。關於這點，日本政界和財界最有名的指導者之一的井上說：「在未獲得這個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廳，從未談到過數萬萬圓的大數字。歲收入，僅達八千萬圓。因此，三萬萬五千萬圓鉅款流入國內，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爲是無盡的財富。國營也好，私營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實行大大的擴張了。」（註十八）

這樣，日本資本主義，經過了日清戰爭的刺戟，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了。日清戰後十年間日本工業的發達：一般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產業的基本燃料的石炭消費量的激增上；特殊的表現在鐵路增築上。即從1893年到1905年間，石炭消費量都大增而特增，尤其是鐵路消費的和工場內消費的非常顯著；前者從 127千噸增至 841千噸，即增加六倍餘，後者從 734 千噸增至 3,776 千噸，即增加五倍餘。使用着原動機的工場，則從1894年的 2,409 所增至1902年的2,991所；勞動者也從 381,390 人增至 498,891 人，即全部工場勞動者，在九年間約增十二萬人之多。這些數字，指出了新興工業的發達，和工場的機械化的大概情形。

若就各個工業的發達情形來說，纖維工業的發展，是最顯著的。其中，紡績工場，從1893年的40所增至1905年的78所；棉紗產額，則從10,666 千貫（一貫約合 7.5 市斤）增至 44,137 千貫，即激增四倍以上。(註十七) 棉紗輸出額，也從1894年的 955 千圓，增至1903年的31,419 千圓，即激增三十二倍餘。織布業也有顯著的發達，棉布的輸出額，從1894年的1861千圓，增至1903年的 7,117 千圓，即約增四倍，其中大部分是輸出到中國的。(註十八) 生絲的輸出，也從1891年的2,994千公斤，增至1905年的4,619 千公斤，佔全世界總輸出的百分之二四・五。(註十九) 其他各種產業的發達，也非常顯著。

其次，1894—95年日清戰後日本資本主義之加速度的急激發展，從各種公司數目以及資本的增加，也可能看出：

	1894 年 末			1903 年 末		
	公司數	資本金（千圓）	(%)	公司數	資本金（千圓）	(%)
工業公司	778	44,598	100	2,441	170,746	382
農業公司	118	1,188	100	249	3,196	268
運輸公司	210	82,560	100	702	262,382	316
商業公司	2,096	25,712	100	3,580	76,994	299
銀行	865	101,379	100	2,275	347,685	369
合計	3,067	255,430	100	9,247	887,606	347

據上表可知：增加率最顯著的是工業公司和運輸公司等新興產業。換言之，可能瞧見日本資本主義生產業的發達，產業革命的進展是怎樣迅速的。加之，牠的發展，這樣顯著地表現在公司資本，尤其表現在有限公司資本的增加上，可說是像日本這樣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特徵；而且這也是和英國那樣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革命——隨伴着個人資本之緩慢的集積，約瓦及一世紀的「緩慢的革命」——相反，日本的產業革命，可能在僅僅十數年間或在更短的期中得以完成的理由。

跟隨新興工業的急激發達，在輸出貿易中，工業製品和半製品漸次增加；在輸入貿易中原料和糧食漸增而全製品則漸減。

	總金額	內容和分類金額百分比（%）				
		食料品	原料品	作原料用的製品	全製品	雜品
	輸出					
1894年	113,246千圓	16.8%	10.1%	43.8%	25.6%	3.6%
1904年	319,261千圓	11.7%	8.0%	46.1%	31.2%	2.3%
	輸入					
1894年	117,482千圓	23.6%	19.9%	18.7%	35.5%	2.2%
1903年	371,361千圓	20.2%	31.1%	13.6%	23.7%	1.4%

我們對照上列輸出入貿易表，總會想像到日清戰後，日俄戰前，日本資本主義已經達到怎樣的國際地位了。

日清戰後急激發達，跳上了國際鬥爭場的日本資本，為謀本身的生存和發展，不得不和帝國主義列強的資本猛烈競爭。要加強競爭能力，必須擴大生產規模，加強國家對大資本的保護，因而要刺戟生產上的獨佔性質的發展。但是，企業之獨佔的傾向，和對農村的苛斂剝削，弱化了大衆的購買力，致使國內市場越加狹隘化。資本的競爭能力，不得不由國家而更加增大，國家必須改良擴張運輸通信機關，整備金融組織，擴大技術者的教育，經營殖民地。這就表現在：鐵路，公路，水運，郵電的建設和改良；金本位制的實施，日本勸

業銀行，勸工銀行，台灣銀行的創設；台灣的鐵路建設，基隆築港等等。

加之，帝國主義階段資本的競爭，是用武力的戰爭。這使日清戰後日本資本之飛躍的發展不能不同時就是軍備的急激擴張。這樣，製鐵所（八幡等等）的創立，在軍事上，在產業上，都有嚴重的意義。國營事業，國家施設的擴大，和軍備的急激擴充，更加重了勞動者農民的負担。這樣，日本資本雖然感到渴望廣大的市場和原料供給地，而國內市場却不能與此相照應地漸次擴大。這只好在國外想辦法。那麼，海外的情勢如何呢？帝俄在三國干涉後退還中國的遼東半島上租借旅順，大連，在滿洲建築鐵路，並且積極侵入朝鮮。英，法，德帝國主義，創租借威海衛，廣州灣，膠州灣，爭奪着中國的市場。這樣，日本資本在海外遇着的，正是妨礙牠發展的强大的各種限制。衝破這些限制的方法，只有更加强化生產力，由國家的援助和獨佔而促進競爭能力，和擴充軍備。其發展又使完全獨佔朝鮮和滿洲，變爲不可缺的條件。

這樣，由於日本資本主義內在的基本矛盾而引起的日清戰爭，不僅沒有把矛盾消除下去，反因戰勝後，不只是從來的輕工業，重工業也急激發展，而且又加上了獨佔傾向的日本資本主義之急激發展，致使日本資本，較之戰前更加猛烈許多倍地要求着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資本輸出地。這種種基本矛盾的發展，釀成日清戰後的兩回經濟恐慌（1897—98年一回，1900—1901年一回，）而恐慌又更加促進資本的集中，國家資本的累積，生產力的發達；同時，使勞動者農民越加在經濟上政治上隸屬於資本。這些矛盾的尖銳化，終於促成了日俄戰爭（明治三十七八年，西曆1904—05年）的爆發。

第四節　日俄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與日清戰後同樣，日俄戰後，日本資本主義也顯現出急激的發展。這第一表現在各種公司投資的增加上。（參看下列第一表。）第二表現在工業生產的激增上。（參看下列第二表。）

第一表　各種公司的投資額（千圓）（註二十）

	1903年	1913年	增加率（%）
纖維工業	55,660	138,546	249%
金屬工業	14,580	61,132	319
化學工業	24,959	94,114	281
電力工業	12,152	199,009	1,572
鑛山業	23,590	157,737	572
農業	3,197	27,651	709
商業	451,680	931,216	159
鐵路	220,225	132,984	65(—)
造船業	39,225	70,214	79
合計（包含其他工業）	887,606	1,983,232	123

第二表　工業生產的激增(註廿一)

		單　位	1906　年	1909　年	1913　年
動力	石炭	千噸	12,980	15,084	21,316
	石油	同上	229	252	259
	發動機	千馬力	235	373	839
	發電機	千基羅瓦特	—	—	597

輕工業	紡錠	千個	1,472	1,964	2,414
	棉紗	千捆	945	1,025	1,518
	棉布	百萬碼	137.8	182.0	416.7
重工業	銑鐵	千噸	145	166	240
	鋼鐵	千噸	69	103	255
	銅	千噸	37.6	46.0	667
	造船噸數	千噸	42	52	65

根據上列二表，我們可能想見日俄戰後，日本產業資本的發展是怎樣迅速的。

日俄戰後，日本的工業纔已進展到質的轉換期了。紡績，織物等輕工業的發達，是不用說的了，戰前已具萌芽的車輛，造船，金屬機械等重工業，也發展起來了。食料品工業，雜工業也開始了，尤其電氣瓦斯等新興產業亦已發展就緒，這樣從來偏重紡織工業的日本工業，也漸次發展到全部工業部門了。下列統計數字，即其明證。

產業別工場勞動者的百分比（使用五人以上的工場）

	1902年	1907年	1912年
紡織工業	60.7%	61.5%	64.7%
製絲	28.9	26.8	27.4
紡績	18.0	14.7	15.7
織物	12.2	18.4	18.3
機械工業	7.8	10.6	11.3

化學工業	17.8	10.2	9.3
食料品工業	6.8	8.3	5.5
雜工業	6.8	9.2	8.6
電氣瓦斯工業	0.05	0.3	0.9

這種轉向，必然要引起工場的機械化，生產技術的改進。下表即指示日俄戰前與戰後工業機械化性質的差異。

工業的機械化（以1897年為基準年度的指數）

	人力（勞動者數）	原動力	石炭消費量
1886年	26	7	——
1889年	50	33	——
1897年	100	100	100
1902年	114	159	240
1912年	197	1,323	359

據上表可知1897年至1912年間，工業勞動者的增加不及一倍，而原動力便激增十三倍餘。這告訴我們：日本工業的機械化是怎樣迅速的；同時，日本工業資本有機構成高度化的傾向是怎樣顯著的。再看下表：

使用原動力的工場的增加（在全部工場中所佔的百分比）

1900年	32.8%	1904年	43.3%
1905年	49.3%	1912年	57.6%

1914年	65.4%
1918年	69.8%

延續，在這個期間，日本的工業，已經顯著地重工業化，近代工業化了。這種事實，反映在日本輸出貿易上，即如下表：

近代工業在輸出貿易上的地位

	輸出總額	佔輸出總額中的百分比（%）			
		原產品	生絲類	近代工場製品	
				小工場	大工場
1893—1897年	124,010千圓	26.60%	43.64%	7.26%	4.45%
1898—1902年	129,163千圓	23.4	29.39	5.36	12.08
1903—1907年	357,293	18.55	27.61	7.90	12.57
1908—1911年	424,305	17.49	30.98	8.84	14.48
1912—1915年	614,713	15.31	27.96	10.28	19.93
1916—1919年	1,697,862	11.17	25.24	12.85	25.23

（註廿[illegible]）

日俄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迅速發達，國家設施，殖產事業，軍備等也急激擴充起來。但是，這種社會關係之擴大的再生產，帶着一種特殊的性質：這種性質，使這個階段具有一種特徵。即日俄戰後，資本的增大及其生產力的發展，是由：龐大的軍需品的需要（日俄戰費達十七萬萬圓），戰後的土木事業，以及其他的國家設施，國營事業的建設和改良，軍備的擴充而促成的。但因此卻加重勞動者農民的負擔，更促進新普羅利塔利亞的產生。這些財政的支出，一方面增加虛（擬）資本的公債和銀行資本；同時又將商產業資本的利潤，剩餘生產力的發達。因此而引起的鈔票增發和物價漸騰，又助長了那個趨勢。為獲得經費，不只是創立非常時特別稅並使之永久化，新設或擴張政府的專賣事業，而且還創設新稅，增徵舊稅。這樣，更加重了的租稅，越加弱化了國民大眾的購買力結

事實擴大了資本主義生產力和大衆購買力之間的矛盾，更使日本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的性質越加濃厚化。是的，朝鮮，樺太（庫頁島）滿洲新編入日本資本主義的支配網後，曾增加了對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中國的商品輸出，但此等市場的擴大，相對地看來，却不及虛（擬）資本，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飛躍的激增。因此，投資在戰爭上的十七萬萬圓的日俄戰費，和投資於戰後經營的巨額經費，沒有得着與此相照應的歲入的增加。即資本之社會的矛盾，轉化爲財政上的許多矛盾；而資本增殖的困難，使國家財政爲資本的緣故而越加膨脹不已。這樣，日俄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矛盾，在戰後數年即現出了「未曾有的不況時代」——1907年的經濟恐慌。這可以說是日俄戰爭所產生的，具有特色的日本經濟之必然的運命。所謂特色，就是：

（一）日俄戰費，是由巨額公債，尤其是募外債來支付的，致使日本經濟界現出了急激的物價騰貴，因而日本的新事業，都陷於過剩投機的狀態；

（二）日俄戰時及戰後的日本農村，迅速貨幣經濟化，這雖有貢獻於日本商品市場的開發，但結局生產力有限的日本農村，既未因戰爭致富，反而增加了財政的負担。因此，從農村全體看來，這不一定是良好的國內市場。這種事實，跟日本政府的對外貿易促進政策相隨伴，致使全部農村從事於養蠶，麥桿，製茶等對外商品的製作，致使極端低廉的勞力，多賣一些給外國。這就表現爲戰後日本農業經營的急激的商品生產化；

（三）在朝鮮，「滿洲」中國等處，日本必須進行的侵略工作，因爲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和「開發工作」進行上自然的社會歷史的困難，需要着更加強大的權力和充實的軍備。

總之，從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來，日俄戰爭的結果，早已不像日清戰後那樣的順利，在國內也好，國外也好，資本主義之內在矛盾，越加深刻而尖銳化了。

第五節 產業革命和農村經濟

日本的產業革命：

（一）雖基於明治維新之社會經濟的政治的變革上；

（二）可能利用和輸入新生產技術，新經濟組織；

（三）這些過程，是由政治權力而溫室地助長的；而且

（四）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過自由主義的發展的頂點，而轉進到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期。

其必然的結果，是封建的生產方式尚未相當拋棄，而高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早被採用，致使各種企業之間，發生了極於調和的不平衡和對立。這個事實，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條件之一，而同時又是牠要迅速沒落的一個原因。(註廿三)

日本產業革命的特色：第一是牠的後進性，即歐美各國的資本主義，早已發展到高度的，從自由競爭轉化爲獨佔的帝國主義的過渡階段（1870年代）日本資本主義，才經過1868年的明治維新，漸次踏上產業革命的過程。第二，歐美資本主義，尤其在資本主義發育有典型的發展的英國，亙及一世紀前後的產業革命，在日本，卻在極短期間中即已完成。日本的產業革命，在日清戰爭（1894—95年）前後即已完成(註廿四)更確切地說牠確立於1897年乃至1907年，(註廿五)這較之歐美，尤其較之英國，產業革命的過程，至少要快一倍。第三，因爲明治維新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和產業革命非常迅速的緣故，在日本經濟中，尤其在農村中，封建殘滓大量地保留了下來。這些特徵，給與日本農村以怎樣的影響呢？

因爲日本資本主義遲遲出發，沒有使農村資本主義化的餘暇，而繼承着傳統的生產方式，繼續剝削着農村。而且，蓄積的資本，在未週遍農村以前，工業生產，早已發展到帶有過剩人口的獨佔化合理化的階段，不可能吸收農村人口了。同時，日本資本主義，因爲牠

那樣造上和發達上的特性，利於維持其具有封建性的殘酷的剝削關係，而使零細農制度（過小農制）繼續下去。（寧可說是沒有變革牠的能力和餘裕。）這就是日本農村中零細農制度發生的原因。這樣，日本資本主義，不只是牠的原始蓄積，就是以後的蓄積，也是犧牲半封建關係下的農村而實現的。即日本資本主義之所以有今日，是由農村流入地主的高率地租，由各地方的金融組織而流入的高利貸的利息，由國家機關權力而流入的由土地負担的各種租稅，以及跟獨立生產者實行商品交換而實現了的利潤和超過利潤等等。但是，給與農村的極少，而奪去的則甚多且急，致使「貯水池」迅速涸渴。這樣勞資以半封建的諸關係爲幸事，繼續其苛酷剝削農村的日本資本主義，不能不痛感到國內市場的農村的貧弱。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停滯，減少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的農村的意義。國內市場的狹隘，意味着日本資本主義基礎的不安定，這也就是日本經濟不斷動搖於戰爭和恐慌之間的根據。這從農村方面看來，是在半封建關係和資本主義經濟支配的交錯下，亘及很久很久的農民窮困的歷史。

在這種情勢下，日本農業的特徵是怎樣的呢？

第一，是耕地面積狹小，僅佔全國總面積的15.3%（1929年）（還較之英國耕地佔全國總面積的23%，法國的41%，德國的4[illegible]%，都要狹小。）而且耕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因而在全部農家中自耕農僅有30%，佃農和半自耕農竟佔70%。

第二，高度的土地集中，雖造成了資本主義農業大經營的前提條件，但因日本農村中半封建關係的大量殘存，苛酷的剝削，和龐大的過剩人口的壓迫，致使農業經營陷於過小農制度的零細經營。其證明是：農家的35%，乃所謂「五反百姓」（一反約合1.5市畝，）耕種不到一町（約合14.9市畝）的農家，竟佔70%之多。其次，農家的半數，是不到五反的小所有者；其75%是不到一町的所有者。因此，農家每戶平均所有耕地，僅爲1.06町（1930年）（北美合衆國爲六十四、五町，丹麥約爲十町，即使在盛行過小農制的英國、荷蘭（[illegible]町）和德國（[illegible]町），也不及日本之甚。）由此可想見日本農業經營零細到怎樣的地步了。

第三，因爲經營規模的零細，致使機械動力，牛馬畜力的使用比較少；農業勞動，主要是從自家的勞力，雇傭勞動力的利用，是很少

的。據農家經濟調查，在農業勞動的總共日數中，自家勞力所佔的百分比，在自耕農為85.7%，半自耕農為92.1%，佃農為93.8%，平均是89.9%。這個事實，由於長工，季節工，日工等數目的稀少，也可能推想到。（1928年）

第四，在日本的農產中，佔最重要地位的是米，麥和養蠶。這和歐美的養畜農業大不相同。

主要農產物產額（1929年）

	價額（百萬圓）	百分比
米	1,584	48.9%
繭	665	20.2
園藝農作物（水果，蔬菜，花草等）	337	10.4
麥類	271	8.4
食用農作物（大豆，甘藷，馬鈴薯等）	199	6.1
工藝農作物	110	3.8

上表說明：日本農業，第一是以穀類栽培為主，以養蠶和園藝作物為主要副產物的農業經營；第二，農業經營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度的商品生產化。

總之，日本農業，既因苛酷的剝削和半封建關係的大量殘存，抑制其生產力的發達；又因極端的零細經營，阻礙合理的農業生產方法的採用，致使商品生產雖已發展到相當的高度，而農業卻難於甚至差不多不可能資本主義化，從而農業生產力漸陷於停滯的傾向。這可說是以農村為犧牲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必然的結果。

第六節　日本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

日本資本主義的最顯著的基本特徵：

第一是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和妥協性，以及產業資本發展太快而遺留了下來的大量的封建殘滓。這種事實，在經濟上，在日本新興工業的重心的紡織工業上，反映出一種特別的，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勞動者雇傭制度和剝削方法。在紡織工業中婦女勞動者的使用，常佔每一工場中全部勞動者的50％以上的絕對多數。農村中苛酷的半封建的搾壓，把這些婦女逼到工場，都市來謀生。在這裏流行着一種「賣身」的雇傭制度。Freda Utley 說「投資妓院和投資紡織工業，從任何統計看來也好，在日本的各種條件下，都能得最高的利益。……兩者都依存於農民婦女的數量。……許多紡織工場，假使婦女沒有開始工作，即不顧先借出許多錢。工場主縱然不先借出錢，隨時都很容易地把婦女帶了來。但須每月把婦女的工資的一部分支付給她們的父親。紡織工場，特別是棉紗工場和製絲工場，在東部各縣，預先支付百圓，在西部各縣，預先支付五十圓，這種習慣，到現在還存在着。這樣的借款，不直接由工場主支付，常常由女工募集代理人來支付。他們根據這個原則「投資」的錢，大賺其錢。他們把農民婦女當作抵押品而收留下來。婦女們爲償還負債，只要還能夠工作，就不得不在工場繼續工作。

「『女工』募集代理人和高利貸，按照每年介紹給工場的婦女人數接受（每人）一定的報酬。……婦女們在製絲工場和紡織工場所得的工資，普通立即交與父親，甚至在工場主沒有預先借款給她們的場合，也是這樣。這個工資，半年支付一次；在製絲工場，在年末女工過年回家時支付。最後這件事情，其結果特別有害。因爲這剝奪在女工從某一工場轉移到條件較好的別一工場的移轉可能性女工的父親和募集代理人，或者和工場主之間的契約，普通須女工的父親及其保證人簽名蓋章，假如女工忌避工作，違反契約，其結果借款不能支付，而父親也不能支付時，則有保證人來支付。許多農民，因爲非常貧困，把全部「財產」拿出來也不能償還借

獄。」(註廿六)

十一二小時以上的勞動時間制，每月至多十五圓的平均工資，極端惡劣的勞動條件，而且沒有出街的權利。「關閉在寄宿舍裏的習慣，依然支配着許多纖維工場。婦女們一旦交給工場，就算完事。她們沒有工場監督員的許可，就沒有離開工場地域的權利。這個習慣，不外乎封建習慣的遺物，這從下面的事實便可證明。即可以離開工場地域的許可，是很少很少的。女工每月只能出外二次乃至四次。」(註廿七) 這種奇妙的制度，把女工和娼妓之間的差異抹殺了的這種勞動制度，日本帝國主義者還自豪自讚地稱爲日本特有的『家族主義』而且自吹是什麼『民族的特長』！」這種和近代的工資自由勞動制相差極遠的特殊勞動制度，在炭坑，製鐵所，鐵路建設，築港，護岸，伐材，水電工事等等工作上，都存在着。(註二八) 固然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日本的新興工業不是資本主義的企業；然而，較之歐美資本主義，封建要素的大量殘存，卻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其次在農業生產部門：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缺如，(註二九) 依據自家勞動的零細經營的優勢，佔收穫的50%以上，還不只包含全部剩餘勞動，而且還侵蝕着必要勞動部分的高率的地租，徭役勞動的殘存，以及其他種種前資本主義的壓搾，都替我們說明了日本農業的後進性半封建性。(參看第五節)

第二，日本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除了它那半封建性外，還有所謂軍事性。構成日本資本主義之軍事性根據的有三：

(一)對農民勞動者的苛酷剝削，弱化了人民大衆的購買力，國內市場的狹隘，迫使日本不得不侵略別國；

(二)資源貧弱的小島帝國，不能適應國內產業革命的進展，故只好以武力侵奪別國的原料供給地；

(三)尤其重要的，是日本資本主義剛才萌芽的階段(1868年明治維新)而歐美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經濟力微弱的日本資本，當然難於在經濟鬥爭場上戰勝敵人，故只好利用其戰略地勢，以武力的侵略，來補充代替其經濟的侵略和鬥爭。

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性，反映在經濟上的：（A）日本資本主義以三大戰役——日清，日俄，歐戰——爲樞軸，每次戰後，就要急激發展一次；（B）日本產業革命的特徵工業的特別發展，就是說：本來，資本主義的典型發展形態，普通都是先有消費部門的發達（1735年創製紡織機械），然後才進展到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1794年創製旋盤等工作機械）。反之，在日本順序却是顚倒的。在紡織機械（1866年製）未輸入裝置以前，而旋盤等工作機械（1856年製）已當作製造兵器建艦的軍用品而裝置完了。（註三十）其次，日本製造兵器和建艦的技術相當進步，不亞於歐美，但製造紡織機械必要的工作機械的生產，却相當落後，大部分機械要仰給於歐美。日本軍需工業的發達和金屬機械工業的落後，從下列二表就可能看出：

第一表

	勞動者人數（人）	原動力數（馬力）	勞動者一人的馬力數
軍需工場（陸海軍工場製鐵所）	72,416	213,380	2.9
民營金屬工業＝機械器具工業	104,257	97,036	0.9
纖維工業	567,581	198,595	0.3

第二表

	金屬＝機械器具工業勞動者人數（人）（一）	纖維工業勞動者人數（人）（二）	（一）對（二）的百分比
日本（1929年）	368,293	998,695	36%
美國（1919年）	2,937,000	1,611,000	182%
德國（1923—24年）	2,135,100	920,560	231%
英國（1925年）	2,182,790	1,338,780	163%（註卅一）

製造軍火技術的進步（飛機除外）和機械器具工業的落後，一方面反映出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性；同時，還更告訴我們：因爲苛酷剝削而形成的低廉勞動力，以及半封建的土地關係下所產生的廣大的過剩人口，是妨礙機械的採用，從而阻止機械器具工業發達的主要原因；（C）在世界資本主義工業上美國所佔的百分比，在1932年爲全生產的40.5％，日本僅佔6.8％；而艦隊噸數，日本僅比美國少二十八萬噸。若就各種艦船來說，例如巡洋艦，日本的噸數，反比美國爲多。（註卅二）

　落後，日本資本主義的半封建性和軍事性，決不是孤立的個別的存在，這兩者之間有內在的必然的關聯。因爲在半封建的苛酷剝削下，國內市場的狹隘，經濟力的微弱，是使它具有軍事性的主要原因。

　伊里奇曾說：「在沙俄，最近代類型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是在沙皇政權對於波斯，滿洲，蒙古的政策中找到了最完全的表現，然而在大體上，在沙俄還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佔優勢。」（註卅三）日本和沙俄同樣，「最新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伊里奇說，——是由獨資本主義的特別緊密的關係所編著。」（註卅四）伊里奇又說：「在日本和沙俄，軍事力的獨佔對於廣大的領土，外國或中國及其他的侵略上的特別便利，一部分補充著一部分代替着現代金融資本的獨佔。」（註卅五）這告訴我們：日本資本主義之基本特徵的軍事性和半封建性，就是到了帝國主義階段仍未完全消滅——雖然我們決不否認它在本質上仍是資本主義也好。

（註一）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六八三頁，中譯六二一頁。

（註二）轉引自土屋喬雄：日本財政史，經濟學全集第三十一卷，四七七頁。

（註三）同上，四七六頁。

（註四）同上。

（註五）野呂榮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一五六頁以下。

（註六）同上，七一頁，一五一頁。

（註七）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七二〇頁，中譯六四四頁。

（註八）平野義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二七——三八頁。

（註九）同註五，一九八頁。

（註十）同註五二〇一頁。

（註十一）同註五，二〇六頁。

（註十二）康士坦丁·樸波夫著日本經濟講話，日譯第一卷，一六——一七頁。

（註十三）日本經濟史，經濟學全集第三十一卷，二六頁。

（註十四）同註五，五五四——五五六頁。

（註十五）鈴木茂三郎著工業及礦業發達史，經濟學全集第三十一卷，五〇九——五一〇頁。

（註十六）同註十二，三一頁。

（註十七）同註十五，五二〇頁。

（註十八）同註五，六〇頁，

（註十九）山田盛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三八頁。

（註二十）沙發洛夫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日譯一一一頁。

（註廿一）同註十二，五一——五二頁。

（註廿二）同註十五，五二八頁。

（註廿三）同註五，六九——七〇頁。

（註廿四）同註五，六〇——六一頁，

（註廿五）同註一九，一一一——一二頁，六三——六四頁。

（註廿六）Freda Utley: "Lancashire and Far East", London, 1931, P. P. 109—111. 轉引自上揭沙發洛夫著書，七三——七四頁。

（註廿七）同註二十，七八頁。

（註廿八）同註一九，八三——八九頁，參照囚人勞動，納屋制度，友子同盟，人夫部屋各項。

（註廿九）櫛田民藏全集第三卷，三五四頁。

（註三十）同註一九，七四——七五頁。

（註卅一）同註一九，一二七——一三三頁。

（註卅二）同註十二，一七——一八頁。

（註卅三）伊里奇著，徐冰譯社會主義的原則與1914年的戰爭（新華日報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第四版第三欄）

（註卅四）伊里奇合集第十九卷一三六頁。

（註卅五）同上，三〇九頁，（日本河內唯孝彥譯伊里奇主義體系二三三頁。）

本章主要參考書

野呂榮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

山田盛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分析。

平野義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社會の機構。

岩波書店版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

服部之總：明治維新史，維新史的方法論。

猪俣津南雄：現代日本研究，日本的獨佔資本主義。

櫛田民藏全集第三卷農業問題。

土屋喬雄：日本經濟史概要，江戶時代的經濟。

大內兵衛：明治時代的經濟。

改造社版經濟學全集第三十一卷，日本經濟史。

山田愼太郎：日本農業論。

木村莊之助：日本農租制度論。

向坂逸郎：日本資本主義的諸問題。

內田穰吉：日本資本主義論爭。

沙發洛夫：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日文叢文閣版）。

康士坦丁．機薩夫：日本經濟講話（日譯第一卷）。

第三篇 結論・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矛盾的嚴重化

本篇前言

同一的經濟基礎，同一的資本主義，雖因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要「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差別來；」但是，我們決不能根據這些「變異和差別」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着徹底的作用，」這恰像我們決不能以特殊性或偶然的事例，來否認一般法則的支配一樣。相反的，我們只有把握着一般法則，才可能了解「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差別」在什麼地方？而且它們是怎樣發生的？只有把握着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法則，才可能了解現社會的將來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命運以及歷史的明日。

一切事物的發展，是由它內在的各種矛盾而引起的。故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同時就是它內在的各種矛盾的擴大和深刻化的過程。資本主義內在的根本矛盾在那裏？由於這種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如何發展下去？發展到歷史的現階段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上起着怎樣的作用？它們的命運如何？歷史的明日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特別研究的論題。本書第三篇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解答這些問題。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基本矛盾

第一節　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是社會的生產與私人的所有——即生產之社會的性質與所有的私人的性質——之間的矛盾。甚麼，甚麼叫做社會的生產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手紡車，手織機，手用鍛被紡績機械，機器織機，蒸汽鎚所代替；需要數百人，數千人的協力的大工場代替了個人的工場而出現。和生產手段一樣，生產本身也從個人分散行動的系列，轉變成社會行為的系列。生產品也從個人的生產品，轉為社會的生產品。現在工場所出產的紗，布，金屬品等等，是許多勞動者的共同產品，這些生產品，在完成之前，先再順次經過他們許多人的手。沒有一個勞動者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生產品。」（F. Engels: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吳黎平譯：反杜林論第三編社會主義三六三——三六四頁）

社會的生產，不單是在各個工場內，而且在全部資本家相互之間也在進行。「由資本主義的生產而發生的勞動的社會化，（即社會的生產——著者）決不單是人們在一個空間工作（這只是過程的一小部分而已），這是跟隨資本累積而使社會的勞動專門化；在所與的各產業部門上資本家人數的減少；特殊產業部門的數量增加。這是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而為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例如在手工的紡織時代，小生產者本人紡紗，用以製造布疋的場合，產業部門是稀少的。但是，生產由資本主義而社會化時，產業的特別部門的數量增加，即個別地實行紡紗，織布。現在，在比較更專門化了的各產業部門，資本家人數越加減少。這個事實，意味着生產者之間的社會的關聯越加緊密，生產者集結成為一體。」（伊里奇著作集：什麼是人民之友，日文川內譯一二四頁）

這樣，因爲：（一）生產手段是只有由社會全體才能使用的社會的生產手段；（二）生產過程的本身，表現爲各依計劃而組織了起來的社會的行爲，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不能不形成爲社會的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雖已社會化，然而生產物的所有形態，仍舊維持着過去的單純商品生產時代的私有形態。這種所有形態，在直接生產者還有生產手段的那種社會，決不會發生「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之間的矛盾」；因爲生產物的所有，在這裏是以自己的勞動爲基礎，不會發生問題。但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剝奪了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割斷了他們跟生產手段的聯繫，把生產手段轉化爲社會的；然而，同時仍舊維持着過去的生產物之私人的所有形態。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的資本家，佔有生產物，縱然這個生產物不是他的勞動的生產物，卻完全是別人的勞動的生產物也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着從來的過去的所有形態，雖然這種所有形態，是以自己的勞動和生產手段所製造的自己的生產物帶到市場去交換爲前提，而且這種前提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不存在了也好。資本主義愈發展，則直接生產者的所有愈被剝奪；因而生產之社會的性質，跟所有的私人的性質之間的矛盾，也越加尖銳化深刻化。這種矛盾：第一，表現在勞動大衆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上面；第二表現爲：一方面是各個工場的有計劃的生產組織，別一方面卻是社會的生產的無計劃，無政府狀態。社會全體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以商品生產爲基礎的一切生產方式的特徵。但是，這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把一切的生產物，把勞動力也轉變爲商品時，生產的無政府性才達到最高點。無政府性，無計劃的生產的結果：第一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第二是自由競爭。

現刻，讓我們先研究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

第二節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

在資本主義社會，互相獨立的許多商品生產者，無規律地從事生產。他們的生產是無計劃的，無政府性的。因此，各個企業，各種產

業部門，各國的發展，是無規律的，無政府性的，因而這種發展帶有不規則的，不平衡的傾向。其次，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商品生產，是為利潤而生產，努力追求較多的利潤，是它的絕對的命令。但是，要可能獲得較多的利潤，如果勞動力的剝削程度相同，那麼只有犧牲其他的生產者才行。即只有由某個企業犧牲別個企業，某種產業犧牲別種產業，某國犧牲別國，才能夠獲得較多的利潤。而且，某一個要能夠犧牲別一個，必須某一個把自已的生產力發展到超越別一個之上。因為只有採用新技術，使用新生產方法，才能夠比別人利用更大的生產力；才能夠超越別個而獲得平均利潤以上的超過利潤（或剩餘利潤。）想獲得超過利潤的動機，促使各個企業，各種產業，各個國家，各不相謀地，此追彼逐的，一起一伏的，競爭於生產力的擴大，因而必使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平衡。

這樣，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商品生產，是為追求利潤而生產，因而有生產者相互間之的競爭存在；故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本質上是不平衡的，「各個企業，各種產業部門，以及各國的發展上的不平衡性和飛躍性，是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所以，「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無條件的一個法則。」（伊里奇）

其次，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時，這種不平衡的發展越加擴大。因為在一些產業部門所成立的獨佔（Monopoly），加強了其他產業部門的無計劃性，致使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混沌狀態更加濃厚，更加急激化。帝國主義時代工業的急激發展和獨佔的形成，促使農業的發展停頓，或相對地緩慢下去，尤其是重工業之飛躍的發展和巨大的獨佔的形成，更加強了其他產業部門的無計劃性。加之，帝國主義，雖有寄生的，頹廢的傾向也好，它決不廢除各個產業部門的，各國各時代的資本主義之飛躍的發展。爭可說：因為前者的緣故，而後者越加必要了。尤其是新的企業，新興的產業，新起的國家，要想趕上，要想克服衰老了的企業，衰老了的產業和國家，越加需要飛躍的迅速的發展。在前者可以看見飛躍的發展；在後者只有頹廢的緩慢的發展。在這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必然是不平衡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從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不同可以明白看出。例如在二十世紀初葉，北美，德國和日本，是進步非常之快的新興資本主義國；而英國和法國是資本主義早已發展了的國家，故在當時，資本主義只能有緩慢的發展；俄

國在當時是經濟上最落後的，所以是資本主義發展速度緩慢的國家。

第三節　自由競爭與資本蓄積

無政府性，無計劃的生產的第二個結果是自由競爭。競爭場中最強有力的武器，是生產費的低廉。減少生產費的主要手段，是企業的合理化，採用新機械，增加生產力，使每一個商品內無包含的勞動量儘量減少。這只有具備着高級技術的大經營的大量生產才辦得到。故自由競爭，迫使資本家階級決不能以他們獲得的全部剩餘價值供個人的消費而使用盡罄，卻必須以相當的剩餘價值部

---

* 只要觀察帝國主義時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具體的現實情形，而且沒有忘掉了它的發展的不平衡性，那麼，都能夠明白 Karl Kautsky 所謂的「超帝國主義」是怎樣的不合理。超帝國主義論，主張獨佔的發展要發展到一個世界的獨佔：一個世界的 Trust，這樣代替各國的金融資本相互之間的競爭而出現的，是由國際間結合起來的金融資本，來共同進行世界的榨取。這種理論，沒有注意到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不平衡的，而且這些國家所有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也是極不均等的。「在資本主義下，各個經濟及各個國家之經濟發展的平衡成長，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下，一時被破壞了的平衡的手段，在產業上是恐慌，在政治上是戰爭，此外別無辦法。」（伊里奇）

其次，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急激化，促使一國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必然實現。因為不平衡性的急激化，一方面，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產生出極脆弱的一環，促進其轉向社會主義；別一方面，激化了資本主義各國的對立，因而在其勢力均衡上，不能不先允許社會主義的存在。「經濟的及政治的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無條件的一個法則。從這裏就發生出社會主義的勝利，最初在一些資本主義國，或者甚至在一國，也有可能。」（伊里奇）

最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在世界大戰後，在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時代，尤其利害。和這個相照應的，是革命浪潮的昂揚，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各國也極不平衡。

分，投放在次回生產過程以擴大經營規模。故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不能不是擴大的再生產過程；不能不是資本的蓄積過程。跟隨資本蓄積過程的前進，資本家爲提高生產力，減低生產費，不能不以其蓄積基金——不供資本家個人的消費而用以投資的剩餘價值部分——的大部分來購買機械原料，或改良生產設備，只用一小部分來購買勞動力。就是說，資本蓄積的過程愈前進，則不變資本的增加，越加大於可變資本的增加，卽隨資本的增大，資本的有機構成也就加高度化。資本蓄積的結果：

第一項　平均利潤率的低降

利潤率的高低，第一決於剩餘價值的大小，剩餘價值愈大，則利潤率愈高。第二，資本的有機構成愈高度化則愈低。第三，資本的回轉愈慢，則利潤率愈低。我們已經知道：跟隨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總資本的有機構成越加高度化，這使資本的回轉速度愈趨緩慢，因而必使平均利潤率降低。「平均利潤率降低之累進的傾向，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一個表現，這表現，指示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之累進的發達。」（資本論，第三卷上冊，德文本一九三頁，中譯一五六頁）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是無限制地追求利潤。故若資本主義愈發展而利潤率跟着越加降低，則以利潤量的增加來塡補平均利潤率的降低的動機，促使各資本家不能不增加其資本。因此，利潤率的降低，强制資本家增加其資本，加强資本蓄積的速度。但是，跟隨資本蓄積的前進，剩餘價值量的增加如果相對地漸趨緩慢，那麼，同時將來的蓄積速度，也必然地要緩慢化。

這樣，一方面，平均利潤率的降低，强制資本家强化其蓄積速度；同時在別一方面，平均利潤率的降低，又抑制資本蓄積的速度。這就是藏在平均利潤率降低法則上的極嚴重的一個矛盾。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上的一個矛盾及其擴大的表現。

第二項　產業後備軍的產生

跟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生的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化，必然地要促成產業後備軍的發生。「卽跟隨蓄積的進行，發生不變資本部分對可變資本部分的比率的變化。這個比率，如果最初是1:1，漸次改變爲2:1，3:2，4:1，5:1，7:1；隨資本的增加，轉變爲勞動力的部分最初是總價值的1/2，漸次遞減爲1/3，1/4，1/5，1/6，1/7，反之，轉化爲生產手段的部分，累進爲2/3，3/4，4/5，5/6，6/7。但是，勞動的需要，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而決定，卻由可變資本部分的大小所決定，因此，勞動的需要，決不是和以前所假設的總資本成比例地增加，寧可說是跟隨總資本的增加而累進地減少。」（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五九四頁，中譯五二九頁）

「這樣，一方面，和蓄積進行中所形成的追加資本的大小相比較，只能吸收很少的勞動；別一方面，以週期更新的構成來再生產的舊資本，將加驅逐從前使用的勞動者。」（同上，五九三頁，中譯五二八頁）故資本的蓄積，必然地要產生相對的過剩勞動者，因而「勞動人口，一方面促成資本的蓄積，同時在別一方面又越加不斷地產生出使自己相對的變爲過剩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法則。」（同上，五九六頁，中譯，五三〇頁）

「勞動者的過剩人口，是蓄積的必然的產物，或者是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達的必然產物；同時，又是資本主義蓄積的槓桿。不，這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存在條件之一。過剩的人口，形成一個可以自由處理的產業後備軍（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它好像是資本用錢養成的一樣，絕對隸屬於資本。不管人口的現實增加有何等限制，資本總歸可以爲它價值增殖上的變動需要，產生隨時可供它榨取的人類材料（Menschenmaterial）。」（同上，五九六——五九七頁，中譯，五三一頁）

「社會財富愈大，運用的資本愈大，這種資本增大的範圍與能力愈大，無產階級的絕對數及其勞動生產力愈大，則產業後備軍也愈加大。促進資本伸展力發展的原因，會使可供利用的勞動力發展。所以，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將伴隨財富的潛力一同增加。但與現役勞動軍比較起來，這產業後備軍愈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他們的貧困，與他們的勞動痛苦成比例——也愈大。最後，勞動者階級中的貧窮層和產業後備軍愈大，官廳正式認爲待救恤的貧民也愈多。這就是資本主義蓄積的絕對的普遍的法則。」（同上，六〇九

頁，中譯五四二頁）

這樣，被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被自由競爭所强制的資本的蓄積，不僅促進利潤率降低，擴大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而且還要使勞動者的地位，不能不日益惡化。

資本蓄積的第三個結果，是發生：

第三項　經濟恐慌的爆發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因爲資本蓄積的前進，帶有總體擴大的傾向。但是消費力却因資本蓄積所引起的利潤率降低和可變資本的相對漸減，反而有相對地漸次減少的傾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消費力之間的不平衡發展；「直接搾取上的諸條件，和它的實現上的諸條件」相矛盾，因而必然地要促成經濟恐慌的爆發。（詳細論述，可參照第五章第四節第六項。）

上述三項，就是資本蓄積的幾個主要結果及其矛盾。

本章主要參考書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資本論第三卷上册，第三篇，（第十三，十四，十五各章）

E. Varga 監修帝國主義論（蘇聯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著）

J. Lapidus, K. Ostrovitianov 共著經濟學教程。

沈志遠著新經濟學大綱。

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最高最後階段——帝國主義

第一節　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集中

由資本蓄積法則所引起的企業規模的擴大，跟隨自由競爭的猛烈化，它變爲外部的强制法則，迫使各個資本家遵守。資本家如不能增殖其資本至必要的程度，則難於維持其存在。就是說，企業如不擴張，便會縮小。由資本蓄積所引起的生產規模的擴大越加變爲這個蓄積的工具和決定的條件。

資本蓄積的法則，顯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累積的兩個形態：藉資本蓄積的幫助的累積（Konzentration）和資本的集中（Zentralisation）。這兩個形態，互相密切關聯，而且在實際上互相交錯，互相補充。*

藉蓄積的幫助的累積，替集中準備地盤，創造基礎。累積的最初的形態，直接立脚於資本蓄積，其進行是由蓄積的幫助，發生許多個別資本的規模擴大。這個累積形態，本來和社會資本的蓄積一致，因此，這和轉化爲社會的財富和新資本要素的那個部分的增加，同時前進。資本蓄積的資金，是極有彈力的，這不只是在資本規模擴大時增加，而且由勞動生產力的發達，搾取率的上昇等等的幫助，

* 「集中使產業資本家能擴大經營的規模；它在這種活動上，可以補充蓄積的作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本五九二頁，中譯五二七頁）。

「由集中而一夜結合攏來的資本量，如同其他資本一樣，增殖自己，再生產自己，並由此成爲社會蓄積之新的有力的槓桿，其不同之點，不過是增殖更加迅速罷了。所以，我們今日一說到社會蓄積的進展，言外就有集中作用包含在裏面。」（同上，五九——五九三頁，中譯五二八頁）。

也能夠增加。但是，在各個一定的瞬間，其幫助有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同時又是以個別資本蓄積的形態來進行的生產累積的限度。此外，資本的蓄積過程，必然地要和資本的分裂與獨立運用的新資本的形成相關聯。「機能資本的增加，都不免要受新資本形成與舊資本分裂的妨阻。就因此故，蓄積在一方面表現爲生產手段與勞動支配權的累積之增進，在另一方面又表現爲許多個別資本相互間的反撥。」（同上，五九〇頁，中譯五二六頁。）

因此，生產的累積過程，只要是立脚在由個別資本的蓄積速度和規模所區劃出的限度上，則此過程，在資本家之間的激烈爭鬥上，在和非資本主義環境激烈爭鬥上，不能不克服這些限度，打開資本集中的道路——不依靠各個機能資本的蓄積規模和速度的道路——前進。這個道路是：「已經形成的諸資本的累積，是個別資本的獨立性的揚棄，是資本家被資本家剝奪，是多數小資本轉化爲少數大資本。」（同上。）

資本集中之最重要的槓桿是累積。企業設備的完備，優良的技術，在競爭場上決定了小資本被大資本所殲滅的命運。不堪鬥爭的小企業的沒落，使小資本家喪失其獨立性，由種種的路徑，他們的資本落到大資本家的掌中。

其次，資本主義的信用也促進了資本的集中。「信用制度，在最初祇是偸偸摸摸地爲蓄積作一個卑躬屈節的助手；藉着不可見的線，把分散在社會表面的貨幣資源，牽引到個別資本家或結合的資本家手中。但不旋踵間，它在競爭戰上，就變成了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後且轉化爲一個助長資本集中的巨大的社會機構。」（同上，五九一頁，中譯五二六——五二七頁。）大企業家，由於銀行的幫助，獲得了處分別人的資本的可能性；獲得了利用一切社會階級的貨幣貯蓄的權力，致使大資本家更易於剝奪小資本家，因而促進了資本的集中過程。

大生產的發展，資本的集中，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越加前進，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達到了極大的規模。

例如在德國，遠在世界大戰前，「在3,265,623個企業中，大企業佔30,588個，即佔總企業的0.9%，在14,400,000個勞動者中，它

們佔5,700,000人，即佔總數的39.5%；在8,800,000蒸汽的馬力中，它們佔6,600,000馬力，即75%；在1,500,000啓羅瓦特電力中，它們佔1,200,000啓羅瓦特，即80%。不到1%的企業，佔有4分之3以上的汽力與電力。而2,970,000個小企業，（雇用5個勞動者以下的企業，）即佔企業總數91%的小企業，卻只有7%的汽力與電力！幾萬個最大的企業擁有一切；而數百萬個小企業，卻一無所有。」（伊里奇著，吳清友譯：帝國主義論增訂本，四——五頁。）

其次，在美國，每年「生產值一百萬美金以上的最大的企業，在1904年有1,900個，佔總數(216,18個)中的0.9%；它們有1,400,000個勞動者，佔勞動者總數(5,000,000)中的25%；它們有5,600,000,000美金的生產，即佔總生產（14,800,000,000美金）中的35.5%。五年後，在1909年其數目如下：3,060個企業，即佔企業總數（268,491個）1.1%的企業，雇有2,000,000勞動者，計佔勞動者總數（6,610,000人）中的30.5%；並有9,000,000,000美金的生產，計佔生產總數（20,700,000,000美金）中的43.8%。

全國所有企業的全部生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握在佔企業總數的1%的企業手裏！

而且這三千個巨大企業，包括有268個工業部門。」（同上，七——九頁。）

在大戰前的幾年間，在大戰中及戰後的時期，生產的集中過程越加猛進。

現在的德國，工業生產機構中大約一半被企業總數的一萬分之四所掌握集中。1925年，在德國使用勞動者五千人以上的企業有六十六個，這一些企業即佔有產業界的全動力機關的15%。

在戰後的美國，生產的集中過程更加猛烈與迅速。即在1904年，每年生產百萬美金以上的企業，佔總企業的0.9%，在1914年即增至2.1%，1925年達到了5.6%。在1925年，5.6%的巨大企業佔有美國勞動者總數的58.0%，全部工業生產物中的69.3%，是由它們生產的。

大生產之驚人的發展，及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它的比重的增加，表現出在少數資本家集團中資本量之越加集中的事實。在資本

主義的最後發展階段資本的集中達到空前的極大的規模，其結果，『數百人的巨大資本家，掌握全世界的運命。』

第二節　獨佔 (Monopoly)

『生產集中發展到了某種程度，便自然而然地要直接達於獨佔。(Monopoly 或譯作「壟斷」——譯者)因爲，在數十個巨大企業之間，就容易訂立協定；同時，競爭變爲困難和發生獨佔的傾向，也正是由於企業規模之龐大所產生出來的。在最近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此種競爭之轉變爲獨佔，即使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現象，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同上九頁)

由自由競爭而發生的生產集中再由生產集中而發生獨佔的現象，決不限於德美二國，這在英國也是有的。『英國這種自由貿易的國度裏，生產集中之轉爲獨佔，雖略爲晚些，也許是採取另一種形式，可是仍舊歸結到獨佔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大不列顛，企業規模之大和技術程度之高本身便包含有一種走向獨佔的趨勢。一方面，生產底集中使企業必須投巨額的資本，因此開設新的企業，就需要巨額的必要資本，這樣，它們的出現也就發生困難了。另一方面（我們以爲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每個新企業，凡是想同那些在集中過程中成立的巨大企業相平行，那麼必然就要生產大量的多餘生產品，要使這些大量的多餘的生產品能夠賺錢地賣出去，那祗有在需要量異常擴大的時候，才有可能。……」在英國跟那些有保護稅制以促進 Cartell 化的國家不同，大部分企業主的獨佔集團，(Cartell 與 Trust *等，祗在主要的互相競爭的企業數目減至「兩打左右」的時候，才產出來。這樣，生產集中之影響於大工業中獨佔勢力的產生，已顯明得如水晶一樣了。』(同上二一——二二頁)

這樣，『生產集中之產生獨佔，已成爲資本主義現階段底一般的基本的法則了。對於歐洲，我們可以很確定地指出新資本主義完全代替舊資本主義的時期，這就是二十世紀之初。』(同上二七頁)

* Cartell, Trust 是獨佔的兩種形態，可參照下節的說明。

『獨佔的歷史，共有以下幾個基本的時期：

（一）1860年至1870年，爲自由競爭底最高的終極的發展階段。獨佔還只是不甚明顯的萌芽。

（二）1873年的恐慌以後，這是 Cartell 廣泛發展的時期，但 Cartell 還只是例外的東西，還沒有穩固起來，還是一時的現象。

（三）十九世紀末的好景氣及1900至1902年的恐慌時期。那時 Cartell 成爲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了。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同上，二二九——三〇頁。）

巨大資本家們，由於組織獨佔的團體，『互相商定之販賣條件，支付期間等等；互相分配市場，決定生產品數量；規定價格，爲各個企業分配利潤等等。』（同上，三〇頁。）

下面的數字，卽指示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獨佔的各種組織，普及到怎樣的程度。

例如在美國，在1904年，國內總企業的24%已經屬於『Corporation』（卽資本家的獨佔組織），全部工業勞動者中的76%在這些企業工作，其生產量竟佔工業總生產的74%。1914年總企業中的28%屬於『Corporation』其生產量佔國內工業總生產的83%。到了1919年，這些『Corporation』佔總企業的31%，生產了總生產中的88%。1929年，生產的70%集中在三個獨佔團體（Trust）的掌中。汽車工業的四分之三被兩個獨佔資本家掌握；電氣工業中大約四分之三被兩個巨大的獨佔團體所掌握！

同樣的情形，在德國也可能看見。在世界大戰前，德國已有五百個以上的獨佔團體存在，其中萊因·威斯特發爾煤礦 Syndicat 及製鋼 Syndicat * 是最大的。1909年，萊因·威斯特發爾煤礦 Syndicat 在杜耳湯姆杜地方採掘了八千五百萬噸的煤，而 Syndicat 外部的，卽未參加獨佔團體的一切企業僅僅採掘了四百二十萬噸（4.9%）的煤。在1913年一月，Syndicat 的產煤量，在該地方佔總額中的92.6%，佔全國產煤量的54%。其次，製鋼 Syndicat 把自己所佔的比率上昇到國內總生產的43—44%；電氣業的

* Syndicat 是獨佔的一種形態，說明見次節。

Trust 供給了總電力的40%。在戰後德國的獨佔團體的發展更加猛烈。1924年，在工業上有二千五百個獨佔團體，1927年約增至四千個。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中的龐大的部分集中在少數的巨大獨佔者手中，化學工業 Trust，在1926年集中了全部化學工業生產的80%於其掌中，到1927年末掌握了礦山業的90%以上，鐵道的85%，電氣工業的84—85%。

只是一個製鋼 Trust—在1926年大約集中了德國的鋼鐵及鋼的生產的一半，——在1930年，由於結合了直到現在爲止站在外部的一聯的諸企業，差不多就掌握了重工業製鋼工業的 100%。

『對於其他許多國家在1931年時的Ca tell的數目有如下的估計：英國——170，法國——80，奧大利——100，捷克——120，匈牙利——76，瑞士——82。』（同上，三十頁。）

各種獨佔團體的這種驚人的發展情形，在其他資本主義諸國，都可以看見，雖然多少有點不同也好。

還樣「現在，已經不是大小企業間的競爭，或技術落後與技術進步的企業間的競爭了。現在已經是獨佔窒息那些不受獨佔組織的指揮的企業，窒息那些不被它們的壓迫和專橫所屈服的企業了。」（同上，四九頁。）

獨佔者打擊局外者，打擊未參加獨佔組織的企業的主要方法是：

『（一）攫奪原料……，（二）以勞資『同盟』方法攫奪勞動力……，（三）攫奪運輸機關……，（四）攫奪銷路……，（五）與買主定約，使他們只與 Cartell 發生買易關係，……（六）有計劃地跌價，使得『局外者』即未屈服於獨佔者企業，陷於破產……，（七）攫奪信用借貸……，（八）宣佈同盟絕交。』（同上，四五——四六頁。）

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的階段發展到獨佔的階段後，有一些學者，認爲自由競爭已經消滅，無政府性的生產漸次變質爲有計劃的生產，而資本主義也跟着變爲『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了。創造這種奇妙「理論」的代表者，我們可以舉出 R. Hilferding 的大名。

其次，K. Kautsky 的「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us)論，則主張獨佔的發展，要發展到一個世界的獨佔，一個世界的Trust，這樣，代替各國的金融資本之間的競爭而出現的，是由國際間團結起來的金融資本，來共同進行世界的剝削。

但是，我們認為：獨佔的發展，不但不能排除一切的競爭，而且還有激化競爭的傾向。因為在競爭場中小生產被擊破後，代替小生產的競爭而出現的，是巨大的獨佔資本家之間的猛烈競爭。故「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的組織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不管獨佔怎樣發展，在事實上，總不能發展到全部資本主義世界只有一個獨佔組織存在，或如 Kautsky 所說的「一個世界的Trust」；而且各個資本主義的發展極不平衡，既不「平」則不能「和」，因而要想帝國主義列强團結起來和平地共同進行世界的剝削，根本是不可能的。（帝國主義反蘇聯十字軍統一戰線的難於形成，即其證明之一。）

所以，伊里奇說：「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獨佔，並沒有消滅競爭，却是建築在競爭之上，而且同自由競爭並存着的，由此而產生許多特別緊張，特別嚴重的矛盾，許多傾軋和衝突。」（伊里奇著，吳清友譯：帝國主義論二一二頁。）據此可知背教者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和「超帝國主義」論，是怎樣的不合道理。

第三節　獨佔組織的種種形態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開始發生的資本家的各種獨佔組織和團體，跟隨大生產的成長，資本集中生產集中的擴大前進，而越加發展與鞏固。在獨佔發展的現階段，我們在各國，在各種產業部門，可以看見種種不同的獨佔組織形態。

獨佔組織的最簡單形態，是：Cartell (Kartell 卡爾特爾。)

所謂 Cartell 是同種類諸企業的各資本家之間之一時的協定，其主要目的，是在參加協定者之間，分配販賣地域，規定加入者不能以協定的最低價格以下的價格來販賣商品。Cartell 的加入者，關於購買原料，享受信用(Credit)的各種條件，也可以協定：爲

和勞動者鬥爭，還可以協定最高的工資額。

從 Cartell 的組織形態看來，凡加入 Cartell 的一切資本家必須遵守協定的堅固保障，是不存在的。在沒有必須實行協定的保障的場合，加入協定的各企業在商業上之保持獨立性，是 Cartell 的最大弱點。它們在景氣不安定的場合，即在物價常常變動，外匯行市不安定的場合，最容易迅速瓦解。因為在這個場合，常發生破壞協定的誘惑的緣故。如果 Cartell 的一個參加者，破壞規定的最低價格，或將其商品拿到已經分配給別人了的市場去販賣，因而可能獲得利益時，那麼，他會毫不遲疑的這樣做而破壞 Cartell 的協定。

獨佔組織的較高的形態，是 Syndicat。所謂 Syndicat，是參加這種獨佔組織的資本家們，在商業上喪失其獨立性，只是在商品的生產上保持其獨立性，商品的販賣（有時原料的購買）由加入 Syndicat 的全部資本家之特別組織來執行。由協定而結合在一起的資本家，必須把它們的全部生產品交給這個特別組織。獨佔地販賣加入者的生產物的這種組織，通常是按照股份的原則而形成的。

Syndicat 較之 Cartell 可能使參加這種組織的各資本家難於單獨行動；故市場景氣的變動，較之在 Cartell 的場合，難於動搖 Syndicat 的組織的基礎。

Syndicat 較之 Cartell，更能保障參加這種組織的資本家的獨佔地位，然而，同時它決不能消滅他們相互之間的競爭。這個競爭，大半是以加入的各企業間分配定貨單的問題為中心而展開的。各個企業都努力於想增加在販賣的商品總量中自己所佔的比例。這個欲望，尤其在 Syndicat 能夠獲得對自己的商品有利的販賣價格時，更加强化。在這個場合，加入 Syndicat 的各資本家，都想儘量多賣商品，因而在可能範圍內獲得更多的利潤。然而，投放許多商品在市場，對 Syndicat 是不利的。因為這必然地不久即使價格降低。這個內在的矛盾，常使 Syndicat 崩潰。

獨佔組織的更高形態是 Trust（托辣斯。）所謂 Trust，是參加這種獨佔組織的各企業，不只是喪失商業上的獨立性，而且還喪失了生產上的獨立性。Trust 有完全自由處置加入這個組織的一切企業的權利，在必要的時候，甚至還可以封閉一些企業。結合於 Trust 的各資本家，喪失了對於自己的企業的個人所有權，而轉變爲 Trust 的公共財產——通常它組織爲股份公司的形態——的共同所有者。加入 Trust 的各資本家，按照他讓與 Trust 支配的各企業的規模，價值及貨幣資本等等，而接受一定量的股票。Trust 有無限制處理各個企業的可能性。它可能封閉生產費較高的劣等企業，把生產集中在優良企業，由此減低生產費，增加自己的利潤，使它在和別的資本家的企業即在跟未結合於 Trust 的企業（普通稱呼這些企業爲 Out-Sider）相競爭時，處於優勢的地位。

那麼，在 Trust 的內部加入 Trust 的各資本家之間有無競爭呢？

從表面看來，加入了 Trust 的各企業已完全喪失其獨立性，因而會沒有競爭存在吧。然而，實際上決不是這樣的。在 Trust 內部的爭鬥，是以各資本家想獲得支配的指導的地位，想分配更多的利潤而發生了出來。在 Trust 內部，獲得了支配的指導地位的人們，事實上決定 Trust 內部的一切事業，規定利潤的分配，用種種投機的詐術，以「薪俸」的形態，侵蝕或分肥利潤。這樣，加入 Trust 的最大的各資本家之間，爲獲得 Trust 內部的指導的支配的地位，不能不發生猛烈的爭鬥。

Trust，在原則上，是聯合生產同種商品的各個企業的一種組織。

但是，要在市場上獲得特殊地位，要想在鬥爭場中戰勝別人，常常使異種的各企業也不能不結合於獨佔組織內，這種獨佔的組織，稱爲 Combination。所謂 Combination 是：「聯合各種不同的工業部門於同一企業之中。此等部門，或是代表改製（加工）某一原料的各個順次的階段，（如由鐵苗鎔成生鐵，由生鐵鑄成鋼，或者再由鋼製造某種完成的物品。）或者是一個部門對於別個擔着輔助的作用的。（如廢物或副產品之製造；包裝用品之生產等。）」（帝國主義論同上，一五——一六頁。）

美國的鋼鐵 Trust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就是 Combination 的一個好例。

這個巨大獨佔體，「把五金生產的一切階段——從鐵礦及煤礦直到巨大的熔爐，延壓工場以及化學焦煤等的設備——都包括到了。只以加入 Trust 鋼鐵的一個稱做格利的製造廠的力量來計算，就可以生產銑鐵 340 萬噸，鋼 440 萬噸，以及鋼材 330 萬噸，其全 Combination 有12個熔爐，52個馬爾丁式的熔爐，3 個勃留明格式的熔爐，幾個延壓工場（其中有世界最大的鐵軌延壓工場，其出產量約有 100 萬噸）約有1000個附有製造副產品設備的焦煤爐，一個水門汀製造廠，生產力有 900 千噸，一個煉炭廠和自已的電站，其發電力達 160 千啓羅瓦特。（同上一六頁。）在1929年，它的鋼鐵產品計百 21.9 百萬英噸，工人數目二十三萬七千人。從1901年（成立的一年）至1930年 Trust 熔鑄 462 百萬噸鋼，并獲得4482百萬美元的利潤。在1932年固定資本計有 1651 百萬美元。」（同上，三八頁。）

像這樣巨大的獨佔組織，其他的弱小企業當然不能和它對抗。而且，Combination 的組織，在原料及半製品的買賣上，還能節省許多費用。因爲一部分企業，直接供給原料與半製品給其他的企業的緣故。例如：加入了 Combination 的鑛山企業，供給鑛石給加入了同一的 Combination 的冶金工場；冶金工場，又供其精製的金屬給加入了同一的 Combination 的機械製作所及其他金屬加工工場……等等。而且，在這個場合，Combination 還不會受原料價格之不斷的變動，原料價格之人爲的提高等等事實所影響。

Combination，由於結合各種企業在一起，較之其他的獨佔組織，具有更大的應付利潤率及景氣的急激變動的抵抗力。加之，Combination 更可能實行技術的改良。

但是，幫助 Combination 形成的一切的事情，也不能消滅加入這個獨佔組織的各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在這裏，爲爭奪指導的支

＊ 注意："Trust"和"Combination"兩個用語，不能明確區別。

配的地位爲獨的分配而引起的各資本家之間的鬥爭，也是不能避免的。

Konzern 是 Combination 的一個特殊形態。

所謂 Konzern 是各種不同的企業之大規模的結合，這是由某企業融通資金與其他的各企業，或購買其股票的一部分，或派遣「自己」的人到這些企業的指導機關去，把這些企業轉變「兒子公司」，「孫子公司」，因而使它們隸屬於自己。Konzern 的最高幹部，通常是一個大資本家，他對許多的企業發號施令。

Konzern，現則在德國最普及，但在法國，意大利，奧大利，瑞典及其他各國，也可以看見。*

第四節　金融資本（Finanzkapital）

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過程的進展，各資本家的獨佔組織的形成：——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特徵——一方面，促進了銀行的集中；一方面又使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上的作用發生變化。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過程的進展，及因此而形成的巨大的獨佔組織，不能不促進銀行的集中。這第一是因爲只有掌中集中了巨額資本的銀行，才有融通資金給獨佔企業的能力。

其次，工商業及貨幣流通的發達，其本身也就在幫助銀行支配下的貨幣額的增加。即銀行本身所有的資本，它收受的貯金額及放款的可能性，都同時增大了。

* 結合許多同一種類企業（例如煤炭企業）的 Trust，或稱爲「水平的 Trust」；結合許多個種類不同的企業（例如：煤，鐵，機械，電氣……等等）於一個 Trust 的則稱爲「垂直的 Trust」。後者不能和 Combination 嚴格區別。Konzern 是 Combination 的一種特殊形態。

最大的各銀行，因採用下述的種種手段，而確保其在資本主義各國的信用體系內的支配權。這些手段是：由猛烈的爭鬥而使其對手破產；由壟斷股票，融通資金而克服其對手；由於自由協定的方法；由於組織獨佔的各種團體……等等。

一九一三年末，柏林九個大銀行以及附屬於它們的銀行，合計共總支配着113億馬克，即佔德國銀行資本總額的83%，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連那些附屬於它的銀行在內，差不多支配着30億馬克，它與普魯士國有鐵路，同如舊世界中最大的資本積累。（帝國主義論同上，四四頁。）

這九個銀行——戰後減而為七，再減為六——佔有全國銀行資本的72.5%，如果合計隸屬的及相連繫的各銀行，則佔有全國銀行資本的92%。1932年這六大銀行，更融合為四大銀行。

在英國，1833年，六十二個私立銀行，在銀行事業上扮演決定的劇目。這些銀行，到了1895年僅有38行，1910年僅為九行，1915年僅為四行，資本則有二千六百萬磅，存款則有二億七千八百萬磅。英國的股份銀行，1890年到1925年從104減至16行，在1925年，這十八個股份銀行，有十三億磅以上的資本及約百八十億磅的存款。此等銀行中最大的五個銀行，集中了英國各銀行的總資本的87%，總存款的71%。

在法國，只有四個最大的銀行支配着。

在美國，——較之別國銀行事業雖然是很分散的多些——十六個最大的銀行，在1924年集中了總存款的[illegible]%。在1931年來，總數二萬二千的銀行中，結合於「聯邦準備制」的八千個銀行，在這個組織的公式的計算上，支配了總資本的62%。而且立於「準備制」的幹部地位的，實質上是十二個大聯邦準備銀行；這些銀行又隸屬於兩個最大的銀行。

「資本的集中和交易的發展（銀行周轉之增進）使銀行的意義，起了根本的變更。散處各方的資本家，集合成了一個集團的資本家。銀行為少數資本家管理流水賬；這樣，它似乎祇做了些純粹技術性的並且完全輔助性的工作。可是，當這種工作範圍擴展得

[illegible]的時候，結果便是少數獨佔者，屈服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全部工商業的活動，它們便能以銀行的聯繫，流水賬以及其他金融上的各種活動，先去正確地探知各個資本家的狀況，然後就以擴大或縮小，促進或阻礙信用的方法去統制他們，去影響他們；末了，它們就會完全決定了他們的命運，決定了他們的收入，奪去了他們的資本，或者是使他們有迅速地而且大規模地增加自己的資本的可能。」（同上，四九——五〇頁。）

關心於產業的經營的各銀行，對於該產業資本家，決不只是限於從外部加以監督，而且銀行本身也變爲產業經營的參加者

各銀行的這種新的作用，和股份企業形態的普及有關著的關聯。

銀行，由於購買股票，就可參加已經組織好了的企業；又能夠企圖或計劃新的股份企業的組織。這樣，銀行把自己的資本投放於產業，直接地參加到它的指導部，因而由蒐集與分配遊休資金的仲介者——在以前銀行是這樣的，——轉變爲指導企業的幹部。

這樣，「銀行事業發展中的最後一個字也是獨佔。至於說到銀行和工業之間的密切的聯繫，那麼最正是把銀行的新作用表現得再顯著的部門了。倘若銀行替某個企業主兌換期票，或者爲他立一個往來戶頭或其它等等，那末把這種職能單獨看起來是一些也沒有損害到該企業主的獨立性，而銀行也沒有越出簡單的中間人的作用。但是假若這些職能增多起來了，鞏固起來了，倘若銀行在自己手裏「收集了」巨額的資本，倘若帳戶往來的結果，使銀行能夠（而且在事實上也確能如此）更詳細地，更完備地知道顧客的經濟情形了，那麼產業資本家也愈加完全要依賴於銀行了。

同時，銀行和工商大企業之間的所謂人事的結合也發展起來了。以佔有股票的方法，以派遣銀行理事充當工商企業董事會會員（或管理處的人員）的方法，或是反過來以派遣工商企業負責人參與銀行管理機關的方法，彼此融合起來。」（同上，八九——九〇頁。）

所以，在生產集中的基礎上，在由此集中而成長的獨佔的基礎上，銀行和產業的融合，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融合，形成爲金融

資本。(Finanzkapital, Finance Capital). 所以，伊里奇說：「生產集中，由集中所發生的獨佔，銀行和產業的融合或混合生長，——這些便是金融資本的產生歷史和金融資本這個概念的內容。」(同上，一〇八頁。)

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金融資本的形成，決不是說產業轉屬於銀行，銀行家上昇爲主人，而產業資本家淪爲隸屬的奴隸。金融資本的產生，是由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融合」——以生產及資本的集中爲地盤，——因此，銀行家本身同時都爲產業資本家；產業資本家同時即爲銀行家，這是它的特徵。

例如：最大的美國資本家之一的 Morgan，是世界最大銀行之一的 "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 及附屬於此銀行的各銀行團的指導者，同時又是極大的製鋼 Trust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的指導者，最大的鐵道大王之一人。其次，美國大金融資本家之另一最顯著的代表者是 Rockfeller，他是世界最大的銀行 Chase Bank 的支配者，同時又在化學工業，石油工業，石炭工業，樹膠工業，航空機工業，以及運輸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

金融資本的發展，在其他主要的資本主義國也是非常顯明的。

這樣，生產的集中和獨佔，促進了銀行資本的獨佔的發展，又促進了產業的集中和獨佔，在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及由集中而發生的獨佔的基礎上，由於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融合，而產生金融資本。在金融資本的支配下，「銀行乃由不關重要的仲介業者的作用，一變而爲萬能的獨佔者的作用了；它差不多支配了全體資本家和小所有主的貨幣資本，以及一國或數國以內大部分生產手段和原料來源。從無數不關重要的仲介業者變爲少數獨佔者的那個轉變，便是由資本主義轉變爲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主要過程之一。……」(同上六一頁。)

金融資本，是新的質，是帝國主義時代以前沒有的新生產關係。金融資本的出現，是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時代，「所以，二十世紀，便是從舊資本主義轉到新資本主義的轉換點，即從一般的資本統治，轉換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換點。」(同上，一

（六頁。）

第五節　金融寡頭統治

金融資本的發生和發展，促成了極少數的大金融資本家——金融寡頭——的統治。

金融寡頭，利用自己的經濟威力，把沒有結合於獨佔組織的 Outsider 的各企業隸屬於自己勢力的統治下。金融寡頭，因買各企業的股票的一部分，通融資金給牠們，即以所謂「參與制度」或「參與組織」*爲武器，把牠們轉化爲自己的「兒子公司」「孫子公司」，而支配着許多企業；這些企業的總資本極顯著的超越了「自己」的資本額。

這個「參與制度」，不只是把獨佔者的權力增加到驚人的程度，而且還使獨佔者可能作種種陰謀，投機及其他一切的賺錢的把戲。

附屬的企業（「兒子公司」「孫子公司」）在表面上是獨立的企業，統治它們的實際上的權力者對於它們不負法律上的責任，因此，金融寡頭能夠做種種的詐欺行爲而使其附屬的各企業負責任。倘若失敗，則用種種方法把損失轉嫁到小股東的肩上。僞造收支計算，人爲的一時的提高股票價格，或用其他方法以隱蔽其對「兒子公司」的冒險行爲。倘若「成功」，則大金融資本家獲得極大的利潤。但此「致富」，常常是空投機的結果，對於社會生產的發展，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金融資本家，由於發行股票，社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而獲得極大的利潤。跟隨金融資本的發展，這些有價證券的發行也越加增

※所謂「參與制度」，就是由於購買某企業的股票的一部分，參加到該企業的核心部；更利用小股東的分散無力，可能以較少的股票（例如：40%）把持着那個企業的支配權。更以這企業的資產等等爲基礎，利用同樣的購買一部分股票的辦法，來統治另外一個企業；再由它來統治別一個企業，因此，金融寡頭，可能因「參與制度」而支配着許多企業。

加。有價證券的發行，變為金融資本的最重要的業務。所以伊思奇說：「發行有價證券，是金融資本的主要事業之一它的特別高度的利潤，在金融寡頭制的發展中和金融寡頭制的鞏固中起有極重大的作用。」（同上，一二四頁。）

有價證券的發行，在1929年，美國幾達百零二萬萬美金；在德國1928年約達四十萬萬馬克。其他各國的有價證券的發行，也相當的多。這樣，「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而被事實上的獨佔者所利用的金融資本，因創辦企業，發行有價證券，購買公債票等等，而獲得大批的而且日益增漲着的利潤；這鞏固了金融寡頭的統治。」（同上，一二二頁。）

有價證券的發行的日益增漲，促進了食利者或利息生活者（Rentner）——只以由股票而來的所得生活着的人們——的成長。這是資本主義轉化為寄生蟲的最顯明的一個例子。資本最豐富的強國的金融寡頭統治者，把其他各國淪為自己的債務者，貢納者。金融寡頭，以其獨佔的地位，可能獲得極大的所得，其結果，「在人口，工業，商業，海運等停滯之下，一個「國度」——例如世界大戰前的法國——（彭，）可以藉高利貸而致富。」（同上，一二四頁。）

「資本的所有與資本在生產中的應用相分離，貨幣資本與產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祇依賴貨幣資本收入而生活的利息生活者與企業家，以及其他直接應用資本的人們相分離，——這是資本主義的一般的特徵。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時，這種分離已經達到了巨大的限度。金融資本對於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獨佔優勢，便是表示利息生活者和金融寡頭的統治勢力……」（同上，一三六——一三七頁。）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巨大的金融寡頭支配者的權力，決不單是限於經濟上，它擴展到了政治上，思想上，以及社會生活的一切部門。

在帝國主義時代，國家機構與權力，對大金融資本家有極重大的意義。在這裏，國家機構，也為金融寡頭的統治而服務。國家機構與各種獨佔組織的密切關係和交錯，使官吏，議員，以及其他最有勢力的政治家，也變為大金融資本的代言人或代辦

者。大臣，閣僚，部長，或有勢力的議員，在議會上，在閣議上，或在其他的場合，都爲大金融資本的利益而「奮鬥」。因此，在這些政治家「隱退」後大半在銀行內，公司內，Trust 內獲得相當的地位，即「棄官爲商」。別一方面，在「官運亨通」的時候，這些人又騰上政治舞台，「爲人民謀福利」。

例如，英國有名的首相鮑爾溫，就是大製鋼公司鮑爾溫公司的所有者。1929 年鮑爾溫內閣總辭職後，一聯的極有名的閣僚就「隱退」到資本主義諸企業的指導部去。

美國的上前屆總統哥立芝 (C. Coolidge) 的閣僚的一半，代表着該國的最大的商業企業，胡佛 (Hoover) 大總統的閣僚的三分之二是由最大的各企業的代表者構成的。同樣的現象，在別國也非常顯著，用不着贅述。

金融士及政治上的勢力，在學校，科學，言論機關，及其他各方面都給大資本以保障，用盡種種方法，把廣汎的民衆「教育」來適合大資本的利益。布爾喬亞國家，被極少數的金融寡頭所統治；大金融資本家之得以高居國家機構之上，是因爲私有的各種獨佔組織的企業，和國營企業相交錯的緣故。布爾喬亞國家，自己經營許多企業——運輸企業，發電所，軍需工場等，——或發行紙幣，公債，組織銀行，這必需求助於大金融資本，這些銀行則承銷國家所發行的公債，幫忙販賣公債。同時，國家給與許多私人企業以補助，協力於生產和資本的集中，促進獨佔組織的形成，因而干涉各個私人企業的活動。因此，國家爲着最大的獨佔者勢力的確立與强化，更給予它們以幫助。在經濟恐慌時期，國家給予種種補助，以防止大銀行及其他企業的破產。這樣，「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的獨佔事業，不過是替某一種業部門中的將近破產的百萬富翁們，提高担保其收入罷了。」（同上，八四頁。）

各獨佔組織與國家（資本）的交錯，激化了在國家機構內爭奪指導地位的大資本之間的矛盾。這表現在政治上，即爲代表利害對立的資本家集團的布爾喬亞政黨的政權爭奪。例如：在英國的保守黨和自由黨；在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在日本的政友會和民政黨。各政黨各有其後台老板的大財閥；大財閥拿出一定的資金交給它的政黨作政治活動之用，使政黨供自己的使用。在政黨

「奪得天下」後，就給大財閥以種種經濟上的特典或「權益」。例如：賦與經濟利權與大財閥，對其商品採取有利的關稅政策，供款，發行有價證券或爲它締結有利的商約，使它獨佔軍需的供給及包辦公共的設施……等等。這樣，金融資本的寡頭統治，不僅在「國民經濟」上發號施令指揮一切，而且在政治上也獲得了無上的支配權。

這樣，跟隨資本主義發展到獨佔的階段，尤其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現階段，極少數大金融資本寡頭統治的確立，促使議會政治漸趨沒落，而出現了以巨大資本爲背景的法西斯蒂的政治形態。

第六節　資本輸出

「在自由競爭完全支配下的舊資本主義，它的特徵是商品輸出。但在獨佔支配下的最新資本主義，它的特徵是資本輸出。」（帝國主義論同上一四三頁。）

資本輸出的根本原因，是「在先進國度中發生了巨大的『資本過剩』。」

不用說，倘若資本主義能把現在的，到處都比工業落後很多的農業發展起來，倘若資本主義能把人民大衆的生活水準提高起來（雖有駭人耳目的技術的進步存在，但人民的生活水準依然是窮困的和半饑半飽的）那麼自然就不會有資本過剩發生了。但是，當着資本主義還保持其爲資本主義的時候，這種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去提高國內民衆的生活水準，因爲這樣便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在這時候，祇會以資本輸到落後的國家中去以便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後國家中，利潤通常是很高的，（因爲資本很少，）地價是比較地不很貴，工資是很低廉，原料又很便宜。

資本輸出的可能性，是由於以下許多原因造成的，即：落後的國家已經被捲入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流轉，鐵道的主要路線已經建設好了或者已經開始建設了；發展工業的基礎條件已經有了保障等等。

資本輸出的必然性，是由於以下許多原因造成的，即：在好幾個國度中，資本主義已經『過於成熟了』，而『有利的』投資場所已經是不夠了（在農業不發達和羣衆窮乏的條件之下）。（同上一四四——一四五頁。）

資本輸出的形態，可大別為二：（一）為追求利息而輸出的資本，即放款資本的輸出；（二）為追求利潤而輸出的資本，即產業資本的輸出，前者例如購買外國的公債而輸出的資本；後者例如在外國建設工場，組織企業的支店，或買收而輸出的資本等。世界大戰前，法國特別以輸出放款資本為主，故普通稱法帝國主義為『高利貸的帝國主義』。

下面的大概的統計，便是關於四個主要資本主義國的國外投資數量：

國外投資（單位十萬萬佛郎）

年度	英國	法國	德國	北美合衆國
1850—1862	3.5	2.5	——	——
1869—1872	15	10	——	——
1880—1882	22	15	——	——
1890—1893	42	20	10	——
1902	62	27—37	12.5	1.5
1914	100—110	60—80	44	30
1924—1930	100—110	——	7.5	75

（此表據 E. Varga 監修日譯本帝國主義論二九一頁，原文單位為百萬萬佛郎，恐係十萬萬佛郎之誤。）

據此可知資本輸出是在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才有巨大的發展。在戰前四個主要國家的外國投資達到了2340至2640萬萬佛郎。

按照起碼的5%的利率計算，從這宗數目所得到的收入，每年尙達117乃至132萬萬佛郎。「這就是帝國主義用以壓迫和剝削全世界大部分的民族和國度的經濟基礎，也就是少數最富的國家的資本主義寄生制度的堅實基礎。」（同上，一四六頁。）

這些國外投資在各國之間怎樣分配的呢？投到那裏去的呢？下表就是一個大概的答覆。

國外投資在世界各洲的分配情形（大概的）（十萬萬馬克）

	英	德	美	英	德	美
	1910年	1910年	912年	1930年	1930年	1930年
歐洲	4	3	0.8	6	2.3—2.7	21
美洲	37	.0	6.9	30	1.5—2.1	38
亞，非，澳洲	29	7	0.3	40	0.2	7
總結	70	35	8.0	76	4.0—5.0	66

（據前揭E. Varga監修書一五一頁。）

「輸出資本的國家，差不多總有獲得相當「利益」的可能，這種利益的性質，說明了金融資本和獨佔時代的特質。例如1913年十月號的柏林銀行雜誌載道：「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近來正在演着一齣趣劇，是很值得亞力斯多劳暴筆」寫的。很多外國政府，自西班牙到巴爾幹，自俄羅斯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為止，都公開或祕密地在巨大的貨幣市場之前，要求借款，有時是非常着急地要求借款。現在，貨幣市場的情形，並不十分光明；而政治的前途，也未可以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斷然拒絕借款，因為生怕鄰國捷足先登，以致獲得很大的利益。在這種國際交易中，債權者差不多總是獲得一些利權的；如優惠的商務條約，開設煤站，建築海港，租獲良好租界，定購大砲等。」（同上，一五二——一五三頁。）

資本輸出對輸出國的利益：

（一）獲得商品市場——資本輸出必然地和商品輸出相關聯。因爲輸出資本的債權國，在提供外貨與輸入資本的債務國時，大牟附有必須購買債權國的一定量的商品的條件。例如1923年七月英國下議院曾討論借款給不列顛印度的問題，在討論中印度事務大臣宣佈說，截到現在爲止，印度政府所得到的借款總數的95%是用於購買英國貨物的。1931年春，波蘭從英國托辣斯"General Limited Trust"方面借到一千一百萬德國馬克，爲期十二年，用以建立電話網，在波蘭方面，應允在六年內依照條約中所規定的價格，購買六百萬德國馬克的英國材料。

在1923—1931年間法國借給羅馬尼亞四次借款，借給南斯拉夫二次，借給波蘭三次，借給捷克一次，借給芬蘭一次，總數共有3551百萬佛郎。在同時期內，僅是從法國輸出的軍用材料及飛機便有1276百萬佛郎，這些東西主要是輸到上述那些國度去的。

美國在南美十多個國度中的投資從1913年的173百萬美元增至1929年的2294百萬美元。在英美兩國的總投資中，美國所佔百分比數在1913年是4.3%；在1929年爲33.8%。同時，在南美諸國的輸入中，美國所佔的百分數增加了一倍，即從1913年的16.1%增至1929年的31.5%。（同上，一五三——一五四頁。）這些事實，都替我們說明了資本輸出，必然地與商品輸出相關聯，因而它能擴得擴大輸出國的商品市場。「因此，資本輸出，成爲鼓勵輸出商品至國外去的手段了。」（同上，一五六頁。）

（二）獲得原料的供給——因爲第一，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資，是加強資本輸出國支配後進國的主要工具，使後者變爲前者支配下的原料和糧食的供給地。原料的獲得，尤其是鐵，石油，煤炭的獲得，使資本輸出國的產業受惠不少，因而加強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量。例如：日本對華，尤其是對華北的棉花放款，經過買辦高利貸商業資本的吸血管，以吸收廉價的原料。其他，例如：資本的大量輸出，大量投資，使美國在南美獲得了大部分的鑛山。

（三）獲得高率利潤——資本輸出的結果，在國內多少可以妨礙利潤率的降低；在國外，尤其在後進國，因爲資本缺乏，工資，地

租，原料等等的低廉，使資本能獲得較多的利潤。

（四）超越關稅障壁——商品的輸出常因高率關稅而受其阻礙，但關稅的障壁，不能阻礙資本的輸出；不能阻礙外國資本的侵入。

（五）壓抑後進國的工具——資本輸出，是壓抑後進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扶植輸出國的「勢力範圍」的極好工具。政治的借款，常使輸入資本的債務國受債權國之或多或少的支配。其次，假若資本固定在某種產業上，一時不易收回，則輸出資本的國家，常藉口保障其投資的安全，起而干涉他國的內政。最顯著的例，是日本對南滿鐵路的投資。日人常藉口保衛其南滿鐵路的「權益」，既不允許中國建築與南滿鐵路平行的鐵路，又有絕對支配該鐵路沿線一定里數內附屬地的統治權，這破壞了中國的行政權的完整，而任日人自由壓抑。在中國，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類似的例證極多，因限於篇幅，不能列舉。

最後，「資本輸出在輸入資本的那些國度裏，影響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且異常加速了這發展，」（同上，一五三頁。）這是毫無疑問的。資本的輸入，雖能異常加速了資本輸入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這決不是說它有使資本輸入國資本主義化的必然性。因為後進國，資本輸入國的資本主義化，除了「外債」的資本輸入以外，還必須內在的必要的許多條件，何況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投資，大部分沒有集注在生產部門上面，例如：1911年英國在對其全部殖民地的投資十五萬萬五千九百萬金鎊中，六萬萬七千七百萬金鎊(41%)投資於國債及地方債，三萬萬七千七百萬金鎊(23%)投資於鐵路，剩餘的五萬萬金鎊(36%)借與工業商業及金融企業，最後金額中（即五萬萬金鎊中）三萬萬二千萬金鎊(65%)被金融與商業企業所吸收。這樣英國資本僅僅12—14%才直接參加到工業。而且這一點資本，差不多完全使用於獲得原料對金屬企業上面。最近的計算——例如1930年秋 Economist 的——也指出了同樣的情形。在外國的英國股份公司資本的極大的部分，是投放在鐵道，銀行，瓦斯，礦山及造船方面。這個事實，說明了英國資本的根本方面，不是在殖民地的工業化的路線上；反之，卻在其隸屬化，原料生產地化的路線上前進。

資本的輸出，既有擴大商品市場，確保原料的供給，獲得高率利潤，超越關稅障壁，壓抑後進國的種種「利益」因而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國間惹起了爭奪投資市場的競爭與磨擦；在另一方面，又促成了資本主義先進國，資本輸出國與後進的資本輸入國之間的衝突。除了資本輸出的市場以外，再加以對商品市場原料供給地的爭奪，迫使各資本家團體，迫使列强，進行而且正猛烈進行着瓜分世界的爭鬥。

第七節　世界之經濟的分割和領土的瓜分

市場爭奪戰的激化，迫使大資本家在國內，則高築關稅障壁以自衛（實行 Cartell 關稅政策）在國外，則採用 Dumping（傾銷）政策以侵奪市場。

國際間巨大資本的爭鬥的尖銳化，因獨佔發展的結果，致使各國的獨佔團體，都想互相協調，來分割世界市場。當某一產業部門中，僅有各國兩三個大獨佔團體在全世界起着決定作用的時候，牠們相互之間的鬥爭更加尖銳化。這時必然地要出現設法協調的企圖。此種協調，通常規定銷貨市場的分配；這締約者分得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裏面牠們可以出賣自己的商品，不怕其他締約者方面來競爭。倘在世界大戰以前，若干工業部門內就已經有了這種國際獨佔團體——國際 Cartell。

最初的國際獨佔團體之一是國際鐵條 Syndicat。最初參加的有英，德，比三國，此後法，美二國也參加了。在 1905年，Syndicat 規定各參加者的輸出額如下：英國佔39%，美國佔26%，德國佔20%，比國佔 17.5%，法國爲 3.5%。俄國在1909年也加入了這個國際獨佔團體。

其次，在電氣工業界的二大 Trust——德國的 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 Gesellschaft（略稱 A. E. G.）和美國的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略稱 G. E. C.）——構成爲二大「電氣王國」，在世界上沒有從這兩大獨佔團體完全獨立的其他的公司。

在1907年,美國的Trust與德國Trust之間,締結了關於世界分割的協定,排除了競爭。『G. E. C.』分得了美國和加拿大;『A. E. G.』分得了德,奧,俄,荷,丹麥,瑞士,土耳其,巴爾幹諸國。關於新產業部門,及侵入尚未分割的國家的『兒子公司』則締結特別的秘密契約。

煤油市場,在世界大戰前,已經分割給兩三個最大的世界的獨佔團體了。

在戰後,最大的國際獨佔團體之一,是1926年九月成立的,把德,法,比,盧森堡,薩爾地方,捷克,匈,奧的製鋼業結合了起來的歐洲製鋼Cartel。(在世界經濟恐慌期間已經瓦解。)其次為化學工業,銅業,鉛業,無線電業,鐵絲工業,人造絲工業,鋅業,紡織業等等Cartel。

大獨佔團體的國際協定,是並不牢固的。在瓜分世界的時候,每一方面依其力量的大小,都各得一份。但是,各個獨佔團體的力量是常常發生變化的。其中任何一個都不停止地在暗中進行鬥爭,設法提高牠的份兒。力量的比例一發生變化,即市場亦必隨之而重新分割一次,而每次的重新分割,一定要促成猛烈的鬥爭,所以,國際獨佔不但沒有削弱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反而使這些矛盾更加尖銳化了。

這樣,巨大的獨佔團體,相互之間,瓜分了原料,商品及投資的市場。金融資本大王之間,在經濟上實行瓜分了世界:各種資本家大團體之間,把世界分化為種種『勢力範圍』。

世界的經濟分割之後,便是領土的瓜分,即列強間在地域上瓜分世界,侵佔殖民地半殖民地。

因為『大企業家的獨佔團體的統治,便是最新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當所有的原料來源都被一手抓住的時候,這種獨佔便是堅固無匹的獨佔。』(帝國主義論同上,一九九頁。)這樣,要保證獨佔的成功,只有佔有殖民地。所以,『當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的缺乏愈覺厲害,競爭和獵取全世界的富源的鬥爭愈形緊急,那麼獲取殖民地的鬥爭也愈趨於瘋狂。』(同上。)

其次,『對於金融資本,不但已經開發的原料來源是有意義,就是可能的來源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在目前時代中,技術進步的迅速是不可思議的,今天無利可圖的土地,明天要是發明了新的方法,(為了這一個目的,大銀行可以派遣大批技師和農學家的遠征

隊去工作）或投入了大批的資本，也許就會變成有利可圖的土地了。關於礦源的開採，新的製造方法的發明，各種原料的利用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資本必然要努力擴大經濟的領域，甚至於努力擴大一般的領土，」（同上，二〇一頁。）奪取殖民地。

英國大批奪取殖民地的時期，是在1860—1880年，而在十九世紀末20年中，奪取得尤其多。至於法，德奪取殖民地的時期，却正在這年中間。……獨佔以前的資本主義，是在十九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中。如今我們知道就在這時代以後，便開始了掠奪殖民地的巨大的「狂潮」，并且異常加强了世界領土瓜分的鬥爭。所以，從資本主義到獨佔的資本主義階段或金融資本的轉變，顯然是同瓜分世界的鬥爭的劇烈化互相聯系着的。

Hobson 在他所著的論帝國主義的著作中，把1884年到1900年這一時代劃為歐洲列強加緊「擴張」（擴大領土）的時代。據他的計算，在這個時期中，「英國獲得370萬平方英里的面積和5700萬的人口；法國獲得360萬平方英里的面積和3650萬的人口；德國獲得100萬平方英里和167萬人口；比利時獲得90萬平方英里和3000萬人口；葡萄牙獲得80萬平方英里和900萬人口。各資本主義國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從1880年起）之拚命獵取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對外政策史中有目共覩的事實。」（同上，一八五—一八六頁）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世界的瓜分已經『完畢』了。自從1876年以後，六大強國（英，俄，法，德，美，日本）的殖民地領土便大規模地擴張，由四千萬平方公里而增加到六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就是增加了一倍半；增加起來的面積有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即是比宗主國的面積（一千六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大了一倍半。有三個列強在1876年時，還沒有一點殖民地；而第四個強國，即法蘭西是差不多一點也沒有到了1914年，這四個強國獲得殖民地面積一千四百十萬平方公里，即大約大於歐洲面積一倍半，人口幾達一萬萬之多。」（同上，一九六頁。）

這樣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世界的瓜分已經完畢了。

第八節　資本主義特殊階段的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發展到上述的那樣的階段，已進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了。

「帝國主義的生長，是一般資本主義的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的繼續。但是，資本主義，只在它發展到一定的很高的程度時候，才成爲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此時，資本主義的某幾個特性，已經變爲它的正反面；此時，從資本主義轉變到更高的一個社會經濟秩序去的過渡時代的各種特點，已經在各方面形成出來，並且暴露出來。在這過程中，經濟上最主要的一點，便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之被資本主義的獨佔所代替。一般地說，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的特點，而獨佔恰是自由競爭的正反面；但是我們親眼看見，自由競爭已經開始變成爲獨佔，它造成了大生產，排擠了小生產，並且更用最大的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集中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於產生了獨佔的聯合，如 Cartell, Syndicat, Trust 以及同這些獨佔聯合相結合的數十個經營數十萬萬資財的銀行的資本。同時，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獨佔，並沒有消滅競爭，卻是建築在競爭之上，而且同自由競爭並存着的，由此而產生了許多特別緊張，特別嚴重的矛盾，許多傾軋和衝突。獨佔是從資本主義轉變到更高的制度中去的一種過渡。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最簡單的定義，那麼，可以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這樣的定義，已經包括了最主要的特點；因爲，一方面，金融資本是操縱在少數最大的獨佔銀行中的，同工業家的獨佔聯盟的資本相融合起來的銀行資本；而另一方面，世界的瓜分就是從某一種殖民地政策（即是無障礙地向着未被任何資本主義列强所佔領的地域去擴張的那種殖民地政策）轉向另一種殖民地政策（即是獨佔地佔領已經被瓜分定了的地球上的那種殖民地政策）去的一個過渡。」（同上二一一——二一二頁。）

這樣，「我們給帝國主義下的定義應該包含下列五個主要的特點：

（1）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於形成了獨佔，而這獨佔在經濟生活中是起着決定的作用的；

（2）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相結合，並且在這金融資本的基礎上造成了金融寡頭政治；

（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得到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4）形成了瓜分世界的，資本家的國際獨佔同盟；

（5）在各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地球上的領土瓜分已經完竣了。

帝國主義是某一個發展階段上的資本主義，在這個階段，獨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形成了，資本輸出獲得有特殊的意義，在各個國際 Trust 之間已經開始瓜分世界，並且地球上的一切領土已經在各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强之間瓜分完了」（同上，一二三頁。）

所以我們認爲：帝國主義，不是單純的一種侵略主義，或者經濟政策，它的本質是資本主義，是發展到最高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後，一方面因爲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擴大而深刻化；同時，又因「地球上的領土瓜分已經完竣，」迫使後進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要擴大她的地盤，就不能不掠奪別國的「所有物，」從而引起了帝國主義列强的對立和爭鬥。其結果，便爆發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

本章主要參考書

伊里奇著吳清友譯帝國主義論（Der Imperialismus als jüngste Etappe des Kapitalismus. 1921）

[illegible] Varga 著[illegible]帝國主義論（[illegible]經濟研究所[illegible]合著）

Lapidus, K. Ostrovitianov 共著經濟學教程（下卷、獨佔資本與帝國主義）

R. Hilferding: 金融資本論 (Das Finangkapital)

Rosa Luxemburg: 資本蓄積論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沈志遠著: 新經濟學大綱,

張仲實譯: 政治經濟學講話。

第十五章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的尖銳化

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俄國的「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Allgemeine Krise）的開始。

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的戰爭。第一個集團是協約國，加入者有英，法，意，俄，美，日，比利時，塞爾維亞等國。第二個集團是德國領導下的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等國。

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商品市場，投資市場，以及原料供給地，必然地要引起戰爭。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表現在1900前後英法兩國的尖銳的對立。1903年英法協定的結果，埃及劃歸英國，而法國則獲得摩洛哥。此後，國際間最尖銳的對立，轉化爲英法對德國的對立。

德國資本主義，雖出發較遲，但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各國間發展的不平衡，德國曾經飛躍的驚人的發展起來，牠一躍而爲第一等工業強國，變爲英法兩國的大敵人。但是，這時世界已經瓜分盡淨了，殖民地已經被佔據完了。德國所得的，只有一些剩下的殘羹。於是德國決心要用武力來重分已經被瓜分了的領土，擴張自己的殖民地。牠瘋狂地在準備戰爭。然而英法却不願意讓出它們已經佔據了的地盤，也拚命地準備戰爭。它們又想奪去德國及其同盟者的珍饈。這樣，英德兩國，在非洲，小亞細亞，巴爾幹等處，引起了嚴重的衝突。德法對摩洛哥，非洲的競爭，法國爲奪取來因河流域與亞爾沙斯，洛林兩省。俄國爲巴爾幹半島上的領導權，爲了君士坦丁堡和奧地利，意大利爲了要獲得亞得里亞海的優先權，爭取地中海的霸權，美國要干涉歐洲，擊破競爭者。日本則欲獨霸遠東。這些國家，更因

德國的「三B政策」而更加强化了與德國的摩擦。所謂「三B政策」就是 Bagdad Railway（Berlin, Byzantein, Bagdad）政策，鐵路線是柏林——巴爾幹經過康士坦丁堡連結 Bagdad 及波斯灣。此項計劃第一對英國在埃及，波斯，印度的「權益」不利；第二和希臘及地中海東半部的法國利益有損；第三影響波斯及高加索的俄國權益；第四給予康士坦丁堡問題及接近地中海的英法俄的三國權益以極大的威脅。

這樣，由於巴爾幹的危機及塞爾維亞問題，終於激成了1914年夏開始的空前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對於人類的勞動力曾加以空前未有的摧殘。一切參戰國家徵調入伍的人數，共有六千二百餘萬。在戰爭中死亡的約有一千萬人以上，受傷而終身殘廢的人數，達二千四百餘萬之多。1913年，全歐共有人口四萬萬零一百萬人；到1919年中期，假定不發生戰爭，按照普通天然的增長率，應達四萬萬二千四百五十萬人，但在事實上，僅有三萬萬八千九百萬人。所以，由於大戰的原故，歐洲竟喪失了三千五百五十萬的人口，或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九。同時，這些被犧牲的，主要的是參戰各國的優秀勞動力，其損失之多，實無可比擬。

其次，經濟上的損失，也達到了空前的驚人的高度。世界大戰的費用，約達一萬萬二千萬萬馬克，那時參戰各國所有的財富，也不過二萬萬四千萬萬馬克而已。所以，大戰吞沒了歐洲好幾代人民辛苦勞動積蓄下來的財富的一半。此外，間接的損失，更無從計算。在軍事行動過程中，住宅，農場，鐵礦，煤井，城市與工業區域，等之廣大的區域，被毀滅了。自大戰開始後，各國生產都大減而特減。軍需品的生產，急激膨脹，佔據首要的地位。機械和設備用具的生產縮減了，消費品的生產也縮減了，民衆的消費水準，降到最低的程度。各國都實行糧食專賣制，限制勞動大衆的消費，而有錢的人，儘可購得無限數量的任何東西。勞動大衆，許多送到前線去當「肉彈」，僥倖留在後方的，則因勞動時間的延長，勞動的强化，及其他一切勞動條件的惡化，還受無窮盡的痛苦。反之，資本家，尤其是軍火商，以及為「國防」工作」的重工業資本家，都交了紅運，利潤穀穀上升。奸商，投機者，都大發橫財，變為所謂「軍事暴發戶」。

這樣，世界大戰加深了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鴻溝，使勞動者階級更加赤貧化，使小資產階級沒落，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尖銳到極點，在大戰中及戰後，勞苦大衆的革命鬥爭的猛烈化，就是因爲這個原故。在這些革命鬥爭中，俄國的「十月革命，」首先衝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

第一節　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對立與矛盾

第一項　蘇聯的出現和戰時共產主義

爲什麼勞苦大衆的革命，最先在俄國找到出路呢？

因爲，「在俄國會展開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領導這一革命的是革命的勞工大衆，勞工大衆有着飽受地主剝削和壓迫的巨量農民大衆，可做他們有力的同盟者。因爲在俄國反對革命的乃是最醜惡的帝國主義的代表——沙皇主義，牠喪失了任何道德，是民衆的共同仇敵。」（約瑟夫語）

「俄國的勞苦大衆，受了幾十年革命鬥爭的鍛鍊，同時又有以伊里奇和約瑟夫做領袖的鐵般的多數派的指導，因此他們在歷史上首先擊潰了帝國主義的力量，而創造了工人的國家。」（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座三版五六九——五七〇頁。）

獲得了政權的勞動者階級，爲滿足勞動者農民大衆渴望和平，土地和麵包的要求，爲保衛和鞏固已得的勝利，一方面跟德奧同盟國方面單獨媾和，締結伯列斯特（Brest）和約，退出對勞動大衆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帝國主義大戰場；同時，更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土地國有，和徹底改善工人生活。這種以消滅人對人的剝削爲目的的「十月革命，」當然就受了廣大的勞動民衆的大歡迎，但在別一方面，同時就引起了國內舊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進攻。這樣，從1918年夏季起，爆發了國內戰爭。捷克斯拉夫人和高察克的叛

亂（1916年六月）國內反動份子的暴動（在莫斯科耶羅斯拉佛爾及其他許多城市）對共產黨重要人物的恐怖手段（刺殺烏羅達斯基和烏里茨基等等刺傷伊里奇等）就被一連三地扮演着出來了。「內亂」一起，接着又是英法日等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在1919年秋，內亂外患的嚴重性已達到了最高點：在北方的阿爾漢格爾斯克，爲英國人所攻陷，同時彼得格勒則爲白黨尤鄧尼契的軍隊所挾制（由愛沙尼亞攻入）；鄧尼肯直逼奧列爾而進逼都拉，莫斯科；比蘇茨基則進逼基也夫。這樣，剛誕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已被頑强的反革命勢力四面重重包圍住，和平建設的可能已被破壞無餘。蘇維埃的當前唯一急務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去爲保衛革命，保衛國家，而抵抗外來侵略和國內叛亂。

可是這時留在蘇維埃政權掌握中的，只有一小部分舊俄羅斯的領土。……再加上俄羅斯境內的全部工業和農村經濟，在四年的大戰中本已破壞無餘。內戰和外患相繼過來，更使國民經濟無法好好整頓。在這時候，全國所感覺的糧食不足，燃料不足，原料不足，以及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不足，已經達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

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爲了要盡量地保證軍隊和國家以必要的糧食和軍火，爲了要使很少的一點物質積蓄得能最合理最經濟地予以利用，蘇維埃政府對全部資源就需要極精確的計算和極慎密的分配。這時對於國內所有的一切生產品，均須規定嚴格的會計制。由國家實行嚴格的有計劃的分配，勿使資源爲私人所操縱而發生絲毫浪費的現象。這就是所謂「戰時共產主義」("War-Communism")

因此，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並非別的，只是在加强壓搾資本主義集團的制度之下，爲着國防的目的而實施的一種合理消費的組織。」（所謂加强壓搾資本主義集團，意即沒收和强制收買資本家階級的私產。）不但對城市的資本家，亦且對鄉村的富裕份子，都採取這種沒收或强買的政策。國家把所有這一切物品都集中在自己手裏，按照一定的標準實行嚴格的分配。一切的商業都被禁止了。農民的穀物收穫，除了自家所必需的一份外，其餘的全部充公，交給國家。這時勞農大衆忍受着國內戰爭和帝國主義

干涉的極度痛苦，但是爲了要撲滅和根絕布爾喬亞地主的勢力，他們祇也樂於承受這種創痛。

「這樣，全部的國民經濟都嚴密地組織起來爲一個最高目標服務了。這個最高目標便是爭取對反革命作戰之最後勝利。不論是生產，分配或消費，都受着這一目標的支配。全部生產物的分配，都是集中的。」（沈志遠，張仲實編著二十年來的蘇聯，四三——四六頁）

這樣，蘇維埃政權，運用着「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鎭壓了國內反革命的勢力，擊退了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鞏固了農民勞動大衆的專政制。

但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因爲在四年的國外戰爭之後又繼續了三年的國內戰爭，致使蘇聯國民經濟，顯示出一般惡化的狀況。戰爭中兵士和平民的死亡（估計總數不下一千六百萬人）耕地面積的激減，工業生產的急激衰頹，交通運輸機關的破壞，金融的大混亂，物價的暴漲，嚴重的糧食恐慌，在在都刺戟着蘇維埃政權迅速講求善後的辦法，何況「在「戰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唯一目的——保證紅軍的生活條件，集中全部物質力量以撲滅反革命，——業已達到的時候，再繼續實施這種政策的話，在蘇聯這樣一個小農經濟佔優勢，經濟技術水平一般地落後的國度裏，只會有百害而無一利。原因是很明白的：最重大的原因是佔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小生產者，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將毫不關心，反正除自家消費過的多餘農產品，是不歸他們所有的，他們何必多多生產。第二個重大的原因，是當政的勞工階級自身的能力尙還弱，它無力自己經營事業而把資產階級及其知識技術人材完全拋棄在一邊。第三個原因是：蘇聯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低，爲恢復生產力計，不得不部分地與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合作。講到這裏，「戰時共產主義」之必需結束，已瞭如指掌了。」（上揭書五三——五四頁）結束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而採用的新政策，就是新經濟政策。

（A）新經濟政策

約瑟夫說：「新經濟政策是勞工國家的一種特殊政策，它容許資本主義的存在，而以勞工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為前提，它預計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成份的鬥爭；預計到社會主義成份的作用，犧牲了資本主義成份而自行增長；預計到社會主義成份對於資本主義成份的勝利；預計到階級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報告的結論，轉引自上揭書六三頁。）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糧食徵派制被糧食稅制所代替了。即實物稅代替穀物的強制徵收，并准許剩餘穀物可能自由買賣，私人可能經營小工場和商業，也許可土地的租佃和工資勞動的使用。但是，這決不是資本主義的復活乃至開倒車退回到資本主義。因為在新經濟政策下，蘇維埃國家掌握土地，全部大工業，銀行等金融機關，交通運輸事業和全部對外貿易，因此，蘇維埃國家，掌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保持着對全國經濟的統一的計劃的可能性，從而可能使殘留下來的一些分散的中小經濟，轉化為社會主義的成份。所以，從根本上說來，新經濟政策的實施（1921—1926年），既不是單純的退却，更不是屈服於資本主義，乃是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暫時以退為進，準備着將來（極短期的將來）的大飛躍的一種必需步驟，所以約瑟夫批評托洛斯基等說：「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季諾維埃夫說，新經濟政策大半是表示退却。這些說法當然是不對的。實際上新經濟政策只在開始的時候表示退却，可是它預計到在退却的過程中，改變力量的對比而實行進攻。」（列寧主義問題一四六頁。轉引自上揭書六七頁。）

新經濟政策的作用，在於利用實物稅（糧食稅制）而促進了農民發展自己經濟的積極性，努力增加自己的生產。自此政策實行後，耕地面積就開始漸次增加；人民所需要的糧食，工業所需要的原料，都增加起來了。這就造成了復興工業的物質條件。在帝國主

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時期破壞無餘的國民經濟，不久就開始復興了。例如『在1921—22年度，實施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工業生產已有高漲的趨勢。例如該年度鑄鐵生產較1920—21年度增加了48%；紡織品生產總值1920—21年度為145,904,000盧布（戰前價格），而1921—22年度已增加到282,724,000盧布，即增加了一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煤礦業。從1920—21年到1921—22年，煤的採掘量由四六四百萬普特增加到五八八・八百萬普特，即增加了二六・八%。頓河流域的煤產量增加到更快，由二八四百萬普特增加到四〇五・四百萬普特，即增加了42%。』（上揭書，七五——七六頁）

農產物也在增加，這可從下列的表上看出來：

技術農作物播種面積的增加狀況表（單位一千公頃）

類別	1913年	1926年
馬鈴薯	3,063.6	5,205.3
向日葵	968.7	2,589.2
大麻	645.0	927.6
亞麻	1,398.0	1,566.4
煙草	62.4	94.2

只有棉花和製糖甜菜兩種，播種地面積較戰前稍少。（同上七八頁）

這樣，在新經濟政策下，蘇聯農工業的生產，到了1926年，即已超過戰前的水準了。下列的統計表，即其證明。

農工業生產額的指數

農業	工業	合計

1913年	100	100	100
1918年	76	23	54
1921年11月	54	30	44
1924年五月	84	67	77
1926年七月	106	104	105
1927年八月	106	114	112

這樣，因爲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就完成了經濟恢復的基本任務。

但是，在經濟的領域，在1927—28年，蘇聯依然是農業國家。在生產價值總額中農業卽佔51.3%，工業僅達48.7%。（這個狀態，戰前差不多沒有變化。戰前農業佔57.9%，工業佔42.1%。）加以工業的製品主要是消費資料；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必須仰給於輸入。例如在工業生產的價值總額中生產手段僅佔27.2%，而消費資料方面的製品卽佔72.8%。這不能不使當時的蘇聯在經濟上依靠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情勢下，假如遭遇着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絕交的打擊，說不定會抑壓着蘇聯的技術的經濟的進步。何況沒有重工業的基礎的國防，在繼續不斷的反蘇聯陰謀之前，不能不使人感着非常的不安。

其次，在當時，資本主義的殘滓還相當的多。工業生產的12%，在私人手中，工業勞動者的17%，還被剝削者雇用着。尤其重要的，在農業方面，私人的部分還佔優勢。共約二千四百萬的農場，還有更加細分的傾向。其中貧農佔七百萬，中農佔一千六百萬，富農佔一百萬。富農約有10%的土地，他們至少剝削着四分之一的農業人口。這樣，在當時的蘇聯，我們不能不承認資本主義還有恢復的可能性。在這裏，蘇聯經濟必須加以大大的改造，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故從1928年十月起，蘇聯當局，經過許多次愼重考慮與審議之後，開始實行五年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簡稱五年計劃。

（B）五年計劃（第一次和第二次）

五年計劃的任務是甚麼?約瑟夫告訴我們說:「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在於把蘇聯及其落伍的,往往是中世紀式的技術移到新式的技術軌道上。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在於把蘇聯從一個農業的和弱小的,依存於資本主義國家奇癖怪想的國家,變爲一個工業的和强盛的,完全獨立而不依存於世界資本主義奇癖怪想的國家。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在於把蘇聯變爲一個工業國,徹底排斥資本主義的份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的戰線,創造消滅蘇聯各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在於在蘇聯創辦一種工業,這種工業不僅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把整個工業加以重新裝備和改組。而且也可以把運輸事業和農業,加以改裝和改組。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在於把零小分散的農業改造爲大規模的集體經營,以便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經濟基礎,因而消滅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可能性。

最後,五年計劃的任務,是在於創辦盡量提高蘇聯國防能力所必要的一切技術和經濟上的前提,爲的對於外來一切武裝干涉的企圖,對於外來一切武裝侵犯的企圖,給以堅決的抵抗。」(1933年一月間在聯共中委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轉引自上揭沈張共著書的八四——八五頁)

第一次五年計劃發表實行後,資產者代言人,都說這種計劃是夢想,是不能實現的騙人的計劃。但是,蘇聯工農大衆的埋頭苦幹,不僅實現了這個計劃,而且在四年裏面完成了五年計劃。

「第一次五年計劃執行的成績怎樣呢？

四年裏面，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分——工業，交通，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合作社——的投資，共達五百零五萬萬盧布。其中投入工業的有二百五十萬萬，投入農業的有九十七萬萬盧布。

在四年之內，工業生產總值，從一百八十三萬萬增至四百三十三萬萬盧布，卽增加了兩倍多。跟帝俄時代（1913年）比較，則增加了三倍多。

在四年裏面，機器製造增長得更巨，計達四倍半，而跟戰前（1913年）比較，則竟增加了十倍。

在五年計劃諸年間，蘇聯創辦了好多簇新的工業部門，或把舊有的簡陋生產，加以改造而成為新式的。

重工業發展的更大。……在四年裏面，重工業的生產額，增長的最多，計達兩倍半。

工業巨大發展的結果，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意義，也顯著地改變了。在1928年時，工業產額計佔國民經濟生產總額百分之四八，而農業佔百分之五二。到1932年，工業產額已達百分之七十，而農業僅佔百分之三十。這並不是說，蘇聯農產品的數量是減少了（反之，數量是增加了，）而是說農產品在全國生產品總額中的比重減少吧了。

資本主義經濟，從沒有像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這樣發展的快。……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平均每年的生產增加率為百分之二二，而資本主義國家，不論那一個，其生產的增加率在其最繁榮之年，都沒有多於百分之五——八以上。

從五年計劃執行的成績看來，蘇聯在一個很短的歷史期間，在技術經濟的關係上，就可以趕上乃至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第一次五年計劃執行的結果，蘇聯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業已大大地增加。1928年，蘇聯的工業生產總額，僅佔全世界生產額百分之四·七；到1932年底，已達百分之十四以上。1928年美國的工業生產，比蘇聯要多十倍；到1932年中期，僅多二倍半。1928年，就工業生產總額說，列在蘇聯前面的，除美國外，還有德國（百分之一一·六，）英國（百分之九·三，）及法國（百分之七。）到1931年中

期，列在蘇聯前面的，在歐洲僅有德國，其產額（百分之一一・九）僅比蘇聯（百分之一一・四）多半分；到1923年，德國連英法一樣，也落在後面了：德國的產額，僅有百分之一〇・一，法國僅有百分之九・七。在1931年下半年，因有許多新式巨大的工廠開始營業，蘇聯的產額就已經超過德國。所以，就出品的數量說，蘇聯工業在1932年就佔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了。」（同上，八六—九一頁。）

這樣，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下，蘇聯已經很迅速而順利地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了。

蘇聯總生產中工業和農業所佔的百分比（1926—27年的價格＝100）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工業	53.1	54.5	61.6	66.7	70.7	70.4
農業	46.9	45.5	38.4	33.3	29.3	29.6

蘇聯的工業化的進展，不僅表現在工業生產的比重的急激增加上面；同時，更表現在生產手段部門（第一部門）和消費資料部門（第二部門）的推移上面。

蘇聯大工業生產中生產手段部門和消費資料部門所佔的百分比（1926—27年的價格＝100）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生產手段部門	49.7	48.5	52.6	55.4	57.0	58.0
消費資料部門	53.3	51.5	47.4	44.6	43.0	42.0

（上列二表均引自Varga著大恐慌及其政治的結果，日譯本二一六——二一七頁）

大工業生產中生產手段部門的急激發展，不但造成了工業化的前提；同時更促進了農業的機械化和集體化，鞏固了蘇聯國防的物質基礎。

其次，以農業來說，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眞發生了空前的革命。「在1927年時，全國農戶加入集體農場的僅有百分之〇・八。他們的播種，僅當全國播種百分之〇・七。到1930年已有百分之二三・六的農戶，加入集體農場。他們的播種，已佔全國的百分之三〇・九。此後集體化的運動，更一日千里。1931年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戶，已有百分之五二・七，他們的播種已佔百分之六三。1934年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戶，已有百分之七一・四，他們的播種已達百分之八七・四。現在蘇聯全國農戶百分之九十已經集體化，他們播種的面積已達百分之九八・二。因此可說，蘇聯農村已經整個的集體化了。」（同上，九二頁）如以絕對數來說，1928年的集體農場僅有三萬三千三百個，但到1934年的第一季，即已增至二十三萬三千五百個。這樣，二十三萬個集體化的大農場代替了一千六百萬個農民小農場。（前揭 E. Varga 著書：二二二——二二三頁）

「隨着集體化的成功，蘇聯的農業在大體上也已經機械化了。……到1934年底，蘇聯農村經濟中所有的農業機，耕種機及載重汽車，共值三十七萬萬三千一百萬盧布。在1935年裏面，還新辦了八百四十三所農業機器站，設立了一千八百四十架電氣打穀機，四百二十八所耕種機修理廠。在1936年新辦的農業機器站又有五百七十五所，連以前的算上，合計已達五千餘所，播種的面積達百分之八十。」（前揭沈，張二氏共著書：九六——九七頁）農業的機械化，機械耕種的優越，更刺戟着中農貧農加入集體農場。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急激發展，弱化了，甚至消滅了私人經濟的作用，而迅速趨向農業的社會主義化。

自第一次五年計劃提前一年完成後，從1933年起，蘇聯又實施第二次五年計劃，到1937年底爲止。第二次五年計劃，是蘇聯國民經濟更加巨大發展的五年計劃，是蘇聯生產力更加空前增長的五年計劃。

要使生產力猛烈發達，就必需工業，農業等生產部門機械化；要使國民經濟一切部門有機械，就需要有可以製造機械的金屬。因此，第二次五年計劃規定，到末了一年，金屬的產額，須比第一次五年計劃最後一年所生產的，差不多要多三倍。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第四年度（1936年，）這一計劃不但已經完成，且已超過，這使蘇聯的機械製造業更向前推進了一步，而機械製造業則是改造國民

經濟一切部門的鎖鑰。

所有這些，使全部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在1937年底即可依期完成。農村經濟所得的耕種機，比1932年要多三倍多，割打複合機要多兩倍。運輸事業所得的機車，要多三・四倍，車箱要多五・三倍，汽車要多八・四倍。輕工業和食物工業，則可得巨量的新式機械和零件，兩者的生產額，增加得更巨。1937年蘇布的產額，比1932年要多四・六倍，皮鞋要多二・五倍，糖要多三・二倍，肉要多二・八倍，罐頭要多三・三倍。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工業生產的增加率規定爲百分之一六・五。這一增加率，雖然比第一次五年計劃平均每年的增加率要少些，但它表示，國民經濟的這種蓬勃發展，只有在蘇聯才可能，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是萬難不到的。而且要知道，每年百分之一六・五的增長率，表示着生產數量增長的急劇加大。因爲第一次五年計劃末了時，增長率的每分爲三萬萬八千壹百萬盧布，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告終時，則爲八萬萬二千五百萬盧布。在第二次五年計劃諸年間，蘇聯工業生產增長的迅速，從此就可想見了。到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時，蘇聯全部工業生產的增加，跟1932年比較約爲二・四倍；工業生產總額，超過戰前的水準，至少當在七倍以上。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更展開了龐大的建設工作，創辦了許多新的工廠，電廠，鐵道，熔鐵爐和城市。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用於各項新工程的費用，要達一千三百三十四萬萬盧布。第一次五年計劃中用於開辦新企業的費用，不過五百零五萬萬盧布而已。我們在前面看到，這已經是破天荒的建設，然而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新的建設還要多兩倍有餘呢。

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和一般經濟的生長，對於交通運輸事業提出了嚴重的要求。所以，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各種運輸事業都有特別廣泛的展開。

改造了並敷設了許多重要的鐵道線，如貝加爾・阿穆爾線，阿克莫林斯克・卡爾塔線，莫斯科・頓巴斯線，卡拉干達・巴爾哈

什綫烏發·馬格尼線等等。到第二次五年計劃終時，機車的數目，將從一萬九千五百輛增至兩萬四千六百輛；車箱的數目，將由五十五萬二千輛增至八十五萬輛。

這樣，在經濟和技術關係上，蘇聯於1936—37年，就好多最重要的經濟部門而論，已佔據歐洲第一位，就有些部門而論，已佔世界第一位。

社會主義建設的猛進，不僅表現在工業及交通運輸事業方面，在農業方面，也已經有顯著的進步。

蘇聯已結束了農村經濟的落後性。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在大體上已經完成。1937年，播種面積百分之八十，已是用耕種機耕種的。穀物收穫機械化的，已達百分之六十，打穀機械化的已達百分之八五。肥料的廣泛運用和農藝學的提倡，也在在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所以，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收穫總額，大大的增加。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農村經濟的全部生產，（二百六十二萬萬盧布）跟第一次五年計劃（一百三十一萬萬盧布）比較，約增加了兩倍。荒地的開墾，播種面積的擴張，收成的提高，是農業生產額激增的主要因素。其次，飼畜業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也已有急激的發展。這表現在：馬，牛，猪，羊羣的激增；肉類，牛奶，牛油，羊毛的豐富供給上面。（以上參照沈張二氏合著二十年來的蘇聯，一〇七——一三〇頁。）

這樣，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執行期間，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在一切經濟部門，都表現出空前的驚人的進步。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突飛猛進，不但在根本上改造了蘇聯的國民經濟，從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從分散的落後的農業轉化為集體的機械化的大農場農業經營；同時，非常發達的重工業，及在此物質基礎上極其鞏固的蘇聯國防，更粉碎了，粉碎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反蘇陰謀。

第三項　社會主義勝過資本主義

這樣，「經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勝利完成，蘇聯已經變成了一個經濟上獨立的國家了。許多舊日要從外國輸入的貨物，今天已在國內製造，而且反而向國外輸出了。這種經濟上的獨立，保證它自己的經濟及供給國防以一切必需的技術軍備，復次從生產技術方面，從工業生產所具有的新技術裝備程度方面，固然可以證明蘇聯的工業已佔了世界第一位，而且從它的發展的速度方面來說，更可證明蘇聯的工業已經佔了世界的第一位。如果把蘇聯工業發展的速度和戰前水平作百分比，並把這個速度來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的速度比較一下，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情形。

	蘇聯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1913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933年	380.5	108.7	87.0	75.4	107.0
1934年	457.0	112.9	97.1	90.4	99.0
1935年	562.6	128.6	104.0	105.9	94.0
1936年	732.7	149.8	114.2	118.1	98.0
1937年	816.4	156.9	121.9	129.3	101.0
1938年	908.8	120.0	113.3	131.6	93.2

蘇聯的工業與戰前水平比較起來，已增加了九倍以上，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則停滯不前，只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如果以1937年下半年所開始的新的經濟恐慌來說，資本主義國家生產之低落，和社會主義生產之急速提高，更可以顯示

出來。在蘇聯，「1938年所有工業的出產量較之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一一・三，較之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增加百分之四七七；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1928年的工業生產較之前一年減少百分之一三・五，較之1929年的水平，降低到百分之九。」」（許滌新著：飛躍突進的蘇聯工業載中蘇文化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紀念特刊一〇六頁）

其次，假如把蘇聯的工業生產量來和資本主義世界底工業生產量作一番比較，也可能看出社會主義要勝過資本主義。

「最近五年來兩個世界底工業生產發展（%）

	蘇聯	資本主義世界
1929年	100	100
1934年	239	77.6
1935年	296	85.9
1936年	385	96.3
1937年	428	103.5
1938年	477	91.0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在過去的五年間，蘇聯的工業生產較1929年增加了四・七七倍，而資本主義世界則於1937年稍稍超出1929年的水準之後，到1938年內於新的經濟危機到來，又降到1929年的水準以下。這又充分地證明社會主義的蘇聯經濟底發展是一直向上的，它不知道有危機這回事，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則不斷地有危機底光顧。」（沈志遠著廿二年來蘇聯經濟發展之基本途徑，中蘇文化同上五八頁。）社會主義勝過資本主義，於此又得一證明。社會主義的蘇聯，爲什麽會勝過資本主義世界呢？因爲：

第一，在蘇聯，決沒有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內在的最基本的矛盾，）國民經濟的一切

部門，都是有計劃地指導活動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冗費，競爭，廣告，錯誤的投資，週期爆發的經濟恐慌，及因此而發生的種種損失，在蘇聯是決不會有的；

第二，在蘇聯，可能極有效地集約地利用一切生產手段。例如：在資本主義世界，假如每週利用生產設備至四十八小時，則稱爲一班作業。」但在蘇聯，每日工作七小時，換班三次，一週共百四十七小時。例如英國的棉業，有紡錠五千二百萬個，在1932年，每週利用五十九小時，只運轉了三千九百九十萬紡錠，即一週共利用十四萬萬小時。但在蘇聯，普通每週利用百四十七小時，故每週要作業七十六萬萬二千萬小時，卽當英國的五倍以上。因此，如以蘇聯普通一般的利用程度來工作，則英國的纖維工業，可能生產全世界棉製品總需要的一倍半；

第三，在蘇聯，沒有各種各樣的寄生蟲——資本家，地主，食利者（Rentner）僧侶，奴僕，使女，娼妓等等——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奢侈浪費等等；

第四，蘇聯沒有失業者，沒有勞動力的廢棄和浪費的現象；

第五，蘇聯的勞動者，都有崇高的政治覺醒，他們都自覺着生產上的連帶責任。在這裏，決沒有資本主義的冷酷的階級規律，工頭制度等等。社會主義的競賽，突擊隊的制度，多數勞動者的道德的壓力和名譽觀念的刺戟，使蘇聯勞動者的生產能力，較之資本主義的要優越許多倍。

就是因爲這些緣故，蘇聯國民經濟的發展，在幾年內便「趕上乃至超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了。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後蘇聯的出現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雄飛猛進，一方面把從來的資本主義世界分裂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對立的不同的體系，而構成爲資本主義總危機（Allgemeine Krise）的主要內容；同時，它的出現和進步，還有下例的種種嚴重意義：

（一）證明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眞理性，和社會主義可能先在一國勝利的理論的正確性；

（二）帝國主義列強，因爲它們喪失了蘇聯那樣廣大的原料，銷貨，投資的市場，一方面激化了它們彼此之間的市場爭奪戰；同時，更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之間的不能解消的深刻矛盾；

（三）激動了而且還激動着：帝國主義國內的階級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國際間大規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總括，蘇聯的出現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猛進，不能不引起它跟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尖銳對立，以及千變萬化的種種反蘇聯陰謀。

第二節　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種種矛盾

第一項　凡爾賽和約遺留下的禍根

戰敗國德國被迫簽字（1919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凡爾賽和約，是協約國把最苛刻的條件，加在德帝國主義者身上，使它永世不得翻身的重壓。和約的結果：第一，德國損失了本國領土二萬五千方哩（約當歐洲屬地的13%）人口六百萬（戰前人口的12%），法國奪去了亞爾沙斯洛林，東部一大部分土地併入波蘭，還有一部分割與丹麥和比利時了。此外，薩爾區域則劃歸國聯暫管。第二，英法日瓜分了戰前一百萬方哩的德國殖民地，（人口一千二百萬）喪失了全部海外財產。領土的喪失，使德國損失了煤礦的19%，褐炭礦山的16%，鐵山的74%，亞鉛生產的68%，熔鐵爐的53%，輪轉機械的16%，亞鉛鑄造所的60%，耕地約14.3%。第三，交出一千六百噸以上的船隻給協約國。此外還有嚴格的軍備限制，和一千三百二十二萬萬馬克的賠款。

其次，奧匈帝國也被分割，在其原來的領土上成立了奧大利，匈牙利，捷克一部分則劃給意大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奧大利變成只有一個大城市（維也納），面積三萬二千方哩，人口六百五十萬，而又無後方區域（Hinterland）的小國，匈牙利則土地人口差不多減去了一半。

保加利亞除賠款四萬萬四千五百萬金元以外，並將1912—13年巴爾幹戰爭所佔的土地全部交出，國境縮退到1912年以前的地方。

英法意希分割了舊土耳其的許多領土，致使土耳其變成小亞細亞的一個小國，被逐出歐洲的舞台。

但是，戰敗國決不是從此就被壓服毫不抵抗的。德國資本主義，在國內則儘量剝奪勞動大衆，在國外則利用戰勝國——英，法，意，美，日——各國間的矛盾，在戰後七——八年間產業又恢復到戰前的水準，又從新提出帝國主義的種種要求，強化了它和戰勝國方面的矛盾。

在別一方面，戰勝國的意大利，雖已取得Trentino——即所謂意大利未恢復的地域（Italia irre-denta）——South Tyrol和Dalmatia的一部分，但仍不滿足，於1920年更自塞爾維亞奪得Fuime。但意大利總因要求實行1915年四年倫敦條約的秘密規定（分贓的規定）而未得英法之允諾（因若實行則對於塞爾維亞與希臘二國即不免引起困難，法國更不消說了；）加以戰前的小國塞爾維亞變成一個相當巨大的國家——南斯拉夫（Yugoslavia），更引起意大利的不安，深恐戰前塞人要求自由出海的野心重復抬起頭來。意大利的不滿和不安，更激化了歐局的不安和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尤其是德意對英法的矛盾。

最後，凡爾賽和約，一方面使日本獲得太平洋上以前屬於德國的島嶼，增加了許多海軍根據地，更攫取了德國在華「權益」，對中國作進一步的侵略；一方面又宰割俄國，如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都是由舊俄帝國領土的一部分造成，割了一部分領土給波蘭，同時，協約國更組織「反蘇十字軍」直接武裝干涉蘇聯，幫助白俄暴動反對蘇聯政府。這些都是「和約」的傑作。

這樣，標榜着『民族自決』自稱和平解決國際糾紛的凡爾賽和會實際上就是戰勝國方面的分贓會議，因此而成立的和約（及國際聯盟）不但不能解決國際糾紛，反而包含着無數的矛盾，這些矛盾一方面使和約本身不久即陷於破產的地步；一方面更播下了戰爭的種子，遺下嚴重的禍根。

第二項　戰債和賠償問題的糾紛

（A）戰債問題

大戰時協約國方面的戰費，直到1917年四月美國對德宣戰爲止，差不多是由美國一國籌備的。美國參戰後，爲自己籌備戰費，爲救濟協約國方面嚴重的財政危機，便頒佈了自由公債法（Liberty Bond Act），前後發出四回公債，共計169萬萬美元。依據最初的規定，美國借給協約國方面的戰債，限於30萬萬美元，但僅此決不能應付急需，故以後又將貸款限度擴張三次，限定爲百萬萬美元。在停戰當時，協約國方面欠美的戰債，共達八十一萬萬七千百九十七萬美元。停戰後，歐洲各國瘡痍滿目，政治經濟非常混亂，澎湃着革命的危機。美國資本家，深恐歐洲政局激變影響到它的『權益』，因此又只好出動去『救濟』歐洲。這樣，美國在歐洲的債權，超過了百萬萬美元，這差不多完全是協約國和戰後同盟國從美國購買軍需品和糧食而欠下來的。最大的債務國是英國，其次爲法，意，比，沙俄，波蘭的順序。英法等強大國家從美國借來的黃金，大部分不用作本國的戰費，卻轉借給其他的小國，致使債權債務關係非常複雜化。英國從美國借入 200萬萬馬克，同時又放款 440萬萬馬克給別國。法國從美國借入 170萬萬馬克，從英國借入 130萬萬馬克，却轉三分之一以上放款給各小國。如能照實數清算，則英國應有 250萬萬馬克的債權，而法國和意大利則各有 180萬萬馬克和[illegible]萬萬馬克的債務。但是，英國除了對法意的放款以外，對其他各國的貸款 250萬萬馬克（帝俄的[illegible]以上）差不多不能收回。

最大的損失，要算對沙俄的 150萬萬馬克的放款。法國的情形也是這樣。在總債額 120萬萬馬克中將近一半是對沙俄的放款。故當作債權國的英法，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歐洲的強大國家，一方面有 270萬萬馬克以上不能收回的債權，而一方面對美又不能不支付 500萬萬馬克的戰債。這不能不引起戰債問題的糾紛。

英法等債務國方面的見解：第一，認為戰債是為有利於展開戰爭的補助金，是共同拿出的戰費，（跟其他軍需品一樣，）因而沒有償還的必要；第二，戰債和德國賠償有必然的關聯，假如德國不拿出賠款則英法等國不能償還戰債，不然，龐大的戰債負担，必使產業無從發展。

反之，美國方面的見解：第一，認為戰債只是美國的一種投資，而且還是利用自由公債通過一般市民募集來的零碎投資的累積；故在對內政策上，在借錢必還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則上，歐洲各國無論如何必須償還戰債；第二，戰債和德國賠款是各不相關聯的兩回事，因而堅決反對把這兩者聯在一起解決。

這樣，以戰債問題為中心，引起了美國和歐洲債務國方面，尤其是美國和英法之間的嚴重糾紛。經過了許多次商談折衷的結果，債務國方面不再提出賴賬的論調，而美國也默認乃至明白表示戰債和德國賠款，必須互相關聯解決。

協約國對美雖是債務者，而對德却是債權者，故為償還戰債，把自己從德國取得的賠款交去就行了。這使它們差不多不用自己的錢卻能償還債務。故最後決定如何分配德國賠款的標準，就是獲得賠款者對美所付戰債的多少。這樣，債務國只是一個輸血管，它替美國起着吸收德國民衆膏血的作用。

（B）德國賠償問題

德國的賠款，就是德國勞動大衆為德帝國主義者野心的失敗而被大量榨去的膏血。

德國的賠款，本來規定總額為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馬克。到1924年，實行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規定德國於最近數年每年須付二十五萬萬馬克。到了1926—27年，德國財政狀態惡化，不能支付1928—29年度的賠款；更因德法之間萊茵撤兵問題的爭執，迫使國際聯盟在1928年十二月不能不開專門委員會決定善後辦法。終於在1929年放棄道威斯計劃，改行楊格計劃（Young Plan），規定德國在五十九年之內，每年平均須付賠款十九萬萬馬克。但當實行這個計劃的時候，世界經濟恐慌，已日益深刻化，而德國財政又瀕於危機。1931年三月德奧成立關稅同盟，使德法關係愈趨惡化。法國吸收赤金的政策，使德國金融界感受極大的威脅。在這種情勢裏，奧大利終於在五月發生金融恐慌，立即波及德國，致使馬克猛跌，赤金外溢，資本逃避。

德國財政的破綻，使德國當局向英美兩國求救，美國大總統 Hoover 宣言戰債和賠款緩付一年。這樣楊格計劃僅僅實行了一年零十月，自1931年七月起又實行美國大總統所提的 Hoover Moratorium。（胡佛緩付戰債賠款案）

1932年夏季，Moratorium 滿期，關係各國在瑞士召開洛桑會議，最大的結果，是各國允許德國賠款減至30萬萬馬克。但是，就是這個數目，德國也無力交出；同時，還更附帶有以美國減債為前提條件。

1932年滿期的對美戰債，英國雖實行償還，而法比諸國則拒絕還債。法國提議減債，美國反對；美國提出的戰債全付案，也遭法國拒絕。債務國都期待着1933年六月十二日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可以解決戰債賠償問題，但開會後美國始終不把這個問題提出討論，因而這個會議也無結果而散會。這樣，這個問題，迄今仍未解決。

這個問題為什麼不能解決呢？根本原因是賠款總額太多，德國無力交出。戰後民窮財盡的德國，要拿出一千三百餘萬萬馬克的賠款，除了不大可靠的借款以外，主要是從貿易出超想辦法。犧牲勞動大衆的產業合理化，固然減少了德國商品的生產費，促進了它的輸出，但與世界經濟恐慌和各國的高關稅政策，*閉塞了這條出路，致使德國經濟惡化，常常瀕於財政的危機。

因為戰債賠償問題：（一）在世界經濟上，第一，使美國資本藉此支配歐洲；第二，阻止資本之國際的流動（因債務問題作梗，）

妨礙世界貿易的發展（因債務國欲由出超解決債務，傾銷的結果，反而激成各國關稅一再提高，）因而顯示出世界資本主義的種種矛盾；

（二）在國際政治上，第一激化了美國對債務國的矛盾，尤其美國利用戰債和賠償問題，積極干涉歐局，更使英美，美法之間的矛盾越加尖銳化；第二激化了英法德意等國之間的矛盾，尤其因為賠償問題，德法國交，再三瀕於非常嚴重的危境（法軍佔領魯爾，萊茵撤兵的糾紛等等。）

這樣，戰債賠償問題的糾紛，確是引起戰後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對立和深刻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項　美國經濟和日本經濟的大發展

（A）美國經濟

「世界大戰根本改變了戰勝國陣營裏面的力量對比。美國在大戰中，獲利最大，因為他沒有大規模地參加軍事行動，但是他在供給軍用品上，卻獲利不小。於是結果，在鷸蚌（尤其是德英）相爭中，美國獲得了很大的利益。參戰各國的自己的力量，都不能滿足戰時煤炭，生鐵，鋼，糧食，石油，布匹等等日益增加的巨量需要。這些巨量的東西，只有求之於美國。同時，南美，亞洲各處的農業國家，銷售工業品的市場，都閒空起來。從前英，德及其他歐洲各國，把工業品輸入到這些地方去；現在這些國家已經談不到任何的出口。所有這些，便引起了美國工業的突飛發展。結果，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個國家。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因世界大戰之故，遂由歐洲移至

* 尤其在戰債和對德投資的關係上，對於賠償問題的解決及德國經濟的復興，有最大的利害關係的美國，正是世界上最高的保護關稅國，這一點顯示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矛盾。

美國。

在1905年的時候，美國農業品和原料的出口共為十萬萬元；工業品的出口僅有四萬萬六千萬元。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工業，會突飛地發展起來。1914年，牠的工業產額，共計有二百四十二萬萬四千六百萬元，到1918年已達六百二十五萬萬八千萬元。

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紡織品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銅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煤鋼的產額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鋅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石油的開採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

從1913到1918年，海洋船舶建築艘數，增加十倍多；汽車的產額，增加了兩倍多。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變成了一個輸出工業品的工業國。1915年，牠製造品的出口，達二十萬萬零七千二百萬元，消費品和原料的出口，僅有十四萬萬零八百萬元。

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農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從1913到1918年，牠的糧食收成，約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牲畜的數目增加得更多。」（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五七九——五八〇頁）

這樣，大戰的結果，激增了美國的財富和威力。美國資本參加到歐州的大銀行，Trust, Syndicat，監督它們，并使其服從自己。戰後美國的發展，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各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從歐州，從英國移到美國來了。美國的猛進，促使英國的勢力漸次墮落。戰勝國的英國，無力恢復它的舊勢力，它漸次衰老，漸被美國壓服下去。美國在1929年度的生產，較之戰前的水準增加了75%；而英國在這個年度的生產，僅僅達到了戰前水準的98%。在1913—1927年，世界貿易上美國所佔百分比增加了4%；而英國却遞減2%。在資本輸出方面，美國也追過了英國，就是在英國的殖民地也好，美國也在開始驅逐英國。例如在加拿大，美國的資本幾達英國的兩倍。

在資本主義世界，英國的落後衰老，美國的勃興，和它奪去英國的霸權，一方面顯示出美國在戰後的新作用；一方面激化了英美間的矛盾，構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帝國主義列強間矛盾的中心。

（B）日本經濟

世界大戰，又使日本帝國主義變爲戰爭的「暴發戶。」大戰中德國的退出遠東，日本的競爭國的無暇東顧，使日本帝國主義獨佔遠東市場，趁機打劫，（强奪德國在華「權益，」提出窮兇極惡的二十一條等等。）

大戰中日本商品市場的突然擴大，使日本工業生產物的總價格從十三萬萬七千萬圓增至六十七萬萬三千八百萬圓，即約增五倍。

世界大戰中日本工業的發展（百萬圓）

	1914年	1919年	1919年對1914年的增加的%
纖維工業	620	3295	532
食料品工業	219	740	343
冶金工業	48	238	496
機械工業	110	716	651
化學工業	175	776	443
鑛山業	147	614	436

大戰中，下水船舶噸數，也從六萬五千噸增加到六十一萬二千噸，即約增十倍。

其次，大戰中日本貿易的出超：

1915年　　175百萬圓

1916年	371
1917年	567
1918年	294
合計	1,407百萬圓

日本除了獲得十四萬萬餘元的出超以外，輸送商品的船舶的運費收入，和對華投資，也獲得了許多利潤。這樣，1914年日本僅有赤金三萬萬四千萬圓，到了1919年即增至二十萬萬圓，即激增六倍。在此總額中，有七萬萬二百萬圓藏在日本國內，十二萬萬九千八百萬元存在海外銀行，此外，日本還借款給別國，（到1918年初借與協約國方面的放款，約有五萬萬圓，）甚至還放款給英國使用。

如以日本全國的國富來說，大戰中，其總價格即從三百二十萬萬圓增至八百六十萬萬圓，即增加二倍半以上。1914年收二十六萬萬圓的國民所得，到1919年則增至一百六十萬萬圓，即激增了四倍。這些都告訴我們大戰中日本經濟的發展，是怎樣迅速的。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及戰後美國經濟和日本經濟之飛躍的發展，顯示出幾種重要的意義：

1. 這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好例；
2. 美國代替英國，掌握着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
3. 在世界市場上英美資本對立的尖銳化；在遠東方面，英，美，日列强對立的尖銳化。

這樣，美國和日本的崛起，改變了戰勝國陣營裏的勢力比例；激化了英美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根據上列三項的說明，可知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列强間的矛盾，因爲（一）凡爾賽和約遺留下的禍根；（二）戰債賠償問題的糾紛；（三）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的衝突更加深刻化尖銳化了。

第三節　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

世界大戰，給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工業的發展一個刺戟。在大戰期間，宗主國的工業，都忙於製造軍用品，沒有餘裕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供給工業品。於是這些地方的工業，便如雨後春筍似的一天天增加了起來。

例如在大戰中及戰後印度工業的發展，有如下表：

	鐵（千噸）	鋼	機械消費（百萬馬克）	棉紗紡錠（萬）
1913年	207	32	139	608
1920年	316	159	——	676
1924年	891	340	225	792
1926年	789	457	——	851

紡織業的平均供給量，從戰前的28%，增加到戰後的61%。煤的產額，1914爲16,465千噸，增至1918年的20,722千噸。黃麻（Jute）工業的發展，也非常顯著。

其次，以澳洲來說，工業上所使用的原動力，在1912年爲三十九萬二千馬力，1917年即增至五十六萬馬力，1920年再增至七十四萬二千馬力。

資本主義所經營的加拿大農業的穀類生產，在1913年耕種面積爲14,315千 Hectare，1918年即增至20,811千 Hectare；總收穫價額，也從553百萬美元增至1,3[illegible]8百萬美元。因此，貿易從1914年的入超 87百萬美元，轉換到1918年的出超 575百萬美元，1924年的出超 15[illegible]百萬美元。

在大戰中，南非洲的皮革工業增加二倍，硝皮工業，和牛乳製品，也急激增加。洋灰的生產，超過本國的需要，煙草，火柴，肥皂，酒，都可能用本國製品來供給。

南美的工業，也有同樣的急激發展，尤其是阿根廷等國工業的發展，最爲顯著。

中國的工業，也在大戰期間及戰後的幾年內，也有顯著的發展。例如從1913年到1926年棉紗紡錠數，從832千個增至3,246千個；煤產量從1913年的一千四百萬噸增至1923年的二千二百六十萬噸，生鐵的產量也從1913年的二十七萬噸增至1919年的四十五萬噸。

這些事實，都可以說明在大戰期間及戰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業發展。

但是，因爲帝國主義者要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能獲得經濟的獨立，因而要阻止這些地方的重工業的發展，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工業的發展，帶一種不健全的畸形狀態。

殖民地半殖民地工業的發展，雖然要受許多的壓迫和束縛，但不可避免的，它一定要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使帝國主義和這些國家的利益發生直接的嚴重衝突。

其次，在大戰期間及戰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剝削，曾經大大的加強，它們想犧牲後者來彌補其損失。宗主國大規模徵發殖民地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即其例證。

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強化，不能不引起這兩者之間的尖銳矛盾。蘇聯革命的勝利，土耳其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四—十六年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更激動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激化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深刻矛盾。

印度，埃及，巴力斯坦等處的反英運動；敘利亞，摩洛哥，安南的反法運動；阿比西尼亞等處的反意運動；菲律濱的反美運動；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以及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尤其是反日運動等等，形成爲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決不可能妥協解決的深

烈矛盾。

第四節　結語

根據上面三節的說明，可知：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後，世界已劃為兩個對立的體系——社會主義的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蘇聯的出現，構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個基本要素；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突飛猛進，引起了它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尖銳矛盾。這是第一個基本的矛盾。

第二個基本矛盾，是德意對凡爾賽和約的不平不滿；是戰後帝國主義列強間爭奪霸權（英法爭霸歐州大陸，英美爭霸海洋，意法爭霸地中海，英美日爭霸太平洋）的鬥爭；是美日經濟之飛躍的發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戰勝國陣營裏面力量對比的變化及其矛盾。

第三個基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及其尖銳化。

這樣，在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不能不顯示出：千變萬化的反蘇聯陰謀；一天天越加緊張尖銳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的鬥爭；風起雲湧的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致使戰爭，革命，經濟恐慌，構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階段的主要內容，越加威脅着資本主義的生存。

本章主要參考書

F. L. Bogart: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the Great World War.

J. M. 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E. Varga: 大恐慌及其政治的結果 (Die Grosse Krise and ihre Politischen Folgen-Wirts haft and Poitik. 1928 -1934).

I. Lapitus, K. Ostrovitianov; 經濟學教程（獨佔資本——帝國主義）

沈志遠張仲實編著二十年來的蘇聯。中蘇文化（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二週紀念特刊）

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

沈致遠著新經濟學大綱。

杜德 (Dutt) 著張弼等譯世界政治。

張琴撫，張健甫共著國際問題講話。

張弼著：世界知識讀本。

金仲華等著：現代十國論。

第十六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階段

第一節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

第一項 第一時期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時期，是歐洲大戰初停到1923年的時期；是經濟混亂和革命高潮的時期。

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因為救濟戰後極端的物資缺乏，在1919—20年短期間中曾顯現出一些好況，但因民衆購買力的激減，在1920—21年又陷於深刻的經濟恐慌。在1921年，世界的煤產量，僅達戰前的79%，鋼的生產僅達戰前的57%，銑鐵也僅達73%。世界大戰所引起的生產力的大破壞和一般的荒廢，阻止了生產的順利發展。商品供給的不足，軍隊的退伍，復興事業資金的巨額支出，促成了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惡性通貨膨脹，一方面激化了經濟恐慌；同時，更促進了小資產階級的沒落，加重了勞動大衆的負擔。

跟生產，商業及金融部門的混亂同時並進的，是勞資兩大階級的殘酷鬥爭和革命的高潮。

1918年一月，在芬蘭爆發革命。在沙俄1917年的「十月革命」，衝破帝國主義的陣線，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蘇聯。1918年十一月，在奧國與德國，都發生了革命。奧德兩國的君主專制統治，被推翻，德皇威廉亡命到荷蘭。1919年三月，在匈牙利爆發了革命。1920年九月，意大利爆發革命。1923年九月，在保加利亞發生農民革命。但因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外有美國資本和別國的援救，內有社會民主黨的幫助，卻壓迫了民衆的革命運動，擊潰了他們的反抗。1923年，德國的資產階級，又戰勝了革命的民衆。故第一時期的革命高潮，大

半是以德國勞動大衆革命的失敗而暫時告一段落。

第三項　第二時期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二時期，是以歐洲勞動大衆革命的失敗為出發點，到1927—28年的時期。這是資本主義相對的安定和資本主義的攻勢的時期。

在第二時期，資本主義漸次脫離戰後的經濟混亂狀態，生產和商業漸次上昇到戰前的水準。在各國，雖各有不同的波動，然而像前一時期那樣的混亂狀況，普通是沒有的。

在這個時期，美國超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的生產，在1925年卽已超過戰前水準的45%，1928年竟超過了50%。在歐洲，法國的工業，在1925年卽達戰前水準的108%，1928年約達130%。德國在1927—28年卽達戰前的水準，而且還超過了一些（約5%）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英國沒有超過戰前的水準。（1925年英國的工業生產僅達戰前水準的87%，在1929年才漸次達到戰前水準，以後又再降低。）總之，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各國的總生產已經增加，超過了戰前的水準。資本家的代言人，看見這種「好況，」便興高采烈地大叫：資本主義已經恢復了健康，資本主義又踏進向上發展的軌道上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決不存在，它是非常安定的了。但是，鐵面無私的事實，卻揭發了資本家的代言人的黑幕，前證明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安定，只是局部的相對的安定。因為：

第一，在第一時期後歐洲各資本主義國的生產和財政的好轉，主要是靠美國資本的「援助。」但是，這個援助，同時就意味着在金融上歐洲各資本主義國之隸屬於美國資本主義的「安定，」一方面激化了戰勝國相互之間的矛盾（因為在金融上隸屬於美國的歐洲各國，總想脫出美國的圈套）一方面激化了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矛盾。在美國資本的援助下，稍稍恢復了自己的經濟狀況的德國又起而爭奪市場，要求殖民地。德國的「復興，」激化了德國與英法之間的，尤其是德法之間的矛盾。戰債賠償問題的糾

紛，就是這些矛盾的一個表現；

第二，在第二時期各國經濟的恢復，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非常不平衡的。（美國發展最快，法國次之，德國又次之，英國更次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改善，在經濟上只有恐慌，在政治上只有戰爭（伊里奇）恐慌和戰爭的威脅，不能不使第二時期資本主義的安定，只是一種相對的局部安定；

第三，資本主義安定的相對性，更顯現在資本主義總危機階段的基本矛盾的嚴重化上面，即顯現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猛進及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的尖銳化上面。蘇聯經濟的雄飛猛進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尤其是1925年來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使資本主義的安定更不確定；

第四，在第二時期，資本的攻勢，以及因此而激起的勞資鬥爭的猛烈化（例如：1926年英國七十萬礦工的全國大罷工，）也是使資本主義只能獲得相對的局部安定的一個原因。資本主義內在的這個矛盾，因所謂產業合理化而更加深刻化。

產業合理化是什麼？產業合理化，是由生產過程的整理或改良，或由勞動時間的增加，勞動力的強度使用，因而想藉此增加利潤。加強對勞動者的剝削的方法。E. Varga 曾說：「合理化包含有兩個方法。廣義的說來，合理化，是某種特殊企業的，或投放在工業的某種特殊部門的全部資本，為增加利潤而採取的一切手段。……但是，現實的合理化，是剩餘價值率的增加。這從勞動的生產力及其強度的增加可以獲得。即由良好的組織術節省勞動時間，或由減少工資，延長勞動時間——簡言之，縮短製造一定量的商品所需的時間，——榨取程度的單純的強化而增加剩餘價值率。」(Varga: "The Problem of Rationalising British Industry", Labour Monthly No. 4, Vol 10)

所以，狹義的現實的產業合理化，就是在加強勞動者的剝削而達到增加利潤的目的。這樣，產業合理化的方法有二：（一）改良生產手段，調整勞動過程，提高勞動的生產力，減少必要勞動，增加剩餘勞動而增加相對的剩餘價值；（二）延長勞動時間而達到增

加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目的。

例如：採用流水式不眠不休的勞動方法（即所謂 Fleissarbeit），裝置迴轉帶（Laufendes Band），輸送帶（Fleissband, Conveyer）等等，一方面使勞動簡易化，迅速化；一方面又使勞動集約化，毫不休息地繼續工作。譬如在美國的福特(Ford)汽車工場，輸送帶（Conveyer）約有一英里長。這從粗糙原料到汽車完成爲止，前後連結一起，任何勞動部分，毫不休息。其結果，由五千個部分構成的一部汽車，十二分鐘即可裝好。這樣，在產業合理化政策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商品的產量，激增了起來。

本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的復興方法，主要的第一是加强獨佔組織，第二就是所謂產業合理化。這兩個方法相輔而用，起着極大的作用。例如：產業合理化之所以在德美兩國非常發達，不能不說是這兩國的獨佔資本早熟和比較發達的原故。此外，德國產業合理化之所以盛行，是因爲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比較更加迫切，以及利用產業合理化來減少商品的生產費，促進貿易出超以達到彌補賠款的支出的目的。

產業合理化在英法日本等國，都相當流行，替資本家增加了不少的利潤。

資本主義的產業合理化，是資本的攻勢的主要手段。高度的機械化和勞動時間的延長，減少了勞動者的僱傭。例如在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非常發達的國家也好，在戰後甚至還有百分之九乃至十八的失業者存在。在德國，工業勞動者在戰前有一千七百萬人，1924年減至九百九十萬，1927年減至一千四百十萬，1930年只有九百二十萬人。英國從1920年到1930年間，失業者數不下百分之六乃至百分之八。

第二，產業合理化後勞動簡易化單純化的結果，促進了婦女勞動者的使用。

第三，產業合理化更降低了勞動者的工資。假如戰後勞動的生產效能，在最强大的資本主義國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則工資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即在戰後經濟情形最好的時期，也沒有達到戰前的水準。直到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爲止，歐洲

各國的工資，普通是在戰前的水準以下。在1927年，德國的工資約達戰前的95%，英國約達90%，法國僅達80%。只有美國，在這個期間只超過了戰前水準的30%，然而勞動的生產效能，卻高出30%以上。這就是實質的工資降低。

第四，產業合理化所引起的勞動的強化，不眠不休的勞動（所謂 Fleissarbeit），釀成了生產上許多的慘事，勞動者在工場內傷害和疾病的增加，就是勞動者為資本家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所付的代價。

這樣，產業合理化雖然提高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增加了資本家的利潤；但在別一方面，失業者的增加和實質工資的降低，反而相對地減少了勞動大衆的購買力。生產力和消費力的不平衡發展，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之間的矛盾，反而因為產業合理化的實施與進展而更加深刻化，在這裏就播下的經濟恐慌的種子。

第三項　第三時期

大約從1928年以來，戰後資本主義，即已發展到了第三時期。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超過了戰前的水準，在各國和各種經濟部門，流行着技術的經濟的合理化，Cartell 和 Trust 等獨佔組織急激發展，發展到國家資本主義的傾向也很顯著。

在1928年，美國超過戰前的水準50%，法國超過30%，德國只超過5%，到了1929年在許多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仍在繼續發展。跟隨生產的發展，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獨佔組織，也在急進。

其次，國家資本主義化的傾向也相當顯著。其具體表現為國營及公營各種企業的發展，國家對 Trust 及各銀行的活動的干涉，以及國家與私人的獨佔組織，國家財政和私人企業的融合等等。

大金融資本的威勢的激增，一國的猛進和別國的落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增加所引起的市場爭奪戰，在在都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矛盾。產業合理化所促成的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更加激化那個矛盾。資本主義內在的各種矛盾的加深和尖銳化，及因此而擴

發的經濟恐慌，就毀滅了資本主義的相對的安定。

第二節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

第一項　經濟恐慌的一般狀況

世界經濟恐慌的兆候，在1929年已經現出來了。產業恐慌，在1929年初席捲波蘭，羅馬尼亞和巴爾幹各國之後，從1929年末開始，又襲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的美國，把它捲入非常猛烈的經濟恐慌的狂潮裏面。多年以來，許多的資本代言人，都謳歌美國的繁榮是永無止境的。但是，1929年以來的經濟恐慌，却無情地駁斥了這種無恥的邏輯。

跟別國比較，直到1929年末爲止美國生產的急激發展，是和資本主義內在的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同時並進的。這第一表現在勞動大衆購買力的激減上面。因爲資本的攻勢在最後的時期非常猛烈，勞動大衆的生活水準，因工資減少和失業增加而急激降低了。跟這個矛盾相關聯而漸次成熟了的經濟恐慌的各種前提條件，暫時被交易所有價證券的騰貴和交易所的投機隱蔽着。這就在短期間中發生了「繁榮」的錯覺。證券交易所歸張着的「繁榮」不但不能預防恐慌，反而加深了恐慌。1929年十月以後，直到現在繼續騰貴着的股票市價，就開始慘跌了。大規模的交易所恐慌擴大了，在幾個星期裏面，交易所證券價格，慘跌六、七百萬萬美元之多。美國的交易所恐慌，波及到歐洲各國的交易所，在這裏也引起了有價證券的慘跌。

跟着交易所的恐慌，就發生產業的萎縮。其結果，1930年初的美國生產，降低到1927年的水準，到1930年末更加降低了。（僅達1928年的水準的75%）

跟隨美國生產的降低，其他各國的生產也減少了。產業恐慌又波及日本，更蔓延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1929年末，尤其從1930

年初開始，西歐列強的生產也萎縮了

各國生產指數表（1929＝100）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美國	100.0	80.7	68.1	53.8	64.9
英國	100.0	92.4	83.8	83.8	86.1
德國	100.0	88.3	71.7	59.8	66.8
法國	100.0	100.7	89.2	69.1	77.4

這個表證明資本主義世界之工業生產的跌落非常猛烈；衰落的最低點爲1932年，那時生產總額和1929年比較，竟減低了三分之一。僅到1933年，主要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才略有起色，但是該年的產額，比經濟恐慌以前的1929年仍低四分之一。其次，這個表更證明了經濟恐慌對資本主義各國的打擊，輕重各個不同，其在各國的影響，也非常的不平衡。恐慌的打擊，不但在各國不同，而且在各種產業部門也不平衡。例如在工業裏面，生產手段部門所受的打擊，比消費資料部門的更加猛烈，這從下表即可證明。

世界工業生產指數（1928年＝100）

	1913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生產手段部門	69	110	96	82	62	75
消費資料部門	81	105	98	91	89	96

E. Varga: 大恐慌及其政治的結果（Die grosse Krise and ihre politischen Folgen—Wirtschaft and Politik 1928—1934,）日譯本五〇——五一頁。

這樣，在1932年世界的銑鐵產額（蘇聯除外）比1929年的要少68.5%，鋼產額要少46.8%。此外，煤，石油，造船，汽車，機械，化學等等工業，也激減了。

生產的激減，製造出無數的失業者。在1926年，資本主義各國的失業者本已有一千三百萬乃至一千四百萬人之多，在恐慌期中，失業者激增到四千餘萬人，在城市，在鄉村，都塞滿了為飢寒所迫的失業者。失業者增加的結果，壓低了勞動者的工資。「依據公式的統計，美國每月平均工資的降低，較之1928年的水準達到了35%，在同一期間英國降低15%，德國竟達到50%。」這樣，「在經濟恐慌諸年間，整個勞工階級所得的工資總額，都大減而特減，美國資本家於1932年付給工人的工資，僅當從前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三三，德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經濟恐慌三年間，曾縮減了二百六十萬萬馬克。」（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六二一頁。）除了工資減少以外，社會事業資金（社會保險金，失業補助金等等）也激減了。無疑的，這使勞動大衆的生活更加惡化。

失業的增加，工資的降低，弱化了勞動大衆的購買力，從而使商品越加過剩，引起商品價格的暴跌。恐慌期中主要資本主義國的物價變動，有如下表：

批發物價指數（1913年＝100）

年平均	德	法	英	美	日本
1929年	137	127	127	137	166
1930年	125	113	107	124	137
1931年	111	102	89(a)	105	116
1932年	97	87	86	93	132(b)
1933年	93	81	87	94(c)	136

（a）1931年九月起通貨膨脹。

（b）1931年末起開始通貨膨脹。

（c）1933年四月起通貨膨脹，

其次，從1928年到1932年爲止的物價降低百分率（每年平均）德國爲32%，法國爲36%，英國爲31%，美國爲31%。（以上數字根據 E. Varga 著前揭書六一——六二頁。）

但是，物價的跌落，在各種產業部門之間是極不均等的。大獨佔資本支配下的商品，利用它巨大的經濟勢力，可能維持着較高的價格。這反映在獨佔價格常較自由價格要高的事實上面。這由下面的一個表中就可以看出來。

Cartell 所規定的物價自由規定的物價

年　份	德國（以1926年爲100）		奧國（以1923—31年爲100）		波蘭（以1928年爲100）	
	Crrtell價格	自由價格	Crrtell 價格	自由價格	Crrtell價格	自由價格
1928年	102.1	106.8	——	——	——	——
1929年	105.0	97.4	99	100	107.7	93.6
1930年	103.1	79.7	96	87	108.9	80.9
1931年	93.6	60.8	91	76	107.8	63.8
1932年	83.9	47.5	93	73	106.1	52.5
1933年	83.9	48.3	94	73	94.8	48.8

不過在好多情形之下，經濟恐慌的壓力，比獨佔的聯繫來得利害。當物價紛紛暴跌的時候，獨佔團體本身也就瓦解了。（與仲貫

譯，前揭書，六三〇頁。）

生產的縮減，物價的暴跌，必然要使各種企業的利潤減少，增加他們的虧損，從而在經濟恐慌期間，各國的破產企業，都大增而特增了。這從下表即可看出。

各國企業破產數目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美國	22,909	26,355	29,288	31,822	17,732
英國	5,900	6,287	6,818	7,321	4,927
德國	9,846	15,486	19,254	13,966	3,718
法國	6,092	6,249	7,200	9,014	8,362
波蘭	516	815	738	545	259

（同上，六〇六頁。）

信用恐慌本來早就與日俱增着。與銀行有關係的企業的破產，資本主義各國國家預算的困難，利潤的減少和虧損的增加，以及股票價格的暴跌，在在都準備了信用恐慌在1931年中的猛烈爆發。因生產縮減和物價暴跌的結果而發生的工業破產，生產品的無法脫售，存貨的失却價值等等，定要使信託關機紛紛破產。信託機關的破產，對工業界又要造成種種困難，而引起工業破產的新浪潮。

信用恐慌，最先是爆發在奧與德國，約在1931年春季，奧國有一家最大的銀行（該行握該國全部工業之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就破產了。此後德國有好幾家規模宏大的工業企業，也相繼破產。1931年六月間，德國位列第三的一家大銀行（達那斯特銀行）及另一家規模宏大的銀行（德列斯登銀行）也都宣告破產。」（同上，六〇七頁。）德國的金融恐慌，轉瞬就波及英國。1931年九月，英

國總於不能克服金融恐慌而放棄了金本位，開始通貨膨脹。英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和英國經濟有密切關係的一些國家，都跟着脫離了金本位制。（日本在1931年末也放棄了金本位。）美國在1933年初也因爲金融恐慌的深刻化，再也不能維持金本位了。這樣，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在經濟恐慌的狂潮裏面，完全被摧毁了。

放棄了金本位的國家，利用它那較低的匯價，即利用本國貨幣對外價值的降低，在世界市場上實行猛烈的「匯兌傾銷，」想藉此「克服」恐慌，彌補自己的損失。但是，一國的傾銷，却遇着別國提高關稅的堅強答覆，因而就開始了貨幣戰爭，關稅戰爭等等。在這種情勢裏，世界市場不得不一天天狹隘起來，而世界貿易也跟着更加縮小了。這從下面的數字就可以看出。

世界貿易（單位十萬萬舊美金）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輸入	34.7	35.6	29.8	20.8	14.0	12.5
輸出	32.8	33.0	26.5	18.9	12.9	11.7

（E. Varga 著前揭書八六頁。）

其次，經濟恐慌引起了工農大衆空前未有的窮困，激減了糧食和原料的需求，縮小了農產物的銷路。而銷貨市場極度縮小的結果，便使農產物的存貨，像山一樣的堆積起來。

農業品的世界存貨（每年四月）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美棉（千包）	2,879	3,870	7,000	9,930	11,174	9,236
小麥（百萬 Bushel）	497	518	600	584	526	483

砂糖（千噸）	6,190	6,125	8,453	9,091	8,903	8,046
茶（百萬磅）	260	210	242	213	276	251
咖啡（百萬袋）	15.4	37.5	31.1	36.9	26.9	——
樹膠（千噸）	245	426	547	646	646	673

（同上，一〇五——一〇六頁。）

農產物的堆積，銷路的減少，不能不引起農產物價格的暴跌，這從下表就可以看出。

主要工業原料的價格（每公斤所值的金法郎）

	棉花	黃麻	樹膠	生絲	大麻	大豆
1929年	214	79	243	51	180	29
1932年	66	27	33	13	74	12
1933年	87	28	65	16	90	11

（同上，一〇四頁。）

此外，咖啡，可可，茶等等嗜好品的價格，都暴跌了。『在經濟恐慌期間，世界市場上小麥批發價格就跌了百分之七十；棉花，咖啡，毛類，跌了兩倍多。似乎城市的消費者，因此而獲益不淺，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知道，商品落在消費者手中，要經過數十家的販賣商和批發商的手，他們聯合起來成立規模宏大的獨佔團體，不許零售物價跌落。在經濟恐慌期間，大多數資本主義國的零售物價，稍跌落得很少，而在有些國家裏面，甚至是增漲（例如在德國。）但是和農民來往的是批發商，因此他不得不以非常低廉的批發價格出賣自己的產物，這種價格往往補貼種子和農具的費用都不够，至於所費的勞動是更不用說了。』（張仲實譯前揭書，六二六——六

二七頁。）這樣深刻的農業恐慌，不得不引起農產物的生產減少。這第一表現在耕種面積的縮小上面。

資本主義世界工業原料的耕作面積（單位百萬 Hectare）

	1929—30年	1930—31年	1932—33年
甜菜	2.22	1.96	1.77
煙草	2.42	2.42	2.07
棉花	33.62	30.88	29.13
黃麻	1.39	0.76	0.87
大麻	0.47	0.35	0.27

（E. Varga 著前揭書，一〇四頁。）

農業恐慌，第一，引起了農業的退化：農業經營的粗放化，農業機械的減少，人造肥料的使用激減，家畜的減少及其質的降低，收穫的減少等等，即其明證；第二，惡化了農民的經濟狀況。例如：

（一）由農產物和工業製品之間的剪狀價格差額所引起的農家收支關係的惡化。

農產物和工業製品的價格差額

	美國（1909——14年＝100）			德國（1913年＝100）		
	A農產物價格	B工業品價格	B對A的比率(%)	B農產原料	A工業完成品	B對A的比率(%)
1929年	138	152	91	—	—	—
1930年	117	144	81	—	—	—

1931年	80	124	68	111	136	82
1932年	57	107	53	97	118	82
1933年	63	109	58	93	113	82

（E. Varga 著前揭書，一〇六頁。）

（二）農家破產和負債的激增。

在農民裏面，遭受農業恐慌的打擊最重的，要算貧農和中農。經濟恐慌，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赤貧化，它加速了農民的階級分化，使成千成萬的農民淪爲無產者，因而激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

這就是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的一般狀況。

第二項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的特殊性

顯然的，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是因生產過剩而發生的恐慌；這跟一切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同樣，是由於資本主義內在的基本矛盾——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之間的矛盾，而引起的。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生產的過剩，就是這個基本矛盾的現象形態。

1929年的恐慌，是戰後最初的世界經濟恐慌；這是包含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及其附屬國家）一切經濟部門，席捲全世界（蘇聯除外）的經濟恐慌。這雖有一般的性質，但經濟恐慌在各國發生發展的時期和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其次，1929年的恐慌，決不是過去的恐慌之單純的反覆，它是在各種新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因而它有和過去的經濟恐慌不同之點。那麼，1929年經濟恐慌的特殊性在那裏呢？約瑟夫告訴我們說：『現今資本主義國家裏邊的經濟恐慌，和以前歷次經濟恐慌不同的地方，就在此次爲時長久而拖延。以前歷次經濟恐慌，至多只是一兩年而已，但這次經濟恐慌已至第五年，仍在繼續年復一年地

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從中榨取以前所積蓄下來的肥油。毫不足奇的，這次經濟恐慌是歷次經濟恐慌中最嚴重的一次。」那麼，1929年的經濟恐慌爲甚麼會拖延這樣長久，這樣嚴重呢？其原因：

「第一是由於工業恐慌毫無例外地包攬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使一國一旦失去了他國的手臂，竟至無用武之地。

「第二是由於工業恐慌跟農業恐慌錯綜在一起，農業恐慌毫無例外地包攬了一切農業國和半農業國，以致不能不使工業恐慌更加複雜，更加深刻。

「第三由於農業恐慌在這個時期內一天天加强，包攬了各門農村經濟，連牧畜業也在內，致使農業經營衰落，捨棄機械，而改用徒手勞動，用馬來代替耕種機，並使人造肥料的應用暴減，甚至完全放棄不用，因之，這使工業恐慌更加拖延下去。

「第四由於在工業中居統治地位的獨佔加特爾 (Cartell)，竭力維持高度物價，此種情形遂使經濟恐慌更加棘手，而阻礙着存貨的消散。

「第五是由於——這是頂主要的一項——工業恐慌爆發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之下，這時，不論在主要的國家，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沒有而且也不能夠有像牠在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前所有的那種力量和堅固性；這時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繼承帝國主義大戰的遺產，還是企業開工率慢性不足，都有着成千成萬的失業者，無法解脫。」（約瑟夫著，轉引自張仲實譯前揭書，六〇四——六〇五頁。）

這就是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如此拖延，如此嚴重的原因；同時，也就是那次恐慌的特殊性。

第三項 「克服」恐慌的種種嘗試

生產過剩的恐慌，迫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毀棄堆集如山的過剩商品，來提高價格。這樣，在恐慌期間，各國都流行着毀棄商品的辦

法，想藉此「克服」恐慌。例如：「在美國1933年，一千萬 Lectare（約當全面積的四分之一）的棉花，剷倒在土中。巴西每年要燒毀一千萬袋咖啡（約當每年的世界需要量），或者把它拋在海裏，或使用於街路工事。茶也不摘，樹膠也不要取。在倫敦，滿船滿載的廣柑，拋棄在海裏。1933年秋，美國政府買五百萬頭猪來屠殺了。丹麥每週要屠殺一千五百匹牛，用牛肉來製造肥料。……這樣的例，此外還有許多。」（E. Varga. 前揭書一三四頁。）一方面有賣不出去的堆積如山的商品，毫不顧惜的加以毀棄；一方面卻有飢寒交迫的勞動大衆。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矛盾！

商品的大量毀棄，仍舊不能解救恐慌。資產階級於是又從破壞生產力，限制生產上想辦法。「勞苦大衆血汗所造成的生產機關，利用的程度很小。熔鑛爐和煉鋼爐，煤井與鐵鑛，機械製造廠和紡織廠，大半都停頓着。用最新技術設備的企業，也都關門大吉。投入這些企業中的巨額資本，都白白地丟掉了；企業本身則因停頓而日益毀壞。開工的各廠，大半都開工不足。……1932年十二月間，美國開工製造汽車的機械，僅有百分之十一，鋼鐵廠機件使用的僅有百分之十三。同年同月，德國全部工業的開工率，曾跌至百分之三十六；重工業的開工率還要小呢。

美國於四年內拆毀的鎔鑛爐，曾有六十座。在1931年，完完全全拆毀的，每年可產七十一萬噸鋼的煉鋼爐，有十二座；拆毀的展鋼機也有十二架。德國拆毀的熔鑛爐，有二十三座，煉鋼爐有三十八座。資本主義各國拆毀機件的堆置場數目，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關於這類的消息，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可以找出好多來。」（蘇仲實譯前揭書，六一四——六一五頁。）這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框子，已經容納不下日益膨脹的生產力，資產階級只好「削足適履」似的破壞生產力，限制生產，來解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限制生產，仍難「克服」深刻的經濟恐慌。在這裏，資產階級又拿出一件「法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雖能多少刺戟企業的活動；但是，這種政策的實施，一定會減低勞動大衆的實質工資，因而要弱化國民的購買力，反轉增加商品銷售上的困難。在這種窮策俱窮的窘境裏面，資產階級忽然看見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在計劃經濟下顯示出一日千里的飛躍發展，它們就「東施效顰」似的也來一

個什麼「統制經濟」。

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在根本上既不能剷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更不能消滅經濟恐慌的根源——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之間的矛盾。反之，統制經濟的發展，却促進了國家財政和私人金融資本的溶合；加強了獨佔資本的支配作用，從而激化中小生產者的沒落，勞動大衆的赤貧化。其結果，國內外市場愈趨狹隘化，階級鬥爭越加尖銳化了。在這樣的情勢裏，資產階級不得不改變他們的統治方法。「有話大家說」的議會政治，現在已經時代落後了，不中用了。這樣，代表着巨大資本的利益，以獨裁，强壓，「統制」愚民政策，對外侵略等等爲能事的法西斯蒂政治，就風靡一世了。

國內市場的縮小，迫使資本家不得不去進行爭取國外市場的殘酷的鬥爭。大資本家利用它們在本國（這由高度的關稅率保衛着）獲得的超過利潤，獨佔利潤乃至國家的補助金來作爲補償，在國外市場賤價（常常在生產費以下）拍賣自己的商品，實行傾銷政策。一國的傾銷，就遇着別國提高關稅率的答復。這國提高關稅，又遇着那國的報復，關稅戰爭的結果，世界市場更加狹隘了。各種各樣的輸出統制，輸出獎勵，輸入許可制，輸入分配制（Quarter System），物物交換制（Barter System）等等，就成爲市場爭奪戰的武器；經濟上的Nationalism，甚至自給自足主義（即所謂Autarkie），就成爲貿易統制的主要精神。

世界市場加速度的狹隘化，更激化了資本主義各國爭取市場的戰爭。要怎樣才可能跳過關稅障壁，侵入別國地盤，是資本家日夜苦思焦慮的問題。他們終於發現了：減低本國貨幣的對外價值，即減低匯價，即能刺戟輸出。（例如英匯減低一半，則從前需一元才能買的東西，現在只要半元即能購買，故在中國當然要引起對英國商品的需要增加。）這樣，在1931年九月英國放棄金本位，減低匯價以來，日本在1931年十二月就跟着「如法泡製」，接着美國在1933年春也放棄了金本位。從此就展開了資本主義各國的貨幣戰爭。匯價的降低，在英美兩國，只比從前低落了三分之一，而日本的却降低了三分之二，加以由於龐大的農村過剩人口（相對的過剩人口）壓低日本的工資水準；低度的物質生活，更減少了日本商品的生產費，致使非常廉價的日本商品，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似的，侵入印度，南洋，澳洲，加拿大，埃及，非洲，南美，中國各地，使英美等國的資本家感受極大的威脅，尤其是日本棉製品的侵入英國地盤，躍居世界的第一位，更使英國的資本家（尤其是 Lancashire 的）叫苦連天。這樣，英國政府一方面手忙脚亂地趕快提高關稅來防遏日本商品；一方面在1932年七月在加拿大召開「渥太華會議」，想加强英本國和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經濟聯繫，構成一個經濟聯盟，以便跟別國作經濟上的鬭爭。但在國際經濟鬥爭場上，衰老了的大英帝國，總敵不過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敵不過美國。這樣，1933年六月十二日，遂有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這是想用會議的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國際間的經濟紛爭，從而共同協力，克服經濟恐慌。但因各國的立場不同，矛盾太多，這個會議也無結果而散。*

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一方面顯示出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經濟鬥爭，已激化到不能妥協的地步了；同時，這更促進列強積極進行爭奪市場的工作。在這裏，帝國主義國家，便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爲單位，組織一個經濟集團，或集團經濟 (Bloc Economy)，作爲進攻和防禦的經濟基礎地盤。大英帝國的集團經濟，美國的集團經濟，法國的集團經濟，日「滿」集團經濟，便是在地域上，在經濟上，把世界加以瓜分的幾個經濟集團。

這樣，由於世界經濟恐慌所引起的世界市場的狹隘化，以及奪取市場的鬥爭的激化，經過傾銷戰，關稅戰，貿易戰，匯兌戰，……等等，發展到集團經濟，可算已達到矛盾的頂點了。集團經濟範圍內流行着：經濟的 Nationalism, Autarkie （自給自足）高度的統制經濟，空前的軍備擴充。所有這些，一方面反映出資產階級要想跳出經濟恐慌的艱苦的種種掙扎，和它那副狼狽不堪的可憐相；同

* 世界經濟會議中的主要問題爲：關稅問題，匯兌問題，戰債賠償問題等等。關於關稅休戰問題，美國依自己的立場，主張停止提高關稅。美國這種主張，顯得需要有市場的德意兩國的擁護，但英國則因其殖民地剩盡受着美日商品的侵入，却反對美國的長期關稅休戰的提議。其次，關於匯價穩定問題，則美國利於匯價跌落不定以便奪取英法市場，而英法却要求美國確定匯價，故此問題也無法解決。關於戰債問題，法國既不還債，而美國又表示如要談判減債，須以各國實行縮減軍備爲交換條件。戰債不能解決，附帶的賠償問題，也就無法解決了。

時，更意味着跟隨帝國主義列强經濟鬥爭的尖銳化，第二幕必然要扮演出人類互相殘殺的大慘劇。1931年的「九一八」就是在世界經濟恐慌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武力掠奪國外市場的第一砲！

第三節 特殊的不景氣（蕭條）

第一項 甚麼叫不景氣

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在1932年會到達了衰落的最低點。此後各年，各國工業都略有上昇之勢。這從下表即可看出。

各國工業產額表（1928=100）

	1929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資本主義全世界	106.0	66.1	75.5	78.2
美國	107.2	57.7	68.5	71.2
英國	107.9	82.8	88.3	99.2
德國	100.4	61.2	69.0	85.8
法國	109.0	76.0	84.0	78.0

許多國家的工業生產，到1932年中間卽已達其最低點。像日本（因通貨膨脹和軍需工業繁榮）那樣的一些國家，在1931年裏；而像波蘭那樣的一些國家，則在1933年初，就到了工業衰落的最低點。根據「柏林景氣研究所」的計算，1933年的世界工業生產量，較之1932年的，約增10%，大約相當於1913年的水準。

那麼，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爲什麼可能克服蕭條的最低點呢？

「單是拿資本主義各國實行通貨膨脹和瘋狂備戰的政策來解釋最低點的克服，那是不對的。在有些國家裏，例如在日本，軍火工業的巨大定貨的確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一切國家通幣制安定的國家在內，其工業狀況都有若干的起色。因此「很明顯的，除軍事和通貨膨脹以外，在這裏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力量也起有作用。」（約瑟夫）」（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六三五頁。）

那麼，跳出恐慌的「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力量」是甚麼呢？Lapidus 和 K. Ostrovitianov 二人告訴我們說：

第一是價格的降低；第二是現有資本之大量的價值減少；第三是資本之廣汎的物理的破壞和一部分生產機構的廢物化；第四是集約的恐慌的合理化（生產的累積，生產集中在設備最好的企業上，技術上的新設施，固定資本的再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強度的增加等等。）（獨佔資本·帝國主義，經濟教程附篇第一章，）更簡單明瞭的說，恐慌的跳出，是「用於對勞苦大衆的加緊搾取，由於農民大衆的破產，由於對殖民地勞苦人民的掠奪，各國工業狀況，都居然獲得了若干的起色。剝削的加緊，勞動強度的提高，工資的削減，所有這些方法，都使好多資本家在需求薄弱物價跌落之下，也得以進行生產。同時，獨佔團體把原料和食物的價格強行減低，以犧牲殖民地農民和勞工大衆；這對資本家也是表示生產成本的減低。第三經濟恐慌摧毀了巨量的生產力，巨量製成品的毀滅。結果，使存貨大大減低，這樣一來，使供求間的比例，在多數情形之下，遂得以吻合。第四，弱小企業的破產，也給大企業騰清了市場。」（張仲實譯前揭書六三五頁。）這樣，世界經濟恐慌就在1933年裏面轉移到普通所說的不景氣（Depression，或稱「蕭條」）的局面了。*

那麼，什麼叫做不景氣呢？所謂不景氣，就是「緊隨着恐慌後的那個產業循環階段，……在這個階段，貸放資本大量休閒着。……生產過程受到限制……（在1847年恐慌後，英國諸產業區域的生產，減少了四分之三）商品價格降低到最低點，……企業精神已經麻痺……，利息率一般都很低。」（資本論同上，二二一——二二三頁，中譯三九七頁。）這就是一般的不景氣時候的經濟狀況。無疑的，

1933年會經現出了這樣的經濟狀況。因此，在1933年，世界經濟恐慌已經轉移到不景氣的階段了。但是，這個不景氣，卻不是一般的通常的不景氣，卻是帶有「特殊性質」的不景氣。

第二項　特殊的不景氣

1933年來的不景氣，跟「通常」的不景氣相反對，沒有創造出促進景氣上昇到繁榮的充分的條件。* *不景氣的形式，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作用下所引起的工業循環的變形。

這個變形，鮮明地表現在1932年中期達到恐慌最高點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發展上面，在資本主義還在上昇時代的工業

---

*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生產的循環，即普通所說的商業循環，要週期經過這樣的四個時期或局面：即沉滯時期（或不景氣 Abspannung），相當活躍時期（或好況 Mittleren Lebendigkeit），過度活動時期（或繁榮 Ueberstürzun），恐慌時期（Krise）。產業週期循環（也就是恐慌的週期性）的物質基礎是固定資本的新添和更換。（資本論第二卷德文本一五六頁，中譯一三七頁）卡爾分析這種循環時，常常側重在恐慌的分析，其次是分析發展到恐慌的那個準備時期，所以，在卡爾的著作裏面，關於「不景氣」的敘述，是零星散在的。關於不景氣，他常常用這樣的語句來表現：即「沉滯」（Stagnation 或 Abspannung），「平靜狀態」（Zustand der Ruhe）「緊隨著恐慌後的那個產業循環階段」（Die Phase des Industriellen Zyklus unmittelbar nachüberstandener Krisis）（資本論第三卷下冊，德文本二二頁，中譯三九七頁），但其實質則一。

**「原因是不讓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上升的種種惡劣條件，還在繼續著作業，如正在繼續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這次經濟恐慌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發生的），工廠開工率的慢性不足，慢性的大量失業，工業恐慌和農恐慌的交互錯綜，固定資本大量革新的缺乏（這種現象會通在繁榮到來前必定是有的）等等」（約瑟夫）

循環上，生產和事業狀態從恐慌的頂點上昇到恐慌之前的繁榮時期的絕頂，只要幾個月就足夠了。在許多場合，在恐慌期中，生產也完全不減少，只是生產增加的速度緩慢化而已。其次，在帝國主義時代，從恐慌的頂點再發展到恐慌之前的繁榮頂點，普通要一二年。

但是，1933年不景氣以來的情形如何呢？

恐慌達到頂點以來，已經經過了兩年以上，而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還依然比1928年的水準要低20%的光景。在情勢好轉了兩年以後也好，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從以前的最高點看來，還在非常低下的地位，這較之以前各個循環的恐慌的頂點還要低。

其次，顯明的，1934年夏季經濟的上昇線，又中途切斷了。在美國，——像1933年的情形——發生極度的惡化：德國經濟，向着毀滅走去。法國則繼續着緩慢的惡化。英國的好況也停滯了。1934年的第三季，跟一年前相比較，工業生產減少了，全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情勢，無疑的，也惡化了。

這個事實是很明白的，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告終的時期，愈加尖銳化了；漸尖銳到生產增加還沒有達到景氣上昇時期以前，早已就跟市場的消化力的界限相衝突了。

因為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的力量，在克服和渡過了恐慌的頂點，轉換到不景氣的一些國家，雖有引起一點好況的力量；然而，卻沒有促進景氣上昇，招引繁榮時期到來的力量。為什麼道理呢？因為：

第一，我們知道，促進景氣上昇的「物質基礎」，是生產手段的市場擴張，尤其是固定資本的革新和擴張。但在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階段，普通是現有生產設備之慢性的不充分的利用，即生產設備，未能全部利用。例如：德國工業生產能力的利用程度（%），在1929年為67.4%，1930年即減至52.2%，1931年再減至44.5%，1932年更減至35.7%。這樣看來，在生產最發達的1929年，德國工業的生產設備，也僅僅利用了三分之二，其餘的三分之一則未使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也和德國大概相同。這樣，除了軍需工業以外，資產階級對於固定資本的革新和擴張，當然要躊躇不前了。沒有固定資本的革新和擴張，當然不可能期待景氣上昇，經濟情形好轉。

第二，大恐慌促進了急激的集中過程。獨佔團體，資本主義之獨佔的性質因而更加強化了。在許多國家（英，美，德，日等國）國家的政策，刺戟着獨佔的形成。但是，獨佔的勢力愈強化，則越加妨礙技術的進步，因而減少固定資本的革新。

第三，昂貴的獨佔價格，商業部門的獨佔，販賣稅和消費稅的提高，使零售價格較之批發價格，只能降低極少的程度。這不能不使販賣給最後消費者的商品減少，從而影響到生產手段部門的生產水準降低。

第四，由於勞動大衆的失業，工資的降低，租稅的提高等等，而引起的勞動者階級所得的減少，勞動大衆的赤貧化，減少了消費資料的銷路，從而減少了生產手段的需要，喪失了促進景氣上昇，經濟情況好轉的「物質基礎。」因此1933年來的特殊的不景氣，雖不會使工業返回到衰落的最低點，但也不會使工業重新抬頭和繁榮。

在以前的各個產業循環上每逢從恐慌轉移到不景氣，則增加資本的價值增值。資本剝削勞動者，剝削農民，壓搾殖民地，才把自已的經濟狀況改善一些。這在以前各個不景氣的場合，都是這樣的。但是，在以前，資本的價值增值的好轉，會刺戟着大規模的新投資，擴張生產手段的銷路，更由此擴張消費資料的銷路，因而會刺戟新景氣上昇。但在1933年的不景氣的場合，情形却不相同。新投資非常之少。缺乏刺戟景氣上昇的「物質基礎。」因此，生產增加，在幾個月後即遇着市場的限界。商品找不着充分的大銷路，完成商品的存貨，又增加起來，又發生新的惡化。假如迅速增加着的軍備費（這雖是不生產的也好）不添加一些銷路，那麼，這個惡化會更加深刻，而工業生產會更加減少吧。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作用，暫時的局部安定的告終及與此相隨伴的帝國主義列強對立的尖銳化，階級鬥爭的嚴重化，以及一切的不安定的作用，將使工業循環更加變形吧。1933年的不景氣，隨伴着短期的恢復和猛烈的惡化——二三國除外——不上昇到繁榮時期，而拖延幾年吧。結局，又會發生更深刻更猛烈的新恐慌吧。——E. Varga 早在1934年九月的預測，又「不幸而言中」了。（E. Varga 著前揭書一六一頁。）

第四節　新的經濟恐慌和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

英國在1937年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失業者，美國在1937年有一千萬人失業，法國在1937年有許多工場停全工或停半工，這一切都有力地證明，在1929—32年經濟恐慌以後的復甦，並沒有發展成一個廣泛繁榮的時期。「從1937年下半年起，又開始了新的經濟恐慌，首先是捲入了全美國，接着就把英國，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也捲了進去。這樣，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能從不久之前的經濟恐慌的打擊之下恢復過來，在它們的前面，又遭遇到新的經濟恐慌。」（約瑟夫）

新的經濟恐慌，跟過去的週期的經濟恐慌一樣，是由於生產過剩，是由於資本主義內在的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之間的基本矛盾而引起的。但是1937年下半年開始的新的經濟恐慌，却和過去的恐慌有幾個不同之點。

第一，1937年下半年開始的新的經濟恐慌，不是在景氣上昇到繁榮階段之後，不是在工業高漲階段之後開始的；這個恐慌「不是爆發在和平的時候，而是爆發在已經開始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時期內。」（約瑟夫）

第二，1929—32年經濟恐慌的前提，是在資本主義相對的局部安定的條件下成熟了的，後來在恐慌的猛烈打擊之下，破壞了這種安定。但是，1937年下半年開始的經濟恐慌的前提條件，是在另一種歷史環境裏成熟了的，這時候，資本主義相對的局部安定早已告終，資本主義內在的種種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化了，一方面階級鬥爭達到了空前的猛烈程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瓜分世界的鬥爭，已經爆發爲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

新的經濟恐慌的這兩個特點，是互相聯系的，沒有可能突破工業的繁榮，不景氣的延長就加激了重分世界的鬥爭，這種鬥爭首先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所加強的。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給新的經濟恐慌以非常不平衡的性質。新的恐慌，已帶上了世界的範圍。它表現在集中有資本主義工業

的近五分之三的那些國家裏（美國，英國，法國及其他一些國家。）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整個的都很厲害的降低。與新的工業恐慌爆發相適應，農業恐慌也深化了，致使一切農業的國家遭受打擊。但是，無論如何，新的經濟恐慌，還沒有帶上一般的恐慌的性質。

第三，新的恐慌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它首先表現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還沒有傳播到侵略集團的法西斯國家內去。而且，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也不是一樣的：在意大利和日本，生產低落的明顯的趨勢已表明出來了；在德國，生產還表示出某些增長，但是非常之小的增長。但是，無論這些國家中的那一國，都還不能說已進到一般的生產過剩的恐慌。這是由戰時經濟的特別條件來解釋，這種戰時經濟，就破壞週期律的通常的交替。一些生產部門沒有發生生產過剩，是因為龐大的軍事的定貨；另一些部門，是因為忍受原料極端的不足，甚至也沒有可能滿足現在的要求。（理論與現實第二期，四三頁。）法西斯國家的戰時經濟及其龐大的軍需品定單，雖然多少可能推延經濟恐慌的爆發，但絲毫不能避免恐慌的襲擊。反之，法西斯國家的生產過剩的恐慌，一定要比其他國家的更厲害，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公開的或隱秘的國家破產。

經濟恐慌更進一步使侵略國家的戰時經濟複雜化，把它陷於不能自拔的苦境。經濟恐慌，阻礙侵略國家的商品輸出，增加原料的饑荒，煤炭的缺乏，財政的困難。恐慌激化了資本主義內在的種種矛盾；為彌補損失，迫使帝國主義國家加強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奪。特別是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國家，一方面乘着民衆尚未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的暴力統治，一方面利用着各民主國家不顧實力制裁，尤其是英國妥協政策的幫忙，急向半殖民地及其他國力微弱的國家進攻。1935年意大利開始了阿比西尼亞的征服戰，1936年夏季，德意兩國組織了對西班牙的軍事干涉；同時，德國佔據了西班牙的北部和西屬摩洛哥，而意大利則佔據了西班牙的南部及巴利列亞島。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佔領東北四省之後，又侵入華北，佔據了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1938年初，德國吞併了奧大利，那年的秋天，又吞併了捷克的蘇台區。1939年初日寇的魔手伸展到華南，佔領了海南島，接着德國又佔據了全部捷克和米美爾，意大利佔據了阿爾巴尼亞。

在別一方面，從1939年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進行了四個多月的英法蘇談判，在蘇聯方面已盡到了一切忍耐，而英法完全沒有誠意，尤其是英國的保守黨，始終不放棄其嗾使德國進攻蘇聯的陰謀，因而英法始終不贊成平等互惠原則，只要求蘇聯保證他們的安全，而他們卻不保證蘇聯的安全，不能保證波羅的海諸國，以便開一個缺口讓德國進入，並不許蘇聯軍隊通過波蘭去反對侵略者，致使英法蘇談判爲之破裂。在這個時期中，德國放棄了反蘇立場，他願意實際上放棄所謂防共協定，承認了蘇聯邊疆的不可侵犯，於是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就成立了。這樣，此後的局面，不能不是以德國侵入波蘭爲契機而引起的英法帝國主義集團和德國帝國主義的武力衝突。

自從1939年秋英法對德開戰以來，雙方旗鼓相敵，各不相下，彼此都沒有必勝的把握，故迄今尚未展開大規模的戰鬥行動。在這個時期間，交戰國的雙方，都展開了猛烈的外交戰和經濟戰。

在外交戰中，雙方都在拚命拉攏別國，孤立對方，意大利和美國，就在這種騎牆相持的情勢裏起着極大的作用，佔了不少的便宜，尤其是美國的軍火商，因此大交紅運，利市百倍。

其次，拿經濟戰來說，自從英法對德實行「最嚴重的封鎖」後，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手段之毒，已超過了上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第三年度。此種經濟戰，正符合於英法對德實行長期消耗戰的計劃，正符合於資本家藉戰爭以發財的目的，同時，用經濟戰來代替軍事戰，也正爲「硬性」戰爭留一個轉圜的餘地。

經濟戰首先使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直接感受到戰爭之破滅的影響，使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與政治社會地位，日益惡化。目前，各交戰國的勞動人民，已備嘗糧食缺乏的痛苦，同時，工作日又大爲延長，捐稅的負担也大爲增加。舉例來說：在英國，奶油定量分配制，規定於1940年一月八日正式施行，但在目前早已非正式地予以實施，居民奶油的供給，已比承平時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在德國，自戰爭爆發以來，即實施口糧證辦法，食物類如牛油，乳酪，火腿等日常佐餐品，大爲缺乏，每人一週限購之量，倘不足中等國家人

民一日之用，近則更規定每星期二、五為素食日，日用品則無不飛漲數倍，窮苦老百姓，乃至一般薪水階層，莫不叫苦連天，衣履適有破損，每多無力添置。

經濟封鎖同時也嚴重地打擊了各中立國家的人民生活。和二十一年前一樣，再一次地破壞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聯繫，因而若干中立國的零售物價已經大為高漲。……至於那些口頭上保持「中立」，實際上蠢蠢思動，待價而沽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瘋狂備戰的結果，甚至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擴大以前，其經濟狀況就已經非常惡化了。」（關夢覺：歐戰與資本主義經濟，新華日報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意大利就是這樣的國家。

這樣，在1937年下半年，資本主義世界又爆發了新的經濟恐慌，陸續波及各國。新的世界經濟恐慌，使失業人口激增，引起了對勞動階級之新的進攻，加深了各資本主義國內的階級矛盾，並使各資本主義國間的對立鬥爭更加激化。因此，莫洛托夫在聯共第十八次大會上報告說：「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正空前深刻地為新的世界經濟恐慌所侵蝕。恐慌把成百萬新的失業者拋到街頭，加強了束縛於資本之下的勞動大衆之沒落與貧困。若干法西斯國家，正以對內的流血恐怖與對外的帝國主義侵略，領導資本主義世界。侵略已喚起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捲進了歐洲亞洲的許多國家，並將威脅更廣。這一切事實，正是資本主義致命總危機之加強，資本主義發生生活之腐爛及其臨近總崩潰之不可爭辯的標徵。」這樣，恐慌和戰爭正威脅着資本主義世界的生存。

本章主要參攷書

E. Varga: 大恐慌及其政治的結果 (Die grosse Krise und iber politischen Folgen.—Wirschaft und Politik 1928—1934)。

L. Lapidus: K. Ostrovitianov 經濟學教程下卷（獨佔資本帝國主義。）

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

沈志遠著：新經濟學大綱。

雜誌類：理論與現實，中蘇文化，經濟週刊，新華日報等。

（附註）生活書店出版沈志遠譯資本主義一書，內容精采，但因已寫至十六章四節時才見到，未能利用，殊覺可惜。在此特別介紹。

後記

拙稿世界經濟史綱的出版，眞不容易。

早在八年前（一九四〇年春）本書即已完稿交印，但以當時生活書店的出版業務，突告暫停，致未能付排。香港戰後，曾得友人函告：拙稿在港，不幸毀於戰火。消息傳來，使我非常失望。料不到，一九四六年初夏，生活書店忽賜喜訊，據稱拙稿幸已爭獲，且在排版中。果然，不久就收到排好後的一大本清樣。當時以忙於其他雜務，無暇修正補充，加以版既排就，更不便多事增删，故僅略加瀏覽，即將拙稿清樣寄還書店。我以爲數月內即可出版，殊不知轉瞬又將兩年，仍無消息。

一週前，忽得書店通知，拙稿又已重排完畢，四月初即可出版，並囑親題書名寄滬。我想這一次總不會再流產了。

在此出版事業極度困難的環境中，拙著的一再流產，決不足怪。不過，多少感覺遺憾的，是我沒有機會把八年前的舊稿再看一遍，重加斟酌的修補。好在我並不拘泥於成見，拙稿中如有錯誤，將來一定加以修正。於此，我熱烈希望讀者們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夜補記